世纪之交热点问题报告丛书·

你应当如何爱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成才

一个父母及全社会高度警醒的话题

⊙ 刘林平/主编

爱的误区

中小学生成长问题备忘录

中国人事出版社

·代序·
中考生家长启示录

于　力

现在的中考比大山还沉重地压在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头上，尤其是家长。他们是愈压得厉害，愈要头昂起腰挺直，大有雪压青松松不倒，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他们不能不用他们并不结实的脊背支起这座大山，因为在他们的身下有孩子们，那些孩子却是经不起这山的压榨的。

不能再怪孩子们了，他们很努力地学习着。在各种压力的驱使下，他们像机器那样不停地运转，晚上学到 12 点，早上 5 点钟又起来。他们把六门功课考到 80 分以上，社会、学校还告诉他们：不行。难怪那个叫鲍比的外国老教授会惊讶他说：“爱因斯坦也不可能每门都这么好呀。”不知道中国的中学生们是否以后都会强于爱因斯坦。但现在社会、学校对他们说：“每门功课不考到 90 分以上不行”（今年北京中考分数在 600 分以上的就有 5105 人，而 600 分已几近满分了）他们太嫩了，他们经不起这种压榨，而家长要经得住。这些家长们已经经受过太多的磨难了，他们的肩在无数次筑坝、修河、造田的劳动中，已被磨出层支厚茧，肩膀有足够的硬度；他们的头已经在坎坷的人生中，弯下又挺起来，经过无数次运动，脖子已经有足够的强度。他们像海燕那样，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冲进“中考”这场暴风雨，去接受洗礼。

尽管社会上频频发出“不要紧张，不要都挤到一条路上，条条大道通罗马”等等告诫，但这些语言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在激烈得带有火药味的竞争中，却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考前，家长们就被学校告知，要把休假拿出来！你有工程师假么？拿出来；你攒了倒休么？拿出来。为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倾其所有，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精力，你的金钱。因为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在京城待考的各家各户，从清晨录音机传出第一个外语音节开始，你这留守父亲、母亲的弦就拧紧了。你要买菜、做饭、熬绿豆汤；你要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试卷、辅导书分门别类地整好，挑出以前的错题，重新誊清，以备再用；你甚至也要熟读中考的每一门总复习材料，以便提醒孩子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你忙碌的身影在书房和厨房不停地穿梭着，且又像做贼那样蹑手蹑脚，以防打乱孩子的思路。就在什么事都做完后，你也不敢开开电视和音响，甚至不敢睡觉，以备孩子不时之需。直到夜沉了，你才敢静静地坐在孩子的床边，看那熬红的双眼轻轻闭上，然后沉重地叹一口气，拖着疲惫的双腿坐在床上，掰手数着还有几天临考。尽管自己心乱如麻，还要想着明天用什么去鼓励孩子，怎样帮助他去打好这一仗。

试考完了，孩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像小鸟出了笼，可你仍没得到解放。虽然你焦急地盼着分，可又害怕看见分。分高了，你怕毛；分低了，你更怕考不上学。除非你的神经像钢丝一样坚韧，否则真要折断了。

也许有的家长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但笔者相信，大多数家长都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体会。那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所带来的愤怒，甚至由于无奈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会给社会以启示么？会推动教改的进程么？也许，将来的家长不会有笔者这辈人的烦恼了，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们。

（原载《北京晚报》1997.8.25）

爱的误区

沉重的“十字架”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

由于高考制度的局限，中小学教育形成了以高考升学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特征。这种应试教育如同一个可怕的“十字架”，极其沉重地压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他们几乎没有了玩耍，没有了春天，没有了欢乐的童年和少年，他们睡眠甚至比不上成年人，为着将来的高考升大学而早早拼搏着。他们成了身心最劳累的人。从清晨到深夜，中小学生最劳累；平均每天做 17 张练习题；“15 岁的我不快乐”；“笼中的鸟盼自由”；“死了就不用定作业了”；“春天不属于孩子”；不忍心让孩子上学；为了免除孩子的苦难，最好还是别让他们出生；近 60%的学生说不喜欢上学；毛泽东曾主张砍掉中小学生三分之一学业。

身心最劳累的人

下午 6 点放学回到家，吃口东西先睡觉，睡到 8 点多起来吃晚饭，然后开始做功课，一直到凌晨 2 点，再正式睡觉，睡不到 4 小时，就又起来复习功课，吃早饭，6 点一过，就骑车上路，每天睡眠不足 6 小时。这一张作息时间表，是一位学生家长记录下来的刚刚考上重点中学初一的女儿每天的行止，看来她比日理万机的领导还忙。

在今日的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的是每天 8 小时工作制，很多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在 6～7 个小时之间；而 6～18 岁左右的中小学生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却一倍于此。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在中国，最劳累、压力最大、最少休息时间的社会群体就数当今的中小学生。

“快起床，快起床！”清晨 6 时，当大人还沉醉于梦乡时，他们的孩子就被一遍遍重复叫唤的闹钟叫醒，胡乱洗漱一下，抓起父母为他们准备好的早点，边吃边上路。白天在学校里，满满当当的 8 节课；晚上到家已经天黑，两头不见太阳。这边放下碗筷，那边拿起笔写作业，一直要到深夜 10 点至 11 点。一天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就是上课和写作业，连中午也要赶作业；大人可以午睡，但孩子不行，否则晚上睡得更晚。

杭州《钱江晚报》曾就学生作业负担过重问题为中小学生开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夜深人静，时钟滴答，编辑部不断收到倾诉心声的中小学生的电话。已是晚上 10 时半了，杭州一所重点中学初三年级的一位男同学打来电话说，他眼前正摊着 4 张数学测试卷和 3 张英语试卷，加上当天的作业，3 个多小时下来，还只做了一半。他说，作业多还可以忍受，同学们最反感的就是罚抄。老师将班上的同学分成 4 组，每次单元测试，只要小组中有一个同学成绩低于 80 分，全组同学全得罚抄试卷 5 至 10 遍。杭州和睦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女生正在准备考外语学校，作业很紧张，每天都要做到晚上 12 点多。她说，一些语文练习已做了三四遍了，可还要再做。在两天的时间内，编辑部在晚上 11 点钟左右共收到 58 个电话，只有两名同学说打这个电话时已做完作业，其余 56 个孩子都疲倦他说，现在还无法上床。

一位初三的学生说，中考完，他整理出 6 月份发的 537 张提纲，平均每隔 10 天要发 179 张练习，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书面作业、练习册什么的。中考尚且如此，高考更是“练习满天飞，提纲遍地堆”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中、小学生，每天学习时间最长的是中国学生。孩子太累，而且不应该这样累！人们都说现在的孩子幸福，赶上了好时候，想吃什么有什么，要穿什么来什么，很少有满足不了的要求。但孩子们感到幸福吗？我们听一听孩子们自己的心声吧：

> 今天是我 15 岁生日，在父母和同伴们的祝福声中，我却流出了酸苦的泪水……
>
> 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去郊外散步，采野花、数燕子。那时的我，似一个快乐的天使，在父母的身边飞来飞去。
>
> 如今的我，却似一只笼中囚鸟，得不到自由。在我的小世界里，只有那堆似小山的作业和父母成天的唠叨。
>
> 每当我从那堆似小山的作业中挣扎出来时，每当我在逃避父母无情关怀时，我只能对着那满天星辰祈望，祈望找到一颗星星，能把我带回到童年……
>
> 今天是我 15 岁的生日，虽有同伴们和父母的祝福，但我仍不快乐。

这是四川武胜县农旺中学 96 级（3）班陈敏同学写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的一篇日记。

让我们再读一读安徽利辛县汝集镇周元学校夏雨同学 1996 年 1 月 7 日的日记吧。

> 我揉了揉瞪得昏花的眼睛，拍了拍思考得发胀的脑袋，搓了搓攥笔攥得生疼的手指，跺了跺冻得麻木的双脚，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又攻破了一道难关！要知道，我泡在题海里足有几个小时了。屋子里阴冷闲冷的，总给人一种寒气袭人之感，经不住由窗子斜射进来一缕阳光的诱惑，我来到了屋外。
>
> 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是那样的和煦、温暖，微风是那样的轻柔、舒缓，天空是那样的广阔、湛蓝，白云是那样的自由、悠闲；一群小孩子正在远处玩耍，几只小麻雀忽上忽下地飞着，一头大肥猪“哼哼”地拱着粪堆，就连那只小花猫也可以眯着眼睛舒适地躺在墙根晒太阳……而我，却似一只被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心中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却又无力挣脱这个囚禁自己的笼子，只好望空兴叹：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 时间的流逝不容我在外面逗留过久，因为还有许多复习题没做呢！

这是刊登在《青少年日记》杂志上的两位少年朋友的日记。“十五岁的我不快乐”，“笼中的鸟盼自由”，读来令人鼻子发酸，我们能说今天的孩子幸福吗？孩子的成长本应当充满微笑与乐趣，但现在人们看着他们可怜：沉重的书包，小小的眼镜，活蹦乱跳的岁月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生命还刚刚开始，未来世界的激烈竞争现在就在他们身上演示开来。如果说中学生的日记难免有些忧郁，那么家长们的看法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童话大王》1992 年第 9 期曾登载了一位年轻母亲的信：

> 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已经重得使孩子们受不了。我儿子的一位同学在一天傍晚不小心陷进城墙边的淤泥里，淤泥慢慢淹到了他胸部，一位过路的高中生将他救起，他才幸免于死。可事后他对我儿子说：“他不救我就好了，死了就不用写作业了。”在写作业与死面前，他宁愿去死，可见作业多得比死还可怕。我的孩子每天早上 6 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 9 点钟睡觉，一天十二小时，除了吃饭就是上课和写作业，连中午放学回家也要写作业，大人还睡午觉呢！可孩子不能睡。课文背了一次又一次，课上到后面好远了，还要重背前边的课文。数学题会做了，又要三番五次地做。儿童正处于发育的时期，需要充足的睡眠和尽情地玩耍，要有属于他们自己支配的时间。可现在，他们的时间却被没完没了的作业侵占了，这严重地违背了儿童生长的特点，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不客气他说，现在的一些老师简直是疯狂了，好像要学生做作业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我们国家规定，一个工作日是 8 小时，而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却远远超过一个成人的工作时间，这是地地道道的摧残祖国下一代。我儿子曾对我说，他比小鸡都不如，小鸡还能快快活活地玩。

这位家长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而既是中小学教师又是中小学家长的人谈到这个问题时心情也好不了多少，沉重中透着无奈。山东郯城县城关镇中心中学一位中学教师在信中说道：“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学 4 年级，我整天为

孩子的家庭作业、考试、休息等发愁。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方法实在成了大问题。别的不说，单说孩子的学习，除了课本内容的加深以外，那些多余的课本、课外辅导书刊简直太多了。孩子的书包每天都被塞得满满的，就像块大石头天天背来背去，书包不知被背坏了几个。甚至有时还得预备两个书包，一个留在学校，另一个装家庭作业。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算是孩子的自由时间，其余都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两头不见太阳，早走晚归。这边放下碗筷，那边拿起笔写作业。我们的老师也真够狠的，就连孩子中午吃饭那点时间，也要布置作业。有时孩子真得一边拿筷子一边写作业。难怪我的孩子喜欢上厕所里看课外书，因为就只有这点时间是属于他的，好苦啊！每到星期天，教师总要布置一大堆家庭作业，生怕学生在这一天中占了多少便宜。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中，孩子整天听到的总是责备、怒斥、威吓和喊叫的话：快起床！快洗脸！快吃饭！快写作业！就连孩子上厕所，我们也催他快点儿!今天的孩子太惨了,他们何时才能熬完这十几年的学业呀？孩子是属于春天的，而我们的孩子却被繁重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大多数时间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我们的春天不属于孩子。”

生理学表明，成年人平均每天学习 7 小时以后，学习效率呈下降的趋势。然而，初三和高三的学生们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足 6 个小时。其余的 18 个小时里，这些孩子至少有 15 个小时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中度过的。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小学生有如此繁重的学习负担。

超负荷的极度重负使得相当多的学生产生了“学校恐怖症”和厌学情绪。《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武汉某医院急诊室一晚连续接诊了 3 名因恐惧考试服安眠药的中学生，他们经抢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身边惊魂未定的家长：“今天还考试吗？”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门诊统计，患有“学校恐怖症”者占门诊儿童的 43.8%。而许多学生的厌学情绪也已经成为学校中存在的大问题。有的学校出现了考试结束学生撕书本的事，学生表示“学腻了”，但厌学情绪在学校中无疑被作为“错误”受到批评教育。本来学生是某个“错误”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只能接受并忍受这个“错误”。如果他们想站在这个“错误”的反面，他们就被看作是真正有错。

在孩子中间流传着的“在学校，课间十分钟最幸福；在家里，厕所里面最温暖”一类话，道出了他们心里的怨愤与悲哀。某杂志曾对中小学读者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从收到的 13 万张表格中看，其中不喜欢上学的占 59%，喜欢上学的只占 41%。

一位外国教育专家说，中小学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孩子对学校感兴趣，让他们喜欢学校，喜欢上学。人这一生大概要上十几年学，如果刚开始就对学校反感，不愿意上学，这十几年可怎么熬啊？所以，让孩子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基础。面对近 6 成的学生不喜欢上学，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1997 年 3 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教师李吉林在人大江苏代表团开会时发言呼吁，尽快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她念了一封两位离家出走的孩子写给老师的信，引起在座代表的强烈反应。

两位出走学生给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可敬的老师，请原谅我们不辞而别。我们知道您爱我们爱得很深，可是，我们却恨您；您为我们的学习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我们理解，但不能谅解。因为您在牺牲家庭、牺牲自

己的同时，也牺牲了我们。在您废寝忘食的教育下，我们没有了节假日，没有了星期天，没有了看电影电视、欣赏音乐的时间，同时也没有了感情，没有了个性，没有了思想。我们只是在您手下操纵的机器人。如果读书和牺牲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宁可不读书……”

孩子们对学习如此深恶痛绝，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问题在于谁都知道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书包越来越沉，但又有谁能真正将学生从繁重的习题与考试中解救出来呢？毛泽东曾主张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试一试如何？

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学校的双休日姗姗来迟；“急急迫迫盼双休，苦苦恼恼过两天”；对学校来说突出的问题是少上了一天课；双休日引发了现行教育体制深层灰的矛盾；中国现行的课程内容还是按照 18～19 世纪学科发展而确定的；把双体日充分利用起来；家长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孩子一想到双休日就发怵；勤奋就是一切吗？远离自然就是拒绝智慧。

教育没有双休日

从 1995 年 5 月 1 日起，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实行了 5 天工作制，单休日成了双休日，消息传开，到处一片欢腾。但惟独对最劳累的群体——中小学生要不要实行双休日，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反对在中小学实行双休日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实行 5 日授课制，缩短了授课时间，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主张相反的观点则是：

1.5 日授课制的实行，迫使我国中小学教育必须改革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时间不重效率的现状。

2.双休日为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3.实行 5 日授课制，降低了周授课时，使教学计划和教材都能做些相应的调整（尽管还不够），向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方向迈了一步。

4.双休日给学生提供了调节情绪、放松精神的机会，也给了学生一些接触大自然、增强体质的时间。

很显然，后一种意见是符合教学改革方向的，更何况，让教育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实行双休日制的部门事实上也行不通。这样，在大多数人享受了近半年的双休日之后，全国的中小学从 1995—1996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之始，实行一周 40 小时工作制。这一下，身心疲惫的中小学生可以缓一口气了。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良好的愿望敌不过严峻的现实，减轻学生负担的愿望被传统的教育体制车轮的巨大惯性所碾碎。事实上，双休日实行以来，对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因为教育没有实际上的双休日。

上海的一个小学生这样写道：“急急迫迫盼双休，苦苦恼恼过两天。”一位女中学生说：“休息的时间多了，作业也成比例地增加了。另外，我妈妈可能又要让我上以前没有时间上的书法班了。”两年前，孩子们欢呼雀跃：“有了双休日可真好。”两年后，孩子们紧皱眉头：“有了双休日也烦恼。”“双休日并不属于我们。”中小学生面对着双休日，仍然是说不尽道不明的无奈和困惑。

上海市少工委曾对全市 14 个区县的 22 所中学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 80%的学生双休日的主要生活仍然是学习，课业负担仍然是影响学生正常休息生活的主要原因。

实行 5 天工作制，教学计划照样要完成，对学校来说，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多放的那一天假，而在于少上了一天课，学校能做的就是加大学习密度，增加学习时间，老师和学生必然都轻松不了。一位中学毕业班的老师说：“6 天的任务压缩到了 5 天，难度没有降低，课时少了，不用双休日补怎么行？”

当然，课业负担量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并不一样。一般来说，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些，毕业班比非毕业班重些，重点学校比非重点学校重些。据统计，重点中学 90%的学生认为双休日的作业量至少要两天才能完成。

由于实行双休日，实际上引发了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教育也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规律。课时、教学计划变化，首先应修改教学大纲，再根据大纲相应地修改教学内容及教材，最后才落实到教学计划和课时的变

更上。现在由于工时的变动，要相应改变学时，这就迫使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被动地加以改变，就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首先教委下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变化本来就不大，一些删减的教学内容并不多。再加上考试大纲没有大的变动，许多老师，甚至市区教研室也不敢轻易删减内容。有考试这个指挥棒控制着，老师都心有余悸，生怕考试内容自己没讲，耽误了学生。有些学科，还由市区教研室统一印发补充教材，这都是没有办法的。教育的变革不是轻而易举的，减轻负担也不是减少点学时那么简单。长期处在教学第一线的北京十四中田校长一脸无奈地作如是说。

“我国几十年一贯的课程，教材是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白月桥教授意味深长他说。白教授长期从事课程、教材方面的研究，他对世界各国的课程、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我国现行的课程、教材体系优点是系统全面，缺点则是知识面窄，内容联系实际少，应用性差，表现出来的则是课程门类繁多，内容陈旧，现行的课程内容还是按照 18～19 世纪学科发展而确定的。20 世纪新的科学成果及发展方向，在我国的课程教材中并没有系统地体现出来。比如生态环境教育，生物工程、信息工程、能源教育等等，面对知识信息爆炸，不将课程门类进行综合是根本不行的（以上材料来自《科技日报》记者游雪晴、缪健的文章）。

还有教学手段陈旧和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头脑之中，仍然固守着所谓知识圈的“仓库理论”，他们仍然把学生当成一个储藏知识的“仓库”来培养。他们满足于几十年不变的死板的教学方法，习惯于“填鸭式”和“满堂灌”，要求学生照老师的葫芦画瓢。学生不会创造性地学习，学习效率提不高，学习负担就减不下来。正像一位教师所说的，学生在校应该学的没学到，应该学会的没学会，只好另找地方补。

也正因为如此，每到双休日，老师想多留点作业，家长又想让孩子多学点东西，社会上办学的人也想方设法多办班、多开课、多招生。这样一来，学校、家庭、社会都想把孩子们的双休日充分“利用起来”，结果是随着新工时制的实行，学生的负担愈显突出。有记者在双休日作过调查，发现北京的学校有不少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补课班、提高班、特长班。一所学校内，少则五六个班，多则十几个班在上课。不辞辛苦的家长带着孩子穿梭于大街小巷，对他们来说，双休日和平时没有区别。

从晨曦初露到夜幕降临，孩子们连轴转着参加各式各样的学习班。据一位 6 年级的学生介绍，他周五晚上上英语班；周六上午上数学提高班，下午学国际象棋；周日上午到作文提高班学习，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属于自己，还得完成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难怪有的学生说，现在一想到双休日就发怵。

一位中学生这样描述他一周的生活：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黎明前的黑暗；星期五，归心似箭；星期六，苦恼人的笑；星期日，被假日遗忘的角落。

像这样的连续作战，别说孩子，连大人也顶不住呀！一位教师说，一次，她被临时请去上表达训练课，班上一位三年级的女同学，听了一会儿课，双眼紧闭，头也抬不起来了，老师赶紧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老师，我的眼睛都花了，我看不清黑板了。”原来这位学生的家离学校很远，她每逢周末要参加三个辅导班的学习。

与实行双休日的初衷相反，家长们也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一位当医生的家长说，他的孩子每周六到学校上英语提高班，教材和学费每学期是 280 元。

北京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口气接连给孩子报了钢琴、书法、外语、数学、作文 5 个班，钢琴和书法都是单请家教，算下来，这几个班的学费每个月近 1000 元。

双休日变成了学习日，说到底还是因为教育观念的陈旧。在许多人看来，只有读书才是学习，只有书本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而学习成绩好坏则是衡量智力好坏的唯一标准。一周 7 日，日日拼搏，勤则勤矣，但勤奋未必就是一切。

有一位传记作家写道，一天深夜，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领导人卢瑟福走进实验室，见他的一个学生还伏身在工作台上。于是问道：“ 这么晚了，你还在做什么呢？ ”学生回答说：“ 我在工作。 ”“ 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 ”“ 在工作。 ”“ 那你早上也工作吗？ ”“ 是的，教授，我早上也工作。 ”学生一边回答一边略显得意地期待着老师的赞许。谁知卢瑟福迟疑一下后说道：“ 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进行思考呢？ ”

中国的学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就很难有新的创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常常可以凭课堂上的优异学习成绩享受优厚的奖学金，欧美学生常常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一到研究领域，搞点研究性项目，中国的学生往往没有欧美的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

中国的中学生在世界性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奖比赛中，屡屡获奖，威震世界；但在 1994 年有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 9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 未来家庭娱乐产品概念设计大赛 ”中，中国共有 20 所学校的 13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却全军覆没，两个组的冠军、亚军、季军中国孩子连边也没沾上，最后仅获得了一个带有鼓励性的纪念奖。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雕虫小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微技术流。但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社会成员创造性的普遍参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缺乏创造性，社会生活岂不是要蜕变成为简单的重复过程吗？

学生整天被束缚在书本上和课堂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大自然离他们越来越远。我国古代哲人说过：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中，蕴藏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人类生命的源泉。这一代中年人的青少年时代，爬树上墙掏鸟窝，官兵捉强盗，淘气的事哪个没干过，这些事情远比课堂学习在头脑中留下更为鲜明的记忆。加上林间的鸟鸣、新鲜泥土的气息，原野上的风，大自然的陶冶，使得童年有了金色的色彩，成了记忆中的“ 流金岁月 ”；但今天城里的孩子连小鸟都很少见到了。有一位小学老师对班里的学生做了一个测验，得出了一组数据：不知道棉花可以做衣服的占 45%，不知道甘蔗能榨糖的占 65%，不知道菜豆角、黄瓜到底长在哪里的占 50%。

智慧并不是原始地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而是万物作用于人脑的结果，是人脑对于信息的储存和加工。给孩子一些时间去亲近大自然吧！远离自然就是拒绝智慧。

时称家教的私塾重出江湖；广告惹得家长醉；家教开出了 15 万元天价；为了孩子读重点中学，上名牌大学；请家教不是万能钥匙；找错病因，事与愿违；隔靴搔痒，家教落荒而逃；离开拐杖，孩子怎么办？学习好坏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学习，说到匠是孩子自己的事。

“私塾”复兴

“私塾”，从孔夫子开始，一直是我国传统的传授知识的主要渠道。自清末以来，西方新式学堂传入我国之后私塾日渐衰落，解放后，在我国已基本绝迹了。不曾料想，80 年代以来，中小学教育出现的考试主义、智育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等不良现象发展成严重的病态，时下人称家教的私塾，也就堂而皇之地重出江湖，遍地开花了。面对如此繁荣昌盛的家教景象，私塾的首创人孔夫子九泉之下恐怕也要笑出声来。

君不见，漫步大街小巷，那街头广告栏里，建筑物的墙上，道旁的电线杆子上不时能看到一张张应聘家教的招贴广告。“想使您的孩子各科学习成绩优良吗？”“想让您的孩子出色成材吗？”“想请一位能包成绩的家教吗？”“想发掘您孩子的潜在智能吗？”一句句灼热的广告词掷地有声，撩得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怦然心动。

每当华灯初上或周末节假日，夹着书本讲义的老师前往学生家私授课业，或者中小学生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去老师家接受传道解惑。老师和学生匆匆的脚步在轻松散漫的都市夜晚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了解，现代的私塾先生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小学的语文、数学老师和中学的数、理、化及英语老师；另一部分是在校的高年级大学生。在新私塾中老师所讲的内容五花八门：或以各类“达标”、“精编”等学科辅导读物为蓝本，或对课堂讲述内容予以预习、复习、补充，或辅导学生做作业。

与孔夫子只收束脩不同，新私塾可谓收费不菲。中等城市一般每小时 10 元至 15 元不等，在沿海一些大城市，当然又要高出许多，一些有一定名气的中小学教师的价码则数倍于此。据报载，上海有一位特级教师每月的“束脩”在万元之上，10 倍于工资。

1997 年 4 月 27 日《广州日报》报道，温州一位大款给家教开出了天价。这位大款在当地报纸刊登一则巨资聘请专职家庭教师的广告，允诺如果孩子考上大学，一次性奖励该教师 15 万元。登广告的业主称，十几年的经营，钱已不成问题。他和妻子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年方十四、读初一的儿子身上。夫妻俩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甚感知识的重要。几经考虑，便在报上刊出了招聘专职家庭教师的广告，要求应聘者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知识全面系统，懂电脑，外语达国家四级，并能科学辩证地进行教学。具体待遇：包吃、住，配有空调、电脑。月工资 1200 元以上。教学效果佳，年度成绩达到班级前 5 名奖励 3000 元，达到年级前 10 名奖励 8000 元，如考取高等学院，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家教会骤然升温？有人说是因为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在岗不敬业，导致学校教学水平降低，弄得家长不得不费心劳神找人给孩子补课，既造成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有人认为这一现象和独生子女的增多有关，在望子成龙心理的驱使下，家长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除了在物质上尽量地满足孩子之外，很自然地是关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很多家长的时间、精力和知识水平又有限，不一定能满足孩子的需要，所以，为孩子请家教也算一种补偿。

事实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的增大，才是家长们争相为孩子请家教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学习好，读重点

中学，上名牌大学，将来在就业方面才能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花点钱请个家庭教师似乎也合乎情理。

但请家教未必就是万能钥匙，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最终还是要靠学校对孩子进行综合素质的教育。带着盲从心理随波逐流，不但不能如愿以偿，而且还会事与愿违。

一位初三年级的学生本来成绩不错，但父母希望他更加出类拔萃，萌生了请家教的念头。父母希望通过家教使孩子在学业上“超前”，即把课本教材赶在课堂教学之前先让孩子学，以领先一步达到步步领先的目的。殊不知，这种过度施教起了拔苗助长的作用。孩子精力有限，又必须同时兼顾家庭教师辅导的进度和课堂教学进度，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孩子对超前的教学内容学得一知半解，到了课堂，面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又觉得似曾相识，难以提起学习的兴趣来，结果两头没有着落，花了钱，搭了工夫，事与愿违，孩子成绩反而下降，家长为此后悔不迭。

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是普遍现象。应当承认，请家教对提高一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有一定作用的，正如我们不否认补课也能起一定作用一样。否则，面对高昂的费用，家长们也不会这样趋之若鹜，问题在于大多数家长请家教具有盲目性。如有一部分家长，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但看到别人不惜重金请家教，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落后，于是硬着头皮也要赶时髦；也有许多家长并不清楚孩子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于是，哪一科都请一名老师，或认为“请一个总比不请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天天奔命过于疲劳，有的是心理负担大重，当然也有些基础知识差。因此，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请家教。

还有的孩子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请家教如同隔靴搔痒。如北京有一位孩子，智力并不差、但家庭的过分溺爱滋长了他的依赖性和惰性，学习怕苦怕累，习惯松松垮垮懒懒散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抱着“60 分过关”的侥幸心理，初一和初二勉强凑合过去了。一进初三家长开始着了急，像这样混下去孩子怕难以毕业。情急之下听人说家庭教师有办法，决定不惜代价为儿子请家教突击，以重金聘请了几位资深高手强化辅导，数、理、化加英语，每科一位，每周七个晚上轮着转。家长算是不惜工本，家庭教师不负所托也着实尽心尽力。然而，一则这孩子由于前两年没好好学习，基础实在太差；二则孩子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等非智力品质决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内因的问题没解决，家长再着急，家教再努力也系徒劳。资质再深，水平再高的家庭教师也难以使一个怕苦畏难、不肯努力的孩子跨越“战胜自我”的横竿。几位家庭教师都没能坚持到一个月就在无奈的叹息声中先后离去了。人参固然有滋补作用，但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

家教的目的是为了使家教对象能“得高分，考大学”，这就决定家教的性质只能是课堂的延伸。它的学习形式与课堂有所不同，是教师与学生一对一，但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权威。它使学生更深地陷入了“上课——复习——作业——预习——上课”的沼泽地之中。

家教的遍地开花给本来学习负担过重、已疲惫不堪的孩子的身心又加了一重负担，它的负面效应肯定要大大超过正面效应。问题的严重更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家教既然以提高学生考分为唯一目的，家庭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所能起的作用也只是一种“拐杖”的作用，是对课堂教育的辅助。现在课堂上是满堂灌，唯一需要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就是课后的复习、预习和作

业。人们都知道授之以“渔”胜过授之以“鱼”。鱼是现成的食物，而“渔”则是一种获取食物的能力，是需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具备的。失败也是一种学习，甚至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事非经过不知难”嘛！家教在侧，孩子是会少走一些弯路，但同时也少了走弯路的可贵经历。学习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独立思考，而离开了独立，独立思考又从何说起呢？孩子如果长期依赖于家教这根拐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独立行走,什么时候才能独立面对难题呢？家庭教师日日耳提面命，或许暂时会使孩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如果由此使得孩子丧失了对自我学习能力的开发机会，那就不仅会得不偿失，而且还要贻误终身。美国著名的未来学专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归根到底，学会怎样学习要比掌握知识本身更重要。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提倡的教育思想是注重让学生学习“如何学习”的方法，强调在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位顾问，一位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应该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启迪思考。

中国的教育传统历来只注重书本教育，这也有它的优点，例如学生的基本知识比较扎实。但现在书本教育只允许分数的评价，所谓“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就是它的本质性注解，私塾的再度复兴也根源于此。如此强行、甚至严酷的灌输，将把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乐趣彻底葬送在学习阶段。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体系以及家长的观念只是注重学生的智力因素，而在智力因素中又只注重学习成绩。事实上，孩子学习成绩好坏与智力因素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由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像学习兴趣、动机、习惯、意志、毅力、自制力、自信等，还有一部分是缘于生理、心理、情绪的问题。只不过后者更隐蔽、更内在，因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时所说的，“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也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非智力因素体现为一种人格的力量，它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倾向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坚定不移的性质，环境的变迁不会轻易改变它；它会按自己的倾向性去运动思想和行为；当外界的条件不利时，它还具有强烈的自卫机制。

学习，说到底是孩子自己的事。通往科学的道路是漫长的，老师（包括家庭教师）应以教给孩子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主，发掘孩子发展的潜力，培养他们良好的非智力品质，激发他们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发奋努力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学习是艰苦的，一个孩子只有胸怀大志并立志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拼搏，才是最最重要的。

中国的父母为自己孩子操心最多；为了孩子，坚持在陋室里“抗战”12年；为了孩子，母亲辞去了工作，父亲累死了；马斯洛的理论缺少子女是否成功这一层面；只要成绩好了，什么都好说；棍棒底下出成绩；成绩不好被父母拷打致死；中国学生无人将父母列入爱自己尊敬人物的排行榜；中国的家庭教育迫切需要科学的介入。

畸形的爱

中国的家长大约是世界上为自己的子女操心最多的家长。为了子女能成为自己期望中的人才，做父母的可谓殚精竭虑，熬干了心血。

《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了一组图片，取名“沉重的爱”，看后让人刻骨铭心。照片的主人公是一位年仅 7 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他有一个十分舒适的家，有电脑，有沙发，可他却很少享用，因为他所在的重点学校离家太远了，为了能让儿子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母亲办了病退，在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又小又潮的屋子，陪儿子一起读书。只有周末，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团聚。冬天太冷，门窗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充作课桌的茶几，做饭的炊具，便全是孩子要读的各种各样的书了。

每天放学，母亲就陪着儿子一起读书。母亲说，他们要在这小屋子里“抗战”12 年，直到儿子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

一位家住重庆名叫莎莎的女孩，9 岁时，她的父母就带她去远在成都的一位音乐教师学钢琴。每个星期妈妈带着莎莎去成都上一次课。两年多下来，莎莎和妈妈坐火车在重庆和成都之间“走”了 36 万公里路程，这 36 万公里相当于 30 个长城，14 个红军的万里长征。

12 岁那年，莎莎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她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地挤火车了，但妈妈为了让女儿学好功课、练好钢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到成都，陪着女儿，和女儿一起向着理想的高峰攀登。可是不久，噩耗传来，莎莎的爸爸为了做女儿的坚强后盾，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干，不知疲倦地四处挣钱，结果病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本世纪，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那时候，父母亲过分强调“恩”，讲究让孩子报恩。如今的父母亲过分强调“爱”，讲究向孩子献爱。但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将生命的赌注全押在孩子身上的爱是不是太沉重了一点？

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特别迫切，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高已成了一种特殊的病态。

从为人父母开始，几乎大半生都是为孩子而活着：从孩子出生到抚养长大，上学就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几乎全过程都恨不得全部承包。这种“承包一切”的爱，充分表达了父母们的慈爱心意，但并没有给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带来适当的能量和养料。现在的家长普遍缺少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一般常识，加上他们大都经历过“文革”，是“被耽误了的一代”，许多人把想上大学而没有上成的愿望统统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考上大学，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

孩子还没生出来，就又是听胎教音乐，又是做胎教按摩，恨不得孩子生出来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生出来之后呢？又是搞零岁方案，又是吃巨人脑黄金，恨不得孩子从幼儿园出来就是博士后。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大大超出了孩子们的承受力：“你要为我争气啊，孩子！”“你考不上大学叫我的脸往哪儿搁？”相当多的父母都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像口袋里的东西一样可以由自己的意识来支配。有人说，马斯洛的自我完善理论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个理论的五个层面中，并不包括子女是否“成功”这一层面。而在中国，成功的父母，会因不出色的子女感到莫大的羞辱；而不成功的父母，更缺乏宽容，他们把子女的成功当作自己成功的

最后赌注。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在一项题为《上海地区幼儿家长家庭教育现状的研究》报告中披露：市区和郊区共有 57.8%的家长要求孩子“样样争第一”。市区 77.94%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达到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对于孩子的职业，市区 91.48%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脑力劳动。天津曾进行过一项学生升学愿望的调查，发现家长和孩子的愿望有明显的冲突。孩子愿上中专技校的人数比家长愿望多，家长愿子女上大学大专的人数是孩子愿望的两倍。

诚然，望子成龙是每个做父母的愿望，但如果家长期望值背离了社会需要和孩子身心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性格发展、社会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

“你要是考不进市重点，我就抹脖子！”——这是一位母亲大人在对女儿进行恐吓。性格开朗、活泼大方的女儿如愿以偿地考进了重点，母亲以百般的宠爱善待她，因为女儿替娘争了光。“你必须在全班考第一。”显然母亲的筹码在升值。看来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不会搁浅在一个水准，父母有要做成功者的愿望，儿女们就得成为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渐渐地，女儿脸上笑容在消失，焦躁与不安爬上了眉宇——学习上她没有成为全班第一。“期末考试成绩要是达不到 90 分，我就抹脖子！”母亲威胁的口吻还是那样坚决。终于有一天，女儿离家出走了。

一旦孩子功课不好，投入巨大的父母往往比孩子更伤心。一位下岗的父亲靠帮人家拉货挣钱养家，在醉酒后哭着对 10 岁的儿子说：“你爸爸这辈子没啥造就了，就是累死，也得把你培养出个样儿来。你就好好学，将来成个人，让我累死了也能闭眼吧！”

据一些家长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反映自己的孩子功课落后，这样的消息比股市暴跌还要让他们难过。

在高期望值的支配下，父母评判子女好坏的标准严重失衡，孩子教育成败多是以智力发展的好坏来衡量。“小孩成绩好，一‘好’遮百丑。”有位家长说，“孩子懒一点无所谓，大不了我当个‘高级保姆’；要是成绩不好，那就完了，将来不是我当保姆的问题，而是孩子饭碗有没有的大问题。懒，仅仅是可能变‘虫’的问题，而分数，却是关系到将来是否成‘龙’的问题。”

于是，我们的父母与孩子相处时的焦点只有一个——考试成绩。只要考试成绩好了，什么都好说；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怎么都不行，孩子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考试成绩。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家长们对学习好的孩子，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极尽娇宠。每年寒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许多大型市场都会挤满一家三口的购物者。原因是孩子考试前家长往往许诺，考得好就给买高档玩具、衣物、自行车，他们是来实现承诺的；而好些饭馆也因此赚得钵满盘满；许多大型游乐场也因家长们的慷慨解囊而大大赚上一笔。当然一些成绩没有达到家长要求的孩子，是绝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不仅如此，“你真蠢”，“你混”，“没见过你这么傻的”，“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看人家×××，从不让父母操心”，此类咒骂声劈头盖脸，整天不绝于耳，整个家庭被愁云悲雾笼罩着，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更有甚者，一些父母信奉的是“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成绩”。

一位小学生写道：“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数学和语文都得了 94.5 分，而我父母给我定的是两科都要考 95 分以上，我各差了 0.5 分。为

此，妈妈一巴掌朝我脸上打来，爸爸也在一旁大声责骂我。当时，我呜呜哭起来，可是没人帮助我。”

一位安徽合肥读高中一年级的女生给某作家写信说，父母也有对她好的时候，那必须是在她考试得了好分数。这位颇有文采的高中生描绘了一次因考试成绩没考好挨打的令人恐怖的场面：“在短短 20 分钟内，我梳了两次头发，但终究还是徒劳一场，妈妈那双仿佛长出来就是为了对付我的头发的手，毫不留情地撕、扯、拽、拉，使我的头发拆散了三次。这样下去，一年以后，我可以不用剃头就上九华山。我没有疼痛，没有泪水，心灵和全身都是一片麻木。我只是拼命护住脸，不让妈妈在我的脸上留下战绩。我不愿让同学们知道，一个上高中一年级的 17 岁的有自尊的女孩，还会挨打，而且像狗一样蜷缩在父母的脚边，用身体去抵挡他们的拳脚。妈妈一边打我一边哭骂，她那看起来像个刚出院的病人一样虚弱的身体，出拳伸脚却又准又狠。但我更怕的是她的语言，她说她不知道怎么会生下我这样一个没良心没人性的畜牲。爸爸的表现沉稳得多，他一边踢我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不可救药的烂货色。”这位女同学悲愤地呼喊：“虽然我已经上了高一，但我读不懂父母的心，他们到底爱不爱我？”

更加惨不忍睹的悲剧也时有发生。沈阳一位 8 岁的孩子，被父亲一记耳光，猛踢两脚送上西天；武汉一个孩子被父亲连捆数道吊在梁上致死；贵阳一位 7 岁孩子死里逃生，但腿上、股部留下 22 道被父亲用火钩烙的红黑相间的伤痕，“跟烧焦的猪皮一样”的肚皮……三个惨案三个孩子的“罪名”都差不多是“逃学、贪玩”，而三个父亲对各自所犯罪行的口供都是如此一致：都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的爱——“恨铁不成钢！”

一个个善良幼小的心灵，就这样被“爱”摧残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啊？法国一项科学调查资料显示，在喜欢打孩子的父母中，有 83%的人智力属低下水平。他们不得不借助于体力来完成对子女的教育，以弥补智力的不足。像上述父母，自身素质极差，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不懂法律（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打孩子触犯法律），他们不配为人父母。

家长打死孩子，这只是个别现象；但家庭教育不成功，却是普遍的现象。据中华妇女联合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全国抽样调查的一万户家庭中，家庭教育比较科学的只占 23%，方法欠妥的占 51%，有严重偏差的占 23%。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孩子们也持同样的看法。1996 年 8 月《中国妇女报》组织了一次有关家教问题的社会调查,给中小学生列出了一份 25 道题目组成的问卷。从回收的 5000 多份问卷来看，反映的许多问题的确发人深省。有 31.5%的学生埋怨家长只知道关心他的学习成绩，有 26.6%的孩子反映：“我想做的事家长总不让我做；经常不让我看电视；爸爸妈妈禁止我玩游戏机；无法获得课本以外的关于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知识。”30%的中小学生感到学习压力太大。以往，考大学的起跑线是在高中，从高一起才开始向大学冲刺。而现在，起跑线逐步移到了初中甚至小学。不少家长督促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奋斗，起跑线越来越提前。一个五年级的男孩在写信时几乎是大声喊叫：“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而最使对孩子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家长不可理解的是自己居然得不到孩子的尊敬。这从一家国际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到证明。

这家国际青少年研究所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高中学生进行“最

受你尊敬的人物是谁 ” 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美国 13 所高中的 1005 名学生，日本 15 所高中的 1303 名学生，中国大陆 22 所高中的 12201 名学生。美国学生最尊敬的人物前三名依次是父亲、乔丹（美国篮球球星）、母亲；日本学生最尊敬的人物前三名依次是父亲、母亲、坂本龙马（日本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而接受问卷调查的 12201 名中国学生中没有 1 人将父母列入受自己尊敬的人物的前 10 名中。

作为中国的父母，不可谓对孩子爱之不深，但仅有爱是不够的。不少国家的通讯社对这次调查表示了关注，埃菲社曾刊登了这样一篇评论：“ 中国的父母自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家，他们批评西方国家的家庭缺乏亲情，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他们在自己孩子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最近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中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成功。在中国，不少父母力图通过他们的孩子来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他们望子成龙，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超过所有的同学，成为佼佼者。然而他们对孩子的要求往往超出孩子的能力，以致伤害了孩子的自尊与自信心。个别孩子由于不堪忍受巨大的学习压力而被迫走上了绝路，如一个学生因高考落榜受到父母羞辱而自杀身亡。在家里，父母把孩子看作是小大人；在学校，老师给他们布置了超负荷的作业。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人们要对不合理和过时的教育制度引起重视，这种教育制度把儿童当大人对待，完全剥夺了对于他们今后成长必不可少的童年生活。 ”

记得高尔基曾说过，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连母鸡也会做的事；但如何教育好他们，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家庭教育迫切需要科学的介入，要提高儿童的智力水平，就要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使教育者先受教育。当然家庭教育失败的责任并不全在家长，教育界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孩子与家长谁更可怜？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伟人的母亲是以巨大的人格力量感化着自己的孩子；家长在应试教育中充当配角；家长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陪太子读书 ”；“ 我是老师还是妈妈 ”；从长远来说陪读对孩子的学习有害。

陪读的尴尬

在中国，做学生难，做学生家长就容易吗？一位身在师范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将他家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称之为“儿童集中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但自己又不得不削尖脑袋设法将孩子送进去。真是黑色幽默！不知道谁更可怜？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从 1901 年废除八股文，1904 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起，还不足百年，而我们却有着一千三百余年科举教育的传统。80 年代以来，中小学教育的考试主义、智育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新抬头，差不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目前的教育状况，无论学生、家长、教师、校长、教育主管部门都不满意，人人喊打，又似乎都无能为力。如同一部已生了锈的机器，但还在以巨大的惯性运作着，作为这部机器的一个小小螺丝钉的学生家长，其处境的尴尬和无奈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历史人物在功成名就之后无不满怀深情地回忆父母的教育对他们一生的生活道路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对他们无以伦比的影响。如鲁迅连笔名都是取自母亲的姓，他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鲁迅的许多生活情趣是在母亲儒染熏陶下培养而成的。18 岁那年，他在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下放弃传统的仕途而选择了进洋学堂学洋务，这在当时是颇受世人歧视和轻蔑的，却也由此显示了母亲的开通。巴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主要不是经世致用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钟爱，而是对于人类之爱的教育。他曾说：“妈妈教我爱一切人。”“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心。”贯穿在巴金一生中最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就发轫于母亲的教育。所以他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母亲。”老舍的说法与巴金非常类似。他说，他从小到大有成千上百的老师，但是“真正的教师”是他的母亲。她给予孩子“生命的教育”。他说：“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与这种情况相似的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伟人。

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所有这些伟人的母亲并无高深的文化修养，有的甚至目不识丁，她们没有也不可能去具体地关注孩子的学业，但却以巨大的人格力量感化着自己的孩子，高屋建瓴地教育孩子怎样处世做人，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和陶冶要胜过语言千百倍。

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挚爱；但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所充当的角色就得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更直接地介入子女的学习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现在的父母亲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具备了这种可能性，同时，也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所谓成功，按现在的应试教育的模式，唯一的标志就是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老师与学校按照这种模式培养学生，家长则在这种模式中充当配角，谁都轻松不了。

孩子如牛负重，家长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就甭想老师会对你有好脸色。哈尔滨某外企中方经理殷先生说：“我不怕各种震动和刺激，就怕接到孩子不理想的成绩单。接到学期通知书的感觉，和收到巨额生意签约方的回书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一些家长说，别

的都不怕，就怕老师反映孩子功课落后，这样的消息比股市暴跌还要让他们难过。

另外，家长既然是配角，无论自身在事业上如何辉煌，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都必须进入角色。北京市法院系统的一位处级领导曾对朋友说：“平时都是我调遣别人，但只要孩子的班主任一个电话，我就是再忙也得抽时间赶到学校，在老师面前，我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有个孩子刚考进一所重点中学，第一次月考，成绩不理想，孩子的家长找到学校，问学校是怎么教的，原来孩子在小学是前 4 名，现在怎么成了 40 名？而另外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长则从自己没尽到责任，影响了年级的总成绩，影响了班集体的荣誉直到影响了老师的晋升和待遇等一再作检讨。事后，老师向学生描述了这两个家长的不同态度。前一个学生家长听说后，马上赶到学校向老师道歉，连声说自己不懂事，不是个东西，让老师大人别记小人过，千万别把帐算在孩子身上。不知怎么搞的，堂堂几尺高的家长，好像一下子变矮了。

面子不好看也好，忍辱负重也好，家长都能够理解，老师毕竟也是为了孩子好。最让家长们头痛又不得不勉为其难而又难以有理想效果的是“陪读”的角色。

陪读，古已有之，古时候皇帝为东宫太子或有钱人家为子弟请来私塾老师，怕孩子寂寞，请几个资格差一些的或贫困的孩子陪着读书，后来“陪太子读书”就演绎为作陪衬的意思。现在的应试教育，就是要把能使孩子提高成绩的一切潜在的可能性都挤压出来，家长自然也就别想轻松了。

重点中学的学生家长自然要陪读，一般学校的家长也得陪。一切围绕孩子转，父母陪子女读书，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现象。据了解，目前小学生的“陪读率”（尤其是低年级）几乎达 100%；即使是初中学生，其初一年级的“陪读率”也高达 75%以上。每当玉兔东升，华灯初上，在城市的每一个小家庭里，年轻的父母或架着老花眼镜的祖辈陪着子女或孙子、孙女做作业，成了城市里的一道独特的夜景。孩子的爷爷、奶奶恐怕都是初次享受陪读待遇，如笔者这样的中年人，记忆中从未有过父母陪在身边读书的经历。

从陪读的内容看，除了主课外，还有陪着学音乐，学英语，学绘画，学计算机等等，几乎遍及目前中小学课内课外的一切学习领域，当然主体是检查、解难、释疑、督促和辅导子女的中小学课程。

家长对陪读是一脸的无奈。“说实在的，我真不愿‘陪读’。”在长沙某开发公司工作的小邓说，“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大多是各单位的骨干，自己的学习、工作任务都十分繁重，再‘陪读’实在力不从心。可是，不‘陪读’不行啊！”

据家住南京市下关区的春霞女士说，她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该班老师要求孩子每天除完成正常科目的家庭作业外，还要完成由家长出题并批改的‘家庭作业”。即家长每天给孩子出 30 道算术题，当天的语文生字抄写 10 遍，家长督促孩子完成后由家长批阅。遇上双休日，孩子、家长都休息不了，因为 90 道算术题还在等着家长出孩子做呢！

在中国药科大学工作的陈女士诉说，她女儿上一年级，其老师要求家长给孩子“自由出题”加强当天新课记忆，并督促孩子把当天语文新课背诵 20 遍。加上每天还要辅导孩子拉一小时小提琴，画半小时图画，“忙得我自己都认为我是老师，不是妈妈了。”陈女士坦率地说，“孩子辛苦，家长更辛

苦。孩子没上的课，家长先读，语文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算术的加、减、乘、除，一样不能少。老师将课外作业推给家长代劳，于是孩子就用老师的标准来要求家长。老师的职业是教书，可家长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呀。”

有文化的家长陪读还好办，苦就苦了那些没文化的家长。在北京某机关食堂工作的张师傅没读几年书，他只得经常举着录音机，拿着孩子的作业本或错题卷子，请一些大学生给分析、讲评，录下音来放给孩子听。他说：“我没文化，学舌也学不好，索性录下来，这样也省了孩子跑路拜师的时间。”他还自嘲地说：“老了老了，倒成了孩子的胳膊腿……”

不管家长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是有能力还是没能力，从老师和学校的角度来讲，让家长陪读是为了充分开发资源，督促孩子学好知识。但父母长期陪读，过多地介入孩子的学习，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陪读助长了孩子的依赖性。学习，归根到底是孩子自己的事，而家长不辞辛劳地陪读，反而使孩子滋长出一种顽固的依赖心理，把父母当“拐棍”，有些孩子作业粗枝大叶，做完也不检查，以为反正有父母把关，学习的责任感也就悄然失落，而责任感恰恰是孩子成长的基本要素。过度保护孩子是没有必要的，对孩子从小就应该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学习是他自己的事，将来有出息也是他自己的事。

家长的陪读也使老师的教学得不到真实信息的反馈。由于家长参与了孩子的作业，教师从学生的作业中获得的信息反馈也就含有较多的水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情况，不利于教师因材施教；教学中的失误和疏漏难于暴露，不利于教师改进工作，老师常常惊诧于：“这些孩子平时成绩不错，为什么考试就名落孙山？”这恐怕就是陪读带来的后遗症。

家长的陪读还会使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稍有不懂就让父母讲解，甚至让父母做好习题后再背诵，对一些思考题，很少有学生主动去做、去思考。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学生做作业的过程不仅是对白天所学知识的巩固，也是自我检查、自我批判的过程，自我批判又伴随着灵感的发挥。因此，孩子能自己检查出作业中的错误，既能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又能发展批判性思维与灵感性思维。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人李远哲博士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好老师以最短的时间给学生很大的发展；最坏的教育是不好的老师占了学生所有的时间，学生又得不到什么。这段话确实发人深省。让家长代替老师占有学生全部课余时间，究竟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做法呢？结论应该是明确的。

2 拯救“学奴”

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降问题

中国的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了“奴隶”，成了“学习的奴隶”。

学生的书包压迫着他们；父母的爱在压迫着他们；整个社会的竞争氛围在压迫着他们……

而要改变这一切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

书包为何由斜挎改为双肩负重？注意：青春期前原友性脊柱侧弯；书包压得孩子直不起腰杆；“读书太累，太没意思”；在美国，孩子背着空书包去上学；字校教育行为扭曲，教育本质异化；新华书店乘机搭车；副省长突击检查字生书包；法国规定：书包不得超过学生体重十分之一；我们什么时候为书包立法？

沉重的书包

80 年代以前，学生的书包是斜挎在左肩或右肩的，80 年代开始，医学专家呼吁中小学生应采用双肩背的书包，以避免双肩失衡，脊柱弯曲。双肩负重的新式书包迅速普及，今天斜挎的书包已很少见了。成年人，包括笔者一开始难免怪医生无事找事，心里嘀咕着：我们那个时代都用斜挎的书包，也没见谁变得一肩高一肩低。等到自己的孩子一上学，疑团立刻释然：专家的忠告果然有道理。原因不在于现在的孩子肩膀特别嫩，而在于书包里的内容已经今非昔比了。有资料表明，80 年代以后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一入学便要学习六七门课，书包重量达 3—5 公斤。6 年后，当他们升入初中一年级，他们的双肩需要背负的“知识”将增重到 10 公斤左右。比较他们的家长小时候读书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加上两本作业本外加一个铅笔盒，满打满算毛重也就是一斤多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笔者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喜欢写诸如‘蹦蹦跳跳上学去”之类的话，要是换到今天，恐怕得被当成病句了，试想，背着自己体重三分之一重负的孩子能蹦跳得起来吗？如此重负沉甸甸地压在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改单肩为双肩，至少可以将重量分布均匀一些，这种改革虽然无奈，但也总算是用心良苦了。

书包式样改了，肩膀倾斜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人算不如天算，越来越多的学生却“挺不起腰杆”。据南京《金陵晚报》报道，1996 年南京市某重点中学十里挑一，选出 10 名成绩优异、体质较好的学生报考飞行员。在文化考试合格后，大多数人却因不同程度地患有“青春期前原发性脊柱侧弯”而被淘汰。

“青春期前原发性脊柱侧弯”已使不少中小学生“挺不起腰杆”，它表现为人体背部两块肩胛骨有大小差异，脊柱弯曲呈“S”形，脊柱两侧肌肉受挤压而变形，待少儿发育成熟、骨骼定型后，极易形成驼背，同时可能影响心肺正常功能。由于普通体检中没有脊柱侧弯检查这一项目，易被忽视。但随着近年来中学课业负担加重，患有轻中度脊柱侧弯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据南京空军四五四医院“招飞行员体检队”体检资料显示：南京中小学生中脊柱侧弯发病率逐年增高。招收飞行员体检资料表明，在外科体检中脊柱侧弯淘汰率是外科淘汰率平均数的 3.5 倍，且城市高于农村，重点学校高于普通学校。仅对某县 900 名小学生的体检中就发现，脊柱侧弯发生率竟高达 14%。

除了坐姿不当，运动量不足，过重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的书包是引起青少年脊柱侧弯的主要原因，这是骨科专家发出的警告。

打开一年级小学生的书包，在与他们年龄、身材不相称的大书包里，大大小小课本及配套教材、练习册有近 20 本。其中除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外，还有自然常识、生活与劳动、健康教育、体育与保健、音乐、美术，以及活动课基本教材，小学生交通安全等，此外还有汉语基本拼音卡，手工材料及好几本课堂练习册。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小萌友，偌大的书包顿时将他们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童趣“镇住”，金色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学生们每天背着沉重的的的书包上学，背着沉重书包回家，还要做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学生学得辛苦，学得厌倦。一位初三的学生称自己是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艰难“跋涉者”，被那背不完的复习提纲，做不完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初一的学生对家长说：“爸爸，我们班上有些同学说不想

上学了，他们感到读书太累，太没意思。”这样的话出自十来岁的孩子之口，丝毫不奇怪。如今的中小学生背着如此沉重的书包，如此疲于奔命，做如此多的作业，到底为了什么？成年人肩荷如此重负都感到劳累，何况都是些娃娃！孩子们的身体垮了，他们成人后对中华民族又有何用？即使能背再多的定理、公式，强记下来不少呆板的知识，能胜任建设祖国的重任吗？

面对孩子们肩上沉甸甸的书包，耳边不禁想起本世纪初鲁迅发出的呐喊：“救救孩子！”

课业如此沉重，书包如此沉重，首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陈旧。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教育只限于书本知识，而书本知识也只有靠“题海战术”才能灌输到孩子的脑袋里。这种教育观念不改变，学生的书本怎么能不“肥”呢？注重书本知识全面而牢固的掌握是我国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利也有弊。利在基础较好，弊在创造力低下。我们强调的基础通常是以记忆书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其实际意义已经大打折扣了。

一个叫高钢的中国留学生把 9 岁的儿子带到美国。当他送儿子进一所美国小学的时候，感到匪夷所思，学校根本就没有教科书，老师看了他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后居然说，6 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是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次书包，一个比一个大。现在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这也叫上学吗？

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有了长足的进步，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背回来一大包书。问儿子干什么，儿子埋头于那些书本和微机，头也不抬地说：“做作业。”

这位家长一看电脑屏幕上的标题，真是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也未必敢写呀！

几天后，儿子完成了作业。打印出来居然是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儿子还把文章分出了章与节，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这位家长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法。那时，他已 30 岁了。

不久，他儿子的另一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打印出来不止十页，儿子洋洋得意地对父亲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后来，小家伙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回答：“老师没为我骄傲，但是她为我震惊。”

当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教育制度不同，不能简单地作类爱的误区。

比，但是在课堂上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果真有必要吗？

除了教育观念陈旧的问题，导致学生书包太重还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品化和市场规则的影响，使学校的教育行为逐渐扭曲，教育的内在本质逐渐异化，已今非昔比了。

教育局下属的教研室的职责应该是指导教学，但现在却利用职权编发辅导教材。据报载，湖北某市中学生必须订《中学生语数英》和《中学生》杂

志，还有大量的练习册、达标手册、辅导材料，每个中学生几乎得买 30 余种。教师也很反感，可又不敢不让学生买。你不买，他明天就出这上边的题考你。

负责经销学校课本的新华书店也随意搭车，在学生课本上乱搭配。如初中一年级，按照国家教委的规定是 11 门课程，可有的地方却发放了 23 种“课本”，除了《语文》、《代数》外，还有许多“配套课本”。光语文一科，就有“语文练习册”、“一课一练”、“语文基础训练”、“单元测试卷”、“作文训练”、“语文课外读物”等 6 种。课本太多，也增加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原来按订书单预收款每套 40～60 元，等书本发下来之后，学生没订的书也随着课本一起发，结果，书店结算“课本”款时，每套竟高达 150 元。这样，学生的书包能不重吗？

学生的书包太重，负担太重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苏州市红十字会发起“保护少儿健康，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签名呼吁活动，社会各界上万人在长达三十多米长的白布上签名支持，其中就有众多的家长、教师、校长和机关干部。可惜签名呼吁只是一种社会舆论，并无法律功能，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面前，又能奈其何？教育部门也曾对如何布置学生家庭作业作过一些规定，但一纸文件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据 1997 年 3 月 22 日《广州日报》报道：湖南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唐之享亲自到

一所乡村小学校门口突击检查学生的书包，仅从一位一年级学生的书包里就找到《小学生语文基础训练》、《小学生数学基础训练》、《单元自测题》三本多余的书。这位副省长说：“城市孩子的书包更重。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辛苦。”“乱订滥发资料的事，今年我们要下决心再清理几次，准备过些日子搞个突击行动，端掉它几个黑窝。”表态虽好，但根据经验，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单单动某一方面，也未必能奏效。

大概还是得请出法律这尊神来保护学生娃娃，中国的保护未成年人法为什么不能包括一项规定学生书包重量的法律呢？在中国，雇佣童工或少年儿童被虐待毕竟是极少数，而几亿中小学生却被沉重的书包压得直不起腰来。法律的着眼点不是要保护大多数人吗？事实上许多国家已经着手这项工作了。法国教育部已发出通知，规定学生书包不得超过学生体重的十分之一。目前，法国议会正就此展开讨论，许多议员主张专门立法，以保障儿童的发育和健康。另外，许多人建议学生可使用专用书橱或发双份课本，以缓解学生上下学时负荷过重，有损健康的状况。

书包过重犯法！这是泰国曼谷颁布的一项限制儿童少年书包重量的法令中的规定。根据这条法令，小学生的书包不得超过 2 公斤，初中生的书包不得超过 3 公斤。如果违反规定，学生的家长和他所在的学校将受到一定的惩处。政府官员和老师有权对上下学学生的书包当场抽查。

泰国教育部门的官员说，颁布这条法令，主要是出于对儿童少年健康的考虑，因为书包过重将会对孩子的骨骼，特别是对脊柱有着严重的损害。

中国什么时候出台这项法律呢？为书包重量颁布一项法律，并非小题大作。没有法律规范，怎能迅速扭转上述社会行为？当然，规定书包不得超重，还是不治本，要根治其弊端，就应在教育改革上用气力。

中学主近视率高达 60%！眼镜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证；眼睛视力和学习成绩孰轻孰重？近视还具有遗传性；学生视力下降王要原因是学习压力太大；我国中小学教育难度大大超过欧美国家；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快乐教育”不留家庭作业；大作业量与成绩优良无必然联系；教会学

生思考更重要；让孩子的眼睛从书本和作业本上解放出来。

镜光闪烁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我国的中小学生近视病率已相当惊人。管中窥豹——广州市教委体卫艺处的陈医生 1997 年 3 月曾透露，1996 年广州市中学生的近视率高达 62%，小学生的近视率也达 27%。每年高考，广州市大约有 80%的应届高中生因近视等身体原因而受到大学专业报考的限制。

近视眼并不是地方病，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未必会比广州好。有例为证：一次观看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个中学生节目，有人发现在现场的数百名中学生中；竟有一半以上带着眼镜！一位做了十几年初三班主任的老师说，他最头痛的是给学生安排座位，患近视的学生越来越多，谁都想坐在前排，还得顾及高矮顺序。“四眼狗，四眼狗”，带着眼镜的小学生们则是互相笑骂着。一个个体户把眼镜摊点摆设在某市一所重点中学的门口，他说，这儿的生意挺好。除了近视，有材料说，目前全国还有的 1000 万名儿童患斜视或弱视。

眼科专家警告说，儿童近视后果严重的，有可能引发视网膜脱落而导致失明，千万不能大意。据 199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教育报》报道，黑龙江省兰西县初三年级学生何刚十分用功，每天作业和复习都在晚上 10 点以后结束。不幸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眼前反复出现黑影、闪亮和云雾遮挡的现象，眼镜片加大到 850 度也看不清考试试卷。诊断结果，原来是高度近视引发了视网膜脱落。近 6 年中哈尔滨光明眼科所已收治此类小患者 55 例。

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黄佩刚教授指出：“学生期间，特别是小学时期，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眼球还没有定型，眼组织也比较脆弱，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很容易形成近视，如果不及时矫正和治疗，则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加强中小学生爱眼保健已刻不容缓！

中小学生视力严重下降，越来越多的孩子带上了眼镜，但至今尚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在小学课本里至今没有“近视是不健康”一说，直到初三的《生理卫生》课中，才给近视一个说法。而在社会传播媒介中，眼镜更是知识分子的象征和“身份证”，就连现在流通的 50 元面额人民币票面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架着一副眼镜的形象。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读书人带眼镜是天经地义的，眼镜是知识的化身，眼镜越厚，知识越多。而对大多数父母亲来说，孩子的视力和成绩如果只能择其一的话，出色的成绩似乎比一双明亮的眼睛更重要。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水汪汪的眼睛”，“水晶般的眼睛”，“明亮的眼睛”，“清泉般清澈见底的眼睛”历来是文学家最下功夫描绘的人体器官，现在被厚厚的“酒瓶底”挡住了，如同清澈的江河水被现代工业所污染，他们还能用什么词语来描写“心灵的窗户”呢？诗人说：“黑夜给了我们一双黑色的眼睛，使我们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光明不也要大打折扣吗？

更加可怕的危险还在于：据医学专家说，近视还具有遗传性。大多数先天近视的儿童，皆因其父母双双都戴眼镜的缘故。

学生视力日趋下降，固然有缺少爱眼保健活动宣传，学生不注意用眼卫生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学生学习压力太大、负担太重，应试教育违背了自然法则和少年儿童的本性，束缚以至损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的本质已由促进人的发展异化为单纯技艺的训练，作为谋生工具的知识和技艺的传授已淹没了人的发展目标，本应是健康、充满欢乐的学习

过程成了不堪忍受、有损健康的苦役。

在学校里，学习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眼睛保健操如同虚设。许多学生不能找准穴位、正确做操，老师也缺少细心的指导。而有些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甚至把毕业班的体育课都免了。我们还不适当地加大中小学教学的难度，大学的内容下放到高中，高中的内容下放到初中，初中的内容又下放到小学。文科的内容难以比较，但我国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的难度，一般比欧美学校同年级要高一个年级以上。一个中国学校的“差生”，转学出去学习往往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这种加大难度的代价，是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并使一大批学生成为跟不上教学进度的“差生”，甚至丧失学习的动力和信心。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 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为了赶上学习进度，学校只能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延长学生学习时间，增加学生学习强度，课内课外作业越来越多。学生整天目不离书，眼睛疲劳过度，视力严重减退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的孩子每天学习时间一般都要超过 10 小时，而根据用眼卫生标准，小学生每天用眼时间不应超过 6 小时。

学生视力下降还与启蒙教育过早密切相关。现在的启蒙教育越来越早，有些未满 5 岁的孩子就被父母隐瞒了真实年龄，送到学校就读，使发育还不健全的孩子用眼负担超出了年龄的承受能力。

学习时间长了，用于游戏和娱乐的时间必然就短。中国儿童的学习时间之长，负担之重如要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绝对找不到竞争对手的。日本学校的竞争也很激烈，但却难以与中国相比。调查显示，日本学校小学生每天在家学习 30 分钟，而中国的小学生则是 1 小时 30 分钟，是日本小学生的三倍。据一项中美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一年级儿童娱乐和运动的时间平均每周 18.4 小时，而中国儿童为 9.2 小时；美国一年级儿童每周用于写作业的时间平均为 3.5 小时，中国儿童则为 7.8 小时。其结果也是合乎逻辑的：数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学生普遍身体素质差，视力不良。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即使在现有的教育体制的框架下，学校如果坚持教学改革，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刘修业和王同瑞校长，推行一种名为“快乐教育”的教学方法，寓教于乐，靠引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获得知识。这所学校一般不留家庭作业。在湖南省中小学教育改革先进县——汨罗县，竟有高中教师几年没给学生布置过课外作业，而当地 1995 年考上大学人数的比例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在全国农村县市这个比例之高也是绝无仅有的。1997 年 2 月 5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杭州高级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校长齐栋在学生作业方面规定，初中除语、数、外三科外各科不得布置课外作业，每天作业量不得超过 1 小时；高中增加了物理和化学，作业量不得超过 1.5 小时，其他各科的作业一律在课内完成。各班的学习委员负责记录每天的作业量及作业时间，每周上报一次。他还规定，教师不得私自为学生购买各种练习册；未经教导处或校长室批准，不得私自打印、复印学习资料。每学期，校领导在各班抽查两位学生的全套作业，调查作业布置的质量和数量。而这所学校采用以上举措之后，1996 年高考升学率名列杭州市第一，并且还在全省排名第二，创历史最好水平。让我们向这些教学改革的探索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见，即使从应试教育的角度来看，大作业量与良好的成绩也无必然联系。只是像齐栋这样的校长和教师太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在时间压力

上，在作业数量上，在重复劳动上负担的确过重，但在思维训练上，却强调得远远不够。学校和老师往往把提高教学质量的“宝”压在加班加点、书山题海、频繁考试上。不顾学生死活，一个词语让抄百遍，一个题目让做十遍，还美其名曰：“加深印象”，“强化记忆”。一些自身学识素质不高的教师一旦发现学生有过错，不论是学习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均采用大量作业来惩罚。《中国教育报》1997 年 2 月 19 日刊登了一幅名为“惩罚作业何时了”的照片，并附加说明，一个初中生的代数练习簿，封面上清楚地大写了一个“罚”字，打开一看，里面已密密麻麻地抄写了 13 页，可只做了 5 道题。立方和差公式、和差的平方公式、平方差公式分别要抄 180 遍、200 遍和 190 遍。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老师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

我国教育传统的弊端在于追求知识的过程，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于自己的思考，而对现代社会来说，后者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前者。在学校教育中，有两样东西远比死记硬背重要得多：一是教会孩子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其次是训练孩子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北京师范学校、湖南汨罗县和杭州高级中学之所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他们注重的是思维训练和能力的开发。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家皮亚杰的认识发生理论，人之所以能接受知识，是因为人有构造知识的能力，比如马戏团里的猴子，尽管它能模仿人类的一些行为，但由于它本身没有构造知识的能力，所以不可能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老师的工作不是“教”给学生什么，而是来构造知识。所以，对学生来说，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校的任务是创造出种种的环境和条件来刺激学生产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愿望，并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启发性的指导。

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少一些、再少一些“读”和“写”，多一些、再多一些“想”和“创”，不仅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生存挑战，而且还能够把孩子稚嫩的眼睛从书本和作业本上解放出来，让孩子黑亮的眸子更多地凝视草地、树木的翠绿和大自然的造化。

升旗仪式中，学主因体力不支而晕倒；我国中小学主体质问题和营养问题日趋严重；军校难以招到合格的学员；生活好了怎么身体反而差了？学习压力大，睡眠不足导致发育不良；孩子的主长主要是在睡眠中完成的；不要因获奖失去了我们的判断力；偏食和吃零食有害孩子健康；家长：别吃坏了你的孩子；“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动物’”。

虚弱的体质

镜头一：清晨，一所小学举行升旗仪式。短短十分钟，一个班竟有 3 位女同学昏倒在地。

镜头二：某地为中学生举行了一次 18 岁成人仪式。仪式开始 40 分钟之后，几个孩子接连倒地，而一些高龄的领导和离退休的教育工作者却能坚持一直站立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镜头三：清明节，济南市许多学校组织学生步行去英雄山烈士陵园扫墓，仅仅一二公里的路程，一些学生便吃不消，在扫墓过程中一天竟有十多个小学生晕倒。据烈士陵园的王主任介绍，面对许多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学生，烈士陵园只好在清明节期间设立了一个临时医务处。医务处平均每天收治十多名这样的学生。

据 1997 年 4 月 17 日《广州文摘报》刊登的消息：国家有关部门不久前进行的全国性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我国大中小学生的体质问题和营养问题却日趋严重，营养水平有所下降。这份由国家教委、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科委共同组织撰写的权威的调查报告，呼吁各类各级学校、家庭和全社会共同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努力提高他们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以迎接 21 世纪对人力资源和人才质量提出的挑战。

现在，学生身体素质差的恶劣后果已初显端倪，足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1996 年，昆明陆军学院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收地方高中毕业生，情况不如人意，令人感到心情沉重。

军事院校招生的一般程序是：先提取学生档案，对档案进行审查，身体素质方面主要审查考生高考前的体检表，符合一般征兵标准（双眼裸视在 1.50 以上，男性身高 1.62 米以上，体重 48 公斤以上，无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再通知考生进行身体复检。去年昆明陆军学院计划在广西招收 8 名学生，共提档 48 份，其中只有 14 人符合身体复检条件，对这 14 名考生由部队医院进行复查时，其中只有 6 人完全合格，占提档数的 12.5%，不合格考生的身体问题有近视的、肝炎的、心脏病的、龋齿的、高血压的。据了解，在广西招生的共 15 家军事院校，除外语、技术类等对视力要求较低的院校外，大部分军校的提档和争取的比例在 8∶1 以上，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同。此外，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军校在中学招生的遭遇大体相似。所以，尽管报考军校的考生较多，但如此大的淘汰率使各军校都感到生源紧张，不得不采取降分提档，从未报军校志愿的考生中调剂提档等手段来完成招生任务，所录考生无论个人气质和考分都不太令人满意，影响了部队的建设。

历史上，只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或饥荒，才会导致百姓体质普遍下降。报上曾刊登过一幅获世界摄影大奖的照片：一个非洲饥饿的儿童，骨瘦如柴、目光呆滞，给人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而我们如今是物阜民丰、国泰民安，市场供应丰富。身为独生子女的中小学生，更是家里“小皇帝”、“小公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娇生惯养。怎么事与愿违，弄得如此弱不禁风？人们不禁要问：“祖国的花朵”还没开放就要枯谢，“祖国的明天”还能灿烂得起来吗？

孩子体质下降，弱柳扶风，首先是我们的应试教育难咎其责。教师们狠抓升学率，家长们望子成龙，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全社会所有工作的成年人都已实行周双休日制，我们的中小学生，那些年仅 7—17 岁左右的孩子

们，却恰恰与成年人相反，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仅没有周双休，反而连休息时间也因学校、老师或家长抓学习质量或补课，而被挤掉太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中、小学生是世界上每天学习时间最长的人。至于全民健身计划，似乎只有中小学生例外，孩子压根就没有时间健身。毕业、升学考试主要课目的考分越定越高,有的由过去的满分 100 分上升到 120 分，再升到 150 分；考题分量逐年增加，考试范围由课本延伸到课外的比例也在增加，随之而来的课内课外练习资料、辅导题型，如雪片似地从不同渠道飞向学生。而补课，更是时下中小学校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时间是固定的，无法将其拉长，学习强度的加大和学习时间的延长，只能以压缩睡眠时间为代价。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

医学专家认为，孩子的睡眠与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孩子的生长主要是在睡眠时完成的。科学研究发现，孩子的生长发育，除了遗传、营养、体育锻炼等因素外，还与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很大的关系。生长激素是人下丘脑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它能促进骨胳、肌肉组织和内脏的生长发育，对促进新陈代谢也有一定的作用。而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其特定的规律，即人在入睡后才能产生生长激素，深睡 1 小时后逐渐进入高峰，一般从深夜 22 时至凌晨 1 时为分泌的高峰期，其分泌量约占总量的 20%—40%。所以，如果睡得太晚，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儿童来说，身高就会受到影响。因此，10 岁以内的儿童在晚上 20 点睡觉最为适宜，17 岁以内的青少年最迟也不要超过晚上 22 点睡觉，这样，过半个小时即可进入深睡期，就不会错过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期。孩子睡得越香、越深，生长激素分泌越多、越旺盛，孩子生长发育就越好。克扣孩子的睡眠，等于克扣孩子的健康！

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按照科学的要求，小学生每天的睡眠不能少于 10 小时，中学生应该在 8～9 小时，这是正常的生理需要。可现在的孩子大都没达到这个标准的睡眠时间。而且，由于学习压力过大，相当大的一部分孩子睡眠质量也不高，对于学习和身体都是很不利的。

睡眠不足对健康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视力下降。其二，体质较弱。虽然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但学生的身体素质不但没有相应的好转，一些体育项目的达标率比 10 年前还低。心脏病、高血压等成年人的高发病已开始侵害青少年稚弱的身体。有的学生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一遇天气变化、季节交替，总有不少学生感冒发烧，打针吃药。其三，神经系统疾病明显增多。有的学生已开始出现神经衰弱症状，小脑缺乏活动训练，动作行为显得呆傻笨拙，而大脑思维反应也被圈死在课本、习题、考试的“怪圈”之中，对圈外更广阔的天地，有的孩子竟茫然无知。

导致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的饮食缺乏科学性，存在着普遍的营养不良的情况。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国进行了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均发现体质不能随身高相应发展，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此种情况被视为营养不良。

调查结果还显示，男生营养不良率城乡分别为 33.44%和 21.17%，女生营养不良率城乡分别为 44.44%和 35.78%；缺铁性贫血城市男女生分别为 33.42%和 36.07%；农村男女生分别为 7.58%和 38.64%。以上数据表明，营养不良在我国中小学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生活条件好的城市的学

生要比生活条件差的农村的学生更成问题。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其他疾病也有相应的发展，如由于膳食过量造成的肥胖儿童近年来迅速增长，有消息说 13 岁的北京儿童肥胖率为 17.28%，超过香港近 6 个百分点。

中小学生成了最劳累的人，身为学生家长岂有不心疼的？

于是家长对孩子，一方面在学习上苛求得不近情理，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都是百般呵护、百依百顺、娇生惯养，要什么给什么，吃什么给买什么，似乎对孩子在生活上的放纵可以多少弥补一下因在学业上对他们过度施压而产生的心灵上的内疚。据统计，北京市一名幼儿园的孩子，每月的消费约占双职工家庭月收入的 50%，当孩子进入高中时，这一比例上升到 65%。但是，正如过度施教于孩子健康成长有害，饮食太精，过度营养同样对孩子健康不利。

现在偏食的孩子很常见，诸如只吃肉不吃蔬菜，不少家长对此束手无策，任由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使得孩子食谱非常单调，根本谈不上平衡膳食。

还有许多孩子吃零食太多太杂。有记者访问过某小学的一个五年级班级，结果发现 90%以上的学生都有吃零食的习惯。我国的营养知识也不普及，大多数家长、厨师未受过营养知识训练，很多家庭膳食结构不合理，营养不平衡。加之家长多为双职工，难以照顾好孩子膳食，致使许多中小学生早餐简单马虎，午餐随便应付，晚餐大吃一顿，结果是许多孩子肠胃出了问题。广州一位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说，她近期给 450 名因“肚痛”前来就诊的孩子做了胃镜检查。结果，胃功能正常的只有 19 人，其他孩子不同程度患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炎等胃病，甚至还有一例胃癌患者。有关人士呼吁，营养状况不仅是学生健康的基础，更是学生正常生长发育和完成学业的基础。对全社会，特别是学生家长开展营养健康教育应是重要的策略之一。

一位西方思想家曾意味深长地说，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动物”。意思是说要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像野兽一样地生存。

具有良好身体素质的民族，乃是民族繁荣的首要条件。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上的竞争，其成功者都必须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忍耐力。

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有成千上万的人顶不住压力垮了下来。不少人的失败并不是其他方面的条件差，而是因为体力和耐力不支而瘫软下去的。因此，在教育上，培养孩子在智力上适应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在体力耐力上也要能够适应和忍受过度的消耗。对于未来来说，孩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 21 世纪的太阳将由今天的中小学生们来共同托起！

青少年急需进行心理救助；现在的孩子有着比上一代人更深的心灵苦闷；绝大多数学主是失败者；不该发生或本可避免的悲剧；失败的教育使教育失败；应试教育丢掉的是使人成功的 85%的机会；因老师的一次批评而轻生；成绩不好要去医院开弱智证明；不按时完成作业被罚吃牛粪；强国先强人，强人先强心。

感觉综合失调症

天津天和、儿童、红桥、和平等 4 家医院的医生，1996 年连续对 8 名因在课堂上或挤眉弄眼、或打嗝干咳、或四肢抖动、或注意力不集中、或自言自语的小学生进行诊治发现，这些学生并非“不遵守课堂纪律”，而是由于学习紧张、心理压力过重而导致的一种神经性紊乱综合症引起的。

一名五年级男生，从半年前开始一走进教室就觉得嗓子奇痒、吞咽困难。上课时经常干咳不止，影响了课堂纪律。老师开始还以为这个学生存心捣蛋，几经教育后仍无“悔改”方引起重视。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化验，均未发现器质性病变。后在天和医院被确诊为神经性咽堵综合症，这主要由于学习紧张、心理压力过大引起的。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是现在这一代青少年相当普遍的特征，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国家“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课的专家学者在对万余名学生进行最新心理检测后发现，约有 32%的中小学生存在着心理异常表现。北京、上海学龄前独生子女心理障碍的比例则高达 50%以上。另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心理疾病的发生率呈直线上升咨询诊室趋势。北京同仁医院临床心理专科的心理医生赵梅近年接触了许多走进她心理咨询诊室的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心理异常的表现为：厌学、考试紧张、人际交往恐惧、单相思、出走等轻度的心理障碍，严重的甚至导致自杀。据了解，心理异常严重者还不易痊愈，对疾病的抵抗力也大为降低，影响今后的生长发育。对此，一位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忧心忡忡地呼吁：“对青少年进行心理救助是时候了！”1996 年 4 月中旬，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召开的“心理健康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也指出，青少年，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急需有针对性地进行救助！

都说这一代孩子是在蜜罐中泡大的，生活优裕、无忧无虑，但事实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首先他们生长的社会环境比以往更为复杂，他们遭遇的生活境况也许更没有先例可循。他们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没有伙伴，形成了畸形的优越感和深重的孤独感。另外，他们肩上所承载的压力和期望也是历代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厚的物质条件的背后，他们往往有着比上一代人更深的心灵苦闷。

人的心理和生理一样，有一个承受压力的限度，弦绷得太紧会断，心理压力过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松驰，也会出现异常。

时下，中小学生被考试、名次、排榜压得抬不起头来。竞争，这个成人社会的最具激励作用的口号，也深入到中小学生的世界里。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成“龙”，父母们不惜采取各种办法，对子女的要求严上加严。“你要是能考上 100 分，我就给你 100 元钱”——重金刺激；“你要是考不上重点，你就别回家”——恫吓威胁；“你这次拿第二名，下一次必须拿第一名”——家长的期望在升值……

然而，第一名只有一个，更何况排名次又是不确定的金字塔，它只许一个人蹬上塔尖，但谁也不能保证不掉下来，重点学校也只是少数，招收的名额毕竟有限。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失败者，达不到父母制定的“目标”。于是，每个孩子都被分数和名次这个标准筛上筛下，不得不品尝被筛下来的痛苦滋味。而家长的“压”、“吓”、“打”等一些“逼子成龙”的措施更是在孩子受伤的心灵上搽了一把盐。整天喋喋不休的辱骂会使孩子的

心灵变暗失色。一些原本性格开朗的学生，从此变得郁郁不乐，缺乏自信，对学习害怕甚至恐惧起来，身体、心理素质都明显下降，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减弱，甚至对生活也失去信心。一些心胸较狭窄、情绪不稳定的学生更会产生心理疾患，从而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或本可避免的悲剧。

济南市某中学初三学生颜某期末考试考完语文和物理后，感觉成绩不理想，次日凌晨 5 时半，母亲发现女儿已服了“ 敌敌畏 ”，立即送医院，颜某终因服药量过多，延误时间过长而死亡。她留下的遗书写道：“ 我想我的成绩不会太好，希望妹妹能圆大学梦。 ”

北京某一家庭，夫妇俩都是高等院校教授，因儿子高考成绩欠佳只能在大学当自费旁听生而感到丢了面子，成天在儿子面

前唠唠叨叨：“ 这么不争气！我们出门都没脸见人。 ”孩子的精神在高度压力下终于彻底崩溃，竟丧失了理智，残酷地用电线将生身父母活活勒死，“ 免得你们无脸见人！ ”

更邪门儿的还有一个高考生本来已经考上了大学，但经不住“ 如果没考上怎么办 ”想法的折磨，竟在考分下达前一天自杀了。还有一个班出现了“ 集体自杀 ”，有 6 个同学成绩不好，竟相约在一起吃安眠药。

“ 失败教育使教育失败 ”。人的心理结构可大致分为智力、情绪、意志三部分，现在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素质的要求偏重于智力，而在智力中又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测验这件事上。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超负荷运转、一试定终身等等，这种不当的教育是诱发学生心理问题的罪魁祸首。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很“ 优秀 ”的学生，由于成绩好，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在情绪和意志方面的弱点，“ 一俊遮百丑 ”造成了一部分“ 优秀学生 ”情感脆弱，性格乖癖，承受力极差，经不起风吹草动。据了解，我国高校少年班学员中约有 1/3 不能完成作业被淘汰，这有性格、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承受能力差和发生心理精神疾病的原因。

美国著名的演说家卡耐基从他自身的经历中总结出了这么一条规律：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十五靠专业知识，百分之八十五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中国的应试教育恰恰抓的就是这百分之十五，而丢掉的是百分之八十五。所以一个在学校的品学皆优的学生可能完全不懂社会，无法适应人际关系，心理脆弱，受不得一点挫折。

北京某重点中学的一位 15 岁的初三女学生，因受到老师批评、家长责问，于是写下一纸遗书，次日凌晨 1 时割腕自杀未成，又于凌晨 4 时从房间的 6 层窗口跳下，仍未死，在血泊中神智清醒地静静躺了两个小时，被人发现送往医院，造成终身高位截瘫。

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她和同学议论老师受到批评，学校通知家长向当事老师道歉，当晚，该生回到家受到家长责骂，遂酿成了这场悲剧。

据记者报道，该学生在小学连续 6 年被评为“ 三好学生 ”，小学毕业前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当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这所重点中学。现在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就是这样一名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竟经不起老师的正常批评而轻生，令人深思。长期比较顺利的环境使她缺乏承受力。当她受到委屈和挫折时，便选择了最消极的回避方式——自杀。她想从此得到解脱，却坠落到更深的痛苦之中。温室中生长的孩子，心理发展滞后于生理发展，意志薄弱，经受不起挫折，稍稍一点风雨，便摧折了嫩芽。我们在关心孩子们的饮食起居、授以学识的同时，对他们的心灵是不是也应

留意、关怀几分？

如果说，我们对那些学习成绩好，被认为优秀的学生的心理失常理所当然地表示深深惋惜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因学习成绩不太好，被认为是差等生的学生受到老师粗暴对待而遭受心灵摧残，更应表示万分的同情。

沈阳某校有位教师，她的班上有位女生某次考试成绩不佳，该教师竟强迫学生家长带着该学生去沈阳市妇女儿童保健的智商测试室测智商，并让孩子测智商时装傻，一定要拿一张弱智证明书回来。于是，当医生问这位学生狗有几条腿，她说不知道。问她一斤有多少两，她说是一百两。测验结果，她的智商只有 46。这样，该学生的考试成绩就可以不纳入班级成绩，老师的工资和奖金就不会受影响。

明明清楚狗长几条腿，却要当众说不知道，以此证明自己笨，再用自己的笨去证明老师的不笨。这位老师可以坦然地拿奖金、评职称、分房子、长工资了，可是孩子心灵上的创伤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弥合。

一所普通小学，每个学生都有一本评分册，学生做错了事就得扣分。迟到多少扣多少分……上课做小动作扣多少分，没带作业本扣多少分。不少怀有上进心的孩子捧着这样一本评分册犹如惊弓之鸟。有些学校，老师动辄就把学生叫到黑板前或教室外罚站。考试错了一道题，罚抄 50 遍到 100 遍。有些教师对学生时常出语讽刺挖苦，当众伤害学生自尊心。比如有同学打个瞌睡，老师就会说：“ 早死三年，可以睡多少觉啊！ ”某一个问题没有搞懂，老师会说：“ 牛教三遍都会转弯，你乍还不懂呢？ ”有同学提问时答不出来，老师又会说：“ 你怎么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呢？ ”像这类常见的，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足以在某一个错误的时刻摧毁一颗稚嫩的心灵。

国家要强盛，“ 强人 ”是前提；“ 要强人 ”，首先要“ 强心 ”，要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还给中小学生一个广阔的生活与学习空间，给孩子以更丰富的学习内容，减轻人为制造的压力，以鼓励而不是摧残的方式帮助他们驱散恐惧心理，是确保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根本所在。

3“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是流行于中国大地的民谣，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从科举取士开始，到 20 世纪末的今日，除了短暂的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之外，中国的莘莘学子便把自己的前途与考分捆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上演了一幕幕命运悲喜剧。

为“标准答案”，三名小学生愤而诉诸法律；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标准答案”；语文试卷让作家懵了头；澳大利亚：中小学找不到标准教科书；小学生面对考试发感叹：”我下辈子愿意变只熊猫，不用学习，还是国宝”；学生日记：老师当众宣读分数的感受；小学生及格分数“大跃进”：95 分；看风水，改校门，求升学。

标准答案

“自作自受”中的“作”应该读第几声？是第一声，还是第四声？

这可以是一个学术问题，语言文字专家可以进行考证争辩，可以写论文发表；这也可以是一个瞎聊的话题，茶余饭后，人们闲下来可以引经据典，抖抖书袋。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四川江津市的三名小学生竟愤而向法院起诉，状告市教委，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这打官司的事缘何而起呢？

1995 年 6 月，江津市四牌坊小学语文毕业考试卷中，有这样一道题：选择“自作自受”中“作”字的正确读音。校方的标准答案是第一声。成绩公布后，部分家长提出答案有误，应为第四声，要求学校更正，但这一要求未被采纳。结果毕业生张鹏鹏、黄佳、庞颖茂三人因选择第四声被扣去一分，失去升入江津中学资格（三人的总分离该校录取线差距在一分之内）。

7 月 14 日，三名小学生向江津市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市教委。9 月上旬，在法院未作判决的情况下，这三名小学生不得不向江津中学分别缴纳 6000 元“捐资助学金”，才得以就读这所四川省的重点中学。

10 月 26 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作出纠正错误的书面答复，补发原告江津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赔偿原告损失费各一万元（含“捐资助学金”、学生的精神损害、家长的误工损失和诉讼费用）。

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家长）在庭审中称：“作”字的读音，在 1985 年 12 月 27 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简称“两委一部”）审定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有明确规定，除“作坊”的“作”字读一声外，其余都读第四声。小学课本中的“作”字第一次作为生字出现是在第二册第十八课中，注音为第四声。在第十二册第八课中出现“自作自受”时没有再注音。

被告认为，“两委一部”的通知，江津市教育委员会到法院开庭时还没有收到。四牌坊小学在未得到正式公文的情况下，根据原教材和商务印书馆 1994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自作自受”的“作”字标注读音为第一声）阅卷评分是正确的。

三名小学生的家长之一的张尊宁 11 月 3 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原教材是指 1985 年 1 月第一版的小学课本，但被后来“两委一部”公布的《审音表》所否定。这届学生所用的教材均是 1985 年 5 月的第二版。而 1994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采用的仍是 1983 年该书的第二版，与 1985 年审定公布的国家标准相比，谈不上法律上的权威性。他问道：“教育主管机关和学校，以没有收到正式公文为由，拒绝执行国家公布的语言文字标准，这是什么逻辑？”

关于此案，被告委托代理人之一、江津市教委普教科长王一民说：“教委不应成为被告。今年教委将小学毕业考试权（包括命题权、组织考试权、阅卷权等）均下放给四牌坊小学等学校。据调查确认，该校的毕业考试工作是规范的、公正的，是比较严密的。因此教委没有权力否定该校的阅卷成绩。

原告对此则认为，被告系江津市教委，作为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对所属学校负有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责。对原告代理人反映的情况，理应依法查明事实，纠正错误。

原告和被告的是是非非自有法院判定，我们这里暂且不论。三名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敢于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其勇气也令人钦佩。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了标准答案而打官司，这足以载入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司法史的案例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标准答案？人们为什么要遵循标准答案？标准答案真的标准吗？学生学习是为了得到或者懂得标准答案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进行深刻的思考。在这里我们也不打算提供某种标准答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些事例吧。

据说，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当年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为了考考他故意出了一道题：“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学过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孔雀东南飞”是乐府古诗的一个标题，除了作种种解释外，很难回答出个所以然。很显然这是一种善意的刁难。听了提问之后，赵元任不慌不忙地爽快答道：“因为‘西北有高楼’。”

现在的考生就不同了，如果有这个题目的话，那么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标准答案，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灵活性。

又据说，有一次老作家韦君宜翻看孙儿的语文试卷，看来看去头皮发麻，过了几十年文字生活的老作家完全被试卷上的 A、B、C、D 选择题搞懵了头。她老人家欲辨不能，真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本来好多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的语文问题，在这份试卷上被分解成一个个似是而非的 A、B、C、D，并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就使得韦君宜这样的作家都无所适从。

作家王周生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到中小学生的作文。他认为，如今考作文，不强调真情实感，只要立意好，切题，段落清楚，前后呼应，哪怕你是照别人的范文写，也能得高分。作文应该打假，作文打假保护的是青少年的思想素质，提高他们的文学修养。这是比商品打假更重要的事情。如今的语文教学，阅读经典著作成为奢侈。如今的语文欣赏，成为繁琐累赘的名段分析。他的一篇散文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语文学习》的编辑叫他写一篇如何创作那篇散文的文章，他把课文拿来一看，吓了一跳。课文后面的那些问题，为什么用这个词，为什么这样写，连他自己也答不出来。有一次，他到一所学校座谈，举了这个例子，同学们给了他长时间的掌声。这说明学生们学语文有苦衷啊！王周生说他理解学生们的心。但是，他知道通向高校的路只有一条，老师学生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走不通，就要出轨，就要翻车，而改造旧轨道谈何容易！

中学语文课本中范文的作者不知道自己的文章为什么这样写，他提供不出标准答案。假如让他去参加考试、大半会考砸了。这是一种讽刺，一种“黑色幽默”。

标准答案似乎是中国教育无奈的选择，是当今中国教育之树的果实。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就不同。比如，在澳大利亚，小学、中学从来不考试。非但不考试，教师连统一教材都没有，学生也没有统一课本，据说这是西方教育的“通病”。有人考察了悉尼、布里斯班、堪培拉与墨尔本几大城市的十余所大中小学（也包括一些私立学校），结果发现，在那里，教师没有统一教材，同一个年级的两个班，老师各教各的。教师所教的内容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州（省）教育部门的教学要求自己编写的。一年中应该达到什么要求，教师很清楚，至于如何去达到要求，就八仙过海了。由于同一年级都没有同一的教法与内容，所以也没有考试，学生在充满趣味的环境中轻松地学习。

直至高中升大学时才考试，这是区分升学与就业，区分升哪一所大学（重点或普通大学）的分水岭。

尽管没有“考场的硝烟”，澳大利亚乃至西方世界的人才仍茁壮成长，仍层出不穷，仍在科学、医学、文化、教育、军事等诸行业中作出贡献，使澳大利亚这个建国二百余年的“大船”在富国的“大海”上航行。

中国的孩子没有澳大利亚的孩子那样幸运，他们是在考场中奋战过来的。每年 6 月，作为社会关注面最广的“应季话题”便是“考试”二字。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构成了一幅“时节应试图”。1995 年北京各级升学考试推出一些新举措，因此不仅为考试加温，更难为了家长和学校。小学升初中除仍坚持就近入学（即分配）的原则外，增加了分片（区）统一出题考试，还出现了一批国有民办、招收自费生等新的办学模式，这无疑为品学兼优者提供了好去处。此外，初中升高中竞争大为激烈，因实际报考人数比招生人数多，这意味着全市将有近 2 万名初中毕业生因考不上高中、职高或中专等而走向社会。至于高考的激烈角逐，自不待言。寒窗数载，全在此一“考”。学生紧张，家长平添了皱纹，老师付出了心血，其苦心自知。北京的新闻媒介纷纷为此开辟专栏，指导学生如何从生理和心理上应付考试。有的小学生面对考试感慨道，“我下辈子愿意变只熊猫，不用学习，还是国宝。”学生太紧张，家长添皱纹，老师付心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为了那要命的“分、分、分”！

分数是要命的，要命的分数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江西省东乡县铜矿子弟学校的一位学生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写下一篇日记,记下了老师考试后当众宣读分数时的感受：

很多同学都伏在课桌上不敢抬头，因为老师在报大家的考试分数。

我认为分数不宜当众宣读，首先这种做法对考得差的同学刺激太大。

人都是顾脸面的，谁不希望名列前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好，已经够难过的了，再当众报分，考得差的同学就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厌恶学习。

最好由老师找差的同学个别谈，帮助他们找原因，指出努力方向，收效可能更大一些。

即使考得好的同学，当众宣读固然能起到鼓励作用，但也会起副作用。如有的同学就沾沾自喜，甚至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

分数不宜当众宣读，还因为分数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学习水平。据说苏轼、李时珍、蒲松龄、曹禺、严文井等人都曾在考场上落过第，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名。相反，有些考场上的佼佼者，后来却碌碌无为。

老师当众宣布学生的分数，这种行为在许多国家是不允许的。在日本，学习成绩是个人的私事，除了学生及其家长，任何人不得打探，更不会向全体学生公布。但中国的老师却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分数是要命的，老师就拚命追求分数。你知道吗？有些学校小学生的及格分数线达到 95 分。

据《齐鲁晚报》报道，60 分不再是及格分数，这是 1996 年下学期期末考试时济南市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新“发明”。

张老师的孩子正上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后老师告诉他，他孩子两门功课不及格。张老师很惊讶，因为孩子平时成绩还可以。后细问才知道，孩子语文 91 分，数学 94 分，但其班主任把 95 分定为及格。据了解，这种教师自定及格线的现象并非个别，在济南市的一些中小学尤其是较好的学校都存

在。

分数是要命的，学生家长也拚命追求分数。辽宁鞍山市教委 1996 年曾就教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大胆举措，其中涉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中小学取消期中考试，小学取消百分制（分为“ 优、良、及格、不及格 ”四个等级）等内容。这一规定公布后，社会反响不一。这些规定公之于众后的十余天里，五十多位家长给鞍山市教委打电话，表示支持并举报违纪行为。但同时，在当地一家新闻单位就教委规定的 20 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问卷调查中,一些家长持有不同的看法。83 份有效问卷中，88%的家长不赞同取消期中考试；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评价学校、老师、学生好坏优劣的标准就是分数；相当多的家长认为取消百分制，实行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衡量成绩不可取。

还有甚者，四川巴中市某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竟请了两位风水先生看风水，“ 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原来校门朝东是“ 退门 ”，退则无，致使学生考不上学；如改朝正北方向，用不着教师多操心，学生成绩会大大提高，升学率也可大幅度提高。于是校方深信不疑，便大兴土木，改建校门。为了节省经费，学校发给各班班主任 250 元人民币的督促费，督促 14 个班的中学生一齐上阵，学生一连许多天都在背泥土，许多家长也来帮忙。这改门的“ 神招 ”究竟灵不灵呢？想来不会太灵验。

BP 机进入考场显神威；六万元卖了考试试卷；新疆高考违纪上百人；福建同安教师大作弊；学生日记：战胜作弊，净化心灵；学生日记：有谁理解我；大学校园出现职业“ 枪手 ”；真假 ”王连国 ”狭路相逢。

“考场高科技”

1996 年 8 月，据报道，江西某开发贸易公司向外地邮发征订函，向高考生推销一种“秘密产品”。后经证实，这种商品是一种考场作弊的工具。

读到这条消息，不能不使我们佩服的是，这家公司的确具有独到的市场眼光。如果不是传媒爆光，可以设想该公司的秘密产品是一定能打开市场的，而那又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啊！庞大得令每一个企业家都怦然心动。

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考试作弊，也许是四川南充人谭某开了中国大陆之先河（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考证）。1995 年 5 月 14 日，四川南充考生谭某私自带中文 BP 机进入成人英语考试考场。他不时低头看“机”，然后快速书写的情况，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老师见他关掉 BP 机便暂时将机“没收”。不久，发现谭某手中又有一个 BP 机。老师再次没收后看到该机中文显示屏上有大量英语单词，并发现第一个 BP 机上也有，这些单词在谭某的试卷上全无错误。

据报道，四川省招生委员会后来作出决定。取消以中文 BP 机考试作弊的考生谭某当年成人高考的录取资格，并且还不充许他参加第二年的入学考试。这是全国被发现的首例在考场上用中文 BP 机作弊者。

人们之所以做某件事必有其原因，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在考试中是因为那考试和考生的利益息息相关，使得他铤而走险。作弊，是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的最大危害，也必然导致严重后果，可是现实生活中作弊的事例屡见不鲜，可见分数的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抵挡。

1995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考试管理部门在组织人力阅改贺县、昭平等地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卷时，发现一千多名考生的答卷有雷同现象。情况反映到自治区教委后，教委领导立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有试题泄密的可能。经组织专家对考生试卷进行认真鉴定后，确认贺县等考点的考纪考风有严重问题。为进一步核实取证，广西教委于 1996 年 1 月举行的全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抽调了二十多名有经验的教师组成巡视组，分赴梧州地区各考点进行重点检查。在贺县考区当场抓获一百多名作弊考生，并发现其中有些考生夹带的资料与开考的《经济应用文写作》等课程的试题内容相同。由此确认该考区在考试前试题已泄密。

区教委党组在听取了调查组汇报后，请求立案侦破此案。经过区、地、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合侦察，到 4 月上旬，案情告破，主犯邱习谷（贺县自考办副主任）和陈永光（梧州师专教务处副处长）双双落入法网。据两犯交待，1995 年 10 月和 1996 年 1 月，邱利用职务之便，两次监守自盗共 6 门课程的试题，以 6 万元的价格卖给陈（已付 5 万元）；陈两次买到试卷后，又与他人将试题泄露给该地区的部分考生，导致了这起全国最大的试卷泄密案的发生。

破案后，广西教委即取消梧州地区贺县、昭平两地一千多名考生 1995 年 10 月和 1996 年 1 月两次自学考试成绩。进行重考。自治区教委副主任车芳仁为此先后 5 次在有关会议上向各级招生考试部门提出要求，必须严肃保密纪律，落实保密措施，遵章办事，切实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悉，对参与这次犯罪活动的案犯，自治区将依据其犯罪事实和有关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绳之以法，对违纪者将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案是破了，为了 6 万元卖了试卷的邱某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纯功利的

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也是不划算的。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许多人还是不管不顾，继续作弊。1996 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中，新疆就有 128 名考生违纪。据报道，为维护高考的严肃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对参加普通高考的 128 名违纪考生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处理。并向全新疆作出通报。根据各地上报的违纪记录和评卷的认定，经认真检查复核，认定新疆 128 名考生有偷看、夹带、卷面作记号等作弊行为，其中汉语言考生 28 人，民族语言考生 100 人。

该报道又说，由于自治区认真抓考风考纪，在考试管理上敢抓敢管，对违纪行为不护短、不遮丑，因此与往年相比，1996 年的违纪程度下降，尤其是雷同试卷得到彻底遏制。

学生考试作弊目的明确，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老师也参与其中，其实他们也同样是目的明确。

福建省同安县就出了这样的典型。《中国教育报》1996 年 8 月 1 日刊发新华社的消息说：福建省同安县一些农村教师为使本班学生取得“ 好成绩 ”，以给自己晋升职称、拿奖金增加砝码；竟纵容甚至帮助学生考试作弊，影响极坏。

据调查，这里的考试作弊有两种情况。一位老师介绍说，一次他被分配为某小学毕业班监考，这个班的班主任事先来找他，要他监考时“ 放松放松 ”。另一位给某小学监过考的老师反映，考试时，一些学生大胆抄袭，刚看住这边，那边又把卷子递过去，“ 只要别让监考老师太生气，一般不会把你们抓出来的，顶多警告一下。 ”有些班主任常把好生和差生交错排座，以便同学们“ 互相帮助 ”。一位班主任曾在同事中讲过自己的“ 经验 ”：班级里要重点培养几个拔尖的，考试时“ 合理分配 ”一下，能带起全班的成绩。一位在中学执教的老师说，每到考试之前，有的学生家长到处打听谁为自己的孩子监考，然后就送礼或请吃，让他关照自己的孩子。

考场上“ 努力 ”之后，一些老师又把功夫花到评卷上。一位评过毕业班学生试卷的老师反映，和他同组的一位老师批卷时专门去认笔迹、查记号，找到 50 个本校学生的作文考卷，然后抢过来都给打上高分数，同时压低别校学生的分数。另外一位老师反映，某毕业班老师发现自己班学生的试卷后，把没答上来的地方都给填上正确的答案。还有的教师竟偷改总分。

据了解，许多老师本来也耻于作弊，但年终考核时，“ 上边 ”只认学分，有了它，就能晋升职称，多拿奖金。否则，即使平时再认真教课，也要排在后边。

一些怀有正义感的教师对此风日盛深感痛心。他们认为，应改变仅以学分考核教师的办法，同时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以免毁了教育，坑了下一代。

福建同安的事例是典型的，但决不是个别的，在其他地方各种作弊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湖南《三湘都市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样的事例：一位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天放学后回家对爸爸妈妈说，明天考试，班主任老师交待，有做不出来的题目，就看旁边同学的，互相抄一抄，一定要考出高分来，压倒其它班。

面对作弊，我们的下一代，那些孩子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心灵经受了猛烈的冲击。

山东招远县第二职业高中 93（1）班的同学薛晓燕在 1994 年 5 月 18 日

的日记中详细描写了自己战胜作弊的经过：

地理考试了。

刚做了一会儿，就遇到了“拦路虎”。我抓耳挠腮地想了半天，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只好去做其它题目。

谁知这道题却老是困扰着我，使我没心思做下面的题，已过了半个钟头，脑中还是一片空白。看来，这道题解不开，下面的题目没指望了。我沮丧极了，一百分和第一名的美梦将彻底破灭了……

终于，我忍不住了，脑中冒出了一个念头：看书！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我就被吓了一跳。但我还是把手偷偷地伸进课桌里，翻出课本，只看了一句，我就全记起来了。下面的题目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做完了。这时，我的心里充满对一百分的渴望，对第一名的憧憬……

忽然，我又想起在周记本曾写下的：“我今后一定不作弊了……”这是我第一次作弊后在周记本上写下的。想到这儿我又有点心虚，这不是作弊吗？虽然只看了一句，也是作弊！我越想越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于是我毅然决定把答案划掉，但笔尖刚碰到纸，又停住了，我真舍不得啊！想想看，如果我得到这四分，我就很可能是第一名；再说，有好几个同学都作弊了，我抄的比起他们简直微不足道、如果不划掉……

我左右拿不定主意。当我的心里再次想到周记本时，心里豁然开朗，终于下定决心划掉它！因为，这四分不是我努力得来的，只能用来欺骗老师、父母和自己，这有什么用呢？而我如果少得四分，那也是我光明正大得来的呀！

我毫不犹豫地抓起笔，用力地把答案划掉了，扔下笔，我的心情好多了，因为我最终战胜了自己。

薛晓燕战胜了自我，净化了心灵。可是，同样战胜了自我的广西博白师范60班同学余小芳却感到委屈和不解，她在1994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课时，老师向同学们宣布这次考试成绩后，讲评说：“这次考试，李×同学考了100分，第一名；而有的同学应考好却只考了70分，这说明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啊！”说完，还蛮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次考试我是只考了70分，明显是批评我，但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考试前，老师一再强调：这次考试请同学们自觉一点，不要作弊。我情愿要一个真实的不及格也不要虚假的100分……

考试时，由于监考老师不严，许多同学都纷纷作起弊来，尤其是我前面的李×更是厉害，又是翻书，又是对答数。看着这一切，我也动摇了一下，但我最终还是克制了自己。因为我想起了老师说的话，想起了这是在检测自己的真实水平。

可现在，看着老师冷漠的眼光和李×讽刺的表情，我的心在哭泣，在滴血：

有谁理解我？

从余小芳哭泣的心灵中我们体会到，作弊是对青少年一代的最大毒害，它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因为它危及了正在成长之中的孩子们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

考场作弊屡见不鲜，从小学到大学都大有人在。据说，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职业“枪手”替人代考。1996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前夕，河南某高校校长曾收到一封匿名信，来信称该校外语系三百多名学生中，

竟有 90%以上曾经或准备替人“作嫁衣”，代考英语四、六级证书（有的已不止一次）。校长为之大惊！联想到进入 5 月份以来，该校突然间竟有 1 一百多名学生（以外语系学生为多）称学生证丢失，要学生处给予补办，原来是想伪造证件，替人捉刀。

随着“枪手”的出现，一些“经纪人”也应运而生。他们通过老乡、朋友等关系，掌握着许多学业优秀的本科生乃至研究生的名单，并想尽办法和他们搞好关系。据了解，某高校代考一次四、六级劳务费是 200—300 元，“经纪人”可以获得 10%左右的中介提成收入。

“枪手”出现了，“经纪人”也有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着现实的市场需求。市场的力量真是无处不在。

更有甚者，连考场作弊都懒得干了，干脆就一步到位，冒名顶替进入高等学校。位于湖南长沙市的中甫工业大学就出现了这样的奇事：真假两个“王连国”狭路相逢，假的那位结果原形毕露。

据报道，一个并未参加 1996 年高考的青年冒名顶替、“荣幸”地做了 4 天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大学生。此事已被当地乃至全国的传媒炒得沸沸扬扬。

1996 年 8 月 30 日，中南工大管理学院录取的陕西籍新生王连国按时报到入学，可 9 日 3 日，又一个来自陕西的王连国持完全相同的证件前来报到。孰真孰假？一时难辨。学校保卫处、管理学院负责人与所在地的派出所迅速共同查阅了王连国的档案，发现后来者才是真正的王连国。那么、两个“王连国”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冒名者真名王西居，山东单县聂付庄乡王娄东村人。1996 年高考前夕，王西居设法将包括王连国在内的 13 名山东考生的户口转到陕西，并介绍他们到华阴市岳庙中学参加高考。高考结束之后，13 名山东学生回家等待消息，王西居却以四瓶西风酒和两条哈德门香烟买通岳庙中学收发室一老头，截获了王连国等人的录取通知书，并花了 1100 元在华阴市办妥了全部粮户关系。王连国得知自己考了 589 分被中南工业大学录取，却迟迟未见到通知，于是赶紧查询。中南工大大为吃惊，立即紧急补发通知。这样，真假两个“王连国”就狭路相逢了，假王连国原形毕露。

据查，王西居还以同样的手段窃取了被兰州大学和中国纺织大学录取的习进才，毕海军两位山东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并办妥了粮户迁移证。

据了解，王连国虽是受害者，但其档案亦有假。档案记载王连国的籍贯是陕西省华阴市，父母均为华阴城关镇农民，王本人小学、中学一直在华阴就读；而事实是，王乃山东人氏，父母均为菏泽市农民，王的中小学岁月全在荷泽度过，仅高考前几天才到华阴。他是王西居违反规定从山东“偷渡”弄过来的。而王西居之所以连连闯关屡屡得手，将王连国等人从山东弄到陕西，不外乎是人民币开路架桥，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中得到了好处。后来王西居交待说：“华阴市普遍都知道这个事儿。当地教委和招生办都是同意的（指异地报考）。校长为了提高升学率，班主任为了赚钱，各种手续学校都给办。”

王西居终究难逃法网，他被带回陕西，湖南与陕西的公安部门联手审理此案。由于这个案件牵涉到三省上百人，而且 13 名考生中有多人已被多所高校录取，因此最后处理结果还将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真是今古奇观，真假混杂，真亦假来假亦真，令人眼花缭乱。

可是，王西居的假冒决不是个别的现象。据报道，山东菏泽地区曾在 1995 年进行过一次大中专入学学生的大清查，结果菏泽师范专科学校清退冒牌生一百多名；1995 年计划招生仅 120 人的菏泽广播电视大学，也清退了 37 名冒牌生。菏泽地区教育局在 1995 年初中升中专考试中，对全区接近录取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以上的 2900 名考生逐一清查后发现，370 名考生有“问题”。菏泽师范、单县师范等学校在新生中也清查出一批冒牌生。

胡某被清退前是菏泽师专政教系 95 级新生，经字迹鉴定及复试，清查工作人员发现许多疑点，但胡某却一口咬定“自己是真的”。在胡某信誓旦旦的当天夜里，清查小组又得到信息：1994 年历史条新生里就有因冒名胡某而被清查的！第二天，清查小组立即驱车来到胡某的家乡——郓城县陈坡乡某村。一打听，村里人说：“对，是有这么个学生，1994 年考上了师专，没去上；1995 年又考上了那里，又没去，现在还在高三复读。”原来，冒名者曾是胡某的同学，花 4000 元买下胡某的通知书，原想瞒天过海，谁料刚进校门就“栽了”。

张某系 95 级新生，经学校的复试和检查后，认定其属于合格新生。未料不久真张某离去，另一个“张某”住进张某的宿舍，大大方方上起了课，如此拙劣的掉包自然瞒不住人。后来了解到，冒牌张某花了 1500 元买下了张某录取通知书，并央求张某坚持到学校清查结束再去顶替。

最荒唐的是 95 级政教系新生张某，入校复试时的字迹和试卷中的字迹截然不同，档案填写矛盾丛生，一些诸如“你毕业前在哪所学校”，“班主任是谁”，“校长是谁”等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知道”。对此，该生的父亲、某县一位领导干部做了一系列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学校坚决清退了这名学生。据记者了解，在 1995 年的中专考试前夕，有人举报许多家长都在高一级的孩子中找了替考者，于是地、县两级教育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高中、中专学校学生无故不得外出。结果仅郓城县考场第一场考试就有 200 人缺考，占到报考人数的 1/4。在菏泽师专的清查工作中，也不时有领导来说情。入校注册时，一位领导干部甚至亲自送来了自己的孩子，并要求学校领导给予关照，谁知一查，也是假冒的。一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成了冒牌生的制造者。据查，在冒牌生与出售录取通知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师给搭桥牵线，个别老师甚至私自截留录取通知书加以出售，某县一中的大门口竟然出现了联系出售录取通知书的广告。

在考试中有这么多的作弊作假现象，看来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严厉谴责弄虚作假者时，必须深刻反思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本身。

“团体总分”与“单顶成绩”；调查显示：

北京中学生大多想当科学家；世纪天文奇观，不惊中学校园；今日大学生远离名著；没进过学堂门的农家子弟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分数几乎是学校教育的唯一追求。

特长无用

为了分数，其它的一切都得让路，于是个人兴趣和特长发展就被打入了冷宫。

一位女孩，很有表演天分和才华，上小学时就出演过电视剧里的重要角色，崭露头角；初中时，她走上了银幕，颇得专家和影迷好评；念高中时，她发奋学习，也积极参加各种演出。升高三时，学校却以有的学科学得较差为由，让其转学别处。

一个男孩精于手工制作，有不少小发明，他的作品曾得过省科技小发明二等奖，人们喜欢他，叫他“小鲁班”；学校却对他评价不是很好，因为他外语成绩较差，因种种原因他未能得到深造的机会。

上面两位学生都是有某种特长的，可是他们却得不到学校的青睐。他们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原因显然是他们的才能只是升学考试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与升学考试关系不大，所以得不到重视和培养。

学校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学校领导谈起这些事情时对此也颇多感慨又无可奈何：“升学考试要的是‘团体总分’，不是‘单项成绩’，只有一门很好无济干事，我们不能不考虑升学率的问题。”也有有识之士认为，目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不利于特长生的成长。一科特长，别科良好的，尚有前途；一科特长，别科较差，则可能在中考和高考中名落孙山。因此，教育政策需要调整。

孩子们有许多各自的兴趣和爱好。《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称，北京中学生半数以上愿意成为科学家。

这项题为“北京市中学生科技意识调查”抽查了北京市 6 个城区 12 所学校，对这些中学的初二和高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在调查中，当被问知是否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时，有 50·7%的学生回答愿意，有 32·8%的学生拿不定主意。愿意成为科学家的中学生中愿意成为医学家的比例最高，达到 16·5%；其次是计算机、物理、天文、生物、数学、建筑、化学、环境科学、地质等领域的专家。调查显示，使得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占 65·3%；出于“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大”的考虑的，占 48·2%。

请注意：有 65·3%的中学生由于“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愿意成为科学家，这其实是一笔有待开拓的巨大宝藏。高尔基讲过：“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一种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世界上许多伟人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无不源自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萌生的对科学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和对知识的浓厚兴趣。

创造力并非天才人物的专利，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差异主要是表现和发展程度不一样。这就十分需要家长、教师及社会鼓励、培养，发掘青少年身上的这种潜能，而不应该一层层地让他们去爬“分数”这座高山。据报载，日本的一些著名大企业在录用大学生时，优先录用有一定能力和正当的业余爱好的人，哪怕一两门功课成绩不好，照样录用。这就是教育体制、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取向的问题。而我国的教育政策取向则造成了学生们陷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地。

据报道，1997 年 3 月 9 日日食彗星同现这一天文大奇观，尽管连日有媒体相继报道，但上海相当多的学生对此懵然不知。

3 月 4 日上午，有人对上海市 5 个区的数所中学作调查，发现能准确回答出“ 3 月 9 日有什么重要天文现象 ”这一问题的学生寥寥无几。虹口区某校一个班 53 人中只有 1 人知道；在南市区某重点中学，20 位不同年级的学生中有 2 人仅答出一半；黄浦区某校两个班级一百余人中回答正确的仅 3 人。

据了解，针对这次天文奇观，也有部分学校作了积极准备。有的派出学生赴漠河或余山等地观测，有的组织学生自制天文望远镜，但这仅限于天文兴趣小组。几位中学校领导坦言，天上的事与学生生活太远，上海本地又看不见，也就无需多讲；有的则称，3 月 9 日前后，传统活动很多，没有时间再多花精力；也有的干脆就没有想到。

天上热闹非凡的世纪奇观，在中学校园里遭到冷遇。这是偶然的吗？

中小学对于分数的单纯追求，缺乏素质的培养所造成的恶果也延伸到大学校园。“ 今日的大学生远离名著 ”，这是 1996 年下半年一项对武汉地区部分大学生所做调查得出的结论。

该项抽样调查显示：对于名著，34.8%的学生“ 没事做时，偶尔翻翻 ”；19.8%的学生“ 几乎不读 ”；“ 想看，但因种种原因未看 ”的占 27.8%；而认为“ 名著是矿藏，能吸取营养，乐此不疲 ”者仅占 9.6%，也就是说在 10 个大学生中还找不到一人热衷名著。

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没有读过从《论语》、《孙子兵法》到《孙中山选集），以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书籍。当要求学生回答弗洛依德的国籍和身份时，答案五花八门，正确率仅为 14%，有人竟说成著名小说家。而当要求举出 10 种不限学科的外国名著时，超过 90%的学生列不出 8 本以上。

令人惊讶的是，大学生对中国革命文学名著也了解不够，《红岩》、《青春之歌）等影响几代人的书似乎已提不起大学生们的兴趣。

61%的大学生认为，他们远离名著的原因是“ 太忙，没有时间读 ”。一位大二学生干部算了笔帐，他平均每周 24 节课，晚上两节选修课。个人支配时间尽被电脑和外语冲走，拿不出大块时间啃名著。

针对这种状况，中科院院士、华中工业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指出，大学生丢开名著将造成知识结构单一，工具意识强化，文化素质弱化，不利于全面成才。

不读名著也还罢了，还有许多大学生连常识都很缺乏。有悠久历史的湖南大学曾对该校的 164 名学生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一段以简谱写出的中国国歌有 83 人不能辨识，聂耳是哪国作曲家，回答德、法、俄、匈牙利的有 14 人。

对于分数的单纯追求，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和全面素质的培养。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也一样，而我们的学生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学习是单调的，他们只读教科书，只应付考试，他们连文史哲的名著都不读，甚至连常识也很缺乏，这岂不是把自己与人类文明隔绝开来？教育的过程，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过程。毛泽东就说过：“ 要自学，靠自己学。”俗话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讲的都是简单明白的真理。

1996 年，一个没进过一天学堂的 16 岁的安徽农家子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他的经历引发了人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思考。

据报道，16 岁的赵梅生于 1996 年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在此之前，他从未踏进过校门一步。

赵梅生家住安徽繁昌县荻港镇，父母都是农民。赵梅生弟兄俩的教育都是身为小学校长的爷爷传授的。他们用的课本是和学校同步的，爷爷把他们弟兄俩教到小学三四年级后，就开始培养他们自学，教他们使用各种工具书，给他们制定每天的课程进度，买同步的考试书籍供他们自测。就这样，他们在家里从小学读到高中。赵梅生说自学是“由自己不断提出问题，又由自己去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再难的问题都由自己去攻破。

这次高考，赵梅生总分考了 634 分，其中英语 126 分。而学英语，他仅仅就凭听磁带和看教科书。

和赵梅生不同，现在的不少学生习惯于“生活难题问家长，学习难题问老师”，这个习惯使他们在成长中走了捷径，但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弃了自己能力的培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学生，也不能更多地责怪老师，而必须从教学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上去寻找原因。

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学习状况令人忧虑；调查显示：初中学主学习习惯不好；满堂灌害处何在；蒙田、叔本华、罗素和毛泽乐论满堂灌。

满堂灌灌出了什么

中国的教学，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满堂灌。当然这种说法有点绝对，有点不分青红皂白，有点儿一刀切，而且还会遭到不少人举出不少事例来加以批驳和反对，并且这些事例的真实性也不容置疑。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这种说法，认为它大体上是准确的。如果套用毛泽东的分析方法，我们有理由、有信心说：满堂灌是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而其它的算是另外一个指头。

这九个指头厉害得很，它足以窒息一代青少年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它足以毁坏中国的教育事业，它足以令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信息时代的世界范围中丧失竞争力。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决不是杞人忧天。

据一项对全国数千所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学习情况的大规模调查显示：中国的大、中、小学学生的学习状况令人忧虑。这项调查是由国家教委所组织的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名为《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和学习指导的研究》。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现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两个方面，前者平均仅达中等偏上水平，后者平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时，在厌学、辍学、学习负担过重的学生中，学习能力弱、学习成绩差的占有很大的比例。

该项调查发现，学生的学习意识普遍较差。对于学习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规律性，为什么要研究科学方法，学生为什么是学习的主体等等问题，学生们或是认识肤浅、错误，或是从来没有考虑过。

调查还表明，学生对于学习的一些基本常规方法，如预习、听课、复习、作业、考试等，没有很好掌握。有的测试表明，基本没有掌握方法的学生占20%以上，掌握得较好的仅占 2.3%。至于如何根据不同的课程、教师教学特点、个人特点选择科学的学习方法，由于“抱着走”、“满堂灌”、“嚼碎喂”等陈旧教学方法的影响，在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以外，学生主动地追求知识、培养能力的意识非常差，对教师的依赖性很大。一步也离不开教师的现象，甚至在研究生中也并不罕见。

现在的学校为学生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学习条件，学生对学习条件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感到不满足。调查表明，在学生中，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和利用现有学习条件搞好学习的观念十分淡漠。以致于许多学生错误地把学习不好的原因单纯地归咎于教师和教学条件。

学生适应环境和条件的能力较差，具体表现为心理承受能力、辨别能力和自主意识均比较差。调查表明，由于心理因素造成的学习失利的现象比较普遍。学生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对新的学习阶段适应时间较长，严重滞后，而前一阶段学习能力、水平对后一阶段学习影响甚为显著。甚至在一些大学生中，仍沿袭着从小学、中学带来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学生对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手段的发展不太敏感，利用录音、录相、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学习工具来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的意识普遍较差。

这项调查表明，中国学生的学习现状的确令人忧虑。我们对这一结论并不怀疑。可是，进一步的思考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学习较差的学生是个别的，那么原因则也是特殊的。但是，调查得出的结论明明白白告诉人们，这种情况是普遍的。那么，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决不能用偶然的、个别的失误来解释此种现象。这是制度性的或者说是体制性的原因造成

的，退一步说，至少有着教育政策取向上的重大失误。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暂且不进一步讨论学生学习状况较差的原因，再来看一看有关的调查材料。

江苏海安县教育局对两所中学的 926 名初中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初中学生学习习惯”的问卷调查，回收了有效答卷 905 份，结果表明：在初中学生中，具有好的和较好的学习习惯者仅占总数的 12.1%，比例很小。有近一半的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生学习习惯的总体现象不能令人满意。在调查的六个方面中，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复习习惯相当地差，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64% 以上在这两方面均有不良表现。调查者认为，现在，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导的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许多教师把精力花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上，于是满堂灌、题海战术、疲劳轰炸等一股脑儿地涌出，使学生疲于应付，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至于学习习惯的培养更是被搁置一旁。

叶圣陶先生有一句名言：“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习惯。”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也这样说道：“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学生良好的习惯，往往自己的幸福都归于自己的习惯。”按照他们的思想对比现在学生学习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教育是失败的，而且这种失败非常可怕，因为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习惯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惯是第二天性”，中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会使他们一辈子都贻害无穷。这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认为，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会使我们的民族失去生机和活力。这不是小事情，而是国之大事，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政府教育当局的重视。

满堂灌灌出了什么？灌出了一代青少年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时严重的先天不足，灌出了一大堆死记硬背的知识却又使得学生们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灌出了创造力的缺乏和丧失……

国际上许多思想家是反对满堂灌的。蒙田说：“我们的教师们总是不停地扯着嗓门往我们的耳朵里灌，好像他们在朝漏斗里倒水，而我们的任务无非就是把听到的东西再重复一下。我倒希望教师改正这种做法。”叔本华说：“若不努力提高孩子自己的辨识能力，教他学会独立判断和思考，那么，教师实际上就是拚命往孩子的脑袋里硬塞一些别人的现成思想。”罗素说：“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智慧对于大多数男女学生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这样无需他们去努力独立思考……然而被动接受的习惯对一个人未来的生活却是灾难性的。”中国的伟人毛泽东也是坚决反对满堂灌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他们的话都值得人们深思！

教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教育：“挑选、适合教育的儿童”？大学教授说：“这样的试卷，我可能考不及格”；过多的考试对学主健康有害；“考试是不得法的教育的最大因素”；“考试题目居然被我押中了”；“我从学校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对分数看得太重”。

考试

90 年代以来，教育一再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频见报端的是这样一些标题：“ 成绩报告单小学生受不了 ”，“ 一小学生因考试罚款自杀 ”，“ 诊断‘ 考试恐怖症 ’ ”等等，只要看看这样的标题就令人感到担扰了。

学习本是一个自娱的过程，生命就是在这种自娱中打开所有器官，不断吸收有利于生命生长的养料。但现在，学习与名次、竞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轻松愉快的自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令人生畏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1996 年 6 月 12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西宁市第五中学一位叫卢晓珑的高三毕业生，在高考前跳楼自杀的消息，她只有 18 岁。该生就读的西宁五中是青海的重点中学，前一年青海高考的文理科“ 状元 ”都出自该校。她的母亲为了她的高考，辞去了在医院的工作，专门在家为她“ 提供服务 ”。卢晓珑在班里一直表现很好，成绩优秀，她是在第三次模拟考试时出现头痛症状，此后情绪一直不好，接着便出现跳楼的悲剧。

恰好，就在同一版上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报道了杭州市的小学生，为了报考一些重点中学的“ 民办班 ”，经历了一场“ 比高考还难 ”的考试。一个没考取的孩子说：“ 我真对不起爸爸妈妈，现在每天上课都没有精神，放了学也不想回家。 ”另一个没考取的孩子说：“ 为了让我考出好成绩，妈妈几乎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甲鱼吃，这下让我怎么交待啊？ ”考上的孩子怎样呢？“ 这次我考上了，但是我很害怕，怕以后考不上大学。真希望不要长大，不要再考试了。 ”

听听学生们编的顺口溜吧：“ 在校天天考，回家夜夜抄，写呀抄呀何时了？我们是那笼中鸟！ ”

一位大学生回忆中小学生活时写道：“ 天天两点一线（家门——校门），夜夜伏案奋战，不敢碰琴棋书画，无暇顾白云蓝天。 ”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好像是“ 挑选适合教育的少年儿童 ”，而不是一种“ 适合少年儿童的教育 ”。竞争，这个成人社会最具激励作用的口号，过早地降临到了中小学生的世界里：学校实行的不是因材施教，而是丢卒保车，100 个学生，经过层层考试的筛选，至少有 70 个被淘汰，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从而使他们的心灵变暗失色，如同乌云遮住了阳光。

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又全是为了高考成绩。一些初中的学生用老师的话编了一段顺口溜：“ 初中刚进门，初一是起点，初二是关键，初三总动员，时时要抓紧，何日想清闲！ ”初中尚且如此，高中的紧张更是可以想见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于是基础教育成了解题技巧培训班，全面发展成了分数就是一切。而考试中心每年的高考题，就像八股文考试时的“ 闹墨 ”，成了以后各届考生琢磨的内容。题目越出越难，越出越怪。例如有的语文考试命题偏、怪且烦琐，有的根本就是文字游戏：“ 交代 ”和“ 交待 ”如何区别，“ 启用 ”和“ 起用 ”怎样辨析；文学常识不仅考作家、作品、写作年代，而且考作家的字、号、谥号、官职、籍贯……难怪一些大学中文系教授感叹：如果我做这套试卷，很有可能不及格。

为了迎接升学考试，一些学校不按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计划授课，对参加升学考试的班级，往往在期中考试时，就已经讲完了大部分课程，准备结束课，进入期末全面复习阶段。据一些小学 6 年级学生家长反映，孩子所在

的班级到第二学期期中考试时，数学和语文就都已经上完了。手工课教师把教材发给学生，让学生回家自己做；地理、历史课干脆抽出重点跳着讲，省出时间上语文、数学这些“重点课”。

一些中学高三年级在高考前一年的 8 月 10 日就进入了全面复习，至 12 月份进入第二轮总复习，来年 4 月份开始第三轮总复习。高中毕业班提早一年结束课，初中毕业班提早半年结束课，小学毕业提前半个学期结束课，甚至被一些地方作为“经验”加以推广。

考试成绩成了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这恰恰是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不仅如此，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成了衡量教师工作成绩的唯一标准。北京某小学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得知她教的班的期末考试成绩比邻班少了 0.5 分，这位刚执教不久的班主任觉得没脸进办公室，她立刻“杀”回教室，让所有没得 100 分的学生站起来，分析从谁身上丢了 0.5 分。

过多过频的考试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害的。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拉特罗布大学行为健康科学系的心理学家寇比克先生研究表明，学校考试确实会使学生患病。最常见的考试病是胃痛、肌肉紧张、头痛和失眠。寇比克在调查了该市 404 名学生后，还发现女生比男生更为考试担心。她们的健康会在考试前变得很差，对于成绩比较缺乏信心。考试对女生健康的损害比对男生更大。

现在通行的考试方法是统考。统考就是在统一的课程和教材的基础上，统一命题，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这种方法的最突出的弊病就是千人一面，用一个模式去套所有的学生。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它虽然可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了最基本的常识，使学生不犯一般的常识错误，但它却不能发现和鼓励学生的个性和专长,看不出每个学生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优势”或特殊才能，而学生和教师为了应付考试则不得不研习历届考题，揣摩猜测，死记硬背。

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其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在谈到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复述型的考试方法时认为，对教师来说，它的确是一种最便利的检查方法，但从了解学生的科学才能看，这种考试“恰恰是最无价值的办法”，其最大的害处在于它所引起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学生刚刚开始对已知的结论产生怀疑时，接踵而来的考试便使他们不得不抛开这些危险的想法。因此，“考试就成为不得法的教育的最大的因素。”（《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某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黑板上写着一个“云”字。一个小男孩被老师叫起来：“这是什么字？”小男孩清脆地答道：“是‘云’字。”老师的脸沉了下来：“他说错了，谁来纠正？”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背书般地大声说：“云、云、云，这个字我认识，横、横、撇折、点，这个字念‘云’。”老师笑了：“对了，老师不是这样教过吗？每个小朋友都要这样说，才算对。”

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看图写话，女孩面对画面上正在给小树苗浇水的男孩写道：“哥哥在种树。”结果被老师判为错。标准答案是：“哥哥在浇水”。另一次也是看图写话，女孩面对画面上大片成熟的麦子和两个正在捉蝴蝶的小孩写道：“庄稼丰收了。”结果又错了。标准答案是“小朋友捉蝴蝶”。

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就是如此长年累月地被机械地刻板地“栽培着”，严重地缺乏想象力。难怪一位留学德国的博士回国后颇有感触地向人们介绍说，如果德国老师提出一个问题，10 个中国留学生的答案往往差不多，而这

种现象在外国学生中是绝不会发生的。他们 10 个人或许会讲出 20 种答案，尽管有些想法非常离奇，中国学生一般是不会有这种离奇的想法的。

1995 年初，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回国讲学，一位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问道：“ 您在国外大学任教多年，在您看来，中国留学生与外国学生有哪些不同？ ”杨教授回答说，“ 在国外，中国留学生无论在普通大学还是在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出色的。同一类题目，中国留学生在中学时代已做过成百上千道题了，不少外国学生才知道一些皮毛。但中国学生胆子小，老师没教过的不敢做。 ”看起来，我们的考试追求统一标准答案，培养学生的是求同式的思维而不是求异求新式的思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考场上的成功者往往只善于考试，不善于自由的创造性思维，于是便产生了违背考试初衷的结果。

为了应付考试，猜题押宝成了某些老师的“ 绝活 ”。

某地小学升初中考试，有个班级几乎所有学生的作文分数都接近满分。老师得意他说：“ 考试题目居然被我押中了！ ”这位老师曾经分别就写人、写事、议论出一题，然后命令学生家长或找人捉刀，或自己代笔，各写出一篇集中上交后，由老师从中选改出她认为最优秀的一篇，然后让学生死死记住备考。

为了争取好成绩，还有更低级的形式，那就是考试作弊，在某些地方这种作弊甚至已超越个人行为而成为一种集体作业。广东传出，作弊已用上了手表型的微形接收器，已超前一步实现了现代化。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老师为了不得罪学生或者为使自己班级的成绩给自己添光彩而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弄虚作假，有意怂恿。而有些家长明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获得了弄虚作假的诀窍和技术，但并不以此为耻，他们认为孩子只要分数高，只要能上重点，能考上大学就行。当然，这已经不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淡化一些选拔意识，多一些强化普及意识，人们大约也不会为考试成绩绞尽脑汁了。

孩子不是填鸭，教育不只是为了分值。据现代管理学对人才的测定要求，共有 128 项指示，而“ 应试教育 ”，即便是门门 100 分，也只涉及 47 项，另有 81 项“ 功夫在诗外 ”。真正有见识的人都不会把考分看得太重。美国有个叫唐纳德 · 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他凭借过人的精明和特殊的才干，白手起家，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使整个美国为之瞠目，被视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这位特朗普先生在说到自己的学校生活时说：“ 我从学校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对分数看得太重。 ”

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主张学生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学校，否则是很危险的。他还指出，学校不要让学生太忙，否则学生就没有时间思考。他告诫青少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国际化，文凭和学习成绩将不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生活得快乐，对社会有益处。青少年要寻找自己的长处和优点，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

在新加坡，学生得高分，政府却作检讨。新加坡的学生如同中国学生一样，在国际科学及数学标准测验上常拿高分，但却不像中国人那样沾沾自喜，反而担心这种情况是因为学生苦习考试作答技巧所致。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说：“ 我们需要重新检视我们评估学生的方式。 ”他觉得，新加坡现行的考试及课程可能不是鼓励创造力、创新及独立思考的最好办法。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不易辨别哪些学生确实是天资聪颖，哪些只是考试

高手。

当然，在准确测量一个人才能的新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必要的考试是需要的，但考试的改革也是迫在眉睫的。要求学生掌握和复述教科书中的知识，这只是考试的最低功能；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促使学生在此基础上去运用知识和更新知识，去发展独特的优势才能。因此，自选题考试、无标准答案考试、即兴智能考试等，应该在整个考试手段中占重要地位。

单项成绩特别优异，具有他人难以获得的特殊本领，这些因素也应该在考试手段中占一定比重。

在国外，考试同样也有评分标准，但据曾在美国攻读学位、现在北京市社科院任职的上官木子先生观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在中国老师手下总得高分的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却没有得到预料的好成绩。而一些在中国老师手下总也得不着高分的学生却在美国教授那里得到了意外的高分。很显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评价标准导致了极为不同的评价结果。据上官先生分析，美国教师注重的是“一点即破”，即学生能高水平地阐明一种观点就可以给予高评价；中国教师则注重“全面开花”，学生若仅就“一点”来论述，那么无论阐述得多么高明也只能得这“一点”所规定的分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在限定的时间里答题，写下的文字越多，说明写作能力越强；但是美国教授认为，一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问题要扯上十句话及至十页纸，说明逻辑思维差、概念不清楚。这就是那些善于长篇大论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栽跟头的根本原因。

我们很难说东西方人在考试的评价标准上孰优孰劣。考试制度是一种价值导向，它指挥着教师的教学方向，同时也左右着学生的努力方向。不同的评价标准下选拔出来的是不同类型的人才，而哪一类型的人才更适合于社会需要，则无形中对考试评价标准的优劣有了客观上的评判。

4 校园里的暗流

中小学生的精神污染问题

教育，是培养社会继替者和进行社会化的基本阵地，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重要领域，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中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的继承者和建设者，理应受到每个人的关心和爱护。然而我们屡屡见到的事实却是：社会变革和转型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影响着学校和学生。学校低矮的围墙，当然挡不住时代的大潮。在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中，免不了也有阵阵暗流涌进校园，过早地冲击着成千上万颗幼小而又脆弱的心灵。

学生与金钱；一个学生该有多少文具？少年儿单影响家庭消费决策——零点调查公司如是说；中学生的消费热：聚会，赠物，带首饰，煲电话粥，穿名牌；一位母亲的担忧。

人小消费高

说到中小学生的消费，是家长，也是其他的人经常谈到的话题。现在，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究竟要花销多少钱？恐怕没有人作过认真的统计。仅就支付学费和各项名目的收费，已经是一笔大数目。例如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已经写到：家长为了儿子读中学，中考总成绩离重点线尚差 3 分，一次性付出赞助费就达 2 万元，另有 3000 元附加收费（那是每个学生都要付出的）。每学期学杂费数百元，此外还有学期中间不断收取的服装费、郊游费、窗帘费、班级活动费等等，不一而足，七七八八加起来，肯定不在少数。这些在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不可想象的。一位大学教师回忆说，他 60 年代初读初中时，一个学期勤工俭学收入所得，支付书杂费之后，学校还给每个学生发了 2.5 元。学校食堂的菜金一餐 2 分钱，每天吃一顿中餐，这 2.5 元差不多是大半个学期的菜钱。此外并不收取任何费用。讲给现在的中学生听，肯定没人相信。

除了这些“正式”的费用，一个中小学生本人的开销也绝对不在少数。如今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教育投资毫不吝啬，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让自己的子女在校读书时吃好、穿好、用好、玩好，更不用说支付那些大额的各项名目的费用了。真正做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怕是只有家长们！

一般说，现在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物价也上涨了，家庭中的孩子也不多，城市中更是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似乎对一般的家庭来说，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几万元，并非是太重的负担，在预算中也能安排出来。但请不要忘记，现在相当数量的工人家庭，大多数农民家庭，他们的教育开支却是一件非常困难、令人头痛的事情。

学生们的消费究竟有多少？请看沈阳大西三校（小学）教导处的一个调查，该调查是在本校高中低三个年级抽选出的 180 个学生中进行的。调查的内容是：一名小学生拥有多少支钢笔？每学期都换一个新书包的学生有多少？调查结果出来后，令人深思。

在“你现在有几支钢笔或圆珠笔”的一栏下，所统计的数字是：高年级（五六年级）60 人中，有 10 支至 30 支以上的 22 人，其次为 6 至 9 支，只有 4 支的仅 2 人；中年级（三四年级）60 人中，有 6 支至 10 支以上的 47 人，4 支以下的无；低年级（一二年级）60 人中，有 5 支至 10 支以上的 39 人。

在 180 份问卷中，平均 1 年或 1 个学期就换 1 个新样式书包的有 97 人。耐人寻味的是，在二年级 1 个班，1 个学期或 1 年换 4 个以上新书包的竟达 10 余人。这 180 名学生中，每学期仅更换新文具所花费用在 50 至 100 元以上的就有 93 人。

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是：该校不少班级在教室讲台前面放置一个类似“失物招领”的盒子，学生丢失的东西有钢笔、自动铅笔、格尺、橡皮等，一学期下来，里面东西越攒越多，可很少见有人认领。一些学生对丢失文具的看法是：丢失就算了，再买。

一个小学生到底该拥有多少文具，当然不可能有统一答案。但可以对照的是：有人参观某发达国家的一所小学，注意到十一二岁学生的学习用具。文具盒内装铅笔 2 支，钢笔或圆珠笔 1 支，几乎每个学生都是这样。其中的铅笔大部分是木制带橡皮头的，较少有自动铅笔。但我们国家城市里的中小

学生的文具盒中，随处可见的是高档昂贵的钢笔，如派克笔、老板笔，金星、英雄笔更不在话下，至于自动铅笔大多是进口的。

孩子们的钱花得阔绰，用得大方，钱用完了管父母要。在他们心目中，仿佛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许多学生的钱似乎花不完，父母给，爷爷给，外婆给，其他亲友给，财源茂盛得很。他们也许并不知道父母的钱来之不易（极少数例外）；他们也许不知道要省吃俭用，至少不乱花钱。

事情并不能全归咎于孩子们，责任在社会。广告中高消费、花钱买享受的诱导；生活中讲排场、讲面子、上下攀比、动辄追求豪化高档的事例屡见不鲜。对孩子们来说，这构成了活生生的最有效的教科书。

但最直接的责任还是在于父母，现在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一切为了孩子！”这本没有错，而错在放任、宠爱，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要求，惟恐自己的孩子吃喝玩乐不满意，惟恐受到半点委屈，惟恐落后于人，但惟独不考虑培养孩子自立、节俭的品格；放手让孩子花钱，却不教导如何花钱。

据调查，当前的家庭消费是“儿童决策，家长服从”，孩子成了推动家庭消费的主力军。在许多家庭中，当夫妇俩为选择什么样的电脑、电视、冰箱等商品争执不下时，孩子成了最好的调解人。夫妇俩都会自然把孩子的选择当作最后裁决。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女士说：“年轻的父母让孩子决定大宗家庭消费，是我们乐于满足孩子的愿望，全家都高兴。”有识之士认为，高消费倾向实际是从孩子开始的。这一现象引起了无孔不入的商家的关注，他们发现了一个深入开拓市场的良机，抓住机会，刺激家庭消费需要，进行宣传引诱，千方百计推销商品。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广告针对孩子们进行宣传，并且按照儿童心理爱好改变产品的设计装潢，许多孩子进了商店就寻找广告里宣传的东西。这种消费也传染到旅游、娱乐界。根据一家大型娱乐场对前来娱乐的 100 个带孩子的家长进行的调查，发现有 89%的孩子提出要求，家长都服从。

另根据北京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许多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该项研究在京、沪、穗、汉四城市中对 425 个有 7—12 岁孩子的家庭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家庭有一名家长和一名孩子接受了访问。结果发现，如果以 100 分来作家庭消费决策权的衡量总值，那么孩子在一般家庭消费决策中的平均影响力则达到 33 分。

根据接受调查的家长报告，在 1996 年的上半年中，自己的孩子平均在一星期内 7 天都有购物行为的占 21.5%；5～6 天有购物行为的占 20.5%；3～4 天有购物行为的占 21.6%；1～2 天有购物行为的占 25.4%；一周中所进行的购物行为少于 1 次的占 8.7%；从来不购物的孩子只占 1.2%；有 1.4%的人表示难以回答。根据家长报告测算，这些孩子在半年中平均每周内至少在 5 天中每天有 1 次或多次购物行为。而接受访问的孩子中，表示购物是自己“最喜欢的活动”者占 12.7%；是“很喜欢的活动之一”者占 33%；对购物“有点喜欢”者占 38.9%；“一点不喜欢”的为 14.6%；“从不购物”的只有 0.7%。孩子们对购物活动的整体喜爱程度相当于“比较喜欢”的水平。

调查结果发现，在零食类、儿童文化用品类（以卡通画册、文具用品、家庭杂志为代表）、玩具游戏类的家庭消费品购买中，孩子的平均影响力比重达到了 63%，属于孩子意见有高度影响力的领域。在保健类、文化活动消费（以看电影、度假、录音带、CD 唱片为代表）、儿童服装等消费品及活动

项目中，孩子的平均影响力比重达 31.7%，属于孩子意见有中度影响力的领域；而像带有明显的技术因素的家用电器、照相器材、电脑以及家具和个人卫生用品的选择方面，孩子的平均影响力比重仅为 4.3%，属于几乎不受孩子影响的领域。

零点调查公司的分析人员根据该公司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项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由于三口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独生子女在家庭活动的时间增加，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的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家长们不仅应节制孩子的持币购物能力，而且还应注重加强对孩子的个人理财观念的正确辅导。

无疑，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而该公司调查专家的担忧和警告也是不无道理的，值得广大家长和全社会的深思。

家庭消费受孩子的影响，但毕竟还是家庭中的“ 集体 ”行为。孩子们“ 自己 ”的花销究竟如何？他们在家庭外的吃、喝、玩、乐、用是怎样进行的？这都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其实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孩子们手中大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说，一是以买早餐、学习用品为由从父母手中要的；二是来源于逢年过节、过生日时父母给的；学校集体活动、同学聚会也是向父母伸手要钱的充足理由。某学生过 12 岁的生日，一日内收的礼金就达 2600 多元。据一位中学的班主任调查，他的班上大部分学生每月的零花钱都在 150 元以上，有的则更多。

其次要考虑的是这些钱是怎样花出去的。学生们说，真正购买早餐的钱不多，买学习用品也不是大头。大部分是用于购买零食、小礼品，同学聚会等等。城市里的一些中小学的小卖部和校门外远远近近的摊档商贩，生意都特别红火，尤其是早中晚学生们上下学时间更是“ 购物 ”高峰期。因而学校大门外的街道马路倒成了小商贩你争我夺的最佳地段，地皮行情“ 看涨 ”。

一位校门外的个体摊档的档主说，他的柜台内“ 各类小吃零食最好卖，每天能卖好几百袋 ”。一位班主任老师说，他的一个学生过生日，私下邀请二十多个小哥小姐们在当地一家有名气的酒店“ 喝 ”了一顿，花去好几百元。

有人总结当今中学生的消费有几大热：

一是同学聚会。这些聚会模仿港台电视片，通通都叫“ party ”或“ 派对 ”，如生日聚会，发烧友聚会，周末聚会，升学聚会，当选班团干部聚会，当选优秀生聚会，家中搬迁聚会等。有位职业中学的学生因父母离异，母亲不在身边，家庭生活“ 不幸福 ”，邀请几位有“ 共同语言 ”的同学，竟在家中开了一次“ 伤心聚会 ”，聚会时大吃大喝而又相对涕泪交流。

二是互赠礼品。中学生过生日，送一张贺卡在有些学生看来已是太小气。十几元、几十元的小工艺品、文具、鲜花，再加上时髦的包装，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了。过年过节，寒暑假，以及其他任何小事都要互赠礼品，以示友好。这种送礼现象随着学生年级愈高，风气愈盛。在上海的某些学校，同学生日举办宴席，出席者大都送红包一个，内装人民币三五十元不等。有的学生告诉父母要去参加同学的某个聚会或祝贺升学等，家长会亲自包好小红包，让孩子带去。一位中学生过 16 岁生日竟收到同学贺礼上千元。还有一位家长颇有理由他说，自己的孩子去同学家参加活动，不带些礼品或礼金会被对方家长嘲笑的。

三是佩带首饰，现在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佩带珍珠项链、玉坠及其他金银小饰物，已是见怪不怪了。

有位高三女生在她过 18 岁生日时，身为私营企业者板的叔叔送了她一条花 6 万余元买来的钻石项链。这位女生戴着这条项链到学校向同学们炫耀，顷刻间成了全校的轰动性新闻。

另有一名高中女生，金的、银的、钻石的、翡翠的以及水晶的各种各样的项链，竟有七条之多，还外加一枚 18K 的金戒指，惹得几名女生羡慕不已。可她自己则不以为然，说这些首饰没有一样她看得上眼，渴望哪一天能拥有一枚份量起码在 3 克拉以上的钻戒。

四是“ 煲电话粥 ”。“ 煲电话粥 ”虽不是当场付费的购买行为，但却是当今中小学生的一项不小的消费。许多中小学生利用家中的电话参与各种社会热线，年龄稍大些的中学生甚至在电话中“ 谈情说爱 ”。大多数的情况是打电话向同学问题目、对答案，商量班里的各项“ 工作 ”，诸如郊游、文艺节目比赛、手抄报比赛之类。关系好的同学还在电话中窃窃私语，说悄悄话。

五是名牌“ 包装 ”。耐克运动鞋已不稀奇，苹果牌牛仔裤也很普通。现在的中小学生大多是名牌“ 包装 ”出来的。

1996 年 11 月 2 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一封署名唐亦的读者来信，说到她作为一位母亲的深深的忧虑：究竟要用什么服饰“ 包装 ”孩子？她说：

近几年，进口名牌服饰悄然进入校园，而且越来越走俏，这一现象让我困惑不解，且深惑不安。我是个年轻的母亲，女儿还在牙牙学语。几年后，当她踏入校门时，不知那些进口名牌将会在校园内火爆到何种程度，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在我周围热衷于进口名牌包装自己的学生并不鲜见。姨妹在某大学外文系读书，她喜欢穿牛仔裤，从苹果牌穿到 LEE 牌再到“ ESPRIT ”，每条价钱都在三四百元。她向我透露，她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穿名牌服装。她认为不穿进口名牌就会掉价。我家楼上的男孩读高三，他说，四五年前，班上谁穿一双耐克运动鞋是很稀奇的，可现在穿进口名牌服装的人多了。哪天谁把名牌穿进教室，谁就会英雄似地神气好几天。更让我感到担心的是，某些父母助长了这股校园内的进口名牌风。有位朋友一心想让女儿与众不同，出人头地。女儿是穿进口衣服长大的，如今上小学了，仍穿进口品牌服装。朋友说，多花些钱让女儿穿洋服装，能出众一点也是值得的。

这样的虚荣心真让人忧虑。该如何正确分析这种现象？我感到力不从心，特地写信给报社希望大家来议一议。真希望这种现象不是愈演愈烈，而是逐渐改观，给学生们一个不慕虚荣、朴实健康、清新向上的校园。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消费，家长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我们这一代吃的苦已经够多了，孩子多花点钱算不了什么，该让他们过得幸福点。另一种说法却显得忧心忡忡：孩子们现在就学会大把花钱，将来怎么得了？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家长和老师提出了一些不无道理的建议，值得大家讨论，特别是值得家长和学校当局参考借鉴。

学校要多开展一些传统教育和艰苦朴素教育，多组织学生去贫困山区参观，或通过举办“ 手拉手 ”活动，学习山区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号召他们向身边不乱花钱的同学学习。其次，学校要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必要的勤工俭学活动，使学生通过劳动知道钱来之不易。做为家长，在家庭花销方面更

应为孩子做好表率。同时，家长和老师要多联系，弄清学生的零花钱花销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以便从根本上改掉学生乱花钱的坏习惯。

可是，在应试教育的观念中，怎样花钱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孩子们怎样花钱，对于他们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巨大。我们的教育对此又做了多少呢？

给老师送礼，是耶，菲耶？幼儿园小朋友也送礼；一位中学生的日记：少儿都知道，“世路难行钱作马”；学生偷钱案发，用钱“摆平”；刘大妈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金钱万能与拜金主义；孩子的新年祝辞：

祝老爸成为百万富翁；“成绩好将来赚大钱”；中学生的名片印上父亲的官衔。

校园有“礼”

在校园里，孩子们受到的不良影响，首先包括金钱和关于金钱的观念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存在问题的除了前面讨论到的消费问题之外，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一是送礼之风盛行，二是受到金钱万能观念的毒害。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金钱仿佛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能交换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似乎能给人带来一切，因而也能最大限度地煽动起人的欲望。总之，金钱似乎是万能的。

关于学校的送礼之风，这里要特别指出，并不仅是学生之间互赠小礼品，而是学生向老师和学校领导送礼。目前，社会上的送礼之风愈演愈烈，形式日益多样化、巧妙化，这股风气也逐渐弥漫到了中小学校园。

一位班主任老师透露，教师节前，领导公开向学生干部布置，要在教师节组织学生向老师赠送“慰问品”。时近中秋，慰问品除贺卡之外，还有月饼、水果等，领导则外加一个磁力杯。

年终岁末，学生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向老师、领导送礼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礼有明送的，如挂历、贺卡等，也有暗送的，如红包、补品、烟酒等，而方式则五花八门。

有的同学是把礼品拿到学校来给老师，而有的则是由家长陪同到老师家里拜访。同学们对于送礼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发自内心的：“一张新年贺卡能代表学生对老师的敬意和祝愿。”有跟风的：“别人都送了，我不送是不是不大正常。”也有跟老师“套近乎”的：“就快毕业了，怕自己的档案过不了关，爸妈说送点礼请老师‘关照’一下。”种种心态，不一而足。

有的学生虽则主观上不愿送礼但又有许多担心：“我也不想送，但有些老师会在班上暗示学生。如果不送，谁知道会不会‘穿小鞋’。”而一些学生则坚决反对：“向老师送礼会给纯洁的师生关系蒙上功利色彩”，“拍老师‘马屁’……”。据了解，大多数学生都反对那种功利目的的送礼，他们说：“给老师最好的礼物莫过于送上一份良好的成绩单。”

校园送礼风其实也是社会送礼风的一种折射，学生的家长或多或少都是送礼的操纵者。一些家长赞成：“新年送些贺礼给老师是很正常的。”一些则很无奈：“现在什么都靠关系，我们也想老师对自己子女好一些。”据家长们说，送礼现象在幼儿园、小学校厉害，中学则相对少些。

《华商时报》1996 年 3 月 1 日消息报道：“幼儿园教师为儿子办婚礼，5 岁幼童随份子”：

黑龙江省呼兰县呼兰镇一家幼儿园的孩子们，收到老师发下来的一张张大红请柬。请柬上写的是“老师的儿子近日结婚，邀请‘小嘉宾’参加婚礼”。5 岁的李楠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请柬捧给父母。由于他进幼儿园才 1 个月，父母根本不知道老师的儿子是谁，叫什么名字。在李楠的央求下，婚礼那天他们还是去了。李楠的爸爸领着儿子先躲在远处观望。不一会儿，李楠告诉爸爸：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都来了。李楠的爸爸只好走过“婚礼收银台”前，在帐单上写下：李楠 100 元。这样，5 岁的李楠有了第一次“随礼”的经历。

山西省方山县有一名高中学生名叫梁永清，他在日记中写道：

1995 年 12 月 22 日

行贿受贿之风，在社会上时有耳闻，可想不到这股风也吹进了学校这块

圣洁之地，连莘莘学子也染上此症。

前些天，我们宿舍的郝××因在校打扑克，被学校开除并限期离校。全宿舍的同学为此事反响强烈。有人建议不妨送点儿薄礼。郝××“茅塞顿开”，以其能力所及花 30 元买了些鸡蛋给有关老师送去，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我们的教室。

薛某是复读生，对明年的中考，希望十分渺茫。他曾求助于某班主任，人家虽然满口答应，但就是迟迟不办。他也想送些薄礼，并差我先去“侦察”，当得知这位老师家没有外人时，他便提着沉甸甸的一篓油进了那位老师的家门，出来时他已是满脸笑容了，说“这下可好了，今后就不必再操心了”。

教室的座位也成了搞交易的商品。某同学是高度近视，没能坐到前排，而身材高大的一位同学又挡着他的视钱，听说某同学的父亲去某老师的办公室几次后，坐的位置就颠倒了过来。

学校是圣洁之地，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那股歪风如果长期得不到遏制，教育出的学生实是令人担忧。

学生向老师送礼，按照社会上通行的标准来衡量，倒的确还只是“小意思”。比较一下那些行贿受贿数十万元，贪污挪用数十数百万元，非法集资几十个亿，动不动给国家造成几千万、几亿、几十亿损失的经济领域的“大案要案”；比较一下那些几乎成为普遍性的钱权交易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比较一下那些卖假药、假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那些卖文凭、卖户口、卖毒品、卖身体、卖灵魂之类的种种勾当，你也许会说，中小学生们还是相当纯洁的。但如果孩子们在少年时期就已知道“世路难行钱作马”，遇到麻烦请客送礼便通行无阻，向掌权者、上司领导阿谀巴结总有好处，那么当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之后，将如何为人处世？

在某大学文科某系有个从中学“保送”（免考）来的学生 Y，平常装得很乖巧，对同学慷慨大方，对老师点头哈腰，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信任。但他却在背后偷了两个同学的钱，而且这两个同学还是他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家在偏远山区，经济困难，刚从亲友处筹集到 3000 元，准备交学费的。由于和这位“小偷”同学玩得很好，让他知道了存折密码，被一“取”而光。那位同学找到 Y，追查偷钱的事，Y 竟厚颜他说，我不承认偷了你的钱，但你如有需要，我可以“借”点钱给你，给了 1000 元。那位同学报告学校保卫处，在保卫处连哄带吓的追问下，Y 口头供认了偷钱的事，并附带承认了另一位同学的钱也是他偷的。

事情到这一步，本来很好处理了，偷了几千元，已经触犯了刑律，应交公安部门立案审查。不想节外生枝，Y 在其兄唆使下作了两个“巧妙”的动作：一是翻供，不承认偷了钱；二是对某些人采取了“特殊”措施。后来，保卫处、公安局竟以证据不足而将此事不了了之，还要求主管学生工作的学生干事不要“扩散”，以免 Y 倒打一耙，说人家诬告他云云。内情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事后，这位本应受到惩处而逍遥法外的 Y 倒有了吹牛的资本，对女友说：“怕什么，什么事都可以用钱‘摆平’。”女友不辨是非，反而以为自己的男友有本事。

参与调查此事的学生干事对此大有感慨，说自己工作难做，事情已经闹到了保卫部门，又不好单独处理，而对被偷了钱的同学还得做思想工作，讲好话安慰。他在调查中还得知，Y 在中学时表现就不好，有劣迹，由于会送

礼，会走关系，又认识某领导，竟被保送到大学来，成了大学生里的害群之马。

“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中小学生如果过早地受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影响，对他们的人格发展、心理品质的培养、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建立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对于中小学生向老师送礼，甚至带有“贿赂”倾向的送钱送物，即使数量轻微，也决不能看作是小事，掉以轻心。

关于金钱万能的论调，也许是因为过于露骨，一般人都不愿意公开表示认同态度。于是社会上便流传着“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样一种说法。这句话同电视连续剧《渴望》中刘大妈所说的“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钱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实际上与金钱万能论没有什么区别，均属于拜金主义的表现。

当大家都认为钱是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时，这种观念就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强化起来，在思维的逻辑上就会将其他的东西诸如道德、正义、理想、原则、政策、法制等等看作是次要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缺少、可以轻视甚至可以忘却的东西。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逻辑作用，加剧了当前社会上的观念混乱。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要钱不要命，以身试法的现象比比皆是，真可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金钱万能的观念已经传播到了孩子们身上，影响到了孩子们的心灵。他们听到的是“财发利顺”的商业字眼；他们接受的是“效率优先”观念；他们看到的是大款、富婆的耀武扬威。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以为金钱万能，毫不怀疑这种观念的合理性，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

上海某小学搞了一次活动，要求每人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句新年祝辞。这本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父母借此可以听听孩子们的心里话。然而令老师吃惊的是，大部分学生写给父亲的是“希望爸爸成为百万富翁”，或是“希望爸爸当总经理”，写给母亲的则是千篇一律的“希望妈妈年轻、漂亮”。

如今在社会上，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常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家庭教育中，父母训斥孩子时常说的便是：成绩好将来才能赚大钱。电视广告中，常会出现一组组父富母贵子娇的镜头。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孩子，有前面所说的想法，是不足为奇的。孩子的心愿当然是天真的，倘若父母们看了，必定也是感触良多的。然而，果真每个父亲都能成为大老板吗？每个母亲都会是越活越年轻漂亮吗？孩子的心愿，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父亲来说，该是一种多么沉重的心理负担？

与金钱万能、拜金主义相联系，学生中的追名逐利也常有表现。一些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爱慕虚荣，追求名利，热衷攀比。武汉市某中学干部子弟比较集中，学生中间竟然模仿生意场上的作法，互相派发名片，每个人手上有一个名片夹。更离谱的是，他们的名片上一律在上面先印上了家长的官职、级别，下面才用小字附上自己的姓名、邮政编码和住宅电话号码。

校园有“礼”及其他种种现象，这固然是社会环境的作用，可是我们的教育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辽宁阜新春“虎”为患；全国年产销游戏机 300 万台；初中生玩游戏机得了“强迫症”；广州：游戏机迷抢劫同学；人大代表提案：加大对电子游戏室的管理力度；抽烟喝酒——孩子的成人游戏，家庭的特许放纵。

电子游戏·小烟民·小酒鬼

在学生受影响而产生的各类问题中，最直接地令家长和学校头痛的问题恐怕要数“电子游戏机”问题以及与之类似而又更为严重的“老虎机”问题。

据新华社 1996 年 8 月 9 日讯,辽宁阜新市某重点中学 5 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已参加高考并分别达到了大学本专科和中专的录取分数线）因迷恋老虎机，结伙抢劫，被公安部门逮捕，“未进学堂先进班房”。

这 5 名学生伙同被该校开除的一名学生组成抢劫团伙，在出租车上和社会上做案 22 起，抢劫人民币 1 万余元，所得赃款全被老虎机“吃”掉，而这个团伙的 6 个人也都落入了法网。

众所周知，老虎机带有赌博性质，危害极大，早已被明令禁止。但个别地方仍然有人养“虎”为患，害人子弟，究竟是为什么？责任在何方？至少当地的治安管理部门是难辞其咎的。电子游戏机对青少年的影响范围大，卷入的人数众多，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致使孩子们无心向学，影响身心健康，甚至导致犯罪。

据不完全统计，至 1995 年底止，我国家用电子游戏机已发展到年产销 300 万台。天津每 40 人有一台游戏机，北京游戏机月销量在 2 万台以上，福州已有 300 多家营业性电子游戏室。

据有关人士估计，目前上海至少已有二十余万户家庭购置了电脑，主要目的是教育。然而孩子们最迷恋的却是电脑游戏。

某省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小张，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

自从他迷上电子游戏机后，他那双变得更灵活的手在试卷上却再也不如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成绩远远地落在后面。11 岁的小李是某小学四年级一名三好学生，自从他家胡同口开设了电子游戏室后，他便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成了那里的常客，再也没心思读书。一学年过去，得知自己各门成绩都不及格，面临留级时，他再也不肯上学了，辍学在家。

电子游戏室人群流动率高，极容易受污染，成为传播疾病的场所。据有关部门在某电游室抽样检查表明，51 件样品中细菌总数超过 1000/平方厘米的有 24 件，真菌检出率高达 50.9%，包括可致皮肤病、肺炎、脑膜炎等疾病的病菌。

电子游戏是一种低体耗的静止性游戏，儿童长时间站着或坐着不动，使血液回流受到阻碍，易造成肩膀僵直，并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此外，长时间玩它还会使视力受损，使人易动肝火，易造成消化不良，并引起肥胖及其他症状，甚至还有可能造成神经及精神方面的疾病。

在上海，一名 15 岁的初三学生在父亲陪同下到心理门诊咨询。他热衷于各种电脑足球游戏，最近患了奇怪的“抖抖病”——电视屏幕上足球比赛哨声一响，他的手指便会不自觉地震颤，比赛一结束，症状也一扫而光。医生说他患上了“强迫症”。

一些老师抱怨说，玩电脑的孩子真难带！他们对各种集体活动不感兴趣，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半天。与其他孩子相比，这些小游戏迷大多沉默寡言，口头表达能力普遍较差。一些爱好格斗类游戏的孩子则明显表现出恃强好斗的倾向。

有的孩子天天早起，等到家长上班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直到父母下班到家前才恋恋不舍地关机，常常是双眼通红，肌肠辘辘。

在杭州，未成年人禁入的歌舞厅、游戏机房成了一些中学生双休日的去处。据了解，一些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和几家开下午场的舞厅一到双休日都有不少中学生涉足。游戏机房在双休日对许多男生来说更有诱惑力。一些游戏机房碍于禁令，对小学生进游戏机房尚能劝阻，但对年龄稍大的中学生玩游戏机则往往视而不见。

1995 年 5 月，武汉市某公安分局查获一起凶杀案，凶手是 12 岁的小学生袁某。事发当晚，他沉迷于电子游戏室已有 4 个多小时了，仍不想回家。一位同学正在玩“ 三国志 ”节目，他要这位同学停下来让他玩。对方不肯，两人发生争执，扭打起来，袁某摸出一把水果刀朝对方捅去。结果两名少年一个死亡，一个被送进了监狱。

某中学一名担任班长的优秀生，最初仅仅是为了好奇跟朋友走进游戏室，后来因为零用钱不够花，发展到偷窃，结果被判刑两年。

在广州，近年来电子游戏室越开越多，大有泛滥成灾之势。例如荔湾区的一条不到 200 米的街道上，1995 年还只有一间电子游戏室，1996 年底增至 7 间，生意非常红火。有的大大方方挂着“ 电子游戏机室 ”的招牌，室内墙上贴有“ 高尚娱乐 ”的口号；有的则挂上“ 某某经营部 ”、“ 照相室 ”的牌子，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游戏室在中午 11：30～2：30 和下午 5：30 以后即学校放学的两段时间最为热闹。一到这两个时间段，许多身着校服的中小学生放下自行车，背着书包进去，里头立即人声鼎沸，机声狂呼。直到晚上 7～8 时，还常有家长怒气冲冲地从电子游戏室里揪出自己的孩子，大声训斥。有不少学校规定不准学生进电子游戏室，但孩子们抵挡不住诱惑，常常偷偷溜进去过一把瘾。

在区庄立交桥，在先烈路、水荫路，均有电子游戏室在或明或暗地开张，有的没有招牌，用一块大黑布作门帘，里面常常是机声阵阵，常有穿校服的中小学生沉迷于其中。

在荔湾区的某街道，竟发生过一起 4 男 2 女 6 名初二学生围住一名同校同学抢钱并将其殴打致伤的严重事件。原因是这 6 名学生玩电子游戏把零钱用光了，要抢钱继续玩。

对这种状况，广州市人大代表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他们在人大会上大声呼吁“ 要迅速加大对电子游戏室的监控力度，严格控制游戏室的开放，对违反管理规定的要坚决取缔 ”。他们还专门提出了一份《加大对电子游戏室管理力度的议案》。希望在广州，乃至在全国的城乡，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重视这个问题，并且真正产生有效的结果。

中学生行为规范明文规定：学生不得抽烟喝酒。但如今“ 小烟民 ”、“ 小酒鬼 ”现象甚为严重。从心理上说，中学生抽烟喝酒，起因多半是为了模仿成人的行为；或者是急欲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干成年人的事情，从偶尔为之到产生依赖，久而久之，积习成痛。在许多人看来，烟酒似乎无关大局，并不构成严重的问题。的确，就单个的青少年学生说，也许影响不大，但从整体上说，抽烟喝酒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则是无疑的。

在上海的一些酒家和饮食店的角落里，常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十五六岁的“ 小哥们姐们儿 ”在毫无顾忌地饮酒作乐。一次，在某酒家有人看到，小圆桌旁围坐着中学生模样的两男两女 4 名“ 小食客 ”。两名男生像模像样地在喝酒，很快把 2 瓶贝克啤酒喝光，又添上一瓶孔府家酒。那两个女生在喝饮料，但面前也都摆着一杯啤酒，不时喝上一口。他们有说有笑，完全一副

成年人的派头。

中学生抽烟更是时有所见。放学后独自在家，或同学聚会，男生抽烟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学生购买的香烟还大多是高档烟或洋烟。一些烟摊的摊主反映，学生买烟的现象极为常见。

至于在家庭中，学生参与成人抽烟饮酒则更是常事。如逢节日或有亲友相聚时，一般情况下，成人还会特意引诱孩子们饮酒，而这时即使平常不允许喝酒、抽烟的家长们，也会“特许”自己的子弟“放纵”一下。也许只是这种放纵加上参与成年人活动时所产生的新奇和兴奋之感，促使孩子们过早地加入了“烟民”和“瘾君子”的行列。

玩电子游戏机、抽烟喝酒，这些都对学校和家庭的教育提出了挑战。

大众传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机械中学生：双体日，看录像；孩子们收听无线电——午夜不设防；中学生痴迷“周易与预测”；商场向学生推销《整人专家》；传媒误导，少儿不宜。

传媒：“少儿不宜”

社会环境对中小学生的种种影响，若从方式和手段来看，大众传播媒介恐怕是独领风骚的了。而且其他的方式和手段，诸如思想政治工作、老师的训导、父母的劝戒等等之类，是绝难以同大众传媒相抗衡的。无论是信息量，还是吸引力；无论是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以及所涵盖的内容的多方面性、多层次性，甚至从教学艺术所要求的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来衡量，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

电视、电台、报纸三大媒介又是其中的主力军。如今的电视台，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都有。甚至有的乡镇也有自办差转台，乡镇的大小事情都作为本地新闻，跟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各地的有线电视，更是日以继夜地转播香港的电视节目或港台录像片，间或插进自己的广告。打开电视机，从专栏到广告，从电视剧到综艺节目，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许多中小学生，特别是在节假日，长时间“泡”在电视里，乐此不疲。与电视相似的遍布城乡的录像室，特别以各类“少儿不宜”的片子吸引人。但身着学生服的少年儿童常常出入，并不见有人阻拦。少儿不宜变成了“掏钱就宜”。在双休日的下午和晚上，杭州一些中低档的录像厅成了不少在校中学生光顾的场所，而所放映的录像片绝大多数是宣扬暴力和男女私情的内容。在星期日深夜，有些中学生还在观看不健康的片子，根本不考虑第二天就要参加的紧张学习。杭州各家出租图书的小书店也成了许多中学生热衷的去处。各租书点一到双休日，生意特别兴隆，来租书的顾客许多是中学生，但架上的可租之书几乎全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真正能使中学生开阔知识面、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很少。

无线电台的节目，则更是不受限制，无孔不入。一般的中波、短波、调频三功能收音机，可以任意收听国际国内的电台节目。而收音机或收录机，在中学生手中已是同钢笔一般属于文具用品了。

南京经济广播电台有个收听率很高的节目《今夜不设防》，解决热心听众难以启齿的私事隐衷。前来咨询的除了成年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节目临近午夜播出，但学生却以惊人的毅力耐心相候，甚至把电话打进直播室。他们询问的多是关于性文化的话题。电台考虑到舆论导向和社会影响，婉言劝阻，但每月电台还是接收到不少学生的咨询信或冒充成人打来的电话。另据了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地方电台开办的类似节目，都吸引了大量中学生。问及他们积极参与的动机，很多学生回答：“不懂性知识是一种羞耻。”

在市场上，报纸、刊物及各类印刷品更是多如牛毛。其中对学生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各种下流、低级的非法出版物和黄色书籍。在大街小巷各类书报摊档，甚至一些正式的书店，都常常能发现各种充满着暴力、色情、荒诞、迷信、教唆犯罪及各种观念误导的东西，均属于打非扫黄之列。

请看上海第十九中学陈立军、廖启涛的调查：

在南京下关、鼓楼、建邺区的几所中学，发现有 109 名学生痴迷周易，有 314 人拥有《周易与预测学》、《周易预测例解》、《四柱预测学》等书籍。

合肥市某中学的初中生在课间和课外时间互相看手相、面相，煞有介事地测算家庭、婚恋和人生。在他们宿舍，有近 1/5 的人藏有《麻衣相法》、

《东瀛相术》和《现代女性相术》之类的书；另发现有 21 名初二学生被褥或枕头下放着这类书籍。

鼓楼某中学一高中生偶然买回一只能占卜凶吉的罗汉神龛，拴在钥匙上颇为得意。未出一月，全班 51 名学生人手一个。一下课，沙沙的卜卦声此起彼伏，课堂变成了风水庙。1995 年前后，学生们又多了一件事儿——占星术。在图书市场上，《你的星座 1995》、《水瓶座》、《金牛座》等书总被他们抢购一空。

1993 年 5 月，有人把一本社会风行的《商场厚黑学》带进上海某中学。未出两月，该校高二学生几乎人人读过这本书。

《中国教育报》记者杨纲在成都发现，一些大商场的文体用品柜台陈列有不少来源于温州的内容不健康的游戏棋，孩子们争相购买，“已有家长投书传媒，强烈呼吁还孩子们一个健康有益的童贞世界”。

这类游戏棋包括：

《整人专家》棋盒上赫然印着一句教唆性的话“：“整人过程决不手软，整人之后绝不后悔。”下棋过程中，输者须按整人专家的命令去做，如“用屁股写字”、“学狗尿尿”、“抛媚眼 3 次”、“Kissme（吻我）”等，并配有图画，还配有蜈蚣、蟑螂、红嘴唇、美人痣等不干胶片作为惩罚对手的工具。

《皇家超人棋》其中一条游戏规则是：走进“结婚格”或“生儿育女格”可收到礼金若干元。

《新版强手棋》其中规定：已坐牢者，可从别人处购得“出狱许可证”，价格双方商定。

《花花世界》有一条规则是：凡得到“强盗卡”和“黑手党卡”的可向对方强行收取 10 美元。

此外还有《企业家游戏》，有“通过黑道索钱，收帐”的方法。《魔鬼连长》其中的一步棋是“遭女友抛弃，心灵受创伤，可得款项若干以弥补”。《游乐世界》宣称“如果你发现叔叔的钱夹中有零钱，可以全部取走”。

杨纲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说：

这类游戏棋的生产厂家在说明中标榜“可以培养今后进入社会的能力”，实则是宣传诲淫诲盗，金钱至上，在娱乐中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引向歧途，其毒害既深且大。

大众传媒中的暴力、色情、荒诞、迷信之类的内容，对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不良影响是明显的，表面化的，一般人包括学生都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因而尚可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但是还有一些似是而非或在成人中就存在着不同看法的东西，尤其是一些观念的误导，或打着某种幌子的不良内容，其影响则是无法估计的。

在传媒误导中容易忽略的是广告中的误导现象。现今的广告，占据了各种各样的媒体，真可谓钻山打洞，无孔不入，人们的生活可以说都被广告包围起来了。相当数量的广告词、广告画面都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有些内容是属于成人世界，“少儿不宜”的。但是广告的传播是“有教无类”的，并不能区别出成人与少儿来。

广告内容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有关性信息的传播。广告中过分的性信息传播（有的则是有意渲染）可能使少年儿童过早地进行性角色的分化，或以不恰当的方式接触到性问题。

苏北某中学初三卫生课讲到男女青春期一章时，课堂上有数人叫喊：“难言之隐，一洗了之”，“……，你今天又戴了吗？既卫生又健康。”

还有一些广告词诸如丰乳器：“没什么大不了的”，东方神油：“令你威力无穷”，等等，对中小学生没什么好的影响，但却到处存在。还有一些城市的药店、商场化妆品柜台公然摆着避孕套之类的性商品，其包装、广告招帖，更是不堪入目。

在电视广告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庭生活模式：男性追求事业的成功，使用汽车和现代通讯设备；而女性是日常生活用品和化妆品的爱好者。女性总被描述为辅助人物，在家庭里辅助丈夫，在公司里辅助老板。男人的成就是最重要的，而女人漂亮的头发、细腻的皮肤是最重要的，是她们获得爱情、生活幸福的保证。流行小说里，男人是强悍的，女人是脆弱的。游戏卡里，出演的是王子救公主的故事。一个口服液广告作出“每天给你一个新太太”的承诺；一个摩托车广告创意是，女孩子要想得到外国男子的青睐，就要骑某某牌的摩托车；一个空调广告说，“某某空调，就像一个好老婆”；一家颇受青少年欢迎的报纸，赫然写着：“兄弟如手足，太太是衣服。不知道穿T恤的男人会不会视T恤为另一个太太：依顺地、不作声地衬出男人的自尊、地位、虚荣与满足。”尽管这些传媒决非有意识宣扬“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等保守、片面的性别意识，但客观上它们传达给儿童的信息是：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是被动的，只有依附男性才能获得幸福。一些传媒中片面、保守的性别角色定位使儿童性别过早分化，对其个性的正常发展颇为不利。尤其是女童，过早地意识到男女的差别并自居于弱势，促使她们以性别来解释生活或学习的失败，早早地失去了自信。

现在有些少年儿童在过早地尝试“大人们的游戏”，幼儿园小朋友模仿接吻，小学生追逐异性同学，中学生早恋等等，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与传媒的“教唆”不无关系。

90年代，全国每年18岁青少年犯刑事罪的15万人，其中中学生7.5万，14岁以下儿童1万；电影《少年犯》，故事并不遥远；少年犯罪的特征之一：低龄化，12岁的女杀人犯；特征之二：团伙化，九条龙和神龙帮现象；特征之三：动机非理性化，杀人为了好玩；特征之四：手段残忍，高中生与三起绑票血案；特征之五：成人化、智能化，流氓团伙精心策划作案。

来自中小学生的校园暴力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城乡居民的安全感则呈下降趋势，已经构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这一现象已经延伸到了中小学校园，延伸到了孩子们身上。我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字眼：儿童暴力！

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数字表明：进入 90 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查获不满 18 岁的刑事作案人员 15 万人，其中中学生占 50%左右（尤以初中生居多），不满 14 岁尚未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作案者 1 万人左右。

1993 年，全国查获的学生（主要是中学生）犯罪人数 84868 人，其中抢劫、伤害和强奸三项暴力犯罪的占 9%，高达 8000 人。

1994 年，少年犯占全部刑事案成员的比重达 18%，与 15 年前的 1979 年相比，少年犯的绝对人数增长了 6 倍多。

1995 年，全国检察院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杀人等重大恶性案件占 1.8%，偷窃、抢劫等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案则高达 79.85%。

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逼迫我们进行沉重的思索。不仅是家长、学校、公安部门应当着急，全社会都不能袖手旁观。

80 年代，曾经有一部电影《少年犯》，讲述公安人员如何管教、挽救少年犯的故事。其中的主题歌《妈妈》，曾引起了多少人感慨啼嘘：

妈妈，妈妈！
儿今天叫一声妈，
禁不住泪如雨下，
高墙内春秋几度，
妈妈呀，你墙外苦盼，
泪血染白发！

那时，你也许以为这故事离我们还很遥远，以为这种事情总会有所好转。而今，当你面对 90 年代的现实时，已经发现少年犯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子弟中间。

1995 年 3—5 月，南昌警方连连破获多起青少年学生犯罪案件，令人震惊。

5 月 23 日，西湖公安分局破获一起青少年斗殴、打死一学生事件，双方成员 10 多人大多是在校学生。

5 月 22 日晚 12 时，特警女子中队钱素梅等人在巡逻时，抓获 5 名持刀拦路抢劫犯，全系十七八岁的省建筑工程学校学生。

3 月 4 日，西湖公安分局木草街派出所抓获三名持刀行凶抢劫“的士”司机钱财的罪犯，均系江铃职高学生。

3 月 30 日，西湖公安分局破获一起借原初中同学自行车，偷配车钥匙环上的门钥匙，入室偷窃案。失主丢失 2 万元现金和价值 2 万元的金首饰，其中两名罪犯系市第二体校学生。

5 月 13 日，东湖公安分局破获一个偷配同学钥匙，通过跟踪打探住址、以看病为由上课时请假去作案的入室盗窃团伙。他们一个来月盗窃五次，其中一次盗得现金万余元。三名罪犯全系省属重点中学——师大附中高一学生。

以上仅系报上披露的部分,罪犯绝大多数是 14～18 岁的中学学生及中专学生。反思一下少年儿童犯罪现象日趋严重的根由，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学校和家庭。换句话说，担任着少年儿童社会化的重大任务的主要机构——学校和家庭及其共同的社会环境对这一现象负有直接的责任。

一般说，成年人犯罪动机复杂，与犯罪人本身的个人情况有更密切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应由其本人承担基本的甚至全部的责任。但是少年儿童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辨别是非好坏善恶荣辱的能力则相对较差。有的少年儿童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对，但不知道控制自己，处于放任状态，比较容易受到教唆、引诱、刺激，使他们的本能冲动（如暴力、占有、早期性冲动等）更容易直接地表现出来。还有的少年儿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以为是好玩，或者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以为仅仅是模仿他人的行为——别人能做我也跟着做。因此，与成年人比较，他们更容易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刺激。

正是基于少年儿童的这种特殊情况，法律上才规定了刑事责任的年龄。也正因为如此，环境才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可是，我们当今的社会、家庭、学校又是如何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呢？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的大人们，究竟有没有尽到保护青少年成长的责任呢？

当今的少年儿童犯罪的严重程度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数量的上升是惊人的，但分析起来，更令人忧心的是少年儿童犯罪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作案人的年龄、动机、方式、手段、走向犯罪的原因等方面的复杂性，同时也加大了综合治理的困难程度。这也是需要各有关方面提高警惕，予以密切注意的地方。

1、低龄化。在前文引述的数字中，有两组数字特别刺眼，一是 90 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查获的 18 岁以下的刑事作案人员 15 万人，中学生占 50%，尤以初中生居多。二是不满 14 岁，还不能负刑事责任的儿童作案者达 1 万人左右。

初中生涉及刑事犯罪，十一二岁的孩子杀人、伤害、强奸、恶性抢劫，这些在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在今天已不鲜见了。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十来岁的孩子能干得了什么？甚至在法律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无论做了什么危害社会的事情，都不能定他是犯罪，都不能给他定罪。事实上这些孩子也无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的确太小了。可是，当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件摆在我们的桌面上时，难道我们除了吃惊、

感叹，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当然，14 岁以下的儿童作案者每年达 1 万人，这个数字相对于全体儿童的人口数量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如果每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长的办公桌上每年都要摆上 300 份儿童作案的报告，这个厅长还能坐得住吗？

据报道，1997 年 2 月 25 日，浙江省东阳市某村 12 岁的女学生赵某为解嘴馋索食不成，竟然溺死一名 4 岁女童。

据赵某交待，当日，她在晚饭后外出闲逛，碰到 4 岁的露露和小伙伴彩彩手里各拿一包“康师傅”酱味条边吃边玩。见她们吃得津津有味，嘴馋的赵某也想要，摸摸口袋身无分文，就上前向两个小女孩屡次索取，均遭拒绝。

夜色渐浓，彩彩回了家。赵某还没有忘记“康师傅”，又一次逼小露露去买一包来分给她吃，露露还是不肯。赵某抱起露露沿着水渠来到距村百余米的野外，即将小露露浸入冰冷的水中。在屡次威逼索取均遭拒绝后。赵某

残忍地将小露露撂倒在水中溺死。

赵某今年刚 12 岁，身高不到 1.3 米，还在上小学。她生活在一个曾几度波折的家庭。出世还不到 4 个月，她的母亲扔下她走了。生父常年在外，她从小由奶奶带着，稍大就养成了见喜欢的东西就拿的坏习惯，又因老人的过分溺爱，她学会了撒谎。7 岁时父母复婚，此后夫妻俩仍长年在外。她被寄养到一亲戚家，生活得很好，但她在校外随意拿人家东西的积习难改，拿到钱就胡乱买东西吃。

经协商，赵某父母一次性赔偿受害者亲属 3.5 万元。目前，浙江省公安厅批准：对赵某实施少年管教 3 年。

在临时监管处，当记者告诉她，不久将送她到省城去“读书”时，她满脸兴奋，连珠炮似地问：那里是不是有许多同龄人？老师说的是什么话？可以玩吗？管饭吗？有电视看吗？这么一个小女孩，可怜她自己犯罪还不知道这是犯罪了，谁能想到她竟然随随便便就杀了一个人呢？

2、团伙化。团伙作案可以说是我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方式，特别是盗窃、抢劫、强奸和流氓等案例更是这样。据统计目前约有 70%的少年犯罪案件属于团伙作案的性质。

团伙作案的一个前提性的影响因素是学校里的小群体活动增多，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三五个同学住在一条胡同或巷道里，常常结伴而行；五六个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常聚在一起；甚至一个班级中几个成绩最差的人也很有“共同语言”。这些常常相聚、交往频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往往容易发展为班级、学校中的小群体。

学生中的小群体的特点是：（1）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并以此形成彼此联结的纽带和内部凝聚的基础；（2）内部关系亲近，并容易达成态度、情绪、价值标准的认同；（3）随着共同活动频率的增加和时间积累，自然产生一两个核心人物；（4）产生内部的“群体压力”，造成较多的集体行动或相同的行动。

这些小群体的存在，加大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如果处理得好，加以正面引导，可以纳入到少先队、共青团、班集体、学生会等组织举办的积极、健康的活动中来，产生好的、有益于学生学习、生活、成长和学校工作的正面效果。如果处理得不好，则极易与正式的、公开的学生活动及学校工作形成对抗，产生消极的、不利于学生和学校的负面效果。情况严重的，就会逐渐变成不正当的团伙活动乃至团伙犯罪作案。

学生中的小群体活动与团伙犯罪其性质是有区分的，不应把两者混同一谈。但前者确有转化为后者的可能性，有关各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慎重处理。

不正当的青少年团伙，其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对封建社会团伙组织的模仿，是其重要原因；其次，学校教育不当，家长简单的训斥和粗暴的棍棒教育，使部分孩子到家庭、学校以外去寻求慰藉，把“哥儿们”当作亲人；还有离异的家庭，或家庭里因变故双亲不全，或父母不在身边的也容易使孩子过分依赖团伙的威力而甘心入伙，误入歧途。

一些影视作品、武侠小说里对什么“青红帮”、“斧头帮”、“镰刀帮”的欣赏式描绘，使模仿力极强的青少年无意中受到毒害。这是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直接诱因。

学生中的小团伙极易模仿这些东西，任意自称为“九条龙”、“十条好

汉”、“神龙帮”等等，俨然一副黑社会组织的派头，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应试教育把一些学校区分为普通校、重点校，过早在孩子们心灵内造成了差别。一些差生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升学没希望，导致纪律松懈，学习不努力。特别是一些教师采用粗暴的训斥和变相体罚的作法，使那些学生感到在学校有“写不完的检讨，罚不完的站”，在学生中受歧视，在班级中失去温暖，于是，只好在校内校外，邀上几个“合得来”的哥儿们，寻找慰藉打发时光。

再者，有些家长本身素质不高，自身有失检点，醉心金钱、女人，整日玩牌、打麻将，使子女深受影响，染上恶习。

有些家长对子女过分溺爱、放纵、娇生惯养、或者过分苛求，期望值过高，而教育方法又过于严厉。更有一部分家长对子女不闻不问，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有的家长忙于赚钱，抱定“树大自然直”的信条，轻易地放弃为人父母的神圣职责。

少年儿童团伙犯罪的腐蚀性、传染性、危害性极大，往往成为少年儿童犯罪动机形成并付诸行动的催化剂和加强剂，它增加了少年儿童走向犯罪的可能性、盲目性和严重性，也加剧了教育、改造、挽救失足少年儿童的困难程度。

3、动机的非理性化。在西方国家有一个新名词，叫“无动机犯罪”，指的是一个人犯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诸如报仇雪恨、谋财害命、杀人灭口之类，没有根强的目的性，或作案前的深思熟虑、策划准备等等。例如某个罪犯杀人，也许只因为杀人好玩，也许是因为当时“心情不好”等等。在我国的少年犯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中小学生不可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需要有太充足的理由，随便一点小事情，觉得不顺眼，便以自我为中心胡作非为。既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分”，也不考虑事件的严重后果，把违法犯罪行为看得太稀松平常。

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可以归结为是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幼稚无知。但在其背后肯定还有更深层、复杂的原因，至少社会、家庭、学校的环境影响和当事者心理因素影响都是不无关系的。请看下面的一个实例：

北京某居民区宿舍楼内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既不是什么大款，更非漂亮女人，而是一位沿街收破烂的外地青年，人们不知道他为何被杀害。

半年后，一名少年在盗窃自行车时被抓获。审讯时，他不但交待了伙同他人多次盗窃自行车、销赃获利的罪行，还交待了他与同伙行凶杀人的经过。而死者正是那位无辜的收破烂者。据案犯交待，犯罪的导因是五六名小伙伴结伙找刺激，而将无辜者杀害。这个团伙作案后，因未及时侦破，他们更加胆大起来，竟以“英雄”自居，肆无忌惮地打架滋事、偷盗财物，直到东窗事发。

此案披露后，学校震惊，家长也深感意外。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呢？平时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呀！但他们不知道，这几个孩子自上学后就以所在小区为区域，结盟为“兄弟会”，并一起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当问起为何杀人时，他们的回答竟是“好玩儿”。

为了“好玩儿”可以无法无天，随意取人性命。前面介绍过的浙江 12

岁女生杀害幼童仅仅是为了一包“康师傅”酱味条！还有我们经常在传媒报道中看到的少年儿童犯罪，都没有什么复杂的动机。同学之间吵架，老师的批评，家长的打骂，都有可能激起孩子们心中的攻击欲，不加节制地发泄出来。个人欲求膨胀，惟我独尊，任何违逆自我意愿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他们内心的愤恨，产生报复心理，进而导致犯罪，小哥们儿之间的义气。小团伙的权威与压力可以抹煞一切是非对错。

孩子们的是非观念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心中只有自我而没有他人（甚至包括父母）的存在？为什么他们心中没有半点节制、惧怕的成分？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尤其值得家长反省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

相当一部分父母对子女只注意体质与营养，不注意心理品格的训练；娇生惯养，有求必应；还有的家长只教导孩子在外面出人头地，强一点、恶一点，不要受欺侮、受侮辱；教孩子在外不要管“闲事”，不要同情他人；教孩子多多表现自己，超过他人。而在学校中，在一切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影响下，对于孩子应当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教育被大大忽视了。孩子们不懂得什么是同情友爱，什么是规矩分寸，什么是正义道德。

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行为无规范，心中无对错，完全地我行我素。他们走向犯罪，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动机，完全是他们的个性使然。

4、手段凶狠，行为恶劣。少年儿童心中如果没有是非对错善恶的区分，其行为自然就没有节制，其犯罪手段自然也就十分狠毒。

杀人犯任莫凡，22 岁，1994 年从唐山二中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秦皇岛复读一年，1995 年 10 月到河北滦南县一中借读。从 1995 年 6 月到 1996 年 6 月一年时间内，独自一人制造了三起绑票勒索的血案，被判处死刑。

三起案件中，被任莫凡绑票的都是小学生。他先勒索钱财，钱到手后却残忍地将孩子杀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名身为高三学生的罪犯，其心肠狠毒、手段残忍，已经远远超过了旧时的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行为，得了钱还撕票，罪犯实际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地步了。

任莫凡的父亲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他说，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他流着泪哽咽他说，我们把力量都花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全家 5 口人；总收入才 500 多元，每月给他 200 多元。每次去看他，怕他肚里没油水，总要给他带上炖肉、茶鸡蛋等好吃的，让他吃几天……

据其父母说，任莫凡只怕他父亲，其母则对他溺爱有加。他们承认近来对孩子在外面的情况不大清楚。其父每次去学校，也只能在课间 10 分钟和他见上一面。其父得知任在学校谈了几个女朋友，花钱太多，多次批评过他，逆反心理堵塞了他与家长的沟通。而社会上的各种不良信息则深入其大脑之中，于是形成他的病态心理。

1997 年 3 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查处了一起某中学初中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多次向二十多名同学勒索现金千余元。令人吃惊的是，作案者和受害者的表现都非常特别。作案学生的表现是明目张胆。其中一名学生，在上学时竟随身携带一张条子，上面开列着十几个同学的姓名及准备向他们索要现金的数目（三五元至五六十元不等），以便照单“收帐”。他们敲诈勒索的方法很简单，或是“借”，或是干脆以“不给就打”相威胁。

受害学生的表现是沉默无言，不敢对老师讲，甚至不敢对家长讲。更为可悲的是：在公安机关和学校政教主任两次动员学生们揭发检举并保证为检

举人保密之后，这 20 多名学生竟无一人敢揭发。他们的理由很一致，就是“ 怕报复 ”。

成都某重点中学初一女生郭某，长时间遭受同宿舍 8 个女生殴打、欺侮、敲诈却不敢声张。女孩子一向被认为性格温和，胆子小，很少是惹事生非的主。但那 8 名女生行为之恶劣，心肠之冷酷也充分反映了当今学生中的心理病态和教育的失误。

1995 年圣诞节前郭某所在宿舍为过圣诞每人收取 30 元（名曰空间占用费），郭某拒交，从此便惹来了麻烦。

事发之后，那 8 名女生在检讨书中供认了大家联合欺侮郭某的经过。

第一次殴打郭某，是在 1996 年 5 月的一天。一个女生在检讨中说：“ 中午我坐在床上准备睡觉，听到有一位同学在说：‘ 郭×，我们来打架嘛。 ’便不分青红皂白将郭某从床上拖起。大家不用一会儿便已将顺序排好，我最后。大家先依次打，轮到我了，我本来不想打，可她们说谁不打就孤立谁。我没办法，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打了郭某几下。 ”“ 我们一个挨一个踢她，然后扯她头发，接着又打了她的脸，反正让她不得安宁。 ”“ 并对她破口大骂，污辱她的人格，使其流泪、求饶。 ”

“ 第二次是打脸，我们每个人都打了她两个耳光，把她的脸打青了。第三次和第二次同样。第四次是扯她头发，有的同学去剪她的头发，头发都掉了许多。 ”除了殴打、侮辱之外，还有敲诈。她们第四次打人之后，每人又向郭某索要了 2 元的“ 精神损失费 ”。还有一天，郭某借了一个女孩一包卫生巾，后来从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包更贵的归还，对方却说规格不同要她重买，但买回来的总没能让对方满意。如此三番五次，共买了 20 元的卫生中却没能还清价值 3 元的债。那些女孩子以郭某“ 买歪货 ”要打抱不平为由又将她打了一顿。事后她们又要求郭某拿出一星期的往返车票共 48 元。郭某没有那么多钱，只得向妈妈要，家长这才知道了真相。

然而更加奇怪的是，学校当局并未将此事看成是严重事件，反而说：“ 学生间发生些摩擦是难免的，不是什么大事情。 ”不知是怕丢学校的面子，引起上级批评和扣发奖金，还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8 个十来岁的初一女生，作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心肠冷酷、对同伴的仇恨和对暴力的习以为常的种种反常心态，难道不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吗？

5、成人化、智能化。十几岁的孩子抢劫时戴上面罩，偷窃时戴上手套，换上大人鞋，这些从书刊影视等传媒上学到的手段被孩子们模仿使用，使他们的犯罪具有成人化、智能化的特点。有的人为了报复他人，精心策划作案步骤。还有的人欺瞒哄骗，诡计多端，引诱受害者上钩。

1996 年元月，海口四中 3 名初二、初三年级的女生伙同另外 4 男 3 女共 10 名少男少女，诱骗本校初二年级 14 岁的某女生在外地登记住宿。这 10 人在旅馆对被诱骗的某女生进行侮辱、殴打、猥亵、奸污，第二天才让身带血迹、伤痕的某女生返回家中。

这 10 个人中，最小的 12 岁，最大的 18 岁，多数是在校学生。他们虽然年纪轻轻，但有人吸毒，有人经常在学校门口拦劫学生，抢自行车，销赃后再购买毒品，吃喝玩乐。他们诱骗某女生，自始至终都是有预谋、有计划、有分工的理性行为。有人骗其逃学，有人劝导其顺从，有人动手殴打、脱衣服，甚至还有人负责从外面买回春药。

然而令人奇怪其实又不奇怪的是，事情暴露后，学校不愿家丑外扬，以免学校声誉受损，影响上面发奖金。有领导说：

“不报案也好，孩子的名声要紧……”有记者要写文章报道，校领导直接以组织名义进行阻止。看来，为了家丑不外扬，对于流氓团伙的犯罪活动，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校园里的青少年犯罪及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怕很难找到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途径。

总而言之，净化社会环境，改善家庭教养方式，改善和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也许是最为无形然而又是最为治本的方法。

5 心有千千结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精怪得不得了，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比我们小时候复杂多了！”我们也许常听到家长们或其他的大人们在这样议论，摇头、感叹、啧啧连声，百思不得其解。的确，50～60年代出生的人在年幼的时候，心地单纯得多了，真正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候的小孩子只有一个心思：“听毛主席的话，做党的好孩子，长大了接好革命的班”；只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纯真。幸福与向往。

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似乎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浮躁、茫然和迷惑之中，大人们有时也把握不定，不知所措，总面临着许多头痛的事来不及细细梳理，忙碌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平和安详的心态，仿佛一下子掉入了八卦迷阵中。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中，跟着遭殃的是我们的孩子们。

现在的孩子们，主要是中小学生，面临着一种过于复杂、多样化、快节奏和变化不定的成长环境。他们在家庭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常常看到、听到、接触到许多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东西，汹涌而来，令人目不暇接而又不知所措；他们心中充满着太多的困惑与冲突；在充满竞争和升学、考试的压力下，又承受着更大的学习压力和重担。在孩子、家长、学校、社会都缺乏充足的估计和准备的情况下，孩子们一下子被扔进了现代生活的海洋中。

于是，正处于急速发育而又十分脆弱的心理断乳期的孩子们的心灵，遭受了超越其承受能力的冲击。

各地中小学生服用安定片成风，全国告急；”我成了学习的机器，活得太累”；兰父亲“偷看”她的日记，她就……；精神麻醉，逃避现实。

服安定风波

电脑屏幕上接二连三地滚动着骇人听闻的文字：

1995 年秋天，贵州全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中悄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服食安定片可以解除一切烦恼，舒服快乐极了。开始时，中小学生每人仅仅只是服食一两片，说是“好玩而已”。慢慢地，便觉得“不过瘾”了，于是几片、十几片甚至几十片地一次性吞下去，以求迅速产生“飘”的感觉。一时间，在贵州的一些城市里，药店的安定片特别好销。1995 年 11 月上旬，长沙个别学校即已察觉有学生服用安定片的情况，但仅通过班主任向学生下达禁令，未引起足够重视。11 月 22 日，长沙市八中十多名学生突然陷入昏迷状态被送进校医务室。校方及时向公安部门和家长反映，惊动了传媒。据调查，该市部分中小学校都有类似情况发生。该市的几家医院同时收治了多所中小学送来的服安定中毒的学生。有黑心药贩以“吃了来劲”为诱惑在校门外兜售，引起学生好奇心理。而药品行业亦未加强此类药品的管理。学生服用的是“舒乐安定片”，是一种高效镇定催眠药，药效较一般安定片高 2—4 倍，它在人体内分解速度极慢，96 小时后才由肾排出 12%，对人的神经产生持久性伤害，长期服用则产生依赖性（上瘾）。

1995 年 10 月至 12 月，成都市发生了数十起学生服用安定片自杀事件。成都市一家医院就收治了 16 名安定片中毒患者。

1995 年 12 月 19 日，沈阳市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中学生集体服药自杀事件，该市第八中学初二四班的 8 名学生在学校吃午饭期间，按预定计划服下了大剂量的镇静药物安定，最多的 100 片，最少的也有 40 片，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酿成死亡的严重后果。

1996 年 3 月 13 日，吉林省集安市某中学 2 位 15 岁的女学生，因“睡不着觉”，便“好奇”地服用了大量安定片，结果双双恶心呕吐，言语混乱，神志不清。

1996 年 3 月一天，郑州一所中学的老师突然发现部分学生走路摇摇晃晃、精神恍惚；一问才知道是喝了一种名叫三唑仑的药物，这立刻引起了学校的警觉。经详细调查，发现几乎每班都有学生喝过这种药。

据学生们说，他们听说三哇仑吃后可以使人变得聪明有劲，且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于是很多孩子都偷偷地买来服用，少则一片，多则六七片，有些孩子还买来分给同学吃。孩子们吃后轻的眩晕呕吐，整日萎靡不振；重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以至精神失常。

根据国家规定，三唑仑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作为镇静剂使用。如果长期服用或超过一定的剂量，就会产生依赖心理，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据了解，这种药曾蔓延到郑州的十几所中小学校，究竟有多少孩子吃过还不清楚。

三唑仑在中小学中蔓延的状况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 1996 年 4 月 4 日起，郑州市开始全面查禁三唑仑，对违反规定经营精神药品的药店进行了查处。吃过三唑仑药的中小学生也陆续被送到医院接受诊治。

1996 年 4 月 19 日晚，武汉市武昌一家医院急诊室同时接纳了 4 名吃安眠药而不省人事的中学生。据该医院急诊室负责人张医生介绍，仅 4 月中上旬他们就先后收治了 21 名此类中学生。

5 月某日，武汉某医院急诊室一连接诊了 3 名因恐惧考试服安眠药的中

学生，他们经抢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都是问身边惊魂未定的家长：“今天还考试吗？”

又是在成都，1997 年 2 月某日，3 名 11～12 岁的小男孩因服用大剂量安定药片而被送到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抢救。3 月 5 日，两名初中生因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被送入该院救治，她们的书包里还藏着成瓶的安眠药。两名少女都是成都五冶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其中一位姓王的同学因家长责骂而不想活了，于是向班上同学要了 80 片安定分三天三次吃光。她的好友见她吃药，也好奇地服用了一把，还说觉得好玩。

近年来，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也常常出现中小学生因滥用安眠药而中毒的报道。

1997 年 4 月 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汕头市的一些贩毒分子把毒手伸向了中学生，他们瞄中了中学生的零花钱，引诱他们吸白粉。目前已抓获了几名贩毒分子，已被引诱的学生正在接受强制戒毒。

粤西某中学的一位班主任老师说，他的学生中有人躲在宿舍吸毒，因有黑社会的人在暗中操纵，老师不敢管。

中小学生服用安眠镇定药物成风，学生中有了吸食精神药物和毒品的苗头，全国告急！

为什么中小学生服用安眠药成风而且波及全国许多省市呢？有关专家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就其直接动机而言，服用者有三类。一类是无知好奇，看人家吃自己也“尝试”一下；二类是由于心理紧张而寻求麻醉和解脱；三类是承受不住各种压力而寻短见自杀。

一名女生告诉老师说：“我并不真想死，只想少吃点吓唬我爸爸，我物理考了 69 分，我吃了药，我爸就不会打我了。”

学校向家长通报情况，希望家长不要责怪孩子，可这名学生一回家便遭父亲一顿痛打。

一位高二男生说：“我都成了学习的机器、考试的奴隶，活得太苦太累。”他曾为此服下 40 片安定而在医院躺了 3 天。

3 名初三的男孩因考试成绩达不到父母要求，害怕受到“武力处罚”，就用吃安眠药来对付，结果两位疯疯癫癫，一位则永远地睡去了。

一位 17 岁的女中学生，本来父母离异就令她痛苦不堪，自觉“比别人矮一截”，当父亲粗暴地翻看了她的日记后，她再也受不了、就吞吃了大剂量的利眠灵，企图在醉生梦死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失落的尊严。

就其背后的真正原因而言，本质上是教育的失误所致。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繁重，考试压力太大。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到，中小学生在高考、中考指挥棒的指挥之下从事着超量的脑力劳动，甚至得不到应有的休息。没有休息日，没有课余娱乐、休息和锻炼时间。上课、补课、作业、复习、考试占据了孩子们绝大部分时间。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还要额外增加孩子们的负担，要求学这学那。学校里的各类测验、考试、竞赛更是接连不断：课堂小测验、单元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联考、统考、模拟考、毕业考、知识竞赛等等，考得学生疲惫不堪，胆战心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在这样的重负之下，学生焉有不寻求精神安慰、寻求轻松享受的道理。正常的渠道得不到，只好走入歧途。

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差，则是教育中更深层次的问题。长时间以来社会、

家庭、学校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品格方面的培养、训练和教育，以简单、呆板、僵化、千篇一律的思想政治工作取代这一切。这使得中小学生在意志力、情绪、情感、性格、自我意识、人格倾向、社会交往与适应能力等等心理素质方面处于一种自发形成和盲目发展的状态。特别是一些学生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经不起打击，心理受挫后的行为反应便显得消极，容易积累成心理障碍。在难以解脱、宣泄时，他们便企图通过精神麻醉来逃避现实，甚至失去生活的勇气。即使那些出于“好奇、模仿”的动机而服用安眠药的学生，也是由于心理品质不稳定，缺乏主见和判断力，因而容易受到不良行为的引诱。

初三女生喝农药自杀；为了 10 元钱，13 岁男生跳楼；老师罚站，11 岁孩子上吊；被鲜花和掌声捧杀的特优生；心理障碍，辣手摧花。

早谢的花季

1996 年 1 月 29 日，山东济南市一位 15 岁的初三女生在家中喝敌敌畏自杀身亡。

上午，她参加期末第一天的考试，自我感觉不太好，对自己感到失望，进而由失望转为绝望。她留下了一封遗书：

“爸爸妈妈：我走了。我想我的成绩不会太好。希望莉莉（其妹）能圆她的大学梦。请多保重。希望莉莉别再走我的后路，让莉莉忘了我吧！再见了，莉莉。——不孝之女。”

消息披露后，社会震惊，议论纷纷。《齐鲁晚报》开辟“女中学生之死留给我们的思考”专栏，每日刊登社会各界有关的反映：

孩子的父亲为此悲痛万分。他期望孩子成“凤”，对于孩

子的学习十分关切。当初，她考中学的成绩不太优秀，他还是托人让孩子进了快班；初二下半年，她的期末成绩由原来的二十几名下降到 44 名，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他让孩子立下军令状，作出保证：初三一定赶上去！

如今，这位父亲说，社会大气候太重学历，学校又注重升学率，家长望子成龙怎能不心切呢？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因此轻率地走上绝路。

一位与她很要好的同学哭着说：“学校招生时，就将学生分为快慢班。快班的学生都是招生时的优秀生。进了快班就意味着向市重点高中冲刺。我们都很担心成绩考不好，一怕家长责备，二怕在老师同学面前失面子，所以每次考试前都很紧张。”

山东师大附中一名高一学生说：“不是我们不够坚强，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市内有一些学校在每次考试之后排名次，有的班甚至按名次排座号。千佛山中学一名初二女生说：“一到考试就想到考不好怎么办，怎么对父母讲。”这位女生曾从班内的前 3 名跌到第 15 名，家长为此大动肝火。她把自己整整关了一个暑假。

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说，学生逆反心理是逼出来的。为了适应当今的社会竞争，家长难免对孩子期望过高，只想让孩子向着父母设定的目标迈进，孩子失去了个人的追求和自由发展的余地，导致逆反心理，形成厌学和对抗情绪。一位中学教师说，家长在确定对孩子的期望值时，应先打个问号，认真审定一下。家长要正确估价自己的孩子，如不切实际地盲目提高“标杆”，平时会造成学生、家长都紧张，矛盾频生；考试时，会挫伤孩子的锐气，使孩子意志消沉、悲观失望、也许一生无所作为。学生的智商、兴趣、爱好以至成绩是有差别的，将来的发展势头也不会是一样的。

一位教育干部说，应让学生懂一些辩证的道理，认识到一次分数不能定终身。初中三年级的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还不足以作出不能成才的定论。再说，难道考不上大学，一生就完了吗？也不是。只要努力，成才的机会还很多。全国的一些优秀企业家，如今办起了产值上亿、十几亿的大企业集团，在改革开放前，不就是一个一般干部，或二三级钳工吗？

你可以说，大道理谁都懂，可事后诸葛亮顶什么用？你也可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事后补牢，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毕竟，十五六岁的花季，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令人痛心、惋惜的。当前中小学生中的自

杀现象屡见不鲜，并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果不尽快加以制止，悲剧还会在全国各地不断重演。

1994 年 4 月 25 日，湖北黄石市一名 13 岁的小学六年级男生从 6 楼家中翻越窗户跳下，重重地摔在地面上，当场死亡。

出事的前一天，他看见一名同学手上有一盒很新潮的游戏卡，自己也想买可手头只有 70 元钱，还差 10 元，怎么办？于是，他私拿家中的钱准备去买游戏卡，第二天被其母发现。母亲很气愤地打了他一巴掌，于是他一气之下从 6 楼跳下来……

这位同学的父亲在外做生意，母亲是一名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家里很富有。他在同学中常摆出“财大气粗，以富傲人”的架势。学校备有学生早餐，但他自己很少去吃，“派”给其他学生吃，自己则上餐馆。出门常常“打的”。他的老师认为其父母平时过分溺爱，一味满足其要求，养成了他要啥有啥的习惯，一旦稍有不满足，便产生逆反心理，结果酿成了悲剧。

1995 年 12 月 23 日，湖南吉首市某教师的女儿王一洁因不堪学校变相体罚，幼小的心灵遭受伤害，遂吊死在床架上，年仅 11 岁。

王一洁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头一天她上课小声说话，被老师批评并罚站 30 分钟。回家后她向父母哭诉“受了冤枉”，“老师不要我读书了”，又听不进家人劝告，第二天上吊自杀。

1996 年 1 月 15 日，山东枣庄市中区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章涛，单元测验考了 28 分，觉得无脸见人，便躲在卫生间用红领巾结束了仅仅 10 岁的幼小生命。

章涛性格内向，学习用功，智力也不差，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成绩上不去。自卑、郁郁寡欢的抑郁性格，在其短短的人生路上埋下了隐患。

1995 年下学期，湖北荆沙市某重点高中女生姚某，在考试时递答卷给同学被发现。她不能容忍自己出“洋相”，在 15 岁差 3 天的日子里离开了人间。

姚某是免试保送重点中学的，入学后成绩依然第一。她成绩优异，常受老师表扬，在家里也是听话的孩子。但她太看重分数，对荣辱过于敏感，习惯于鲜花和掌声的包围。曾因为成绩由第 2 名降至第 6 名而撞过墙的她，更不能容忍失去“好学生”的桂冠，终于走向了极端。

一个又一个的案例，一幕又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为什么这些处在灿烂花季的生命，会过早地夭折？

辣手摧花，第一凶手便是心胸狭窄。从死者的情况来看，其主要表现是，遇事想不开，只从一时一事看问题，而且只看到自己，不善于同他人比较，不善于从外部寻找原因，常常会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自我处罚，或以死来唤起某种“证明”；第二是过于敏感，对于荣誉、面子、旁人的说长道短过于看重，一旦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便以为天要塌下来，无脸见人；第三是内心抑郁，遇事不能有效地排解，更不善于向他人倾诉，闷在自己心中，久而久之会失去生活的勇气，由精神上的退缩走向崩溃。

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又是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共同影响的结果。在中小学生自杀现象中，外部环境的影响起了催化和加压的作用。一些家长对子女期望值太高，将子女看作是自己人生目标的延伸或替代，形成了很强的压力。还有一些家长教育方法不当，打骂加溺爱，或过分娇纵，或过分严厉，或骤冷骤热，使子女无法适应。有些家长缺乏同子女的内心交流，简单粗暴，造成代际隔膜和子女的心理孤独，又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加以疏导。而就学校和

社会来看，学生负担重、压力大，学校管理不善，工作简单化，以及一些错误的观念引导和不良风气影响都有可能起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作用。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应试教育的阴影笼罩在学校、家庭和孩子们的头上，造成了这种现象。

父亲的无知与残忍害了女儿；社会调查；中小学生的八大烦恼；过度严厉与溺爱——教育子女的两种误区；从大人抓起；少年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友生率高这 13.9%；专家说，我们的孩子并不幸福；培养下一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如今的中小学生，除了极少数特困生之外，基本上是不愁吃喝的。正如在前面讨论到中小学生消费问题时曾提到的，当今中国，真正能做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怕是只有学生家长。

所以，现在的孩子们营养状况、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生理发育方面，肯定超过他们的上一代。这毕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可是，作为家长和成年人的我们却往往不懂得孩子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或者至少是忽略了这一点，常常是“以成人之心度孩子之腹”。

据《瞭望》周刊报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太喜欢她养的小猫儿，连做作业的间隙也不忘给猫添食，还在本子上勾画几笔吃食时的“猫态”。一心想让女儿考重点中学的父亲，认为是猫“有罪”，分散了女儿的学习精力。一天，他让女儿抱着猫随他到工厂去。突然，他猛地从女儿手中抢过猫扔进锅炉，让她亲眼目睹那可怜的小生命的下场。女儿还来不及判断父亲的用意，只听到小猫最后那声凄厉的哭叫。她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猫儿在通红的火中挣扎，瞬时化作轻烟和灰烬……愚蠢且残忍的父亲以为从此为女儿扫清了进重点中学的障碍，根本不知道善良幼小的心灵随着那小动物的惨死已被撕成碎片。此后，无数的夜梦里，她都惊叫着爬起来，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最终积郁成疾，不得不休学……

1996 年上半年，《中国妇女报》组织了一次有关家教问题的社会调查，总结出中小学生有八大烦恼。《中国教育报》1996 年 9 月 18 日和 10 月 2 日分两次发表了这次调查分析的结果：

1.家长不能理解我。

27%的中小学生将“家长不能理解我”列为主要烦恼之一。相关的问题还有：爸爸妈妈不相信我（占 12.9%）；家长只知道关心我的成绩（占 31.5%）；我想做的事情家长总不让我做（占 26.6%）；我不知道怎样向父母说出我的想法（占 33.7%）。另外，有 19%的小学生选择了“我不愿学父母为我安排的学习内容”（如钢琴、计算机、美术、舞蹈、书法等）。

2.家长总不让我玩。

21%的孩子说“家长总不让我玩”。与这个题目十分相关的是，“家长只知道关心我的学习成绩”，“我想做的事情家长总不让我做”，“我经常没时间看电视”（占 25.2%）；“爸爸妈妈禁止我玩游戏”（占 21.7%）。

3.我无法获得课外知识。

32.2%的中小学生把“我喜欢的课外书太少了”看作是他们的一大烦恼。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赞成孩子读课外书。而持赞成态度的家长又常常为“可买的书太少”而头疼。江苏一位家长在来信中抱怨说：“我的孩子特别爱看一些课外书，常常缠着要买，可是书店并没有什么好的儿童读物，有的虽然适合孩子阅读，但价格太贵，让人难以接受。”

20.2%的中小学生认为自己“无法获得课本以外的关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知识”。12.7%的中学生觉得自己“很难获得青春期知识”，而这又正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烦恼。

4.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

38.9%的中小学生承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什么原因呢？53.9%的同学选择了“我没有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可见同学们都意识到了学习

方法重要。而掌握一种科学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5.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以往，考大学的起跑线是在高中，从高一起才开始向大学冲刺。而现在，起跑线逐步移到了初中甚至小学。不少家长督促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奋斗，起跑线越来越提前。这次调查中，大约 30%的中小学生感到学习压力太大，还有 8.7%的同学埋怨“总也做不完作业”。一个五年级的男孩写信时大声呼喊：“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6.我没有什么知心朋友。

14.8%的同学说自己“没有知心朋友”。与这道题目相关的感觉是“我常常感到孤独”（占 17.6%）。

7.家庭困扰。

10.4%的同学把“爸爸妈妈总爱吵架”当作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烦恼。家庭困扰在同学们心中投下的阴影是巨大的，有的同学因此厌恶自己的家庭，做作业时分心，不愿回家等等。调查中有的同学说，“家长太固执”，“家长说话不算话”，“家长封建思想太严重，摆大家长的威风”，“家长的脾气全靠心情好坏”，“家长常常出言不逊，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8.老师偏心。

在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很在乎“老师喜欢谁”、“讨厌谁”。因此，这几乎成了同学们私下议论最多的话题了。这次调查中，9.3%的同学认为“老师偏心”，与这个问题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问题“班主任对我不好”，有 3.7%的同学说“是”。也就是说，觉得老师偏心的同学，也感觉班主任对自己不够好。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长和老师常常是我行我素，不考虑孩子的特点、要求，尤其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有些父母自以为最爱自己的子女，最有权利管教自己的子女，有的家长对孩子专横、武断甚至达到残忍的程度。他们在严厉和溺爱的两种态度取向上常常走向极端。

严厉的极端表现是，要求孩子绝对服从，不分场合地当面训斥，禁止一切合理要求，甚至实施肉体惩罚而毫不心软。

沈阳一个 8 岁的孩子，被父亲一记大耳光、猛踢两脚断送性命；武汉一个孩子被父亲连捆数圈吊在梁上致死；贵阳一个 7 岁的孩子死里逃生后，在腿上、臀部留下 22 道被父亲用火钩烙的红黑相间的伤痕……三件惨案中三个孩子的“罪名”差不多都是“逃学、贪玩”，而三个父亲对各自行为的口供都是如此一致：因为自己太爱孩子了——“恨铁不成钢！”

孩子们受到的伤害，除了肉体痛苦甚至生命危险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打击。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创造性和想像力受到抑制，行为动机受到严重挫折，变得忧郁、烦躁、孤僻和退缩，从而产生心理障碍。

溺爱的极端表现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生活上过多爱护，包揽一切，不敢放手让孩子独立活动，常常代替孩子做事情；同时，发现问题不及时批评教育，明知不对还要护短，使孩子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成了家庭内外的“惹不起”。

湖南某具有一个小学生，在学校表现不好，父亲长期在外，其母亲欲进行严厉管教，却遭到了爷爷奶奶的强烈反对。爷爷奶奶常常当着孙子的面大声数落儿媳妇的“不是”，对孙子则娇宠有加，结果使孩子更加有恃无恐，

为所欲为，发展为小偷小摸、行凶打人。“ 混 ”入初中之后，更受到社会上不良青少年的影响，终于成了学校的“ 害群之马 ”，初中没毕业便被开除。

溺爱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常常是依赖心理严重，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同时还容易形成自我中心，自私狭隘，有时还会产生逆反心理、对立情绪以及恐怖、离异心理。无怪乎一位政协委员在报上撰文呼吁，办教育首先不是从娃娃抓起，而应当是从大人抓起！

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失误，教育体制的弊端，加上社会大背景的种种不良影响，造成了中小学生心理素质方面存在着较为普遍性的问题。其突出的表现是依赖性强、自制力差，社会交往能力不足，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等。有相当比例的中小学生业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种种心理障碍。

1994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 4～16 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表明，中国少年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 13.9%。

有关部门此后作了相关调查，发现小学生、中学生中不同程度心理障碍的比例分别达 20—30%和 40～50%。

根据 1996 年对南京 2300 名大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调查，结果表明 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我国高校“ 少年班学员中约有 1/3 不能完成学业被淘汰，这有性格、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承受能力差和发生心理精神疾病的原因。一位专家在调查时发现，几乎所有青少年犯罪的动机，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心理扭曲的因素。

在北京，每 10 名中小学生中就有 1 名心理障碍者，而参加心理咨询的 1/3 以上是有关学习焦虑的问题。

在天津的一项调查中，781 名中学生竟有 22.15%的心理异常者，其中 4.4896 的学生问题严重。

杭州某单位对 2916 名大中学生进行为期 3 年追踪调查,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初中生占 13.76%，高中生占 18.75%。

在东北三省，通过对 3 万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心理异常者占 32%。

1994 年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研究室对广州市的 570 名初、高中学生进行了一次心理问题调查，孩子们的自我感觉令人担忧。有 84.74%的人对目前的自我不满意，希望能更好；有 7.89%的人希望出生在另一个家庭。人际交往上的心理问题亦较为突出。如有 31.75%的孩子常有话不知对谁说；15.61%的孩子觉得无人能理解自己；16.84%的人觉得缺乏知心朋友；19.47%的入觉得老师难以沟通；22.63%的学生认为难以达到父母的要求。有 10.53%的人希望找心理医生咨询，但又怕别人知道。

国家教委不久前在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有 22.23%的大学生程度不等地存在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北京大学近十年因心理障碍休、退学生数占休、退学总数的三分之一。杭州大学医学院对本院 1000 名学生进行心理卫生调查发现，正常型仅为 12%。湖南医科大学对 827 名学生调查结果显示，有 35%的学生存在中度痛苦水平以上的人际敏感、抑郁、偏执、强迫症等等。这些学生在中小学时有可能潜藏着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而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1995 年春,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叶斌专门访问了一位名叫小茵的 17 岁女生。小茵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优越，成绩良好，唯一的缺憾就是“ 寂寞 ”。她对叶斌诉苦：“ 我一直在家里，一直在读书，我没有朋友，父

亲不在家，母亲又不会听我的，我的苦闷不知向谁倾吐。我觉得孤独忧郁，生活缺乏活力和刺激，平静得几乎要让我发疯。有时，我甚至会用刀片割破手指，看着鲜血一滴滴流下，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刺激和兴奋。”她的手腕上真有一道道自戕的伤疤。叶斌认为：个体处理压力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内投，一种是外投。小茵属于前者，她是用自我伤害方式缓解内心无处宣泄的心理压力。

专家认为，从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方面来看，少年儿童（一般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包括如下几类：

1.行为障碍：如儿童的多动症、过度焦虑反应、退缩行为、攻击行为、恐惧行为等。

2.儿童神经症：如儿童恐惧症、强迫行为、神经衰弱、儿童期惫病等。

3.特种障碍：如排泄障碍、语言障碍、睡眠障碍、进食障碍等。

4.不良习惯：如习惯性抽搐、吮吸指头或衣物、咬指甲、吸烟等。

5.品行障碍：如偷盗和说谎、逃学和离家出走等。

6.性格障碍：如猜疑与抑郁、狭隘与嫉妒、怯懦与自卑、对立与破坏等。

孩子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是儿童期，二是青春期，这是家长和学校都必须注意的。

根据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岫茹介绍，心理障碍也即轻微的心理失调。就青少年而言，在学习、就业、交友、恋爱、社会适应等方面比较普遍。例如：

有位女中学生内心喜欢一位年轻的男老师，由于害羞，连正面看老师都不敢，渐渐地发展到不敢看所有的男生和男老师。当她用手挡住自己眼睛的时候，都会感到自己的余光仍在看。她十分自责，认为自己很坏，正常学习无法坚持，学校也不敢去、最后只好退学。这种异性恐惧症的病例，在中学生中男女都有。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英已经认识 2000 多个汉字，钢琴通过了六级考试，是父母和姥姥的宠儿。可自入学以来，她看到老师很严厉，经常训斥或处罚同学，开始害怕到学校去，以至每到学校门口就会呕吐，连上楼梯都迈不快步子，还时时担心别的同学挤她。据了解，这种适应不了学校大环境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大都是独生子女，这种案例有不少。

当然，关于中小学生心理素质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要研究、分析其具体表现，特别是要全面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找改善的办法。

北京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导师董奇教授认为，现在学生的心理素质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他们今天生活的社会环境比过去复杂多了，他们常常接触到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东西，他们心中的困惑、冲突比过去同龄孩子要多得多。而且在学习上他们还承受着比过去孩子更大的压力和重担。因此说，虽然现在的学生比过去的学生生活更现代化、更富裕、更丰富多彩，但他们未必比过去的孩子过得更幸福！他们面对着来自社会、学校、家庭的压力，激烈的学习与升学的竞争；甚至还面对成人、传媒对他们身上某些弱点的夸大、渲染和指责。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他们总体上还能健康成长，已经很不容易了。

从要成功地适应现在与将来的学习、生活、工作的角度分析，在当前学生的心理素质中，存在依赖性较强、自制力较差、社会交往能力不足、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等需要重视的方面。但这些不足的存在不能

完全归因于学生。事实上，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症状，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还在社会、学校和家庭。如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社会政治问题，家庭结构变化，文化教育方式的新特点，家庭居住环境的改变，过多的学习课程和内容，过重的学习与升学压力等等。只要准确地研究、把握了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并采取相应教育对策，当前学生心理素质中不足的方面是可以改善的。

专家的意见是精辟的。目前中小学生心理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能归罪于学生，责任在社会，特别是家长和学校。我们不能像九斤老太那样，责怪我们的孩子“一代不如一代”。恰恰相反，这一代的孩子们在基础素质、总体的体质和智力水平上应该是强于上一代的。他们在未来将要担负重大的历史责任。惟其如此，在更好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更应当持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青春期——人生的心理转折时期；现代少儿生理发育年龄提削；青少年性罪错，最小的 12 岁；14 岁女孩和情人私奔；青春期问题与心理断乳；青春期是一个多事之秋；羞羞答答的青春期教育；性健康教育的观念误区；“好吃的东西拼命吃，也会生出大病来”。

躁动的青春期

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重的现象，就是青春期心理问题。

青春期是少男少女性生理发育成熟和性心理开始形成以及开始走向心理独立的转折时期。由于食物结构的改善和营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儿童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普遍提前，小学高年级学生已开始了性生理发育并出现第二性征。相对而言，青春期教育和辅导却由于种种原因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了青春期的种种心理、精神以及行为方面的问题。其中，以早恋、不正当的两性交往、性罪错方面的问题为主。

据调查，我国青少年性罪错的年龄分布为：男子最小值为 12 岁，高峰值为 15 至 16 岁。由于社会开放和文化变迁的大环境影响以及各类传播媒介的普及性诱导，少年儿童受到大量的有关性问题的信息刺激，也间接地促成了青春期的提前到来。现在的小学生性早熟、中学生早恋及性罪错行为已是时有所闻。

根据哈尔滨道外区某派出所提供的情况，1996 年初，一名正读初一的 14 岁女孩，在与人同居一个多月后才被父母带回家中。这名女孩 2 月初便开始打算与一名 23 岁男青年同居。她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拿走 1 万元后，即与男青年一块离家出走，以月租金数百元租了一套楼房，并购买了沙发、床和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严然过起了“ 小家庭 ”的同居生活。

家长发现她失踪后，长途跋涉到处寻找，仅在全国各城市发寻人启事的广告费就达上万元。3 月 30 日当地负责治安的民警在清查外来人口时，发现了这个“ 新住户 ”，经详细询问，终于真相大白。事后，一位教育界人士就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目前影视作品的成人化及过多的恋爱镜头已成为孩子们早恋早熟的直接因素。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北唐山市的一所中学里，竟连续发生了两起少男少女集体淫乱事件。

在唐山市第 XX 中学，一名不满 14 岁的初一女生中午放学后在学校操场被几名男生截住，并被挟持到男生宿舍，遭到轮番奸污。另有几名男生一直在旁观看，认为好玩。

家长报案后，学校保卫科和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却又发现了另一起更严重的集体奸淫活动，且历时数月之久，一直无人过问。该校初二男生约 15 人与同年级一名女生长期有性关系。他们往往像是做“ 集体游戏 ”似的，从去年暑假开始，或在同学家，或在铁路旁、小菜园、沙子坑，甚至就在校内。

这群学生平常在校表现都不好，有的受过处分。他们几乎都不同程度观看过黄色录像片，平时话题总情不自禁地移到男女关系上。在就此事进行调查、处理并追究发生的原因时，学校只强调外在的客观原因。他们说保卫部门就一个人，管不过来。另外，如今男学生有的长得比他们的班主任还高大魁梧，一耍膀子可以把老师拉个跟头，根本没法管。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不允许随便开除学生，净化校园环境的难度更大了。但根本的原因却是与青春期的性生理、性心理有关，而学校的领导似乎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在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有关刑事案件的卷宗里，记录着一起 4 名成年男子和 5 名未成年男子共 9 人先后奸淫同一名 13 岁的少女的特殊案件，案中 9 名男子都被依法提起公诉。而此案中受害者王 XX，竟然又是整个案件中的始

作俑者。

王 XX 是普陀区某中学的初二学生。父母离异后跟父亲生活，但父亲常常不在家，家中只有一个 78 岁的老爷爷，身体不好，耳朵也不好，平时根本没办法管她。母亲改嫁了一位苏州的大款之后常常给她钱，一给就是几百元。手中宽裕的王 XX 便泡进了舞池歌厅，把学习和读书的事抛在了脑后。1995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王 XX 和一女二男四个年轻人在舞厅里玩到凌晨，随后他们全部来到王家。起初他们男女分开各睡一房。可是等王 XX 醒来时却发现身旁睡着一个男人。这个小小的换位究竟导致了什么结果，王 XX 此时还不太明白——经常逃学使她没有接受到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她问那位比她大的女青年，那人告诉她：“ 你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 ”几天后，她在另一个男青年处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从此，她便不再拥有同龄人的那种纯洁和无邪。虽然她有些茫然失措和心灰意冷，但既然已经“ 这样 ”了，便索性“ 一不做二不休 ”起来，三天后，当她和另一名刚认识不到半天的男人去开房间时，已经无所顾忌，而且显得很开心。就这样，王 XX 已经是随便得很了，但她并不是为了钱，而只是玩。频频更换的男人也没一人打算对她“ 负点责任 ”。直到 1996 年 3 月 18 日，王 XX 带一个男人回家留宿，遭到爷爷的坚决反对，争吵中被民警发觉，事情才告结束。在民警的询问之下，王 XX 承认曾和 9 名男性发生了性关系。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青春期的少年男女在性罪错以及性心理、性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层面，是露出水面的“ 冰山之角 ”。透过这一层面，我们能看到更为隐蔽又更为普遍的深层问题：即所有少男少女所面临的青春期问题——那才是漂浮在青少年成长航程中的一座真正的冰山。

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逐渐形成并且日益强烈的谋求心理和精神独立的内在欲望以及日益强烈的原始性冲动，是埋在他们内心深处的“ 炸弹 ”。已经爆炸了的固然会造成许多伤害——伤己伤人；但绝大多数尚没有爆炸的，如果不及时拆除“ 引信 ”，正确引导其内在能量的释放，最终均会导致他们的心理危机和精神危机，干扰其顺利成长，并祸延将来。

这一切，我们可以统称之为青春期的烦恼。

青春期是人生最为灿烂多彩的阶段，但也是人的一生中最为烦恼多事的时期。如果说，一个小孩从他或她学习走路开始，就在努力谋求独立行动，或企图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事吃、喝、玩、乐、拉、撒、睡等等“ 生活大事 ”而不愿大人们代办或过于干预的话，那么，进入青春期之后，一个人所谋求的便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独立，在知、情、意、行诸方面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且企图凭借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而不欲过分依赖长辈或旁人的指手划脚。他们还需要借助与同龄人交往——交自己的朋友来抵抗对父母长辈的心理依赖。同时，由于性生理开始发育，还逐渐萌发了性的需求和欲望，渴望得到发泄，渴望同异性进行交往，并且进而渴望得到除长辈之爱、朋友之爱以外的男女之爱。

青春期是一个多事之秋，它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个急剧的转折，心理上、精神上变化太快，要求太多，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过重的负担。相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危险时期，心理学家则称之为心理断乳期。

因此，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恰当而有效地进行心理卫生教育，特别

是青春期的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等方面的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心理的发育成熟和精神世界的充实完善能否顺利完成，同时还将长久地影响到人生将来的心理行为。

由于文化的影响或曰国情的特殊性，在我国，对学生的青春期教育以及对成年人的性教育甚至计划生育中涉及到的性问题，都是一件羞羞答答的事。虽然性的禁区已经冲破，但人们心中的性禁忌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而在实践中又常常忘却了我们的先祖大禹治水的基本道理，在防堵与疏导的选择上常常偏向于前者。

因而，在以性健康教育（包括性生理、性角色、性行为、性伦理以及有关的法律制度等）为主体的青春期教育中，迄今仍然存在着种种的观念误区。《文汇报》1996 年 12 月 2 日刊载了洪嘉禾的文章，专门评析了其中的几种论调并进行了反驳：

一、无师自通论。认为孩子长大了，有关男女间的问题，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开展性健康教育是多此一举。在性的方面，男女少年的生理成熟超前于心理的成熟，如何对待这个不平衡，重要的就是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人类的性关系不仅仅是自然的两性关系，更是社会的两性关系，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要使男女的行为规范适应社会的需要和道德要求，就需要进行教育。

二、封闭保险论。到了青春发育期，孩子对异性的向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孩子中向往和异性交往的比例也随之增加。他们想了解性知识及两性关系，这是完善自我的必要环节。此时越封闭越会引发他们好奇和追求的心理。随着社会的开放，大众传媒的影响，封闭不但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学生从学校和家长这两个途径接受的有关性教育很少很少，而从其他各种途径接受的性教育又大多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三、不要唤醒论。有人认为有了问题再教育也为时不晚，就如沉睡的孩子不必去唤醒他们。不懂得性健康教育其实也是健全人格的教育，只有系统地进行性健康教育，才能使孩子正确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增强道德意志和自控力，提高有关性的承受能力，这也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淫秽教唆论。有人把科学的性知识的传授和性健康教育同淫秽教唆混为一谈，反映对性的无知和偏见。事实上两者有着原则界限。性健康教育有着科学的体系，针对对象的不同年龄、身心情况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它遵循适时、适度、适当的原则。公开的、科学的、令人清醒的教育恰恰是抵制叫人迷惑和沉沦的淫秽迷雾的有力武器。

其实，在我国，就当前已经进入青春期的一代青少年（其主体是在校中学生）来说，其心理情感已经同他们的上一代的情况或传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差别。如今的成年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绝大多数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状态（多数人经历过“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饥饿状态），所处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环境又是基本封闭、僵化和禁锢的，从心理意识上来说简单得多，也纯洁得多。当前由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各类传播媒介大量的信息刺激，由于社会普遍性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所引起的需求层次提高和需求结构变化，现在的中学生已经很难用“单纯、不懂事”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了。他们的青春期心理和思想意识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1.内在需要复杂。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家庭单位缩小，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姊妹相伴，离异家庭增加等等，使当今青少年深感孤独。另外，青少年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彼此间距离、隔阂明显，尤其在同性同学之间竞争更为明显，这些原因使青少年更趋近于异性，渴望从中得到真情的慰藉。近来中学生中出现了认“干哥哥”、“干妹妹”的现象。对此现象，一些中学生认为：和异性交往的时候更开心，更能得到尊重和承认，且可学到许多在同性同学中学不到的知识，感到自己更有价值。另一部分同学则得出了较为理性的答案：同性间竞争激烈，彼此总要“留一手”、“防一脚”，只有在异性之间才能真正放开自己，彼此没有太多竞争，更多的是合作，互相需要，互相欣赏，这样才能感到真情，也才有勇气表达真情。

2.对性爱的需要和关注增强。中学生对生理的成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羞怯，现在他们更愿意看到自己的成熟，并且表现自己的成熟。对生理成熟的接纳，使当今青少年对美、对性爱的需要和关注日益增强。

3.更富有行动性。以往青少年感到困惑最大的是与异性交往时遭到父母、教师的指责以及内心的罪错感，从而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今青少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恋爱过程本身。在热线电话和心理咨询中遇到的大多数是“行动性”、“操作性”的问题。如：“我爱上了隔壁班级的一个女孩，我该怎样去向她表达才不会遭拒绝？”“3 个男生喜欢我，我也都喜欢他们，我该怎样与他们相处？”等等。

4.成熟与幼稚并存。当今中学生都确认，他们并不需要成人意义上的那种爱情。他们对自己内心需要的理解、描述都很清晰，显示出一份成熟，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又有幼稚的表现。一部分同学不断地更换异性朋友，类似“感情游戏”。

另外，青少年尽管需要介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东西，但实际生活中这个尺度很难把握，身历其境中的他们往往会“忘记”了原来的需要，或者无力再让自己回到原来需要的那个“中间状态”。青少年在两性交往中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心态的不成熟，有一部分青少年以拥有异性朋友来满足其自尊心，或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成功，或者以此来提高自身价值，甚至当作在同伴中“吹牛”的资本。

长时期以来，我国的青春期教育处于一种时冷时热、喊喊停停的局面，或是简单马虎、不讲实效；或是羞羞答答，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或是受到考试与升学的压力而被迫“靠边站”。

青春期教育，其实应当纳入整体的心理教育、人格训练之中，应当作为整个的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青春期中的性的问题是需要心理辅导和自我心理调节的，也是一个人格教育和培养训练的问题。性是人的本性中最难以控制和最需要控制的本能之一，性的缺陷就是人格的缺陷之一，而性教育的完成也是整个心理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外，从总体上来说，青春期教育应当面对全体青少年。我们不应把目光局限在已经发生“问题”的那些少男少女的身上，只进行事后的补救和“管教”，而应当面向那些心中充满焦虑和疑惑的绝大部分青少年特别是学生，提前“介入”，防患于未然。

一些专家建议，青春期教育的主要任务应当是：

1.帮助青少年学会如何合理、科学地控制自己的性本能，了解、懂得并遵守当时当地的有关性的各种规范；

2.帮助青少年学会在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多的层面上发现、理解性爱的内涵；

3.帮助青少年学会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学会更理性地。更高尚地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表达并处理内在的需求和冲动；

4.帮助青少年寻找和构筑获得感情及表达感情的渠道，更恰当地进行两性间的交往；

5.帮助青少年理解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角色（包括自身的角色期待和异性的角色期待），并逐步学会恰当地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

6.帮助青少年培养对崇高的感情生活的认识和追求，学会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以及注意力转移和升华，培养出健康、向上、积极、高雅的生活情趣并最终形成完善、高尚的人格。

广州师范学校的一位心理咨询老师在给学生辅导时说得好：“人在青春年少的时期，谁都有性爱欲望，谁都会萌发谈恋爱的念头。我们无意视性爱为洪水猛兽，但也不能任其泛滥。正如人饿了就要吃东西，但也不能因为好吃就拼命地吃。于是我们就要考虑，有些东西可以多吃，有些东西应该少吃；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东西可以暂时不吃。如婴儿时吃脱脂奶粉，稍大后吃半脱脂，再大些后才能吃全脂奶粉。有些东西还可以替代吃。否则，人就会生出大病来。”

我们期待所有的少男少女们都能顺利地消除自己“青春期的烦恼”，早日进入成人的世界，立身处世，不疑不惑并最终达到一种孔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6 这一代人

中小学生的“吃苦”必修课

中国的教育逐渐走入一条越来越窄的峡谷：即以片面追求升学率为主的（有人风刺性地简称为“片追”）应试教育。

在应试教育指挥棒的驱使之下，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只重视学生的智育，忽略了德、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忽略了学生健全的心理素质、健康向上的个性品格以及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训练。在所谓的智育中，实行的又是部分知识的被动灌输，把目光完全局限于考试和升学，忽略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能力的培养，忽略了知识的全面学习和智力的综合训练。这种状况不仅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而且知识面狭窄，生活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下降，心理人格不健全，整体素质偏低。一切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于是，所谓“素质教育”的问题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逐渐付诸实施。

夏令营中的较量；怎样培养下一代；中国“小皇帝”，真正的危机；艰苦奋斗——知青忆当年；勤劳俭朴，我们民族的美德；小学生要家长洗脚穿衣，74%的学生离开父用不能生活；高中主做饭，刀伤指头锅砸脚；韩、德、日、美、瑞等外国孩子的自立精神；劳动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

夏令营中的较量

广州《黄金时代》杂志 1993 年第 7 期发表了孙云晓的通讯报道《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说的是 1992 年 8 月，中国和日本的一百多名 11～16 岁的少年儿童在内蒙古一起举行草原探险夏令营的故事。

故事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而是介绍了中日两国孩子在困难面前的不同表现，以及两国家长帮助、爱护孩子的迥然相异的方法。

我们不妨将两国孩子和家长的表现列成一张简单的表格，进行对照：

中国孩子日本孩子

1.上路时有些人的背包几乎是空每人负重 20 公斤，
的，只背点吃的；才走一背包装满食品和野营
里路便把水喝光、干粮吃用具。
尽，之后靠别人支援。
上路后叫苦不迭，背包
带纷纷断落，趁机将背包
扔进马车，若无其事。

2.生病时一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生一矮小男孩肚子痛，
病了，瑟瑟发抖，泪如滚汗珠如豆，坚持背背
珠，送回大本营，睡席梦包，不肯坐车，在草
思，喝蒙古奶茶。地上躺一会儿，继续
前行。

3.宿营时又白又胖的孩子背着手，自己动手妙菜、煮
反应麻木，以为有人送饭，粥，先请大人吃，然
肚饿的孩子向领队哭诉。后自己吃饱。

4.环境意识一路走一路丢东西用过的杂物都用塑
料袋装起，发现鸟蛋
用木棍围住，提醒大
家不要踩。

5.家长表现道路被冲坏，某带队干市议员的孙子高烧
部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一天多，照常参加活
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动。
叶公好龙，不愿送自
已怕孩子来受苦。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孩子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是啊，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文章刊登出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全国多家报刊转载，许多人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见解，有的报刊专门组织讨论，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中国教育报》以《夏令营中的较量》为题予以全文转载，并在评论中提出了一连串“ 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怎样培养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一个人要不要有一点精神？一个民族要不要有一点精神？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和爱护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能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无独有偶。4 年后的 1996 年 8 月 6 日，我们又在黑龙江《生活报》上读到了记者连秀丽的文章：《中俄儿童夏令营随行记》，介绍中俄两国儿童在夏令营中各自的表现。令人惊奇而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一次的情况和 4 年前那一幕竟是如此雷同：

7 月 26 日，记者随哈尔滨市“德强杯十小明星”赴俄罗斯的布拉戈维中斯克进行参观访问。活动中我们看到中俄儿童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我们的“十小明星”是哈市几十万少年儿童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多次在国内外得过各种奖杯和证书。但是，中俄儿童在联欢时，他们中仅有 4 人能登台表演，且对自己专业以外的项目一筹莫展。而布市的小朋友们则是一人多能，唱歌、跳舞、讲故事、演小品等，每人都能召之即上。尽管如此，我们的“小明星”们却对他们的精彩演出十分漠然，急得领队跑到他们中间带头鼓掌，并生气他说：“你们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人家也看不懂你们的节目，却都把巴掌拍红了。”

俄方与中方“小明星”们围成一个大圈传排球。当排球不慎滚入游泳池中时，中方几个“小明星”高喊：“唉呀，可咋办呀？”这时身旁的几个布市小朋友争抢着脱外衣和鞋子，一齐跳入池中将球救起。

当中俄儿童共同爬山时，俄方的儿童呼喊着向山顶冲去，而我们的“小明星”却排着整齐的队伍，规矩、缓慢而缺乏朝气地前进。俄方领队莫名其妙地问：“我不明白你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连爬山也要排队？”

当双方儿童告别互赠纪念品时，我们“小明星”拿出来的礼品是组织单位为他们在国内集体买的，而俄方儿童赠给“小明星”们的却是用山上的桦树皮亲手制作的质朴新颖、造型别致的工艺品，上面有他们的题词。

夏令营中的较量，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但是较量并不只是在夏令营中。

冷静地回顾一下身边的一些小事，我们应该引起警觉。有一对干部夫妇的女儿高中快毕业了，但父母一旦外出，女儿便不知到哪儿去吃饭，而她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那些能歌善舞、弹琴绘画的一代新人，有不少人竟拿着熟鸡蛋不知怎样剥壳；孩子们口若悬河地谈论 21 世纪，却不会煮饭切菜洗碗洗衣；虽然父母经济并不宽裕，孩子却花得起数十元买个笔记本或贺年卡，花上百元吃一顿“小奇士”、“麦当劳”。还有的家长用单位的车接送子女上学，有的学生打扫卫生也要爷爷代劳……今天的孩子在米老鼠和唐老鸭、娃哈哈与太阳神的氛围中长大，他们视喝牛奶为吃苦药，将吃米饭当成秕糠，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姑姨团团追赶、苦苦相求，才咽下那么一两口。

设想这样一代人将来会怎样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 30 年前就担忧过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接班人问题，在上一代人上山下乡热浪之后淡化了。而他们的子女却成了危机丛生的“中国小皇帝”。花朵虽然艳丽多彩，但能经得住暴风雨的吹打而生存吗？

试想，在上一代人或更上几代人中，哪个不是八九岁去塘里河里井边挑水，有多少人在中学时代就要兼做家务砍柴种菜拾煤渣。

有一位当年的知青回忆说：“记得我曾在知青点当了一个月炊事员，餐餐将一大盆南瓜和辣椒摆到桌上，顷刻间便被伙伴们吃得一点不剩……那时的‘再教育’是真正的再教育。第一次砍柴，第一次挑粪，第一次放牛，第一次打谷，对一个 15 岁的在县城长大的少年来说，不知有多艰难。靠着汗水、血泡和手茧，才闯过了劳动关。”

而在今天，我们的后代与我们已是截然不同。他们不知什么叫艰难，不知奋斗为何物。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禁使人忧心忡忡。一切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是我们国家的危机，民族的危机，是一种真正的危机！

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强之际，我们的这种传统美德还要不要传下去？在我们追求豪华与奢侈，各种“超霸”、“王中王”、“帝豪”之类的消费品、娱乐场随处可见，广告中“花钱买享受”的口号满天飞，生意场上充满了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否还能够传得下去？

当大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已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迷惑，而大人们对子女的培养又采取过度溺爱与庇护，习惯于包办代替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能否接受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能否培养成自强自立的社会接班人？这在每个人的心中，恐怕都是一个疑问。

请看下面的调查材料和案例。

根据某地对 500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的，分别为 21.5%和 76.4%。小学低年级中有 24%的人不能独立穿衣系扣，30.6%的人不会系鞋带，31%的人上学需家里人接送。能够帮助父母做些简单家务的，中学生占 26.9%，小学生只占 0.2%。有吃零食习惯的，中学生占 53.1%，人均日消费 0.8 元；小学生几乎达 100%，人均日消费 1.05 元。

据北京市家教会在某小学一年级一个班的调查表明：该班 44 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 17 人，占 39%；家长给洗手绢的 29 人，占 66%；家长给洗脚的 23 人，占 52.3%；家长给穿衣服的 26 人，占 59%；家长不陪读就不做作业的 21 人，占 47.796；不会做作业由家长代替做的 17 人，占 38.6%；由家长启发才会做作业的 5 人，占 11%；只有一个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因为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文盲。

上海一项对 1500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表明：51.9%的学生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用品；71.4%的学生在生活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只有 13.4%的学生偶尔做些简单的家务。调查人员提醒家长：父母正在辛苦地培养生活能力低下的懒孩子。

天津少工委对 1500 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51.9%的学生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有 74.4%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只有 13.4%的学生偶尔做些简单的家务。

上海一项小学生现状调查表明：在一至五年级 1270 名学生中，坚持自己洗脸、穿衣、盛饭的仅占 55%，而“自己有时干，有时不干或根本不干”的占 45%。在该市举行的“勤动手”比赛中，许多“小皇帝”连系鞋带、钉书钉、装电池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无法独自完成。有的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卫生劳动都不大愿意做，轮到卫生值日，有逃跑的，有敷衍偷懒的，更有出钱请人代劳的。

在长春市某重点中学就读的王××直言不讳他说，日常生活中，像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这种本来并无异议的事，现在已成为“过去时”，而子女的衣服妈妈洗却成了天经地义的“现在进行时”。

家住天津南开区的崔某上高中一年级，平时埋头刻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但从来没有做过家务，其父母为了孩子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平时不让其干一点儿活。11 月 21 日，其母突然有事，中午没有回家做饭，崔某放学回

家后饥饿难忍，但又不知如何下手做饭。万般无奈，崔某便学着母亲的样子，想煮碗面条吃。他先拿起菜刀切白菜，刚切第二下，便将左手中指切了个口，鲜血直流。接着他又一连划了十几根火柴才将煤气炉点着，在放水时，右手腕被火燎，当甩动烧伤的手臂时，不小心又将铁锅碰掉在地上，锅砸在双脚面上，疼痛使他不能起身。经医院外科检查诊断，除左手中指外伤、右手腕轻度烧伤外，双脚面软组织损伤淤血，并有尾骨骨折。

别以为只有中小学生是这样，那些考进高等学府的身强力壮的大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理由很简单，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高中生考进来的，“习惯成自然”。

在郑州某管理学院，一位姓李的洗衣工每隔一天来收洗一次衣服，平均每次 40 多件，有时达 60 多件。她笑着说：“大学生们太懒了。”郑州高校学生的课余时间（白天）与上课时间比例平均为 6：4，有 10%的同学把课余时间的一半用在学习上。但有的学生宁愿将大把的时间用来看电视、打台球、玩扑克，也不愿洗衣服。而且家庭收入不高的同学出于攀比心理和面子的需要，也让洗衣工洗衣服。

曾有大学生千里迢迢打长途电话问母亲如何拆洗被子，得到的答复是“你托运回来妈给你洗”。

看来，现在的读书人每人要配一个书童和一名丫环才行。让我们看看外国人的孩子是如何干家务劳动的吧。我们过去总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少爷小姐们一个个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根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 72 分钟，韩国为 42 分钟，法国为 36 分钟，英国为 30 分钟，中国为 12 分钟。

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凡 6～10 岁的孩子要帮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去买东西；10～14 岁的孩子要在花园里劳动，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 岁的孩子要擦汽车和在菜园里翻地；16～18 岁的孩子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看起来这样的规定似乎近于残酷，当孩子成人之后方感到这种磨练增长了才干，锻炼了意志，一辈子受用无穷。

日本孩子的勤奋，我们已在夏令营中见识过了。日本的中小学生特别注重生存能力的锻炼，日本的学校、家长及一些有关的团体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到农村参加集体活动，建立“自然教室”、“森林之家”、“自然俱乐部”、“青年之家”等，以使学生加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热爱，增强独立生存能力。例如到无人岛上独立生活，到农村去干农活，野营、登山等。在许多孤岛或森林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日本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影。他们在无老师带领的情况下，面对着既无电源又没淡水的可怕自然界，安营扎寨，寻觅野果，捡拾柴草，寻找水源，自己营救自己。

一位去日本留学归来的女士说，日本人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刚学走路的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大人不去拉；3 岁多的孩子自己穿衣穿鞋；4 岁多的孩子生活基本自理；5～6 岁的孩子除自己管理自己外，还得做些家务。小病尽量不吃药打针，要与病魔抗争。日本全家人外出旅行，小孩都要背个小包，装自己的东西，上学以后，许多学生都在课余时间挣钱。

在美国，家庭教育是以锻炼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到外边参加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自谋生路。

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农民家庭要孩子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开割草机，冬天帮人铲雪，秋天帮人扫落叶等。

在瑞士，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之辈，从小就着力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精神，譬如，十六七岁的姑娘初中一毕业就去一家有教养的人家当一年左右的女佣人，上午劳动，下午上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锻炼劳动能力，寻求独立谋生之道；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学习语言。因为瑞士有讲德语的地区，也有讲法语的地区，所以一个语言地区的姑娘通常到另外一个语言地区的人家当佣人，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还要到英国学习英语，办法同样是边当佣人边学习语言。掌握了三门语言后，就去办事处、银行或商店就职。长期依靠父母过奇生生活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出息或可耻的。

毛泽东说过，“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几何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认为是最不光彩的事情，学工、学农被当作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但在当今许多人的观念中，劳动和普通劳动者都受到轻视。教育子女动辄就是当“家”、当“星”或当“长”，却忘记了教育他们首先要作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那种“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人，最终将一事无成。

大量事实证明，学生参加适当的劳动有利于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

1.劳动可以使人学到一些劳动技能，为未来的独立生活作准备，得到生活能力以及职业能力的训练。

2.劳动可以锻炼体格。劳动中的锻炼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还有劳动成果所带来的价值效益，相对于纯体育锻炼来说，是一种更具合理性的补充锻炼形式。

3.劳动可以训练人的动手能力和反应能力，可以使人形成完善的心理机能。

4.劳动是最好的实践形式，可以获得大量的直接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验证、巩固和消化间接知识。

5.劳动可以锻炼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可以锻炼自己动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品格，克服依赖、懒惰心理，畏难情绪以及贪图安逸、不劳而获等种种不良习惯。

由于书本知识大都是非常纯粹的，最“正确”的，剔除了枝枝节节，因而单纯学习书本知识显得单薄，没有错误的对照，没有亲身接触实物的“切肤”之感。因此，读书学习远远达不到劳动（实践）所带来的种种效果。正如古人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切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大力实施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是基础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要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把认真实施劳动教育作为教育思想大讨论中的重要问题来解决。

道理是大家都懂的，关键是实践。而我国教育的实践，还差得太远。

“我到农村认个家”；杂草与秧苗的混淆；学生到菜市场“体验”生活；活动课——学会生活；北京中学生两成不懂寄信；包饺子：中学生的“能力”训练；俭朴：中小学生的又一话题；“一双旱冰鞋”的故事。

到农村认个家

1996 年暑假期间，由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省教委、省公益事业基金会等单位在杭州共同举办了一次“ 我到农村认个家 ”活动。

活动采用自愿报名、统一组织的方法进行，对象是 12～14 周岁的城市中小学生，落户地点是淳安和武义两县（浙江相对贫困地区）。为了始终体现“ 培养普通劳动者 ”的宗旨，体现“ 吃苦耐劳、丰富农业知识、与农村建立感情 ”的特点，活动有 5 项要求：这就是“ 一周务农；认一个新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写一篇学农日记（要求学会做饭、喂猪、割草、锄地、砍柴、采茶及辨认农作物等）；在新家门口照一张‘ 全家福 ’；用实际行动得到一张‘ 实践证书 ’ ”。

“ 让我们学会吃苦 ”，“ 让我们在农村劳动中获得知识与快乐 ”是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7 月 12 日，最后确定的 82 名来自杭州城各中小学的学生集中在火车站参加出发仪式。是日，少见的连夜瓢泼大雨持续十几小时，广播里不时传来淳安县遭受严重水灾的消息，杭城也多处为水所困，但所有的家长都准时把孩子送到了车站，没有一个临时变卦。

在农村，学生们举行了篝火晚会，参观了森林公园、村办学校，召开了主题队会，此外的时间则是参加劳动，如采茶、糊火柴盒、锄地、铲草、喂猪、砍柴、拉车等。一周时间，孩子们感到收获很大，但也有许多的插曲：

——城里孩子要“ 方便 ”了，这才发现到处找不到像自己家里那样的厕所，以致有位男生几天未大便。

——城里孩子有的头一次看到活猪，没想到猪这么脏，因此不相信自己爱吃的肉就是它身上的。

——城里孩子有的拔草拔掉了一大片瓜苗和瓜藤，以为绿的小植物都是杂草。

——城里孩子采茶时一把把捋下了老叶，还觉得这样既快又省事。

——城里孩子初到农家，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记者问苦不苦？天真的孩子答：“ 苦。 ”继而又大口吃起菜来，而农家孩子在一旁则轻声说：“ 我们只有过年才有这样的菜，这是为客人准备的。 ”

——农家孩子把好房间好床铺让给城里的小伙伴，而自己睡地铺。同样，因为座位不够，吃饭时农家孩子就端着碗让在一旁，而请小客人坐正座，对此，有的城里孩子心安理得，连谦让的话都没有。

在上海，1996 年 7 月 13 日，一百多名参加科普外语夏令营的学生到五角场农贸市场体验生活。从他们写出的调查报告来看，孩子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的经验和常识简直少得可怜。

仅有一小部分孩子通过问菜贩知道了货源是从十六铺或者其他地方批发的，但许多孩子以为这些菜就是家里人常提起的“ 八仙桥 ”或“ 中央商场 ”运来的，那里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有个孩子甚至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市场货源是从“ 国家 ”那里组织的。有的孩子认为菜场跟超市一样 24 小时营业，开张时间是“ 5 点多钟，从早到晚 ”。调查报告要求每一个孩子写上四种豆制品的名称，一个孩子写上了“ 老豆腐、嫩豆腐、臭豆腐 ”，还有写“ 豆浆、黄豆和绿豆 ”的。有的孩子认为西红柿的培育方式除了人工的还有野生。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一位叫万映明的处长说：“ 尽管孩子们的答卷有些出洋相，但是毕竟他们已经开始熟悉父

母每天买菜的地方，知道饭桌上的菜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了。”

小学生要学会生活自理，中学生要学会一些劳动技能，这是很有必要的。早期活动课程的倡导人陶行知等教育家认为，教育就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准备。活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解决他们当前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设法扩大和加深他们已有的兴趣和生活经验。这些教育理论至今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上海的一些小学生，已经开设了一些活动课，诸如茶艺、怎佯买食品、童装设计比赛等，训练学生当生活的主人，学会独立生活。孩子们上这些课非常活跃，非常高兴，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不是我们的孩子不行，而是教育体制和大人们自以为是的观念束缚了他们。

在 1996 年由《邮政周报》社举办的北京市首次中学生书信比赛活动中，报社收到 3352 封参赛信件,其中有 731 封不符合用邮要求和参赛规格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占 22%。

这些不符合规格的来信，多数属于没有使用标准信封，没有正确书写邮政编码，没有完整书写收寄件人地址，没有贴足邮资，没有使用书信体格式书写。据了解，在北京不知道邮资有本地、外埠之分，不知道寄信要使用标准信封、要书写邮政编码的中学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中学生竟然不知道信封上要写收件人姓名，却直接写成“爸爸收”或“妈妈收”。

这些小学生都应当知道的东西，堂堂中学生还不知道。而且作为首都的北京尚且如此，其他的城市呢？现在，生活方面无能力自理的中小学生究竟有多少，现在无法统计，但肯定不在少数。

从学生们的角度说，其实他们最反感死板地学习书本知识，对那些与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课程，对参与生活实践的各种活动，对各种有意义的劳动哪怕是学习做家务，都非常感兴趣。

与勤劳相联的是俭朴。

社会上的铺张浪费、奢侈豪华之风吹到学校里，家长们在金钱方面对子女过于放松，提供的条件过于优越，使孩子们逐渐失去了俭朴的良好品质，养成了乱花钱、高消费、不爱护财物、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气。

现在的成年人，成长于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年代，从小到大受到的都是勤俭节约的教育。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总还是精打细算，不愿过于奢侈，更不敢浪费。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多数人都没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首先是对东西不爱惜，常常不是弄坏，就是随便丢弃；其次是花钱大手大脚。生日要下馆子，穿衣服要名牌，零花钱再多也能很快花完。

某学校近年来捡到的围脖、帽子、手表、高级水壶等无人认领，每学期捡到的橡皮、铅笔、钢笔不下近千支（块）。问到该校学生，他们说：“这东西有的是，谁找它干什么，小气！”而另一所高校每天泔水桶中的饭就多达 200 公斤。

的确，奢侈浪费的习气不属于个别现象了。我们在其他的章节中已经看到，中小学生消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孩子们心目中，父母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山银山使不完，钱用完了只管向父母要。他们不知道要省吃俭用，不知道要不乱花钱。

孩子们多花钱不仅是增加开支、造成浪费的问题，更严重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于它会在孩子们的思想观念上和心理品格上打下这样的烙印：只要享受，不要勤劳；只愿索取，不愿付出。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一双旱冰鞋”的故事，对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一个家庭有 4 个小孩，最小的女儿才 7 岁，她非常想得到一双旱冰鞋。可她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不足鞋价的 1/3。当父亲把几项家务活分给 4 个孩子时，小女儿包揽了最脏最累的活儿。几天后，当女孩伸出一双长满水泡的小手，告诉父亲已干完活儿时，父亲早已把旱冰鞋放在了她的床边。小女孩为此掉下了激动的眼泪，她十分珍惜自己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报酬，一直把旱冰鞋带在身边，直到长大成人。

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希望中华民族勤劳俭朴的美好品德能够代代相传。

“暖箱式”与“襁褓式”教育；懒惰、娇气、怕苦、怕累——当今孩子的通病；受不得委屈；小学生拉练，奶奶不同意；城里娃下乡，警车开道；“吃苦夏令营”成为上海热点；抗挫折教胃：肉体磨练和精神磨练；中学生日记：穷困而不自卑。

吃苦是门必修课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我们都知道，人的成长不能太一帆风顺，要经受一些曲折、磨难，经受一些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打击，才能培养出顽强的意志，锻炼出不怕困难、敢于面对失败的心理品格。生活的磨练对人生来说是重要的。在狂风暴雨中摸爬滚打，在热血烈火中冲锋陷阵，在险滩激流中逆水行舟——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并且胜利地走过来的人，无疑是得到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的孩子，受到的是一种“暖箱式”或曰“襁褓式”教育与爱护，没有机会接受生活的殿炼，没有机会离开大人们的保护独自“闯荡江湖”。他们被培养成了懒惰、娇气、怕苦、怕累的大少爷和娇小姐，心理脆弱，适应能力低下，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长此以往，难以担当起历史和未来的重任。

我们常常看到，在每所城市小学门前，每当放学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家长等在门前接孩子，有的甚至是几个大人等一个孩子。在山东淄博师范学校附小，有一天放学，天下小雨，完全不影响走路。大多数的孩子被家长接走了，还剩下十来个学生，是高年级的。老师分别为他们找来了雨具，让他们自己回家，路并不远。这时有几个孩子竟放声哭了起来，接着其他的孩子像被传染了一样，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师问：假若你放学后，爸爸妈妈有事没回家做饭，你准备怎么办？像商量好了似的，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等爸爸妈妈回来！”

同样是在淄博师范附小，有两个学生班干部，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经常得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有一次期末考试，出入意料的是一个考了 82 分，一个考了 100 分，两人拉开了距离。试卷一发下来，考 82 分的觉得与另一位拉开了距离，无脸见人，便趴在课桌上哭了起来。考 100 分的自然是洋洋得意，故意在哭者面前炫耀，被老师批评了一顿，结果也哭了起来。

中午，他俩各自留下遗书，双双出走了。一个在遗书中说：“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敢把只考了 82 分的试卷交给你们，我没有脸面对你们那严肃的脸孔，也无法在同学面前抬起头……”另一个写道：“爸爸妈妈，老师无缘无故地批评我，我再也无脸见人，我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要让老师知道，我没有错。”

若不是发现及时，把他们找了回来，几乎酿成悲剧。很显然，并没有发生天大的事情，那孩子也算不上受了什么委屈。可是，他们怎么会想到了出走？

据报道，河北省老河口市第八小学四年级一个班组织一次新长征拉练活动，老师宣布这个消息后，学生们听了是欢呼雀跃，而家长听说后则大多震惊，一半人表示激烈反对。孩子们与家长磨了好几天，57 人中总算有 30 人得到了签字。

一位同学的奶奶说：“这么小的年纪，走在路上被车撞着咋办？走不动咋办？学校怎么想到搞这么危险的活动，出了事谁负责？”有位学生的父母已经签字同意，可出发那天，爷爷却拦住孙子不让走，把他拖回家补课去了。还有一位姓吴的同学，好在外公当过中学校长，比较支持这次活动。吴××请外公出面做通了父母的工作才参加了拉练。

更有一位女生，软磨硬泡让母亲同意她参加，母亲却说：“天热，路远，

你受不了！”女生说：“你不放心就让爸爸跟着一起去好了！”终于让母亲签了字。出发那天她爸爸因事走不开，母亲竟派保姆跟着去了。

小小一次活动，家长阻力为什么这么大？主要还是由于对孩子的过分宠爱与庇护，怕孩子吃苦。再说孩子们平日缺乏磨练，忙于学习，父母担心一下子走很远的路，体力受不了，而且又不放心，怕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忽略了对子女的独立生存能力、吃苦耐劳的体质和心理方面的培养锻炼，忽略了这方面的重要性。

许多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吃一点苦，受一点累。在生活和学习上，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父母就心疼得不得了，赶快替他们排除，甚至越俎代庖，把应由孩子自己做的事也代替下来。替他们洗脸、穿衣服，替他们写作业，替他们收拾书包。上学送、放学接，中间还送点心牛奶。学校组织劳动，替他们劳动；班里搞墙报、手抄报、文艺活动，替他们设计、编写（而不是指导）；孩子犯错误，替他们承担责任，怕孩子受不了委屈。刮风怕吹着，下雨怕淋着，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抱在手里怕摔了”。这样养出来的孩子，如“温室里的花朵”，经不得风雨，见不得世面，更何谈今后独立生活、立身处世？

正是在这佯的背景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要对学生进行“吃苦教育”、“抗挫折教育”。

1996 年暑假，一次以赴贫困地区考察为主要内容的“吃苦夏令营”成了上海的一大热点。

这次夏令营是由上海市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等单位组织的。来自上海各中小学的 61 名营员，年龄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 10 岁。

“吃苦夏令营”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向社会公开招收营员时，数百位家长领着孩子前来报名，使主办单位不得不将原定的 30 个名额增加到 60 个。一位即将出国读书的女高中生，被拒绝后仍坚持要去，终于破例成为第 61 位营员。一位营员家长说：“如今的学生甜蜜太多，吃苦太少，德育往往被家长们忽视了。孩子们平时缺少挫折，缺少磨练，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现在花钱让孩子体验一下苦味，对他们将来踏入社会将有所帮助。”

在南京，则以军事训练为主题对学生进行吃苦教育。学生在活动中面对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如吃素菜、喝白开水。绝大多数学生完成了从不知所措到积极面对的艰难历程，也有的孩子以“身体不舒服”为由退出军训。

南京学生在吃苦夏令营里，第一天中午开饭，发现桌上只有鸡块烧毛豆、蒜苗炒肉片、炒木耳菜和炒土豆片，不少孩子皱起眉头。磨蹭了一个多小时，一顿饭总算吃完。14 张桌上有 8 张桌的素菜盘几乎一点没动，荤菜则吃得干干净净。但两天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无论上什么菜，都很快一抢而光。一位学生在家时喝饮料都认牌子，入营后，看到淡而无味、略有些发黄、有时还漂着一层泊花的白开水，一下子还真无法下咽。可在太阳底下训练，一身大汗之后，不喝水怎么也挺不过去，渐渐地他开始习惯了……

在山东淄博师范学校附小，从 1993 年起就开始实施挫折教育计划。这是校长张自海上任后经过调查、分析、思索之后做出的决策。

该校的挫折教育实际是一项全方位进行的“系统工程”，目的是使学生克服困难，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树立良好品德和顽强意志，正确对待荣誉和批评，提高自信心，保持最佳的精神面貌，以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

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创造一个灿烂的人生和美好未来。该校三年多时间的实践证明，挫折教育意义重大，收效也很大。

日本教育家提出，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存教育不仅仅使他们身体强壮，吃苦耐劳，还包括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使孩子在陌生的人际环境中把握心理平衡，不畏惧，而且坦然自若。事实上，自“二战”以后，如何使富裕环境中的孩子健康成长，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界讨论的问题。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度报告一针见血：我们再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

有这样一个故事。为了不使孩子忘记该国“二战”后最困难的日子，最近，日本一家幼儿园给大班孩子做“忆苦饭”，结果，孩子们面对当年大人吃过的糠菜嚎陶大哭，拒食三天。园方毫不动摇，大多数家长也不反对，第四天起，孩子们终于咽下了这顿忆苦饭。韩国已默默开展了 11 年的“不给子女留遗产运动”。“不给子女留遗产运动”的 284 名会员，均系社会上层人物或中产阶级。他们认为，遗产对子女有害无益，子女会因为遗产问题纷争不休，安然享受父辈血汗而不思创造，应该让他们懂得生存之难。

“吃苦教育”也好，“挫折教育”也好，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尤其是当今在优越的条件和父母宠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更有必要认真补上这一课。

但是，这种教育不能流于形式，走过场。它不是为了图表扬、发新闻、求名声、搞轰动效应，也不是为了应付上头的检查评比，而是要落到实处，真正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所谓能吃苦或能抗挫折，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肉体上的磨练，即是要有强壮的体魄、良好的体能和应付艰苦环境的技术与能力。弱不禁风和眼高手低的人是吃不了苦的。二是精神上的磨练，即要有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要有正确对待困难和失败（以及正确对待顺利和成功）的心态，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奋斗到底的斗志。意志薄弱、畏惧退缩、懒惰丧志、三心二意、狂妄自大或自卑自贱的人也都是不能受苦、经不起挫折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心理和精神的坚毅比体魄强健和技巧熟练更重要，更持久。而真正意义上的吃苦与抗挫折，恐怕不是一两次夏令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有长时间的磨练和修养才能最终见效。还记得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故事吗？冬天洗冷水浴，雨天去汀江游泳，故意到最繁华的闹市静心读书，不带任何盘缠到乡下行乞调查，那才叫真正的“吃苦”教育呢！

最后，让我们读一则中学生的日记，体味一下那种“穷而不卑”的精神。那是从真正的苦难和挫折中走出来的孩子，相信他必将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一头是蛇皮袋装破被褥，一头是破旧小木箱，我高挽着裤筒担着行李满头大汗地来到学校。那狼狈样儿，不像是到重点高中来读书，倒有点儿像南下的打工仔。当我走进我的同龄人中时，他们的目光几乎都掠过一种惊异，随即是一种捉摸不透的样子。我想低头，但到底还是在那些漂亮的“飞鸽”、“凤凰”面前昂头挺胸地走过去！

我是山里来的，大山坚韧的风骨支撑着我。父亲那干涩的目光就在我身后，充满鼓励，充满期待！母亲把五百多元——全家的积蓄交给我时，手虽然没有抖，但她的心却在发颤。

我没有理由自卑，我应该昂起头向前走自己的路。面对那一条条火红的

迎新标语，我心中涌起一股激情、骄傲地笑了。

幼儿园测验：“孩子不善良”；全国少先队代表抢电梯；李校长的忧虑；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只讲成绩，“一俊遮百丑”；德育难“操作”：政治教育，社会影响，5＋2＝0

“德智体”与“智体德”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价值混乱、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社会风气败坏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也不例外地受到严重影响。目前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无论从严重程度上还是从普遍性上来看，都令人深深地担忧。

在北京朝阳区某幼儿园，市里的幼教专家对学前儿童进行了一次心理测试。专家向小朋友提出了几道测试题。头两道题是检验同情心和善良程度的：“如果你在路边见到一只要死的小猫，怎么办？”孩子们兴奋地抢答道：“踢死它！”“拿砖头砸死亡！”“踩死它！”孩子们尽数置小猫于死地的办法，兴致勃勃，只有个别孩子主张救活小猫。专家冷静地提出第二个问题：“假设你玩得好好的，这时有个小朋友打你一下，你会怎么样？”提问立即得到反馈。一男孩果断回答：“我拿鞭子抽他！”其他儿童也纷纷表态：骂他，揍他！据统计，持报复观点的约占 57.1%。

第三道题和第四道题用来检验助人为乐和舍己为人的品德状况。老师提问：“要是有个小妹妹发烧了，冷得直哆嗦，你愿意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她穿一穿吗？”孩子们犹豫起来，不吭声。幼儿园教师点名叫答。第一个被点到的孩子显然具有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她病了会传染的。她穿我的衣服，我生病怎么办？我妈妈还得花钱给我治病。”第二位孩子的回答也很委婉：“我妈妈肯定不让借。要是借，妈妈该打我了。”第三位孩子直言不讳：“不借！弄脏了怎么办？”第四位则说：“我怕她给我弄丢了。”据统计，半数以上孩子都表示不愿意借衣服给小妹妹，还都运用自己的小小智慧临时编造出种种不借的理由。

一位幼儿园的老师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正好她自己 4 岁的儿子也在这所幼儿园就学，于是她叫出了自己的儿子，希望他在专家面前有一个好的表现。专家接下来提出第四个问题：“有个小朋友没吃早点饿得直哭，你正在吃，愿意分给他吗？”儿子想想，断然答道：“不给！”老师提醒他：“可是那个小朋友饿极了，在哭呢！”儿子毫不动容：“他活该！”

《中国少年报》记者张庆华曾撰文披露：在一次优秀少先队队长夏令营中，野餐完毕，大家把饭碗一推，抓鱼戏水，尽兴玩乐，只有一名聋哑少女在溪边默默地洗刷一摞摞盆碗。在全国第三届少代会上，这些被人们称为尖子的代表与成人争着上电梯，乘车抢座位，绝不在少数。有个颇具演讲才能、名噪一时的南方少女，在一次夏令营中，只见她下汽车后，不提行李，摇着扇子，大摇大摆而去，任工作人员手提肩扛……

张庆华感叹道：“作为一名少年报记者，我曾参加过许多各类优秀少年儿童的评选，也曾被他们的事迹一次次感动。然而；另外一些孩子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

面对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的趋势，有识之士深感忧虑。湖北京山县一中校长李耀庭先生说，某些中学生对祖国缺乏自豪感，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父母缺乏孝敬感，对自己缺乏拼搏感。然而，学校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又阻力重重。

京山一中的德育工作在湖北全省都算是较好的。即使这样，李校长的评价仍不乐观，可见其他中小学的情况更差。湖北省教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多年来，基础教育一直存在着“三重三轻”，即重智育，轻德育；重学业，轻

品德；重分数，轻能力。不少学校对德育工作“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各方面都把升学率当作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在办学水平与升学率之间划上了等号。只要升学率上去了，其他方面都可以马虎一点。评价学生也是只看考试成绩（实际上只看能抄会背的机械记忆能力），忽略或轻视其他方面的能力。有的学校，某些道德品质不太好的学生，一旦高考过线。学校就为他们重新填档案，文过饰非。这使得广大中学生以为只要成绩好，个人修养可以不重视，关键时刻可以“一俊遮百丑”。

一些中学评选三好学生，德、智、体三项指标的排列顺序已经渐渐地变成了智、体、德。品德操行的重要性下降了，考试成绩的地位提高了。一些评上三好学生的同学只顾自己埋头学习，不热心集体活动，更怕帮助其他同学而耽误自己的学习时间。某中学要开展英语“一帮一”活动，消息刚传出，几位英语成绩优秀的“三好学生”突然格外“谦虚”起来，纷纷找到班主任说：“我英语不行，别让我帮别人了。”还有一位姓黄的女生，成绩优秀，却不愿意参加班里的各项活动，通知她参加，总是借各种理由躲开，一心只顾自己。但评选先进以及各项奖励，她都要积极争取，生怕少了自己一份。

轻视德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属于“技术性”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德是“软件”，没有明确的操作标准；而智、体都是“硬件”，有较明确的操作标准——考试或达标成绩。例如一般的中学评选三好学生，智的标准很明确：主科要全部达到优，即 85 分以上；副科要达到良，即 75 分以上。体育方面在速度、耐力、技巧等方面也有若干非常明确的达标要求。由于好“操作”，所以一到评三好，便先把智、体达标的学生挑出来，然后才考虑到思想品德。而德的标准是“软”的，伸缩性大，所以只要智体过关，德方面没有大的毛病，也就行了。但智体方面若差一小点而没有被选上，德再好也不行。某中学一位学生品学兼优，只因物理是 84 分，便被死条件淘汰出了三好评选范围——没法“入围”。

有些学校为了在德的方面便于操作，便规定了“思想政治课成绩优秀”的硬件，看似合理，实则不妥。政治课的学习，当前大多是死记硬背，基本上都有标准答案，而考试试题也是非常机械，缺乏难度。例如，一道题规定答三个观点，哪怕不理解，只要提到几个相关的概念就能得分；但如果只答了一两个观点，哪怕有深度，有创见，还是要扣除所缺“观点”的得分。一位经常参加高考阅卷的中学政治老师对此十分反感，他概括成三句话，“能抄会背，千篇一律，考完忘记”。再说，以背书的分数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好坏的依据也是很不可靠的，否则那些会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就都成了“道德模范”了。

德育作为“软件”受到轻视，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在教育和训练的时间上经常受到冲击，被挤占大多。中小学虽然有思想政治课、活动课、社会实践课等教学安排，但除了政治课之外，其他课随时有可能被挤占，特别是实行 5 天工作制后，学校往往向德育课“挖潜”，以便能完成原来 6 天的其他教学内容。学生的自习课，如果语、数、理、化的老师来补习（常常是互相“碰车”或轮流“值班”），则被看成是合理的；若有人要安排思想道德教育或这一类的活动，恐怕就有许多人见怪了。

针对目前的现状，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如果通盘来考虑，有两个战略性的问题值得认真讨论。

一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政治教育。政治思想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但远远不是全部。中小学生的思想品行至少应当包括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家庭道德，还有个人行为方面的自强自立、勤劳俭朴、不屈不挠、勇敢拼搏精神，以及积极健康向上的信念、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等等。过去我们统称为思想政治教育，甚至把心理素质也归纳到其中来，太笼统了，又不全面，而且易于犯形式主义毛病，引起逆反心理。

有的内容，过去被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忽略了，如今在新的形势之下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孝敬父母问题。我们反对“割肝喂母”的愚孝，也反对封建家族主义之下的父权本位思想，但孝敬父母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美德，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怀。世界重量级拳王霍利菲尔德有一句名言：“唯一能打我而我却不能还手的人是我妈妈。”在我国，由于在独生子女家庭多半是大人围着小孩转，成了父母”孝敬”子女惟恐不周的局面，相反地子女尊重、孝敬父母倒很难得。在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应当把这一看似小节却关乎大局的内容补充进去。现在已有不少地方开始进行孝敬父母的教育。如济南一中规定父母生日、“三八”妇女节及每周周末为学生“孝敬日”；南京市教委将每年重阳节定为“中小学生孝敬日”，增加学生爱父母、爱家庭、敬老尊贤的良好品德。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

二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组织落实应当由社会、家庭、学校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完成。1996 年，北京市教工委曾就大学生的思想受环境影响情况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将 15 项影响因素归类，社会影响因素竟占 62.2%之多，学校影响因素占 32.2%，家庭影响因素占 5.5%。

而根据北京联合大学纺织工程学院就大学生成才所受影响进行的调查表明：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占 58%；其次是家庭，占 36%；学校仅占 6%。就中小学生而言，可能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更大一些，但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这表明，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不能只靠学校单独进行，而必须发动有关各方齐心合力，协调行动。

许多中小学老师感叹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结果是 5+2＝0：学生在学校受了 5 天教育，周末放 2 天假、社会上的一些消极因素和家庭教育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都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抵消了学校德育工作的作用。例如，小学《思想品德》课本第一章就是《从小立志为中华》，道理讲了许多，但是孩子们从社会上得到的信息则是外国比中国好。打开电视，各种产品广告、儿童动画片都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洋货”比“国产”好。学生觉得中国就是什么都不如人。一些家长也都这样教育孩子：“好好读书，考到国外去。”

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影响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在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中有一课叫“拾金不昧”，教育学生“在校外拾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学生认为这样不对，因为现在社会上有假警察，有些真警察也用滥罚等不正当手段谋取钱财，钱不能交给警察。给小学生讲要懂礼貌，客人来了，热情开门打招呼。他们也有疑问：现在经常有人冒充熟人到家里偷东西，因此不能随便开门。教师在课堂上讲的一套，完全被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抵消了。

看来，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要来一个全社会“齐抓共管”才有可能见成效。

7 怎么一个“ 钱 ”字了得

教育中的金钱渗透

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尽管这市场机制还不那么完善。仿佛在一夜之间，国人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报纸上不再论证“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不仅仅是遍布街头巷尾的小商小贩在竭尽全力推销商品；不仅仅是铺天盖地的广告，也不仅仅是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大谈特谈股票和期货，而是深刻地体现在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上。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不要贫穷，我们要富裕”。

可是，事情很容易走向另一面。一位伟人讲过，即使是真理，只要是多走了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何谓议价生；特殊政策与择校收费；择校费开出了 12 万元“天价”；择校费与先富起来；择校费：方方面面，是是非非；择校费择出了什么；金钱与条子；择校与卖官。

择钱录取

中国 80 年代后半期逐渐形成一类学生群体，因缴较高额费用突破原有入学政策限定而进入志愿学校学习。这些学生在小学阶段，指不按就近入学原则，因家长以钱物赞助学校而取得跨区跨片入学资格的孩子；在初中阶段，是指非保送生或非推荐生，不按就近入学原则，因家长以钱物赞助学校而取得跨区跨片入学资格的孩子；在高中阶段，指不够录取分数线，家长或家长单位付给学校一笔赞助款，学校录取线下浮，从而得以进入志愿学校的学生。现在，人们把这些学生叫做择校生。这种说法已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新闻媒介为此开辟了专栏进行讨论。

每年秋季入学之时，在学生家长中乃至整个社会中的热门话题就是择校高收费。这择校高收费到底有多高？远的不说，就看看 1995 年和 1996 年的情况吧。1995 年 3 月 27 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全国电话会议，明确指出小学和初中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赞助和录取学生挂钩。可是，说归说，做归做。北京某区的“教育试验区”当年就在全市率先恢复小学升初中考试，给了一点“特殊政策”：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名额收费录取。其标准为：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 3～5 万元。如某师大附中每名学生收 4 万元。有两所大学的附中还分别在其它中学办分校，全都高收费录取学生，其中的一个分校招两个班，每名学生收 1.3～3 万元。北京的重点学校 1995 年只招收了 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的名额全是收费实验班。1995～1996 年上半年，北京择校生收费行情是：重点学校每名学生 4 万元左右，准重点学校 3 万元左右。别以为非重点学校就不这样干，它们也有自己的“奇招”——办“尖子班”、“特长班”等等，每名学生交 3000～8000 元不等，不愿交钱者则请进慢班。

小学、初中择校生价格诚然贵。可高中价更高，因为高中是非义务教育，收起费来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北京的标准是：市重点一般每人 8 万元，区重点 5 万元。但是这价格行情还在看涨，某大学附中定下很高的录取线，一般学生很难高攀，要交 8 万元才可入学。谁知竟然供不应求，有人愿出 11 万元，后来又被炒到 12 万元。这大约创下了普通高中入学收费的“天价”。

乖乖！12 万元！这对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在贫困山区足以建一个希望小学。

北京是这样，其它地方亦同样如此。

1996 年，在杭州，择校生一般要交 9000 元左右；济南，学校所在区内的择校生 3000 元左右，外区户口则是翻一翻为 6000 元，关系“硬”的可以优惠一点；广州，一般 2 万元左右，也有交 5 万元的；上海，由 1995 年的 3、4 万元涨到 5、6 万元，个别学校突破 10 万元；即使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山西运城，也要 5000 元……

为什么要收取择校费？经济利益大于一切。据统计，1994 年和 1995 年，北京市此项收入分别为 1.4 亿元和 1.26 亿元。在 1995 年的 1.26 亿元择校生收费收入中，有 40%用在了教育设施的改造上，15%用于教师的结构工资，15%用于教师的集体福利待遇，还有 4000 万元的结余。一些收费较多的学校先富了起来，其中一部分钱用于组织老师到南方以及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旅游，算是开了洋荤。这样，那些重点学校和其他有办法的一般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当然要积极收取择校费了，他们总算找到了一条摆脱贫穷的“捷

径”。

可是，社会的反映却不一样。当然也有赞成的，赞成论者所持的理由也颇充足，那就是教育经费短缺尽人皆知，收取择校费可以补这个缺口。一位校长就这样说过：国家要求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条件，可钱从哪里来？现在有些学校吃“瓦片”（出租房屋），有的开旅馆，办饭店、加油站、机票代售处……五花八门，效益也还可以。可他们学校条件有限，经济效益不好。有些教师能力强就想调往好学校，挡也挡不住，这非常令人头痛。他们只有靠择校费了。这话却也是实情。

在赞成论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的大款。他们有的是钞票，可以甩出一大把，解决“革命后代”的问题。据说，早在1987年，北京一位个体运输户就为了孩子紧紧盯住景山学校，他几乎天天泡在那里，说：“只要学校收我的孩子，我乐意把赚到的万把元钱捐给学校。”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感动了学校领导，如愿以偿。现在，大款们对教育这个“百年树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视的。以前，你有钱也办不到。那时，要靠“条子”才能进好校。如今不同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出得起赞助费，那就不怕进不了门。票子取代了条子，至少票子和条子平起平坐了（条子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些条子还是很管用的，类似于商场里的优惠券，其优惠的程度视来头大小而定）。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呢？

可是，持赞成论者毕竟不是多数，我们的社会中大款还不多，要多了就不会叫大款了，更不会称为款爷。大多数人是老百姓，他们和“大款”一样也望子成龙，于是有些人就节衣缩食去交那择校费，他们当着学校领导的面虽然显得非常愿意，可要叫他们背后不骂娘只怕也难。

对于择校生高收费现象到底应该怎样看？在1996年8月16日《光明日报》所组织的一次讨论中，一些人士发表了意见。

学生家长王吉玲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这是一个不好解开的结。一方面受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所谓重点学校，以其优良的环境、数一数二的师资和良好的教学质量，吸引着广大的家长和学生。于是，围绕孩子上学的问题，就出现了不正之风：谁有关系，谁有钱，谁的权力大，谁就可以将孩子送进好学校。而一些收取了高额费用的学校，其形象更是不佳，当他们回首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轨迹时，高收费肯定不会是明智之举。就广大家长的心态而言，对孩子上学，我们当然不赞成学校高收费；但是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交钱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怕是倾其所有，还得违心去做。

学生家长张霞说：我的孩子今年参加升初中的考试，只因差几分，某校开口就要收数万元。这对我们靠工薪收入的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想让孩子升入一流的学校，那是假话。好学校少，薄弱学校多，这又是客观事实。自从收费上学的现象产生之后，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上好学校有了一线希望，但是高额收费又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择校按照有关规定收取一定的费用可以理解，但是那种狮子大开口的收费办法，确实有损学校的形象。我认为解决择校高收费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把那些薄弱学校搞上去，使薄弱学校的校风、教学质量、师资水平赶上或接近那些先进的学校。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刁立春说：在义务教育阶段，改进初中入学办法，实行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平等原则的基本标志，也为缩小校际之间的差距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然而，实行就近入学还存在着一些现实困难。就

我校毕业生就近分配反映出的情况看：若分配生分配到较好的初中，家长、学生皆大欢喜；若分配到基础薄弱学校，就会出现一些学生“择校”到其他中学的现象。一些家长认为：取消初中入学考试是将学生的竞争与分配延迟了3年，他们把孩子的初中教育看得尤其重要，这是不无道理的。从实际情况看，一是重点校与薄弱校之间差距明显存在；二是允许一定数量的学生有选择学校就读的权利（这种学生的资格认定要通过复核考试的程序完成），这些情况给部分就近入学的学生及家长造成心理不平衡。我认为，改进初中入学办法，应当与改变基础薄弱学校面貌同步进行。

北京八十八中教师康浦说：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和择校生问题，不仅仅是个收费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而且是教育经费长期短缺及应试教育与片面人才观长期作用下的综合反映，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各级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对其负有主要责任。应尽可能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保证学校的必需经费，尤其要加大对基础薄弱学校经费的投入。要知道，几所重点学校解决不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还要靠所有学校。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陶春辉说：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北京市择校高收费解决得还不令人满意，社会反映也比较大。市委、市政府对纠正择校高收费十分重视，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定要把择校高收费遏制住。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基础薄弱学校的领导班子；决定今后3年，每年市、区（县）投资9000万元加强基础薄弱学校的办学实力，实现免试就近入学。

在《人民日报》组织的有关讨论中，北京二龙路中学校长童庆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说几点与大家不同的意见。首先，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就近入学，但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小学校与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存在差距，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点儿的学校，就近入学不符合学生与家长的心理状态。要贯彻就近入学原则，就必须取消重点初中，取消保送生，然而这不符合现实。收费择校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办学规律，不能谁有钱谁就择校。然而，交费择校者只是具有择校心理者中的极少部分。同时，我们从制度上也没有保证就近入学，例如，北京市就有25%的推荐生比例。其次，承认现实，改革招生制度，进行统考，至少是全区的统一考试，按分数择优录取学生。应该取消保送生，取消重点初中，全区统一命题考试。考试不是“罪恶”之源，教育上出现的问题不要都归结到考试。考试具有选拔作用，而且对广大学生来说，是比较公平的竞争。

有人对北京择校生高收费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他们认为，虽然择校生的出现事出有因，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但其消极面也是客观存在的。

第一，尽管政府为全体学生提供就近入学的条件，收费仅是对少数选择学校的人而言，但是，还是给一些人造成了有钱就能上好学校的印象，加剧了一部分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举例说，一个初一的同学在他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在我们学校的附近，也有不少重点校，如‘二中’、‘二十五中’、‘一六六中’等等。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我们也向往重点校，我们也不服那些水平与我们相当，甚至不如我们，然而进入了重点校的同学。我们更不服那些利用条子、票子、走后门上好学校的同学……”

第二，加剧了重点校、二类校同薄弱学校的差距。这种悬殊差距主要表

现在生源、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上。由于“ 票子生 ”的出现，市重点校、二类校更加门庭若市，薄弱学校更加冷清；重点校、二类校师资队伍更加稳定，薄弱学校师资外流更加严重；在教学硬件上，重点校、二类校日趋现代化，薄弱学校由于力不从心，硬件只能是老样子。例如，近年分到一二五中的初中高分段学生，有近三分之一开学不报到，被家长用各种办法给转走了，结果形成了生源的恶性循环。生源差，教师教起来也没有情绪，导致优秀教师外流。初中开学前后的学生二次流动已成为择校生的另一大主流。海淀区双榆树二中 1995 年招生四个班，共 180 人，截止到 8 月中旬，到校报到的仅 80 人。

实际上，择校高收费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两点。一般的枝节问题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它的核心就在于以金钱取代分数为“ 价值尺度 ”来衡量、取舍学生。这到底合不合理呢？或者说它是不是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合理性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呢？对此，我们必须作较为深入的分析。

德国的哲人黑格尔有一句名言：“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择校生高收费是一种现实的客观现象，而且此风越刮越大，尽管国家行政机关三令五申、明文禁止，甚至国务院副总理发表电视讲话都未能奏效。就如老百姓所说的，“ 收费年年有，今年八千明年一万九 ”。难道这种现象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简单他说，学校之所以要高收费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学生家长之所以愿意（至少在表面上是自愿的）交费是由于望子成龙的期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非是强行索要（也有强行索要的特例，此处暂不讨论）。这比拦路打劫还是文明许多。这大约还是一种市场行为，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市场行为。在这种行为中，确立了或者说基本确立了“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相对于原来的比来头、比条子，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来头与条子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而金钱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但是，问题在于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是不能够或者至少不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义务教育的阶段尤其如此。义务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如果放任金钱的铜臭玷污它，义务教育则是一句空话。办教育是要钱的，但这钱不应该来自择校高收费。择校高收费和中国封建王朝腐败时期公然用钱买官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要细心考察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哪个王朝公然明码标价出卖官位，那就离它覆亡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择校高收费之风如果再不能煞住，中国的教育也就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试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今日知道它可以凭借父母的金钱买到任何学校的入场券，那么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会试图用金钱去购买他期望的一切，他会成为“ 金钱拜物教 ”的忠实信徒，他会嘲笑他的老师昔日在课堂上所讲的正义与公理。而他的老师，那些“ 拿了人的手软 ”的教师们又怎样去“ 为人师表 ”呢？

收费项目知多少；学校收了 ”厕所费 ”；小学主为了 1.6 元罚款而自杀；一张 ”告家长书 ”的收费单；中学主日记：怕星期天找父系要钱交费；1995：乱收费 3 亿多元；教育得“ 第一，——乱收费第一；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 假老虎 ”；搭车收费与代人受过；收费猛于虎。

苛捐杂税

择校生收费只是当今中小学收费的一种，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的收费呢？如果你不怕不耐烦，且听我们一一道来：学杂费、实验费、书刊费、食堂管理费、宿舍管理费、春游费、秋游费、博物馆参观费、天文馆参观费、咨询费、试卷费、牛奶费、制装费、乐器费、绘画费、班费……

别以为上面所列的收费项目够多的了，其实它还是很不全面的，遗漏了许多项。如若不信，且举数例。

1995 年 7 月 1 日，湖北省京山县某小学在校门口贴出通知，规定每一位学生家长为学校集资 100 元，又向每位家长发了一份不盖公章的借款通知书，上面写道：“ 由于财政经费困难，学校要改造学生厕所，迎接‘ 普九 ’达标检查，经请示上级批准，向学生家长借款肆百元，毕业时还本付息。 ”这项借款所写借据以及集资款发票上,学校均未加盖公章,不知是什么意思？此项“ 借款 ”是否可称为“ 厕所费 ”呢？

同年，安徽怀宁县实验小学在该县遭受水灾之后，不顾行政部门的三令五申，对于不足年龄要求入学的小孩，根据所差时间，加收 100～300 元不等的学费。此项收费被称为“ 小龄费 ”。

据《光明日报》报道，1996 年 4 月 13 日，河北省鸡泽县郭庄小学五年级学生郭庆克因考试不及格又被罚款 1.6 元（此前他因学习成绩不好按学校规定被多次罚款），未及时上交，4 月 20 日考试时他被拒之于教室门外，哭着回家后服农药自杀了。此种罚款应该被称作什么费呢？“ 不及格费 ”？

1996 年 4 月 19 日（郭庆克自杀的前一天），据《民主与法制》1996 年第 17 期报道，陕西省西乡县钟家沟乡中心小学 12 岁的小学生李梅因交不够 30 元勤工俭学费而服毒自杀。但该校并没有就此罢手，仍然催交该项费用，不交者、未交够者不许进教室。六年级学生刘维志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很想上学，但因差 16 元勤工俭学费不能上学。一个月后，刘维志和班里的其他两名同学因交不够勤工俭学费而相继失学。

据《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建湖县冈东中学在给学生家长发出的“ 征费通知单 ”中列举了这样一些收费项目：中学生养老保险金 30 元、烈士陵园捐款 10 元、《家犬导报》征订费 12.5 元……

湖北省孝昌县一中的一位同学在给《中国青年报》的来信中曾这样写道：“ 新学期即将开始，可我却整天为那一学期 655 元的学杂费而愁眉苦脸。我们这里是贫困山区，没有几人能上得起高中。想到那么多的学杂费以及生活费，我实在有点不想读书，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两鬓斑白、身体佝偻的父母为我东挪西借、受人白眼。每当学年初，我的心都快碎了，为父母的艰辛，为自己求学之路的坎坷不平，也为父老乡亲的殷切希望。我想退学，可我又不心甘…… ”

这位同学在来信中寄了一份盖有湖北省孝昌县一中公章的“ 告家长书 ”，上面开具的收费项目有：

学杂费：285 元（含学费、住宿费）；

集资费：每学生每年 120 元，学年初一次交清；

代收代管费（多退少补）：书本资料费 140 元，补课费 50 元（高二）或 70 元（高三），柴煤费 30 元，人身保险费 5 元，文娱费 5 元；

总计：高二 635 元，高三 655 元。

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市，1996 年 2 月据物价检查机构对十多所学校的调查，有的学校自立名目乱收费，如向学生收取实习实验费、军训费、户口费、文体费、电视机费等等。仅 17 所学校就查出非法所得 190 余万元。该市某幼儿园办学前班，赞助费为 500 元，然而在开学前又举办“学前培训班”再收一次费。

还有在多项收费之外向学生违规行为要钱的。比如，湖南宁远某重点中学规定：学生迟到一次罚款 1 元，大扫除缺席一次罚款 5 元，一次不交作业罚款 2 元，高、初中会考不合格者每生每科罚款 50 元，高考摸底考试不达学校既定标准者每生每科罚款 50 元……

够了，如果再列举下去，恐怕读者会失去耐心。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材料时心情却异常沉重：一个幼小的生命为了少到 1.6 元多到 30 元钱而自杀，这难道不是教育的耻辱吗？尽管这是个别的，难道又可以容忍吗？还有那些失学的孩子们，他们也许是交不起 10 元人民币的冬季烤火费，也许是无法筹集自己还十分年轻却要未雨绸缪不得不交的“养老保险金……这些稚嫩的心灵是怎样面对“苛捐杂税”的呢？山西襄汾南辛店中学的白桦杨同学在 1993 年 3 月 28 日的日记中写道：

以往我盼星期日，星期日可以睡到早上八九点，可以好好地看电视，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菜……没有作业、提问、考试。可现在，我怕星期天。

“你还有零用钱吗？”父亲习惯地问。

“哦，我这次花得多，学校给发了选修教材。”

“多少？”

“一共 12 块就够了。”

“只要你不乱花，在学习上需要多少钱都给你。”父亲说着递给我 15 元钱。上上次 30，上次 20，今天又是 15，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家里刮几十元，想到并不宽裕的家境，我很惭愧。

唉，星期天向家里伸手，似乎已成了定理。

我怕星期天。

欢乐的星期天变得不欢乐了，因为有各种名义的费要交。学生家长比孩子更害怕，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从学校带回一张张的条子，那肯定是要交费了。那一张张交费条的神圣性不容置疑，如果你胆敢不照办，第二天，也许你的孩子就得站在教室外面，泪水直流。那么乱收费的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呢？1995 年，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列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一项重点内容之后，吉林省清理出中小学乱收费项目 61 项，共查出乱收费 1151 万元，已清退 360 万元；河北清理出中小学乱收费 517 万元，已清退 360 万元，并取消不合理收费近百项；湖南益阳市赫山区清查出乱收费 430 万元。据统计，1995 年全国累计纠正社会通过学校搭车乱收费 6712 项，金额为 1.4 亿元，同时纠正了学校包括择校生收费等在内的乱收费 3701 项，金额为 2.3 亿元人民币。1996 年，贵州省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取得很大的成果，共查出违规收费 434 万元，清退、罚没金额 322 万元，择校生收费总额比上一年减少 48 万元，清理多种收费共减少学生负担 71 万余元；河北省共清理出不合理收费 357 万多元，清退 273 万多元；广东各地中小学共检查出违规收费金额 2044.5 万元，清理违规收费金额 1413.3 万元，清理各种收费补习班 692 个，减少学生收费 81.82 万元，清理各种强制学生购买的复习资料约 19 万册，减少学生收费 129.97 万元。河北唐山市

1995 年下半年在全市开展了一次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干人间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40.7%的人认为教育系统乱收费问题突出，在各种乱收费中其严重程度居第一位，群众的不满意率比上年上升了 8.7 个百分点。

位居第一，却是乱收费的第一。谁还敢说中小学校是清水衙门？

中小学乱收费屡禁不止，原因何在？《中国青年报》1996 年 10 月 30 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委。该报道说：

9 月 5 日至 6 日，记者随湖北省有关部门检查了武汉三镇 13 所中小学的收费情况，所到之处“乱收费问题突出”：初步统计乱收费项目达 25 项，有一所学校违规收取的金额超过 309 万元。

在检查中，一旦查出学校的乱收费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横向攀比：“多收这点钱算什么？比起其他学校，我们好多了！”第二反应是无所谓：“查出来，退给家长就没事了，反正没进私人腰包！”第三反应是满腹委屈：“我校历来规矩，这是初次违规……”

汉阳区教委纪委书记严家才形象地将各级政府发出的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比作“山林之虎”，从 1993 年他就在观察：“老虎”是真来，还是假来？他的结论是：近几年来的都是“假老虎”，只是吓一吓“本分人”。执法不力的客观效应是：谁执行政策，谁就吃亏。一位以“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办事”为准则的校长，1994 年曾被区教委评为“遵纪守法廉政校长”，今年他也开了戒，自立项目向学生乱收费 6.6 万元。检查中，学校感到最委屈的是搭车收费项目，认为是代人受过。一些学校反映，能向学校摊派的部门都不是好惹的。你不按人头订团队系统的报纸，轻则说你不重视德育，重则评不上先进；你不接受新华书店搭卖的磁带、书籍，书店就会在按时供应课本的问题上刁难你；教研室要收试卷费，学校顶都不敢顶……

由于这些摊派给经办者（包括学校）好处费，使得学校和一些长期摊派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更使学校举不起拒摊牌。一位武汉市人大代表在检查中苦笑着说：学校怕评不上先进，怕“管、卡、压”等，但就是不怕制止乱收费的政府文件。这究竟是为什么？谁能给出一个答案？

答案是有的。因为政府的文件是“假老虎”。“假老虎”唬得了谁？那些利益共同体就胡作非为了。中小学的乱收费可是动真格的，是“真老虎”，直叫人感叹收费猛于虎！在中国要打死这只老虎还真不容易。打了多少年，老虎越来越猛，越来越威风。老百姓可就受害了。据济南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抽样调查，1994 年市区居民户均学杂费支出为 165.79 元，比 1992 年增长 57.44%，比 1993 年增长 16.3496，平均每年递增 22.02%。其中文具费用 1994 年户均支出 17.77 元，比 1992 年增长 80.77%，比 1993 年增长 60.52%。学生学习方面的支出费用过快，对于工薪阶层已成为沉重的负担。

另据《中国妇女报》报道，上海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1996 年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支出是城市居民所有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并持稳定上升的趋势。这项对全国 8 个大城市居民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的调查显示：在有上大学的子女的城市家庭中，父母每年平均要为子女上学向学校缴纳的各项费用力 1076 元，支付子女的其他教育支出费为 509 元，支付子女的零用及生活费用 1272 元；在有上高中子女的家庭中，父母每年平均为子女向学校缴纳的各项生活费用和给子女的零花钱则达 2220 元；有初中生的家庭上述三项指标的数额分别为 326 元、552 元和 1766 元；小学生家庭的三项支出则分别为 282 元、456 元和 1596 元。在北京，有高中生的家庭直接用在孩子身上的钱已经占到

家庭总收入的 40%，而有初中生或小学生的家庭直接用在孩子身上的钱则均占到家庭总收入的 25%。

中国的老百姓是望子成龙的，他们尽管还不富裕，却节衣缩食将大把大把的钱用在孩子的培养上。但是，面对比虎还猛的学校收费，他们会始终忍受吗？

一遭特殊的寒假作业：推销螺旋藻；“开门办学”学商去；“食品订货会”与校园惨案；到学校商店买冰棒可以得表扬；规定：学主每人每年购买校办商店商品 300 元，否则罚款；智商测验先买保健药品；“智力碘”盯上了中小学生；13 岁男孩欠了 500 元“外债”；中学生跑股市；“贵族子弟”日本斗富；商品推销与学校教育。

商品推销

学校是斯文之地，从来都是很清高的，所以人们称之为“象牙之塔”。可是，市场经济的魔力足以战胜斯文，不是吗？且看事实。

据 1997 年 3 月 12 日《羊城晚报》报道，开学已半月有余，然而，对于浙江省温州市东瓯外经贸职业学校而言，由一道特殊的寒假作业引起的风波却远远没有平息。

温州东瓯外经贸职业学校是温州市一所社会力量办学的中等专业学校。1 月 25 日，学校给全校 479 名学生布置了这样一道寒假作业：寒假期间每位学生必须向消费者推销价值 200 元的螺旋藻保健品和生物素牙膏等新产品，完成推销任务后成绩才算合格。其成绩具体计算方法是：推销螺旋藻 2 盒、生物素牙膏 6 支，成绩合格；推销螺旋藻 3 盒、生物素牙膏 8 支，成绩“中”；推销螺旋藻 4～5 盒、生物素牙膏 12 支，成绩“良”；推销螺旋藻 6 盒以上、生物素牙膏 18 支以上，成绩“优”。螺旋藻和两种生物素牙膏，学校给的定价分别是 90 元、7 元和 10 元，学生可在此基础上以 105 元、8 元和 12.5 元的价格出售。

在这所学校新学期报名注册的第一天，教室的走廊里仍可见到不少的学生手里拿着一袋袋没有推销出去的产品。九四国际会计班的几位同学说，这些产品知名度很低，价格偏高，根本无法推销出去。一个学生无奈他说，他把产品拿给哥哥拜年了。

据悉，此事已引起了温州市工商局、市教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已开始着手调查。这真是一条好新闻，编辑所做的标题也很有特点：“479x200＝95800（元）”。479 名学生每人推销 200 元商品，共值 95800 元。谁敢说现在的教育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事例？这个事例倒让人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搞“教育革命”的“开门办学”，不过那时响应号召多半是去“学工、学农、学军”，而今日则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去“学商”了。

是的，“学商”是时代的潮流，并非是温州外经贸职业中专的专利。“请进来、走出去”，现在的中小学大都“开门办学”了：围墙推倒了，沿街处设立了一家家商店；学校公告栏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老师在课堂上公然要求学生去卖某种商品……

1997 年 4 月 2 日，一桩因召开“食品订货会”而发生的校园惨案震惊了北京和全国。7 岁小学生周皓字死了，无情的车轮碾过他瘦小的身体。

这幕惨剧于 4 月 2 日发生在北京宣武区南菜园小学的操场，那时二年级（3）班正在上文体活动课。

也是在那时，学校门口上方赫然悬挂着“食品订货会”的标语，车辆进进出出，肇事的车辆是昌平工业品公司前来学校参加订货的面包车。

4 月 2 日第四节课，二年级（3）班正在操场上玩得高兴，而这天，正是在学校举行的食品订货会开幕的日子，前来洽谈订货的车辆络绎不绝。11 点半左右，一辆北京牌面包车在无警示也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从操场往校门口倒车，正在与同学们自由活动的周皓字躲避不及，被撞倒在车轮底下。送医院终告不治。

家长们闻讯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闻讯震怒了！神圣的校园，上课的课堂，竟然成了一名可爱的小学生的葬身之地，这是为什么？周皓宇的父亲是

一名军人，面对爱子的惨死他悲愤交加他说：“我想说的话也是千百万家长想说的话：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是办公司办企业的地方！”

据了解，这所学校与某食品批发部签订了联营协议，不仅出租了教学楼内的教室和其它办公房屋，还出租了教学楼周边的一排平房。并且，学校的操场平日里就被辟为停车场。家长们不无气愤他说，平常学校里车进车出，学生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每次家长会，他们都向校方反映此事，但并未引起视。即使不开订货会，事故的隐患也一直暗藏着，因此周皓之死并非偶然。

周皓宇之死的确不是偶然的。学校忙于做生意；对其它事情就大意了。

这已经是一种时髦：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天天到学校的店去买冰棒，家长感到有点奇怪，他即使放学回家后想吃冰也要返校去买，父亲问他，才知道儿子在学校买冰棒可以得老师的表扬。而在一个稚嫩的心灵里，老师的表扬是非常重的。

还有更奇怪的事：刚刚上小学的女儿从学校里带回两包品，妈妈颇感不解，问是哪里来的，女儿的回答理直气壮：师发的。并要妈妈给 10 元钱，明天交给老师。做妈妈的无；只好把钱交出。许多家长都碰到过这种事，他们的孩子从学里带回各种购物优惠券，并吵着要去买，否则会落后，得不老师的表扬。现在，有一些教师积极充当推销商品的“二手”，把各种“商品广告信息”、“优惠券”发给学生，他们的推销一般都是很有成效的，因为在学生那里他们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据报道，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审计局在对该县鸭子口厚浪沱中学预算内外经费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一件怪事；该校自 1994 年以来，不顾学生及家长的反对，规定在校学每人每年必须在该校校办商店购买 300 元的商品，完不成任何者每少购 10 元交费用 1 元。经审计核实，近 3 年来累计有 140 人次交罚款 1623.80 元。其中 1994 年 7 月，46 名学生交费 706.60 元；1995 年 6 月，27 名学生交费 439.30 元；1996 年 7 月，51 名学生交费 308.20 元。厚浪沱中学所在地的山区农民尚未脱贫，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拿不出。

另据 1997 年 4 月 10 日《羊城晚报》报道，上海许多商家的促销战火已燃至校门，他们利用学校向学生和家长频频推销商品。家住建国西路的徐某近日反映，他的儿子所就读的小学召开家长会，说要请专家对每个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家长纷纷前去。谁料这些专家不是说这个读书思想不集中，就是说那个学习不用功，让他们去进行智商测试，而要测试则先要花 240 元买一盒某品牌的保健药品。住在新华路的林某反映，儿子学校组织春游，可校方别出心裁让学生们买运动鞋，说是有利于健康和提高学生的集体观念，家长被孩子们缠得没办法，只好掏腰包买回一双被老师称之为“校鞋”的运动鞋。

不仅仅是学校，它们的主管单位也打学生的主意，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插一脚。据 1997 年 2 月 5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河南省鹤壁市，一种叫作“智力碘”的东西盯上了中小学生。一位学生家长拿着一盒“智力碘口嚼片”对记者说：“花 20 多块钱买来这么一盒药，撂在家里也没敢让孩子吃，怕有副作用。现在都吃碘盐，犯不上用药物来补碘，但学校非得让学生买这药不可。”他的话里透露着无可奈何。其实，推销“智力碘”的始作诵者不是学校，而是它们的上司——鹤壁市教委。这个挂着教委牌子的行政主管部门曾召开市区校长工作会议，要求市区的中小学生购买服用这种药品，此后，又召集辖区内的淇县、浚县教育局的负责人并下发文件要求服用“智力碘口嚼片”。这样，在鹤壁市的中小学中就兴起了一股推销“智力碘”的热潮。

这种推销带有某种强制性，一位教师说，某些上级部门把学校当成了市场，什么东西都要通过学校让学生买。学生听老师的话，老师让买，学生就向家长要钱，家长也不敢不给。这话真正道出了实情。

在全民经商的氛围中，不少人都在拚命想“点子”、搞“策划”，千方百计把商品打入学生一族的消费中。据说精明的商家要想尽办法打女人和孩子的主意。什么地方孩子最多呢？当然是学校。打开学校的大门，自然是许多商人的重要战略了。

一些商人是很有“点子”的。比如，在当你漫步文化用品自选市场和文具柜台时，色彩斑斓。花样翻新的儿童文具就使得你不得不驻足观赏，那些漂亮的玩具化的文具真有吸引力。这是商家“推陈出新”的妙招。这一招也确实顶用，许多孩子买了这种文具。当然，也带来了商家难以想到的另一效果：孩子们在上课时可以堂而皇之把文具摆在桌上并尽情玩耍。这当然有点令教师头痛。

推销商品，是学校里的老师“自力更生”的行为，是他们苦心经营、开垦的“南泥湾”。可是，他们在经济上取得成效的时候，却使中小学校园里刮起了一股经商旋风（此处不讨论大学，在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做点“生意”已经是理直气壮的事了。比如，在广州某高校，许多老师都在热心于伟大的“传销”事业，他们不想错过这据说是继炒股、房地产，期货之后中国人发财的“第四次浪潮”，发展“下线”已经成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旋风所到之处飞沙走石，孩子们并不十分明亮的眼睛便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据1996年2月27日《华商时报》报道，北京一位13岁男孩，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欠下了500元的“外债”，使得家长大为恼火。

几个月前，这个男孩的父亲发现儿子日常开销有不少出入。经调查才知道他在学校门前小摊贩处赊帐买食品，有时摊主还借钱给学生，多时竟达四五十元。

这位父亲觉得问题性质严重，先后找了学校及摊贩的主管单位工商局、派出所等，但令人失望，有关方面的答复是，向学生赊帐在有关市场管理的法规中并没有限制，因此不存在强买强卖的问题。据悉，向学生赊帐已不是少数行为，而且越赊越多，有的摊主逼债逼得很紧，最后有可能造成没有偿还能力的孩子走向犯罪。

学生欠下了“外债”，家长的心情当然不会太好。但是，也有很“开明”的家长，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去“游泳”。据1997年3月3日《羊城晚报》报道，哈尔滨市一些中学生利用寒假和课余时间跑股市炒股票，引起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议。

据了解，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是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股市的。对此持支持态度的家长认为，现在的孩子不应该只停留在学校的书本知识上，带孩子跑股市是为了让他们见见世面，有从商的知识，日后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此相反，学校及教育界则对此持不同的意见，许多人甚至为此担忧。一位中学班主任说，股市上人员复杂，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弱，易受不良影响。同时，课间有些学生大谈股票和做生意，还有的旷课跑股市。教育界人士则认为，中学生要了解有关股票的知识，可在业余时间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放弃所学课程出去炒股，无疑是本末倒置。

跑股市并不算是太稀奇的事，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刮点风，学校就可能跟着下点雨。社会上现在兴起了传销，一些中学生也就跟着干，抢

着加入传销大军，听讲座，推销产品，为自己美丽的发财梦而奋斗，忙得不亦乐乎。社会上款爷兴摔酒瓶斗富，他们的孩子就用大哥大堡“电话粥”。据天津《今晚报》披露，该市某校四年级的一名寄宿生，父母为了方便与他联系，花了近万元买了一部大哥大给他使用。这名学生每天一副大款模样，机不离手，有时一天要打十几个电话，在同学中颇有影响。而在该市和平区某小学，一位六年级的学生有一次在下课时手里拿着一张百元的人民币，喊着要买同学的头发留念，每根头发出价 1.5 元，以显示自己的富有。

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孩子斗富斗到外国，让洋人也大为惊奇自叹不如。1994 年夏天，25 名中国孩子在日本大出风头，出手豪爽，引起当地新闻媒介竞相报道，成为一时轰动日本的社会新闻。

这些孩子是广州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的学生，他们那次到日本旅行，每人花费人民币 3.2 万元，被称之为“贵族学校的小富翁”。在百货商店，在迪斯尼乐园，这些孩子们很随便地从裤兜或书包里掏出一大把万元日元的票子，花起来毫不在乎，令普通日本人震惊。《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我每月工资也就七八十万日元，每当我拿出一万日元时，都要仔细斟酌一下，这钱是不是非花不可？不光是我，大部分日本人都是这样。你们中国这些孩子真太不得了了。”还有日本人由此而发问：中国真的穷吗？

中国真的还是穷的，特别是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那就还很穷很穷。可是，中国也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的孩子过足富瘾。

据说，在中原大地的河南省，有一位个体户给自己 6 岁的独生子请了两名佣人护送上学，孩子的书包由佣人背，水壶由佣人提，就连上厕所也由佣人侍候。又据说，东南沿海某地，春节期间某大款给了儿子 3 万元压岁钱，儿子上下学便打的，作业出钱请同学代做，经常邀请同学下馆子。

这些现象都令国人深思。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拜金主义强有力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使不少教师陷入迷惘之中：他们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可仅仅依赖国家是不现实的，自己也得自力更生，于是就有了推销商品的一系列行动；另一方面，幼稚的孩子们应该怎样面对金钱，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现在，人们又喊出了另一句话：再富不能“富”孩子。我们的教育决不能造就骄奢淫逸的一代。如果是那样，就背叛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的教育也就彻底失败了。而校园推销商品对孩子的教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真值得人们深思啊！

校园大款素描；总务主任用上了高级轿车；乡教办盖起了办公大楼；县教育局设了 10 个小金库；教育局长收取工程红包；一伙吃教育的耗子；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教育吃教育的典型；“清水衙门”也要受到监督制约。

教育也能出大款

教育也能出大款吗？清贫似乎是中国教育的同义词，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就像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也是只收学生几块干肉，过着清贫的生活。难道现在就变了？可是，真的是这样，教育也能出大款。

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些校园里大款的模样。请看某重点中学的校长：大哥大、高级轿车、传真讥、国际长途，一应俱全，装备不亚于大公司经理。国家规定领导干部一年出国不得超过两次。他一个中学校长，去年一年出国 4 次，今年暑假又去了印尼和美国。学校问题成堆，不予重视，不抓教学，专攻出国；要么就是关起门来与家长谈判，利用每年几十个高价收费学生，捞取油水。

校长如此，副校长又如何呢？一个主管“奥校”考试的副校长，经常收到外地寄来的上特产、汇款，而且是让人大摇大摆地寄到学校传达室。家另一位副校长，专门制定家长名单，按照有用程度进行“公关活动”，回报当然是保送大学和高中之类了。此女士父母皆普通工人，自己却在拆迁中独得黄金地段，其吃穿住行，房屋装修，都称得上豪华，谁会相信她是一个中学校长？严然一个大款太太！

上面对学校中的大款的描述是生动的，生活中人们也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校园大款。听到的就更多了，比如说某校长一年个人的招待费就有数万元之多，足足吃掉了几十上百个学生一学期的学费；又如，某重点中学的总务主任都用上了高级轿车；还听说，现在召开中学校长会议，只听到会场里一片大哥大的响声……

可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主管教育的单位和个人在教育行业里捞油水，他们是贫困的中国教育中所产生的大款。1993 年 12 月 22 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市招生办公室副主任石仁富死刑，判决书说：

……被告人石仁富自 1983 年任沪州市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以来，利用手中权力，向学生家长 405 人索要收受贿赂款计 411310 元，此外，尚有 337837.47 元被告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已构成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1、被告人石仁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并处没收财产 88117.53 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88117.53 元。2、被告人石仁富受贿赃款 411310 元和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 337837.47 元予以追缴。

判决书中一串串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就是这个石仁富，他把手中的权力用足了。当地老百姓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泸州有个石什么主任，只要你给他钱，就能读到书。”而石仁富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他公然索要钱财，又往往打着“借”的幌子。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我们还是看一看一位证人的证词吧：

我是通过他人认识石仁富的，通过他帮忙，我的女儿读上了某纺织学校。起初我到石家表示要其帮忙，因为打听到别的考生都出点钱，我当着中介人给了他 4000 元，他说：“我不要你的钱，若要，我就打个借条，算是暂借，今后经济条件好了再还给你。”于是，石写了两张同样内容的借条，一份给我，一份他留着。等我与中介人分手到沱江旅馆，石便追了上来，说：“你把借条还我。”我说：“我已经给了中介人。”石说：“不行，快去拿回来。”

我赶快把借条拿回交给了石，石说：“ 以后，你找我办事一人来就行了，不要第三者。 ”我说：“ 石主任，这些我懂。 ”石仁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以后小孩的事办好后，我单独又送去了 4000 元，这次，他再也没有打借条，也闭口不说还款之事了。

就是这样，石仁富从数百位学生家长那里“ 借 ”到了大量的钱。这些钱被他存放在一间小屋子里，当地检察院从中搜查出：银行定期存单 63 张，计 50.35 万元；各类企业银行伊券、待有卡 280 多张，计有 24.8 万元；现钞 8.5 万多在每一张单据中，都有一个贪婪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玷污了“ 教育 ”这个神圣的词汇。

据 1996 年 9 月 2 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省徐闻县的贫困乡角尾乡教育办公室，不顾全乡许多学校校舍破旧、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私自动用学校建楼费，于 1993 年为仅有 6 名工作人员的教办建起了一栋三层 500 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1995 年又再耗巨资建了一栋四层 896 平方米的大楼，乡教办主任和出纳员两家各住 100 平方米。

这就是吃教育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报道还有不少。某市一线教师年享有的经费只占教委机关工作人员的七分之一，该市教委机关工作人员每年人均分得帐外补助近 2000 元，而一线教师加班每天仅得 0.50 元。湖南平江县是有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该县的教师常有领不到工资的情况。可是，县教育局 12 个内设机构竟有 10 个小金库，违纪金额达 566.9 万元。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1996 年 12 月 12 日的《中国教育报》报道，原江西永新县教育局局长刘学诚被永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没收财产 2000 元。刘学诚在 1993 年至 1995 年担任县教育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教育系统的基建工作中，多次为工程承包人顺利承包到工程和谋取利益提供便利，而自己多次收受这些承包人员的贿赂款达 17900 元。

刘学诚的案子与现在许多大案要案相比的确不算什么，但他吃的是教育，而且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县的教育。

与刘学诚相比，原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兼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高玉林吃教育就厉害得多。高玉林于 1983 年至 1995 年担任市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与其下属相勾结，共贪污公款 758815.36 元，收受贿赂物品折合人民币 2000 元。高玉林的副手樊本奎贪污公款 50000 元，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 2000 元；中专处处长张洪斌贪污公款 514953 元，收受贿赂 30000 元；中专处副处长张泽田贪污公款 427250 元，收受贿赂 38500 元；行政处处长李树清贪污公款 139203 元；高招处副处长窦军贪污公款 6300 元；行政处财务科副科长常善成贪污公款 9000 元。

高玉林这一伙都是吃教育的耗子，而且吃得很厉害，也许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

吃教育饭想做大款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的确取得了成功，就像本书其他章节所写到的那样。教育本是清水衙门，是油水不多的地方。可是，那不多的油水也令人垂涎。这真值得人们警惕！对于任何权力，都必须要有监督和制约，并且要成为一种制度。教育不是生存在真空中的，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中，教育不能成为特区，尽管这是一个清水衙门。由于教育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允许在教育中产生大款，否则一粒老鼠屎搅乱一锅粥，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如果让吃教育的人继续“ 吃 ”下去，甚至越

“吃”越多，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呢？

吃教育的大款们，你们该怎么办？要你们收敛的呼吁，也许显得十分幼稚和可笑。可是，面对着孩子们清纯的目光，面对着他们脖子上鲜艳夺目的红领中，你们还能下手吗？清贫的中国教育，决不能产生大款啊！

老生常谈话经费；1995 年国家公某教育经费占国民主产总值的比值降到近 5 年的最低点；大蛋糕中切下一小块；一辆高级轿挛＝一所小学；一桌酒席=全校学主一学期的费用；教育集资，农何失控；教育附加，收不上来；挪用教育经费补了”西墙”；经费短缺，后果堪忧；36 个座位挤满了 70 个狐阄幸运儿；教室成了沙丁匡罐头；”议员”出谋划策。

吃紧的教育经费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每年的人大和政协例会上，总会有人谈起这个问题。中国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差不少，有一年甚至排在了世界倒数第二。这个消息曾经令国人震惊。因为作为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视教育的，难道我们的教育在世界上竟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吗？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惑众？可是，的的确确是这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为证。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依然很低。1990 年，中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约合 8 美元，而世界平均约 220 美元；中国平均公共教育经费约 48 美元，世界平均约 1230 美元。

然而，近年来教育经费不是增加了吗？不是也有多少多少个亿吗？1996 年 9 月 18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年度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1995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 1877.95 亿元，比 1994 年的 1488.78 亿元增长 26.14%。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支出为 1411.52 亿元，比上年的 1174.74 亿元增长 20.16%。这些增长的确不少。

但是，有专家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一些重要的指标仍然没有达到《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增长要求，甚至还有所下降。如 1995 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6.05%，比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2.24 个百分点；全国只有 14 个省、自治区实现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最突出的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基本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不仅没有增加，还有所下降，降到近 5 年的最低点。自 80 年代以来，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值，一直在 2%上下徘徊，1992 年为 2。

99%（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4.1%），此后持续下降，1993 年为 2.76%；1994 年为 2.52% ;1995 年为 2.46%,比 1994 年又下降 0.06 个百分点，离《纲要》所规定到 2000 年这一比例应达到 4%的目标更远了。”

“教育的战略地位并未真正落实和巩固，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这种评论应该说还是公允的，并没有夸大其词，也不显得尖刻。前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何东昌也承认：“从 1991 年以后，财政性教育拨款虽然绝对数增长不少，但相对比例数由 1991 年的 3.1%下降到 1994 年的 2.68%。”“我国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低是因财政收入在国民总产值的比重过低并逐年有所下降所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离公共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例为 4%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呢？（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1991 年，该项比例世界平均为 5.1%，发展中国家则为 4.1%。而在中国，该项比例 1980 年为 3.3%，1985 年为 3.6%，已经较为接近 4%了）在中国，教育拨款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约占 75%,1995 年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教育总经费的增长 9·8 个百分点，这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NP 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教育费附加的征收不力和挪用也是原因之一。

那么，问题清楚了，在国家财政的这个大蛋糕拼盘中，教育总是难以切到较大的一块，或者说，切到应该切的一块。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的确有

认识上的原因，教育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毕竟不像上一个大型项目来得直接、明显。可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利益冲突呢？教育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因它的功能所限而被其它的利益群体所排挤。

这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法，而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实。

在中国的第十个教师节，中央邀请了 50 多位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到北京欢度节日。在北京繁华的马路边，有记者得知一位教师是第二次来北京，便问他说：“这次来，你觉得首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教师说：“小汽车多了。”“你知不知道一辆值多少钱？”“不知道。”“你猜猜。”“大概得十几万吧。”“一辆汽车的钱够盖一所小学了吧？”

在五星级国宾馆的餐桌旁，又有记者问一位正在用餐的女教师：“你知道这桌菜多少钱吗？”女教师说：“不知道。”当记者告诉她是两千元时，那位教师的脸立刻变得沉郁，她不无感慨他说：“两千元，够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一学期的费用了。”还有一位女教师，当听说剩下的许多饭菜将全部扔掉，觉得很可惜。她对记者说：“如果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吃，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说到这里，那位教师哭了。

是的，两千元一桌的酒席在有些人眼里算不了什么，但对嗷嗷待哺的教育和山区的孩子们来说，那就意义重大了。北京和中国其它大都市的小汽车越来越多，交通因之越来越堵塞，但是那些越来越豪华的小汽车在阻塞交通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挤兑了教育，因而也阻塞了孩子们的未来之路，阻塞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之路。

于是，受到阻塞的教育就只好“自力更生”，就有了我们上面所讲到的择校高收费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但是，这种做法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不但败坏了教育自身，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潜藏着社会冲突的极大危险性。

《光明日报》曾载文谈到农村教育集资问题，湖北省潜江市熊口镇丁岭中学是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1995 年新学年开学之际，一张新生入学收款清单却愁煞了新生家长。收款单上开列出 7 个收费项目，共计 684 元，这不能不使刚获得温饱的农民望而生畏，其中仅教育集资一项即高达 350 元，占收费总额的一半以上。一位新生家长至今谈起此事还愤愤不平，他说：“学校 1991 年已盖好新校舍，不知为什么还集资？”

湖北随州市一个人均年收入 1300 多元的村庄，一户三口之家一年需上缴各项款计 1400 余元，其中仅教育集资一项就高达 700 多元，占上缴款总额的一半，连两岁的幼儿也平摊上 200 元。

教育集资的泛滥与失控已成为 1995 年农民负担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地区不仅将自愿集资变成硬性摊派，而且数额迅速攀升，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担负能力。在集资方法上也是有章不循，政出多门，随意突破限额。一些地方少批多集，甚至不批也集。襄樊市 1995 年批准教育集资 3916 万元，实际集资 5705 万元。鄂州市 1994 年教育集资 326 万元，到 1995 年骤然增到 2423 万元，涨幅高达 6.5 倍。

以加重农民负担发展农村教育，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农民积极性受到伤害，势必使我国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动摇国民经济的基础，并最终影响教育的发展。

教育集资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不少农民家庭因不堪教育集资与各种费用的攀升而迫使自己的孩子辍学。有些农民说：

“学校越盖越好，学生越来越少。”这真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可是，一方面是乱集资，另一方面则是该收上来的钱收不上来。据透露，1995 年，我国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只有 68%，农村约为 50%，部分地区不到 30%，甚至还有个别地区没有开征教育费附加。在不少地方，教育部门不了解教育费附加征收数额的底数，财政部门则用以抵顶财政拨款。这样，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当然就严重不足了。挪用教育经费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993 年 1 月，国家教委人事司负责人在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时透露，在乡镇一级，挪用教育经费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乡镇拆东墙补西墙，经常挪用教育经费。如四川仪陇县立山区把教师的工资款用来抵铁路集资款，马鞍区则用教师工资款垫付兴办食品厂、火柴厂和针织厂所欠债务。据 1997 年 1 月 22 日《中国教育报》报道，安徽利辛县潘楼镇挪用所收教育经费和教育附加费共 99.2594 万元，用来付保险费、买推土机和还银行贷款，至使该镇教师工资被拖欠。

教育经费短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 1993 年 10 月 28 日在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中说，由于经费短缺，75%的中学和 90%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全国共有 1500 多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修缮,教育系统教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 12 个行业中长期徘徊在第 10 位左右，1992 年全国职工每人年平均工资为 2930 元，而教育系统则为 2731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5 个百分点。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表现为不少地方拖欠教师工资。1993 年，山西省拖欠教师工资最高达到 3500 多万元，涉及全省 76 个县的近 10 万名教师。到 1993 年 9 月底统计，全国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最高达到 14 亿元。而时至今日，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教师处境艰难，就如本书其他章节所描写的那样。

缺少经费而使教育饱受困窘的事例比比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举出两例以飨读者。一例是农村的。据报道，在贵州威宁自治县海拉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班，课桌分两排由后墙一直抵至前面讲台，36 个座位挤满了 70 名当年幸运地抓上“入学阄”的孩子。抓阄成了孩子入学的第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学校在招生时的无奈之举。海拉乡距威宁县城 130 公里，入学率只达到 45%，失学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师资和教室。尽管全乡有 18 个教学点，但最宽敞的校舍也容纳不了 300 名学生。中心小学 6 个年级班班超负荷，最多的几乎超过正常座位的一倍。最令人头疼的是每逢新学年开始，众多要求入学的孩子简直要挤破校门，老师们难以平衡，被迫亮出抓阄入学的“绝招”。

这些老师是“公平的”，他们选择抓阄，把受教育的机会交给“上帝之手”去安排。这就要靠运气和命运。而那些孩子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抓一个“好阄”上，从而能分享到半个座位。

还有一例是城市的。据报道，八十多名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屋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这是 1997 年 4 月 8 日出现在鞍山市和平小学的场景。据这所小学的负责人介绍，1994 年和 1995 年该小学只负责接收某街道办事处管区 4 个居委会辖区的孩子入学，每班只有 45 人左右。可从 1996 年 9 月 1 日开始，和平小学一共要接纳 11 个居委会辖区的孩子入学，学生严重超编。学校主楼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已有 60 多年历史。1997 年 3 月中旬，鞍山市铁东区教委、市基建办三次来校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此楼水泥墙砖已成粉状，裂纹严重，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为此，校方从本学期一开学就将教师、学生从主楼搬到东楼，再将多个班级合并。在三年级二班教室里，

八十多名学生挤在一起，连过道都摆满了桌凳。有人问学生，“你们这样坐不挤吗？”“不挤！”“写作业时怎么办？”“互相谦让。”……

在1997年3月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八届政协五次会议上，教育经费的问题受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全国政协常委刘诗白在发言中说：“在教育的投入上，还是要强调按照邓小平同志‘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些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和‘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的指示，坚决贯彻以财政性拨款为主，多渠道投入的方针。”他并且提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一，……要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二，地方政府应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将其主要精力用于为社会提供服务，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不断拓宽筹措经费的渠道；三，依法保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四，尽快按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将教育经费从科教文卫总额中分离出来，实行预算单列；五，理顺各级财政教育拨款的责任体制；六，建议成立国家教育银行，运用金融机制和手段，多渠道融通资金，缓解教育事业资金不足的矛盾……”

人大代表杨海波建议：“按一定比例在预算外资金中切出一块用于教育；在固定资产调节税中征收2%用于教育；将征收的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中每年增量部分用于教育；发行教育国债，全部用于教育。”

他们的建议值得重视。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增加教育投入的确是关系到中国的明天未来的大事。现在多用一分钱，将来的收获绝对不止一分。春天播种，夏秋收获，每个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快播下壮硕的教育之种吧！不能再迟疑了，一点都不能！

8 为人师表的困惑

中小学教育中的师德问题

老师是一个神圣的称呼，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表，职责重大。“天、地、君、亲、师”，尽管“师”排在第五位，可那毕竟是可以享受崇高敬意的位置。做一名教师，多么的光荣！

可是，中国的教师也是普通老百姓，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食五谷杂粮，操心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的地位并不高高在上，甚至一度还成为“老九”。“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所喜爱的这句格言也完全适合中国的教师，这当然也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的，即“人所具有的一切缺点我都具有”。是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一切缺点，中国的教书先生们也都不可避免。这不是恶意的攻击，这是对于现实的勇敢的正视。而正视现实，我们不但要看到中国教师的缺点，而且要看到产生这些缺点的环境和条件，要看到中国教师的艰难。

幼儿园的中小学：女士们的一统天下；专家评说：学生性格的女性化；“红都”重金招不到男幼师；男同胞为何不愿当“孩子王”；师范院校缸少男生。

教师女性化趋向

女士优先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社会对于妇女的基本态度是歧视，即使如孔圣人者都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从“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许多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去革命，去斗争，去闯世界，闹得红红火火。

现在在幼儿园和中小学里，女士们也红火得很，她们占据着大部分的位置，甚至有一统天下之势。

据统计，截止 1994 年底，全国各级普通学校中女教职工人数为 599 万，占教职工总数的 43.9%；女专任教师人数为 485 万，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5.6%。但是，在中小学，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在南京市，据 1995 年的统计，中学里的女教师已占了教师总数的 65%左右，在小学这一比例还要高一些，在幼儿园里则几乎都是女教师的天下。

这种情况是令人忧虑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郭嘉梅副教授对此作了研究，她认为，从教育的角度看，男女教师各有特点。女教师温柔、耐心、观察仔细，更容易接近学生。男教师有魄力、思想开拓、精力旺盛，对学生的引导性强。男女教师的特点对朝夕相处的学生们性格形成、心理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学生如果接触同一性别的教师太多，那么他（她）正在发育形成的人格中性别化倾向就多一些。目前中学里女教师较多，而女教师善于建立一种女性气氛，久而久之，学生性格中女性比重加大，柔弱、温顺的成分多一些，不利于他们走上社会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

还有一些教育专家也认为，在一所学校里，男女教师的组成搭配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据研究，中学男女教师的组成比例以 1.2：l 较为适宜。这样无论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还是性格形成都有积极的影响，既能培养出男性的刚强、坚定、果敢，又有女性的耐心、细致。

我们不用过分担心这个问题。尽管过多的女教师占据中小学的教职，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说这种“生态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工作气氛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方面也有专家对此作过研究）等等，但是更深的忧虑是：女性在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占居主导地位，究竟是不是妇女解放的成果？或者说究竟是妇女的胜利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来看一看许多报刊上都议论纷纷的浙江温州红都幼儿园招聘男教师的事情。

红都幼儿园是浙江省温州市一家颇有影响的幼儿园，它占地 18 亩，仅一期投入就有 400 多万元，其硬件设施是一流的。自 1996 年 9 月开园后，报名的人很多，一时门庭若市。该园园长卢婉秋认为，硬件设施要搞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软件建设则要艰难得多，而师资则是最重要的。于是，卢婉秋决定登报招聘男教师,遂于 1997 年 3 月在当地报纸上刊出‘重金招聘男教师”的广告。可是，红都幼儿园的重金许诺却没有打动男士们的心，居然没有一位男士前来揭招贤榜。这当然有点令卢婉秋园长心冷。卢婉秋园长对男性在幼儿成长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她曾对人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只老鼠窜进家门，妈妈对孩子大叫，快打开门，把老鼠赶走。而爸爸则对孩子说，快关上门，拿棍子来把老鼠打死。在这个故事中，男性的父亲和女性的母亲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据悉，在不少发达国家，对幼儿教师中男性的比例早有明确的规定。日

本在 1975 年就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十多年后，男教师的比例已达到 6.3%，而在幼儿园园长中，男性已超过女性，占总数的 52.1%。1996 年在上海的一次调查中，59%的幼儿教师欢迎男性加入幼教行业，79%的家长非常欢迎男教师参与幼儿园的教学。可是，现实是令人失望的。成立于 1953 年的浙江幼儿师范学校，迄今为止已培养了近万名幼儿教师，却无一人是男性。该校也尝试过要招男生，但应考者很少，最后只得取消。1997 年 3 月 24 日的《光明日报》刊文谈到红都幼儿园招聘男教师一事时，编者曾在该文后面加了这样一段编后语：

“红都”招聘受挫，再一次提醒我们关注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其实，不仅在幼教系统，缺乏男教师的状况在全国许多小学、初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慈母体贴入微的呵护，也不应缺少严父阳刚之气的熏陶。面对家长们的热切期望，社会呼唤更多的男子投身到儿童教育这项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事业中来。

《光明日报》的编后语写得不错，并进行了强烈的呼吁。可是，中国的男同胞们为何不愿意当“孩子王”呢？是他们思想觉悟低？是传统作怪？还是另有原因呢？

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对男性同胞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何存在，必须追究其思想观念背后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教给我们观察、认识和研究社会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

在中国的职业分层中，教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在“文革”时期，教师是尽人皆知的“臭老九”，可见其地位之低。改革开放以来，教师在政治上受人歧视的现象的确已经根本改变，但在经济上他们的收入相对其他阶层来说却是比较低的。这不在于教师表面的工资收入，如果仅从表面的工资收入来看，教师是不比公务员等社会群体低。但是，教育单位从总体上来看是所谓的清水衙门，即教师手中缺乏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索取除正规工资外的其他收入，他们几乎拿不到奖金，教师的工资是死工资（一部分高额收取择校费的学校除外）。而在当今社会，无庸讳言，死工资已经不是衡量收入的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标准。各种各样的奖金在收入中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所以，在一首广为流传的所谓划分几等公民的民谣中，教师是属于“山珍海味认不全”的末等公民之列。这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教师的社会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人们不愿意当教师。每年都有不少的人想尽办法调离教师队伍，或从政，或经商。而在报考大学时，补充教师的师范院校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冷落，有人曾著文分析了此种现象：“这些年大报小报在讲多少文科‘状元’进了北大，多少理科‘状元’进了清华，怎么就没有人讲他们进了北师大？这些年来别说‘状元’，大凡比录取分数线高那么一点儿而自忖有把握被录取的，就不大愿意委屈自己进师范院校。尤其是上师范院校有不收学费并发助学金的历史传统，尽管如此，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肯上师范，而宁肯贷款上别的学校。师范院校的生源‘档次’不高，以致我们这些师范‘出身’的人感到很没有面子。别人问起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总是要声明：报考时我是教师，政策规定只能读师范院校……再到中小学去看看吧，很多小学、初中，几乎成了女教师的一统天下。男性有许多不愿当教师，当了教师的也有不少在想办法改行。”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在 1991 年北

京师范学院录取的新生中，女生占 77%，男生只占 23%。师范院校缺少男生，中小学当然就成了女士们的天下了。

男士们跑了，他们去中外合资企业，去行政机关，去公检法，去赚钱，去当官，去风光……留下的是女士们。

女士优先，女士优先！中国教育中的“女士优先”并不是女士们的胜利，而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中国孩子们的悲哀，也是中国男人和女人的悲哀！

上海市小学教师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48%；罚抄一百遍：老师是否心理偏执；教师工作紧张程度 6.2 级；中国教师每天劳动时间比其他岗位职工多 1.67 小时，娱乐时间少 0.5 小时，睡眠时间少 1 小时；“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灵与肉的冲突

上海市小学教师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48%。1996 年 11 月 1 日，影响巨大的《南方周末》在头版发表了该报驻沪记者陈建军的《做个健康的灵魂工程师》一文，披露了上海市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课题组对上海一百余所小学 3055 名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测试结果。

据该文说，上海市小学教师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48%；其中 12%有明显心理症状；2%较为严重，与一般群体的“常模”相比，有 23.4%的小学教师超出“常模”2 个标准差。在被测试的小学教师中，13%有焦虑症状，15%有敌对症状，15%有偏执症状，上述三种症状中，都有 2%的教师表现严重。

据说，上述 12%的小学教师如还在讲台上，对学生的安全存在潜伏威胁；2%的小学教师必须立即暂停其教师工作，进行心理治疗。

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读者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当笔者读到这篇文章时，一种苦涩的感觉立刻弥漫了心间。当然，稍后权威的《中国教育报》所发表的《心理调查亟待规范》的“记者来信”让我们稍感安慰，该文说“这个调查结论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证实”，并引证了权威人士对于此项研究所使用的量表不妥当的说法。

我们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材料，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是否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的确需要“进一步证实”、进一步的研究。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例令我们怀疑一些教师是否真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疾病。比如，当学生做错了某一道题时，老师罚学生抄一百遍，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偏执呢？又比如，老师惩罚犯了错的学生方法严重不当，简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因为平时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并无过节，这是不是由于老师反映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心怀不满而迁怒他人的某种心理反映呢？……

人的心理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的紧张程度有关。根据国外心理学家的研究，当代人的工作紧张程度可以划分为 10 级，教师是 6.2 级。比教师更为紧张的职业是：矿工（8.3 级），警卫人员（7.7 级），飞机驾驶员、领港员、记者（7.5 级），警察、口腔科医生（7.3 级），演员（7.2 级），出租车司机、医生（6.8 级），电影导演（6.6 级），助产士（6.5 级），歌唱家、器乐演奏家（6.4 级），消防队员（6.3 级）。紧张程度低于教师的职业是：售货员、售票员（5.7 级），公共汽车与火车司机（5.5 级），外交官与农民（4.8 级），会计师、工程师、律师、理发师（4.3 级），画家、秘书（4.2 级），邮递员、建筑师（4.o 级），电脑程序编制员、银行工作人员（3.7 级），博物馆工作人员（2，8 级），图书馆工作人员（2.o 级）。

显而易见，在中国，比教师工作更为紧张的职业中，飞机驾驶员、演员、出租车司机、医生、电影导演等经济收入比教师要高得多；而与教师收入相差不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工作人员，它们工作的紧张程度又比教师要低得多（矿工的工作紧张程度是最高的，他们的收入并不同工作的紧张程度成正比，但这种工作主要是一种体力劳动，相对简单一些，此处不做详细讨论）。教师的经济地位与他们工作的紧张程度、复杂程度是不相称的，因而便产生了种种问题。

我们在上面所引述的《做个健康的灵魂工程师》一文披露，上海小学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平均每天 8.93 个小时，每周人均授课 15.31 节，其中 46%的教师为 18 节；每个小学教师平均一天辛勤操劳的时间合计为 15.05 小时，

而除睡眠外，休息、娱乐时间每天平均仅仅 1.67 小时。而另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合格教师人均劳动时间为 9.67 小时，比其他岗位的一般职工日平均劳动时间多出 1.67 小时，睡眠时间则比一般职工平均少 1 小时，娱乐时间少 0.5 小时左右。这样大的劳动强度长时间怎么能维持下去？怎么可能会不患上种种生理和心理疾病？而另一方面，他们收入微薄，家计艰难，用一句《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评论诸葛孔明的话来说，就是“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的确，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报上常有某某老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消息。我们在读到这一类表彰先进人物的报道时，更多的是沉重的叹息。1987 年，武汉市教育工会对全市 18909 名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患病率占 68.5%，而职业病（肺病、胃病、咽喉炎）、中老年疾病（心脏病、肝病、高血压等）以及癌症又占病人总数的 61%。1988 年，齐齐哈尔市文教工委对全市的 15467 名教职工进行了健康状况调查，患病教师为 9260 人，患病率 59.2%。1988～1991 年间，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并且呈上升趋势，其中自然包括中小学教师。1991 年，某城市对 1500 名中小学女教师进行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有 51.5%的女教师带病坚持工作，其中积劳成疾的为 45.8%，由于舍不得放弃工作使病情加剧的占 12.4%。而据最近对两省一市教师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有严重疾病的人占总数的 2%。这一比例看似不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数据，它是以十万为基本单位的。

“食少事烦”，“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些评价诸葛亮高尚精神的话，对于不少中小学教师来说也是适用的，他们中间的优秀者其高尚的人格和行为虽然并不显赫，但却足以令人为之感动和感叹不已。

可是，问题在于岂能久乎？！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恶语伤人：“蠢猪，笨蛋！”老师”新点子”：用胶布封住学生嘴巴；”君子动口不动手”；”靠责罚和棍棒压服是懒人惯用的简单办法”；学主日记：“老师，快快放下您手中的棍子吧！”4 岁男孩被逼喝尿；某些教师还需要启蒙；麻将：学校的一道风景线；抽烟：老师带头学生紧跟。

师德何在

“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是靠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

这段话出自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它道出了教育过程中教师品行的重要。中国是文明古国，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古人和今人就特别重视教师的人品对学生的巨大作用。孔夫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的这些话受到了后人的尊重，成了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为人师表，对于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中国的教师在总体上是不错的，许多次的调查表明，社会公众对于教师的道德评价是比较高的。比如在 1996 年 6 月，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组织过一次关于师德状况的抽样调查，在 3015 份有效问卷中，对“班主任敬业精神”、“任课教师教学态度”、“关心学生”、“不歧视、体罚学生”、“不向学生、家长索取钱物”等 5 个项目，满意和较满意的评价分别为 96%、91.3%、92.2%、90.8%和 92.6%。但是，此种调查结果却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毕竟还有近 10%的不满意，何况像“不歧视、体罚学生”和“不向学生、家长索取钱物”实在算不上对教师很高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职业的基本准则。

教师（此处主要指中小学教师）的道德素养的确不容乐观。比如恶语伤人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你懒，你妈也懒，你爸也懒，你们全家都懒！”“蠢猪，笨蛋！你家是傻瓜世家！”“你回答得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是弱智！”教师骂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据一次对学生的专项调查显示，挨过骂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59%。

惩罚学生的手段越来越不像话。罚抄课文、罚扫地、罚冲厕所是一些教师常用的手段。可是，对于学生的惩罚远不止这些。一位数学不及格的小学生被任课老师责罚手拿试卷围着教室跑三圈。三位上课时吃苹果的女生被班主任下令口里衔着苹果站在教室前排示众……

据报道，1996 年 3 月 14 日下午至 15 日上午，浙江杭州市秋涛路小学三（3）班至少有 8 名学生为了上语文课时不再讲话，“自觉地”在自己嘴上贴上了胶布。这个贴胶布的办法是该校三（3）班主任高老师想出来的。她在 3 月 14 日上午上语文课时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块胶布，如果上课时忍不住要讲废话，就用胶布把嘴巴封住。”当天中午，果然有几个学生从家里拿来透明胶布或医用胶布。下午上语文课时，一个学生问了几个作业上的问题，高老师就要这位学生用胶布封住嘴巴。据学生反映，贴胶布的时间可以自由控制，觉得自己的讲话会影响大家时贴上，觉得自己不再讲话时撕下来，但有时撕下来要征得高老师的同意。学生说，有好几个同学贴胶布的时间超过 10 分钟。这个故事有点“今古奇观”的味道。但是，打人的事就不太稀奇。1996 年 5 月 10 日中午，四川剑阁县锦屏乡水磨村私立学校三年级 4 名女生，因故未按时到班午休。下午上课时，班主任王国学将这 4 名女生叫到黑板前，先叫她们背朝全班同学面向黑板，然后责令 4 名男生站在 4 名女生背后，每个男生用教鞭打其中一个女生臀部 20 下，由王国学数数，直到打够 20 下为止，造成被打女生臀部红肿、淤血。这位王国学先生打人颇有

“古风”，他自己“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却打得非常认真，因为他亲自“数数”，认真计算过了的。

也有亲自动手打学生的。1996 年 12 月 5 日上午，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镇北关小学二年级（1）班班主任、代课教师马桂贤，因该班学生刘婷婷未完成作业，就用炉钩子将其面部烫伤三处。

王国学、马桂贤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索。

旧式教育有惩罚的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这都是普通老百姓所熟悉的格言。私塾教师打手心，是许多老人讲给儿孙听的故事，老人们往往还律津乐道。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好传统，是和现代教育文明水火不相容的。蒙田说：“在把幼小的孩子训练得尊重荣誉与自由的教学过程中，我反对一切暴力手段。时下，人们对严刑峻法有点奴颜婢膝；然而我觉得以说理、启发和诱导办不到的事，靠暴力也决不可能办到。”洛克说：“靠责罚和棍棒压服是懒人惯用的简单办法，也是教师们通常所知道的或所能想出来的唯一的管教手段，但却是用于教育中最不适合的手段。”这两位思想家的话都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我们认为，打人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法错误的问题，它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极恶劣的。在现代社会中，学校作为孩子们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应当建立文明、民主、和谐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会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一个好公民。相反，如果孩子们接受了棍棒的教育，他们的心灵就有可能受到污染，就有可能崇尚暴力，其行为就有可能富有攻击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是要建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而实现这个理想需要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人，这就需要学校的文明教育打下根基。打人惩罚的传统实质上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是我们民族肌体上的毒瘤。

学生对于棍棒教育是非常反感的。甘肃靖远县中堡乡营防村营防中学初二的滕爱芳同学在 1992 年 4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

老师，请听我说。

此时此刻，我的心很沉很沉。心里既同情他又恨他：老毛病总是不改，老惹您生气。可是，老师，您知道吗？我更看不惯您的所作所为，望着手拿棍子的您，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不明白，为什么面对一些调皮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做老师的您不用循循善诱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而总是用粗暴的手段，让学生在您的棍子下驯服呢？我困惑！我不明白！我困惑地想着，往事如放电影一般，又呈现在我的眼前……

教室里，一个二年级学生，仅仅是由于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罚跪，头上还顶着两块砖。他才八九岁啊！老师，这难道就是“第二父母”的所作所为吗？当您在用残酷的方法教育我们这些祖国的乳燕时，可曾想过人民给您的光荣称号和它的分量？

老师，听了这些，您有何想法呢？老师，快快放下您手中的棍子吧！不然，您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打人令人反感，甚至令人痛恨。可是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情。据 1996 年 6 月 7 日的《大河文化报》报道，在中原油田中心幼儿园竟发生了一桩教师强迫幼儿喝尿的事件。4 岁的男孩张淼哭诉说，午饭后老师让女孩子去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就尿在屋里了。小朋友报告给童老师，她说，把你尿的喝下。张淼小朋友就用手指蘸在尿里，往嘴里吸吮了 3

次……

人是不能憋尿的。现代医学证明，有尿而不尿，久而久之，会得尿毒症。小孩子更不能憋尿，他们的忍耐力十分有限。“ 憋不住了，就尿在屋里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正常的是，那位童老师竟然为此而惩罚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惩罚，是逼 4 岁的张淼喝尿。于是引来了张淼的哭诉。

张淼小朋友可以哭，也大半只能哭。可是，读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却欲哭无泪。生活中这样的事不是绝无仅有。一位教师上写字课，嫌一位学生字写得太差，就将这位学生涂了个“ 黑脸关公 ”，等等。这一类事情的发生，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个别教师其实还需要启蒙，还需要人权、法制、伦理的启蒙。当然，有类似行为的教师的确是极少数，可是，这就能让人掉以轻心吗？俗话说：“ 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 ”古代的哲人又说：“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这真值得人们警醒！

上面的例子让人们认识到，当今少数教师道德素养的确存在问题。不仅仅是打人骂人，有的学校还公然要求学生说假话，为校方遮丑。1997 年 3 月，《新华日报》在“ 读者来电 ”栏刊登了一封家长来信，信中说其孩子在江都市某中学读初三，开学时交费 675 元，校方给的收据上只写 545 元。两天后孩子回家说，上面有人到学校调查收费情况，老师让学生不讲真话，问到谁就说只交 545 元。不知道该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要学生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时，他们怎样面对孩子们纯朴的眼光？

当今社会，有不少人沉缅于麻将之中，此种风气也污染了校园。某县立中学，一百二十余位教职工中有七十余人会打麻将，其中铁杆“ 麻友 ”不少，每晚至少要开七八桌。夜深人静，噼噼啪啪，成了该校的一道风景。“ 麻友 ”们砌“ 长城 ”是要来点“ 意思 ”的。“ 意思 ”越来越大，一个晚上有时输赢几百上千元。真不知清贫的教书匠怎么负担得起？先生们夜里苦战，白天上课自然精力不济，只好对付了事。

抽烟是社会的一道公害，教师中也有不少“ 瘾君子 ”。一开会满室烟雾缭绕，使人透不过气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不少学生也跟着老师学抽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就吸烟问题曾经专门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要齐抓共管，努力做好中小学禁止吸烟的工作，校长、教师要带头不吸烟。国家教委的主要负责人专门强调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还有许多许多事例，我们这里不再赘述，免得有损教师的“ 光辉形象 ”。但是，教师的形象“ 光辉 ”不“ 光辉 ”，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为人师表，实在是责任重大，先生们，千万马虎不得！

清水衙门也患官场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上不能下，学校也不例外；教师大演“ 脏利大逃亡 ”；互相挖墙角，“ 肥水不流外人田 ”；研究表明：公元 2000 年，全国初中教师仍有 20%不合格；羊城缺少电脑师资。

精官强兵

1958 年，英国人帕金森出版了一本政治小品文集：《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定律》揭露的是一种官场病，即因人设事，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总是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几乎每搞一次机构改革，机构就会有所增加，处长科长一大堆。可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中小学校也传染了这毛病。学校本来是清水衙门，想当官的不会到学校来。但现在的学校，官是越来越多，多得有点令人吃惊。

据报上说，有这么一所农村小学，学生不足 300 人，教师不满 20 人，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机构应有尽有。于是乎，“ 脱产 ”、“ 半脱产 ”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就有八九个，几乎占教师总数的一半。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据记者调查，一所十几个班的中学，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就有五六位，再加上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创收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又是五六位，十几位书记、主任领导着不到 80 位的教职员工，显得有点“ 那个 ”，不是很协调。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一些市县教育局的负责人说：目前中学领导人数超过规定数额（按国家规定，一所普通中学校级干部定编三人，即校长、书记、副校长）的学校比较多，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教育局不能严格按照干部定编、任免规定办事，而学校的领导也能上不能下。一位校长说：“ 我们学校的两位主任，一位 56 岁，从 30 多岁就当教导主任，一干就是 20 多年，头发白了，腰杆弯了，体力也不支了，现在免职，于心不忍；可活儿还得有人干，只能再提拔，这样干部名额就多了。 ”

这话讲得合情合理，有些事的确很难办。当上了官，又没有犯错误，谁会主动下去？至于能力嘛，还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于是，终身制就大行其道，当官的也就越来越多。

可当官的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指手划脚的人多了，扯皮的人和事也多了。一些教师本来是业务骨干，可一当官，上讲台的时间就少了。这一多一少，对教学质量当然就有影响。精官减政，这不但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问题，中小学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官要精，兵也要强。这样的队伍人强马壮，才能打胜仗。可是，当前的教师队伍却面临着种种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军心不稳。

据 1992 年国家教委公布的教育统计公报披露：全国小学专职教师由上一年度的 553.22 万减少到 552.65 万，减少 0.57 万人；中等师范学校专职教师由上年的 5.72 万减少到 5.7 万人。

1987 年，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在 1000 名教师中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 如果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你选什么职业 ”这一问题时，继续选择教师职业的仅仅占 28.5%。

1988 年北京对大学生择业倾向的一次调查表明，中小学教师是大学生最不愿意干的职业（在所列被选择的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在 1429 名大学生中只有 1%的人愿意当中小学教师，比选择到合资企业者少了 20.6 个百分点。

在 1992 年的一次调查中，中学生最不愿意干的职业之一就是教师。有学生说：“ 当教师，在我们头脑中几乎没占什么位置。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出国深造，如何到外资企业就职。 ”

1996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回答“你对教师这一职业有何看法”时，41%的同学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前途不大，自己从事这一职业并无光荣感、崇高感。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选择教师以外的职业”；27%的同学选择“读师范只是偶然，并没有太多的其他想法”；20%的同学选择“教师工作比较单纯、清闲，竞争相对较小，所以读师范”……

不能怪学生这么想，教师自己就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使尽浑身解数，演出了一部“胜利大逃亡”。

这部“胜利大逃亡”始于何时，我们没有作过精确的考证，但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愈演愈烈。1986 年，江西省外流的中学教师有 999 人，外流的小学教师有 575 人，1987 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外流 600 人，其中自费出国的有 200 人，到外系统的有 400 人。此种情况，后来更加严重。

中小学教师外流，他们或出国留学，或进三资企业，或到工商税务银行，或进党政领导机关……1996 年 3 月 27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庄电一的文章，披露了教育系统内部互挖墙角的情况。这篇题为《教育系统内部互挖墙角何时了》的文章说：在党政机关、工商税务等部门纷纷到教育系统来挖人，不少教师热衷于“跳槽”、改行的同时，教育系统内部的互挖墙角活动也几乎没有停止过，最近在一些地区似有蔓延扩大的趋势。

不久前，记者到宁夏中宁县采访，该县教育局局长张树生以十分激动的语气向记者反映了骨干教师被银川市一些重点中学挖走的情况。据介绍，1994 年以来中宁县已有 7 位业务骨干被挖到银川。而这种情况在邻近银川市的一些市县可能更严重。由于银川一些重点中学工作条件、福利待遇都比县里好，他们来挖人时又许了愿，因而具有很大诱惑力；而县里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留不住人。出现缺额，县城学校便又到乡村学校去挖人，而被挖的人多是有教学经验、能扛大梁的骨干教师。

与这种状况相联系的是，一些大中专应届毕业生还未到校就被挖走或自己联系转走。1994 年，有关部门给中宁县教育系统分配了 65 名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但到校的只有 25 人，而且本科生少，专科生多。1995 年中宁县接收了外语、物理教师各 5 人，无一人是本科生，县教育局只好把他们都安排到初中，锻炼几年再视情况调整。由于骨干教师缺乏，一些学校出现主课开课紧张的情况。

教育系统内部这种互挖墙角行为，是由于各地办学条件差距大、教师待遇差别大造成的……

张树生说，被挖走的教师数量虽然不大，但影响却不小。

中宁县一名陕西师大毕业的高中语文教师，在宁夏时每月只挣 400 元，到广东东莞后还当教师，每月工资竟上升到 1500 元，这在教师中产生很大震动。还有一些教师调入银川市后回到原来学校夸耀新单位条件、待遇如何如何好，更使没走的教师心理不平衡。这样一来，走了一人竟影响一批未走者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教育系统内部“自相残杀”，当然有可能造成“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好校更好，差校更差，但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毕竟“肥水没流外人田”。问题的关键是，教育这块“田”到底有多少“肥水”？

据 1987 年的统计，全国小学教师学历未达标（中师、高中以上算达标）的占 34.4%；初中教师未达标（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算达标）者占 67.3%。1988 年北京市对于 8 个城近郊区 52 所小学的 448 位青年教师（35 岁以下为

青年）进行的一项素质调查表明，只能勉强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占总数的42.9%，还有 4.4%的教师根本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总共有近一半的教师素质较差。一项对于全国初中教师调查的结果表明，由于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较低，如果每年以 3.5%的学历合格提高率计，到公元 2000 年，全国仍会有68.4 万名教师学历不合格，占全部教师的 20%左右。

从总体水平看，中小学教师素质尤其是在农村，由于缺乏正规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师，就有了大量的民办教师作为补充。无庸讳言，民办教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

另外，某些科目教师奇缺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说，电脑师资的奇缺就是南国大都市广州中小学校的一个大问题。据 1997 年 4 月 14 日《羊城晚报》报道，近几年来，广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将电脑课列为学生必修课，并为此专门设置了电脑室。但是，因为师资条件有限，许多昂贵的电脑设备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育才中学初一年级 8 个班的学生，已经一个学期没摸过电脑了。因为学校管理电脑化的需要，原本教电脑的老师本学期的主要工作是把有关档案输入电脑并打印出来。另一位老师每周要给高中的 4 个班上 8 节电脑课，还要上初三的物理课，负荷已满。于是，初一年级学生只好改上劳动技能课，学的是打字。这样，机房的 60 台电脑只好闲置。这所学校的电脑已经更新换代好几次了，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本科电脑专业的老师，现有的两个电脑老师都是“半路出家”的。越秀区有小学 50 多所，只有 12 所学校设立了电脑课，普及率在广州市各个区相对较低。据分析，电脑教师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全区的小学只有一个专职电脑老师。教师水平不高，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学生只好停课。大新小学就因为电脑“塌网”，已经一个学期没上电脑课。

学校缺乏合格的电脑师资，同样也缺乏合格的音乐、体育师资（在乡村尤其如此）……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教育面临着许多挑战，但至少应该建立起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才谈得上别的事情。

精官强兵，这是中国教育最迫切的任务，这是走上教育改革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赤城故事：乡村教师负担太沉重；1996 年中国民办教师平均月工贸 160 元；蜡炬成灰泪始干；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摊派一览表，克扣有清单；小学老教师的新请求：按时足额发工资。

在困窘中挣扎

写下这一节的标题，我们的心就一阵阵缩紧，胸口一阵阵发闷。中国的教师，清贫自是清贫，可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吧。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群教师，他们是在极端艰苦的状态下从事着高尚的事业，其生活之困窘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们就是农村的教师。

1996 年 11 月 21 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发表了《别叫脊梁太沉重》一文。大家从这篇文章里知道了距北京仅 180 公里的河北省赤城县农村几位教师的故事。

郑海文、李桂香：夫妻双双任教于雕鹗乡黎家堡民办小学。34 岁的李桂香得了胃癌，动了大手术。她在大医院化疗，因家里所借之钱花光，不足一月只得回家，至此为治病已花去 16000 元。县教育工会、乡文教组、本乡教师连救助带捐款一共凑了 1000 元，可是进行第二次化疗还需要六七千元，对这个空荡荡的家来说，钱真不知从哪里来？

王升：任教于云州乡北沙沟小学，做了 20 年民办教师，月工资共计 198 元。妻子务农，三年前因胸椎结核住院三个月，花去 7000 多元。按医生要求还得住三个月，因无处借钱，王升老师借了辆三轮推车把妻子拉回家，结果路上颠簸，把伤口震开，又花去 2000 多元。为还债，王升老师从 1994 年开始，每年寒假到北京门头沟的小煤矿背煤，一篓煤大约 120～130 市斤，背一篓得一元钱，一个寒假可挣回 1000 多元。王升老师的大儿子 1996 年小学毕业已考上乡中学，因开学要缴 200 多元学费，家里实在拿不出，只好让其重上一次小学五年级。

降怀全：任教于马营乡满家沟民办小学，欠债 7000 多元。家中 75 岁老母有病缠身，儿子 1995 年摔断了胳膊，女儿因贫血住院，家里 20 亩地全靠妻子一人耕种。家中所欠债务不知何日能还清。

这些教师生活的贫困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吃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过节；平时，他们是以小米、莜麦、土豆、黄豆为生的。夏天，他们一般都是带一顿没有菜的干饭做中餐，其他季节则一天只吃两顿饭。

上面所讲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特例。1994 年，四川乐山市教育工会对 1870 名乡村公办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家庭平均月收入不足 50 元的困难户有 455 户，其中沐川县的 376 名教师就有 224 个困难户。而乡村的民办教师则还要困难得多。1996 年，中国有在册民办教师 180 余万人，他们绝大多数分布在乡镇以下的中小学，占农村中小学教师总数的 30%左右，平均月工资为 160 元。贵州 60%、山西 27%、湖北 25%、陕西 19%的民办教师人均月工资不足 100 元，其中湖北近 8000 名民办教师月工资仅 70 元。他们是中国一个非常困难的社会群体。

在 1995 年《农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文章中，该报记者何兰生对乡村民办教师的困境作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我们摘录这篇文章中的几段，以飨读者：

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恐怕不知道这些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仅有 130 元左右吧？他们的全年收入尚不及城市中公款吃喝的一桌酒席钱。而且这只是平均数、还有一些初级职称的民办教师拿不到这么多钱。收入低倒也罢了，可经常除了国家每月给的 30 元能按时到位外，由乡镇财政补贴的 100 元往往要拖到年底，甚至一年、两年才能解决，有的竟四五年地挂在帐上……

从教师这一职业上挣不来足够养家的收入，民办教师们就拾起他的另一行当，业余时间做一个笨拙而又吃苦的农民。多年的教师生活，造就了他们远不如职业农民的体魄，可弱者也要生存。老人孩子要吃饭，妻子要新衣，民办教师们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只得义无反顾地挑起耕田耙地的重担。他们在学校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像千手观音一样一人兼四五门课，白天是不停地上课，晚上是备课改作业。还得抽时间回到自家的责任田里为全家的生活而劳作……

……终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两面夹击，单薄的身体难以在天地之间昂首挺立了。昔日的大丈夫豪气让位于佝偻、咳嗽和早衰，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劳作终于要挤干他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疼痛使他在讲台上冬天也流汗，一缕粉笔灰甚至也能让他咳出殷红的血来……没有公费医疗的保障，自己一人的病会要了全家人的命。有些民办教师就这样强充自信而终于倒在厮磨半辈子的讲台上；也有些民办教师在教师节免费体检洞悉多年隐患后，很快就从教室进了手术室继而走进骨灰盒。过去多年的自我欺骗被现代医学一举击碎，生命就像他半辈子碾碎的粉笔灰一样飘忽无踪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真是绝大多数民办教师生命的写照。在感叹他们品格的高尚和生活的艰难之余，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提供点什么？如果一旦“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歌谣深入人心，中国的乡村教育体系又怎么维持下去呢？没有了乡村的教育，中国又何谈现代化呢？当然，现在已经有了文件，说民办教师要转为公办，这当然使人看到了希望。报上也公布了诸如浙江的民办教师已经全部转为公办一类的消息，可是在不少地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即使他们真正如愿以偿地转为公办，那又会怎样呢？中国乡村的教师，即使是公办教师也还是很困窘的。在一些人心目中，教师远不是一个让人喜欢从事的职业，而乡村教师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天平上的确没有分量。而在一些地方，他们正当的工资收入甚至还要遭到花样翻新的摊派和克扣。

1996 年 10 月 28 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读者之声”披露了 1995 年全年湖南省某乡政府对教师的摊派情况：

乡水泥厂投产，教师人均集资 1500 元（见乡政府发文）；

石牛公路改修，教师人均捐款 200 元（见乡政府发文）；

救灾基金会，教师人均捐款 20 元；

职称评定基金会，教师人均捐 20 元；

规定教师认购“好运来”奖，教师人均 100 元；

修体育场，教师人均捐款 20 元；

拥军优属费，教师人均捐款 4 元；

防洪保安费，教师人均捐款 30 元。

1997 年 1 月 20 日，《中国教育报》在“读者园地”又发表了四封来信，反映克扣教师工资的情况。其中的一封来信说：

我们是湖南省衡阳县溪江乡中学的教师，近年来，深受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之苦。以 1996 年度为例，我们工资表上的各种集资收费，其项目之多，数额之巨，令人咋舌。下面就是 1996 年度各项扣款清单：

修建省道 1814 线扣一个月工资的 20%（78 元），职评费最低不少于 90 元（若评“中高”要 300 元以上），调资费 10 元，简易人身保险 60 元，养老保险年工资 3%（不低于 125 元），绿化费 6 元，优秀证费 3 元，人民教

育基金参照个人工资基准 100～200 元之间，县一中建校费 100 元（连续集资三年每年 100 元），教师资格过渡费 12 元，报刊杂志费 60 元（教师们对此意见最大，没有订单，强行订阅，连选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最后到位的书刊不足 20 元，且是《衡阳宣传》、《时事报告》两种）。

以上共计 15 项，逾千元，相当于一个工作 15 年的中学二级教师三个月工资。而我们这些山区教师，三分之二系“半边户”，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还得被扣除年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我们实在难以承受，已到了非“减负”不可的时候！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教师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稳定教师队伍，促进山区教育质量提高，我等谨以普通山区教师身份大声疾呼：“我们也该‘减负’了！”

湖南省衡阳县溪江乡中学全体教工签名（略）

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湖南，安徽省界首市颍南程庄小学一位教师的来信说：

我是一个执教 35 年的小教高级教师，我希望贵报多反映一些教师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安徽省界首市颍南办事处 11 月 29 日总算发了教师的 8 月份工资。本应发我 484.5 元的工资，扣除保险 60 元、水利捐资 10 元、教师资格过渡费 20 元，捐资助学 100 元，实发 294.5 元。一位未结婚的青年教师本应发 360 元的工资，和我同样扣除 190 元，学校又扣除他 8、9、10、11 月向学校借的 200 元伙食费。他还有钱吗？9 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还要扣除 50 元的‘献红心”费。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又有谁能知道？欠我们教师的钱在增加，教师的债台也在高筑。今天我冒昧给贵报写信，希望贵报能为教师说几句话，请按时足额发给我们工资。

还有江苏省铜山县何桥乡肖庄中学一位教师的来信说：

去年 12 月 20 日发放工资，江苏省铜山县何桥乡某中学的教师，个个愁眉苦脸地从会计手中领取了盼望已久的 10、11 两个月份的工资——一张近期存款单。其实，乡政府这种做法在 9 月份已尝试过一次，不过那时每人仅给一张 250 元的存单（本人仍保存着），余款发放，这尚能满足广大教职工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人们也就认了！然而，这次竟将两个月的工资只

开一张存单！哪管你饿着肚子喝西北风！

对此种行为，我们不禁要问：当教师权益受到侵害时，又有谁能为他们仗义执言？

中国的乡村教师真的是在困窘中挣扎，这实在不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所讲的话值得我们这些先哲的后人警醒啊！

9 社会的责任

社会对中小学教育的影响

教育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事，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业。一个不能担当起自己的教育事业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教育的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在临近 20 世纪末的今日来审视我们的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究竟做得怎样？我们的笔头并不轻松。

路通了，400 名孩子却失去了教室；800 多座坟墓占据着小学校园；“ 娘娘 ”坐进校园里，神仙在此大过瘾；信息入侵，污染校园；雨中上演夹道欢迎，领导高兴学生感冒，催粮募捐，学生当了“ 开路先锋 ”；新鲜事：农民缴售烟叶与子女上学挂钩。

保卫校园

这是常见的一幕：赤身裸体、浑身泥污、披头散发的一个男人在怪叫，在追逐学生，学生们吓得到处躲藏，年幼的低年级学生竟嚎陶大哭……

这种景象也常有发生：穿着洋气的青年哥哥凶巴巴，恶狠狠地在找学生要“保护费”，谁敢不给，刀子就拿出来了……保卫校园，保卫校园！这是社会的呼声，这是学生和老师的请求，这也是家长的心愿。可是，保卫校园仅仅是把疯子和流氓赶走吗？不！

保卫校园，首先要保卫校园“领土”的完整。而这一点在一些地方却成了大问题。据 1996 年 1 月 31 日《检察日报》报道，山东省农机所子弟小学有在校学生四百余人。1993 年，济南市修建东南外环路，占去了该校 2/3 的校舍，学生们失去了教室。市政府同意无偿划拨 10 亩土地给学校建新校舍。

学校在 1993 年 4 个月的时间里连打了 4 份报告，10 月 4 日，济南市东南外环路工程会战总指挥部下发了文件，按东南外环路征地政策每亩 1 万元拨付给城区东南外环路施工指挥部。但“区指”负责人却说：“这个文件我们无法执行，用 1 万元到哪里去征一亩地？”此话令小学领导瞠目结舌。他们没料到，当初市里一分钱不花，就把他们的校舍划去了 9.72 亩；如今每亩 1 万元，反而征不到地！

学校怕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只好租来仓库给他们作校舍，让教师们挤在一间漏雨漏雪的板棚里办公，同时他们再次向市领导反映情况。

1994 年 1 月 20 日，济南市市长谢玉堂就小学校舍被占一事作出批示，要副市长赵志冰“将此事办好办到底”。经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在 X 村划拨 10 亩土地给小学，然而该村负责人却提出两个条件：要让该村孩子在小学无偿就读；征地费用要增加到每亩 30 万元。对这两个条件，小学表示不能接受。

一晃七八个月过去了。1995 年 8 月 18 日，在市政府同意征地费用提到每亩 10 万元的基础上，市土管局终于代表市政府与 X 村正式签订了征地协议，由市教委和某局分别承担 40 万元和 64.13 万元的征地费用。但某局的 64.13 万元却一分都没到位。记者到这所小学采访时看到，为了给孩子们腾出一点学习的地方，山东省农机所的职工们都搬到了所里的实验楼上住，把原先他们居住的简易平房腾出来给孩子们上学；十几位教师挤在一间平房里办公，甚至两人共用一张办公桌，站都站不下。

一间缺了一角的教室里，满满地坐了六十多个小学生。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放在讲台旁一角的一只小煤炉，给孩子们增添一点可怜的热量。

小学校长张宝珍说，几天前济南下了一场小雪，一天里就有 3 处教室出现漏、塌现象。

三年，400 名孩子没有教室，这种情况不知道现在改变了没有。这是发生在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大省省会的事情，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印在一份中央司法机关的大报上面，人们会以为这是阶级敌人的恶意中伤。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太多，可是，类似某某小学的操场被占了的新闻，我们过去读过不少，现在也还时有所闻。

活人要搞一些工程挤占学校的“领土”，这是常有的事情。死人也来凑热闹侵占校园则可称之为新闻甚至奇闻了。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报道。

1996 年 11 月 17 日《北京晚报》报道，深圳市海滨小学一半左右的校园用地被八百多座坟墓占据着。重阳节下午，紧挨着教学大楼的坟场有好几拨

人在上坟，他们将装在坛子里的人骨头和骷髅摆在塑料布上晒太阳。每逢年节，校园内的坟场上香烟缭绕、鞭炮声不绝，学生根本无法安心上课。

由于这些坟迁不走，学校的二期工程无法开工，教学大楼只能盖一半，钢筋水泥安放在外。明年眼看许多适龄儿童等着上学，可是学校由于目前的情况，很难扩班招生。南山区委、区政府已经为建设新坟场划出了用地，并召集有关部门开了多次协调会，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这种现象决不是个别的。1997 年 1 月 6 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说，两位读者彭大贵和唐美华在苏北农村所见到的 14 所中小学中，除了 6 所（其中 3 所新建）学校校园无坟墓外，其余均有坟墓，多的六七座，少的也有一二座。据反映，这些坟墓有的是坟主占着“风水地”不肯搬走，有的是乡、村干部老祖宗的“保佑地”，也不肯搬走……到一定的时日，坟主及亲戚便来烧香、烧纸、燃放鞭炮，校园清净之地备受干扰。

现在，城市中许多中小学都处在各种违章建筑、电子游戏厅、录像厅、歌舞厅、饭店和小商小贩的重重包围中，对校园里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就如本书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

保卫校园，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生活实际的需要。除了“领土”被侵占之外，除了暴力入侵之外，精神的入侵也使人们提出了保卫校园的要求。例如，对于校园的“信息”骚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许多中学生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这些信件一般以“内部资料”的面目出现，其内容荒诞不经。如一份以“河北邯郸市磁州华隆高新科技产品开发中心”名义编发的《产品简介》的“邮购信息”推销这样一些产品：“雄狮丸”、“中国猛男”等药品；“麻醉烟”，“不用施术催眠法”等“仙道绝学”；“勾魂倾心术”、“生男生女百种秘方”、“相思法”等“神术”；“小本发大财”、“麻将场场必胜技巧”等绝招……

年少的中学生容易轻信，如南京某中学一名中学生收到这类信件后按要求寄去 30 元人民币邮购“喝酒永不醉法”，得到的资料介绍的秘诀是“将酒偷换成水”。另一中学生按信件要求汇上 60 元邮购“一本万利致富法”，两个月后对方回信说“因材料涨价，需再汇 50 元”，钱汇过去后就杳无音讯。

“信息”入侵，轰炸校园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全国各地屡有发生。这大约也是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吧。可是，此种“信息”使得宁静的校园变得不宁静，它的可怕甚至远过于疯子在校园里撒野，因而，保卫校园就变得更为迫切。

保卫校园，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还得对干扰学校工作的某些领导说“不”，而这是很困难的。不怕县官，只怕现管。要学校拒绝领导的一些要求，真是勉为其难。而不拒绝，孩子们就要受罪了。

据 1996 年 2 月 4 日《金融时报》报道，1996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时，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中心小学 200 名学生根据该镇领导的部署，在寒风大雨中举行夹道“欢迎仪式”，迎接安庆市领导和在望江县参加会议的与会人员途经华阳镇视察。当时，大雨从头淋到脚，道路两旁的学生冷得直打哆嗦，仍然要一遍一遍地呼喊“欢迎欢迎”，直到嗓子喊哑。欢迎仪式结束后，大部分学生都患了感冒，一些学生还住进了医院。

这种场景我们并不陌生，但那大都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想不到“文革”结束 20 年后，此种场面又会再现，而且是在大雨之中，真是难为了孩子们！

还有更奇怪的事情。据 1996 年第 14 期《半月谈》杂志透露，近年，陕西省泾阳县某地每到夏秋征收公粮时，当地政府便给中小学校下令：全部放假 2～3 天，学生回家催家长缴粮。此后学生凭售粮发票方可上学，否则不准进教室。1996 年元月，政府组织收购“爱国棉”，每人要交 45 元差价款。学校又放假 3 天让学生回家去“动员”家长。当时，村组干部带路，校长教师在前，公安、政府人员在后，车子紧跟，声势浩大。到 5 月份，政府又开始了“两基达标”集资募捐活动，农民人均 120 元，当地教师。学生又成了“开路先锋”。学校又放假，又开大会动员，并规定谁家不交款，学生就不准进教室。在这个地方，学校的“开门办学”倒是搞得很好，教师和学生几乎成了政府的“工作队”，催交钱粮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有这种“土政策”的并不是只此一家。1996 年 10 月 3 日《中国教育报》报道，一向以种植烟草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河南省郊县家头镇，为确保烟草利税的完成，入夏以后，采取了农民缴售烟叶与子女上学挂钩的政策。该项政策规定：学生开学入校需交 15 公斤的售烟条，否则不准入学。这是一项“发明创造”。当地一位老农民说：“我活了几十年，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政策。”这样，一些没有种烟的农户就只好让孩子到外乡去上学，没有条件的就只好让孩子辍学在家。

活了几十年的老农总算开了眼界，他见到了从未见到过的“新鲜事”。读者读到这里想必和我们一样心情沉重。中国的孩子们应该受到保护，再也不能让他们站到雨地里去举行欢迎仪式,再也不能让他们去当催粮催款的‘工作队”，再也不能让他们先交售烟条才能上学，再也不能让“死人”和“神仙”占据校园……

保卫校园，让校园成为孩子们神圣的天堂！这是社会的责任，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天职。

错字掉字，课本不再神圣；小学生来信：

新课本令人扫兴；教材错误百出，学生上诉法庭；中学教师来信：《中华美德丛书》实在不美；无错不成书，孩子们也学乖了；“孔子是我国著名的什么家？”书上的标准答案：“老人家”；大学副教授对幼儿故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舶来品充斥少儿图书市场；儿童读物，价格令人咋舌；中小学图书馆日渐衰落。

书的悲哀

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他们小时候的课本是非常神圣的，那里面很难找得到差错，甚至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如果哪个题目做不出来，哪个地方不好理解，那一定是自己出了差错，课本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难道课本还会出错吗？人们对课本的正确性是从不怀疑的。

现在的课本则不同了。有的题目学生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拿过来认真分析，原来书上印错了；有的句子，孩子们大声朗读，爸爸妈妈听在耳朵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仔细看书，原来掉了字。于是，爸爸妈妈免不了叹口气，说点风凉话：“现在的课本真不像话，比我们小时候的差远了。”

这是九斤老太的哲学。可这哲学偏偏还有市场，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问题不在于九斤老大有偏见，而在于现在有的课本真的“不像话”。

1996 年 3 月 25 日的《中国教育报》发表了山东省曹县庄寨镇张寨小学学生张贵寅的来信，信中说：

开学后，新课本一发到同学们手中，我班同学大为扫兴，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呢？

原来由菏泽地区教研室编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山东成武县印刷厂 1995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小学语文课堂练习第五册，印装质量较差。

印刷方面，有的书页字迹重复、模糊、不易辨认。有些字印得不明显、不清楚。还有多处印错题，并有一些错别字。

装订方面，一是缺页较多；二是装订颠三倒四，如 15 课后，就是 18、17、16 课，还有的开头就是 29、30 课；三是一本书里竟有几课重复的课文。

印装小学生课堂练习册，不能光想着赚学生的钱，也要为学生的学习着想。像这样印装质量较差的课堂练习册，怎能不影响学生的学习呢？

这样的课本肯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印制装订质量有问题的课本和那些出版课本的单位，就必然会遭到学生的抗议。1996 年 1 月 9 日，天津市中山涉外金融职业中专学校韩天竹、茹建凯等七十余名学生上诉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指控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法基础知识》一书内容错误百出，使包括原告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读者受到了损害，已构成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罪”。有关人士称，该案系全国首例因教材质量问题引发的诉讼案件。

我们很高兴读到这条消息。原告和被告的是非自有法院判定，用不着我们多言。学生们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向教科书提抗议的确令人可喜，这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了首例教材质量案，开了一个头，便会有人跟上，这是否会促使孩子们的教科书质量提高呢？应该有点作用吧。

1996 年 12 月 26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川乐山市中学严志烈等三位教师的来信，现摘录如下：

我们是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最近，一些同学读到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学生的《中华美德丛书》（共 6 册）。我们发现，其中《成功之路》和《生命之光》两书除某些观点有失偏颇外，文字、标点、语法、逻辑错误多得惊人。如第 3 页“……丰富的饮食、机枪、原子弹……”；第 6 页“宇宙的历史、自然、人类的历史，于是……”；第 25 页“……继续钻研、修养、实践这大志的自我人格”。书中的错别字则更多，如将“像”写作“象”，

将“磨练”写作“磨炼”，将“呕心沥血”写作“沤心沥血”，将“一副对联”写作“一付对联”，将“治”住洪水写作“制”住洪水，将“打鱼”写作“打渔”，将“仁人志士”写作“仁人智士”，将“精彩”写作“精采”，将“辍学”写作“缀学”……《生命之光》一书中，除有不少生造词以外，类似上面的错误也不少，如将“合乎”写作“合符”，将“气概”写作“气慨”，将“朝廷”写作“朝庭”，将“抽泣”写作“抽涕”，将“讴歌”写作“呕歌”，将“抨击”写作“评击”，将“震撼”写作“震憾”，将“两肋插刀”写作“两胁插刀”，将“狭隘”写作“陕隘”，将“献身”写作“献生”，将“屈服”写作“倔服”，将“剧烈”写作“巨烈”，将“鄙视”写作“卑视”……书的末尾更是莫名其妙，语言让人哭笑不得。两书中还有许多数字、标点用法不规范、不统一的地方，让人感到不是在读内容，而是在改错，有时比改学生作文还难。

两书每本字数不足 6 万，而每本书差错累计竟达近百处。作为学校的老师，我们 11 月初曾打电话到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位女同志说：“错误难免，现在是无错不成书。”当问书的责任编辑李××是什么人时，那位女同志说：“是我们副社长。”

“我们副社长”编出了错误百出的书，他（或者是她）的手下似乎还很理直气壮，真让人不可理解。中国的图书质量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中，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少儿图书也是“无错不成书”。以致于一些小学老师抱怨说，书上经常出现错别字，图画跟说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等错误也为数不少。孩子们也学乖了，他们在读书过程中也经常说：“书错了。”误人子弟的书真是误人不浅。这种状况终于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据报道，1996 年 8 月，针对一段时期以来许多出版社超范围出版教学和少儿两类图书，质量却无法得到保证的混乱局面，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对全国教学用书和少儿图书进行质量检查的通知》。这次图书质量检查的重点是图书的编校质量。检查的范围是全国各有关出版社 1995 年新出版的教学用书（包括各类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读物）和少儿类图书。检查后将对不合格的图书采取处罚措施。

这次检查的效果怎样我们不知道。显而易见的是，检查是“技术性的”。可是，孩子们所读的书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却比错别字更难令人容忍。如著不信，试举一例。

提问为：“孔子是我国著名的什么家？”

一般的回答是教育家、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可是，一本名为《小学生智力问答》的书所提供的标准答案是：“老人家”。

“孔子是老人家”。人们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这对开启小学生的智力又有何益？

类似这样的书还有不少。湖南湘潭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黄俊伟曾发表文章说：“在给女儿讲幼儿读物上的故事时，不知是自己的理解水平太低，还是某些故事的内容逻辑混乱，我这个大学副教授竟常有不知所云、讲不下去的尴尬感觉。前几天一篇刊登在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量颇大的《幼儿画报》1996 年第 1 期上的名为“三个猎人”的故事，硬是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篇小故事很短，仅二百余字，可我却反复细读了多遍，仍百思不得其解。转而去请教同事，仍然不得要领。现将其抄录于此，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指点迷津：

从前有三个猎人，两人没带枪，一个不会打枪。他们碰到三只兔子，两只兔子中弹逃走了，一只兔子没中弹，倒下了。他们提起一只逃走的兔子朝前走，来到一幢没门没窗没屋顶也没墙壁的屋子跟前，叫出屋主人，问：“我们要煮一只逃走的兔子，能否借个锅子？”

“我有三个锅子，两个打碎了，另一个掉了底。”

“太好了！我们正要借掉了底的。”三个猎人听了特别高兴！

三个猎人用掉了底的锅子，煮熟了逃走的兔子，美美地吃了个饱。

“三个猎人”的故事让一位副教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的女儿和读者诸君能“摸得着头脑”吗？这样的书不读也罢！

可是，孩子们总得读书呀！他们读什么呢？

据报道，武汉市文化部门对该市书刊批发市场作过调查，发现根据海外同名卡通电视片改编引进翻印的少儿读物至少占了少儿图书品种的 80%，种类不少于 300 种。从图书的质量来看，其粗制滥造、血腥恐怖、低级庸俗的画面、内容令人忧心忡忡。一些读物从封面到内页插图、文字无不充斥着对少儿读者极为有害的暴力、怪诞、迷信乃至色情等不健康的内容。以从日本翻印过来的《七龙珠》连环画为例，其画面头绪繁乱，内容也不完整，充斥每幅画面的无不是刀光剑影的残暴角逐，有些插图文字简单到只剩下“啊”、“杀”、“砍”、“冲”等几声类似血腥兽类的嘶吼。

中国的少儿读物几乎成了舶来品的天下。继前些年的米老鼠、唐老鸭、克塞、希瑞公主等卡通形象越来越多地进入少儿读物之后，圣门士星矢、超霸恐龙、忍者神龟、望乡战士等紧步后尘，现在也成了不少出版社竞相争逐的读物选题。此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年幼的下一代心中难道就不能占有主要的位置吗？难道就让孩子们沉醉于日本武士的英勇故事和美国英雄的刀光剑影之中吗？

该悲哀的还不止这些。如果你漫步书店，就会发现，现在的不少儿童读物的价格令人咋舌！

一套《自然科学全集》共 10 册，售价 200 元；一套《西游记绘图读本》，售价 357 元；一套《动物图解》15 本，售价 900 元。这些儿童读物都是硬皮精装，书里多有精美彩图，卖者声称有一定的保存收藏价值，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敬而远之。

儿童读物的价格涨幅实在过大。有资料表明，图书价格的涨幅是全国零售物价涨幅最大的门类之一，平均涨幅达 35.4%；而就一些儿童读物而言，涨幅还超过了这个幅度。如一套 4 册的《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1994 年的售价为 80 元，1995 年为 100 元，1996 年已提价到 180 元，涨幅是 80%。

书价太贵，太贵！不用说农村的孩子，城里的孩子又有多少人能轻易买得起这书呢？那些赚孩子们钱的人，能否不要在书上面打主意呢？能否赚得不这样凶，搞点薄利多销呢？

太贵的书价令人望而却步，也使中小学图书馆（当然也包括大学图书馆，此处不予讨论）不能发展。北京市 28 中有七百多名学生，一年的图书经费只有 2000 元人民币，能买几本书？据调查，现在不少中小学校每年购书不足 100 本。不少中小学图书馆藏书量没有达到相应的最低标准。有一些学校图书馆竟然把老师和学生都有的教科书或早已过时的旧书拿来凑数；有的学校图书品种少，复本多。据说，某所中学竟有 1500 册《尼罗河的女人》。一些

作文选编，不少学校都有上百册。中小学图书馆藏书太少，那个地方就冷冷清清，不少学校图书馆形同虚设。孩子们缺乏精神食粮，这念的是哪一门子的书？

书的悲哀，悲哀的书！如果仅仅只是书本身的悲哀，那也就罢了。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信息时代，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书。如果没有书，没有内容健康、质量可靠的书来给我们的孩子们读，那又何谈教育呢？中国是文明古国，是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的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的国度，是书的故乡。书的悲哀是中国真正的悲哀，尤其这悲哀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让这悲哀快一点成为历史吧！

惊人数字：200 万“随军”外来民工子女往校园外流浪；北京“浙江村”：小女孩说：“我爸爸不让我上学，说花钱太多”；菜市场：孩子们玩得真起劲；权威人士警告：“野”孩子将是诚市里最可怕的不稳定因素；广州：“兴乐小学”起风波；专家分析：权利属地化和外来人口子文就学难；“大道理”：孩子必须接受教育。

芝麻，开门吧！

历史进入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于是，像当年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一样，今天的农民也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城市挺进，组成了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流动人口 8000 多万，并呈继续增长的态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 1.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0%左右。在这支流动人口大军中，随父母一起流动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和少年大约在 200 万以上。以北京为例，外来人口超过 300 万，其中在京居住的为 287.7 万，且主要集中在城近郊区，相当于城市户籍人口 619.8 万人的 38.4%。即平均每 3 个北京市民中就有一个外地人；其中 0～14 岁的少年儿童占 9.9%，约 20 多万。在广州，外来人口达到 500 万左右，他们的“随军”子女为数不少。在上海，据同济大学学生所作的调查，外来民工子女已超过 12 万人，并且还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全国共有二百多万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随父母流浪，他们大都被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沉痛的数字。这些孩子之所以不能进入学校的大门，是由中国所实行的按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基本政策所决定的。按照这一政策，当地户口的孩子只能就近入学。如果想换一个地方上学，就成了“择校生”，就得要交钱，而这一笔钱为数不少，就如本书第六章所叙述的那样。

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外地民工对于城市来说只是暂住人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定的城市人。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打工挣钱。他们付不出昂贵的“择校费”，孩子几乎不可能上学。

一位来自安徽贵池、在南京当清洁工的妇女告诉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儿子已经 4 岁，应该上幼儿园了，可她与丈夫每月总收入仅八百来元，还要寄回 150 元，幼儿园赞助费要八百多元，每月还要交二百多元。哪有可能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的费用就更高了。

在北京闻名的“浙江村”，有记者碰到一个正在玩耍的 9 岁的浙江小女孩，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小女孩回答说：“我爸爸不让我上学，说花钱太多，让我回家念。我还有一个哥哥，今年 15 岁了，也待在家里呢。”在她所住的村子，一位杂货店主告诉记者，这一带到了入学年龄而没有上学的孩子

大约有一百多个。一位安徽的打工妹说，听说这里的外地孩子上学，大概要交 5000 元钱。

5000 元，对于生活艰难的外地民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要他们为孩子入学如此“出血”，那是不可想象的。何况，一些民工本身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他们在这里交“择校费”，又到那里交“择校费”，在经济上实在不划算。于是，这些孩子就只有随父母在外面流浪。1996 年 5 月的一天，有记者到北京市北郊最大的农贸市场——马甸市场去做过调查。在这个市场里，固定租摊位的就有二千多人，他们主要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浙江和江苏等省，长期在北京居住，大约有 70%～80%的人带着孩子。

下午 3 点半，正是卖菜的高峰时间。在一百多米长的马甸农贸市场里，记者细心地数了数，共有 35 个在市场里穿梭玩耍的外地孩子，年龄从二三岁到七八岁不等，据市场管理人员说，这些孩子整天跟着父母在市场里玩耍。

江苏来的丁裁缝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在马甸小学上一年级，每年除了交 480 元的借读费外，还要交 1200 元的赞助费。如果不交钱，学校就不收他的孩子。安徽一位姓郑的小贩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在入学前找了 3 个学校，交钱都不收，说是安排不下。后来转到了马甸小学，每年要交 500 元借读费和 1200 元的赞助费，还不包括其它的费用。山东一位小贩也说：

“我们出来是想赚点钱，光孩子的花费就这么大，这怎么行？”记者问他们这市场里有多少孩子该上学而没有上？他们想了想说：“我们这里五十多户，还就我们两家孩子上了学。”这些小贩来到北京都已经六七年了，孩子跟在身边无法上学，放在家里又不放心。安徽的小袁说：“我们队里有一个河南的孩子，才 10 岁，刚回家就掉在水塘里淹死了，他妈哭得死去活来。我是不敢把孩子放在家里的。”

民工们不敢把孩子放在家里，只好带出来，城里的学校一般又不收。城里的学校也有自己的难处，教育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教室容量、师资力量都有限，对付正儿八经的城里人的孩子都有点勉为其难，哪里还有余力收暂住人口的孩子？何况，那些孩子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从整体上看比不上城里的孩子，有的孩子甚至连拼音都不懂。在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政策下，老师们又怎么可能会乐于接收这些孩子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城里的学校不愿自找麻烦，外地民工们既不愿大“出血”，又觉得书读多了也无用。他们自己不也没读多少书吗？这工不是照样打？这生意不是照样做？就如一个卖红薯的人所说的那样：“我儿子只要会喊卖红薯就行了，书读多了也没用。”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麻烦就大了。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谈起成千上万的民工子女进不了小学，在街头、菜市场与父母为伴成为新一代文盲时，与会者无不心情沉痛。一位权威人士警告说，今后这样的“野”孩子将是城市最可怕的不稳定因素。

也有人想自己兴办学校来解救外来民工的子女。他们本人也是外来民工的，要自己解放自己。从广东梅县到广州做生意的罗伟权和曾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的石胜会却是这样的人。他们深感外来人员子女入学难，自己的子女在广州也无法入校，就决定创办一所专门为外来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所名为“兴乐小学”的学校于 1996 年 3 月 4 日在广州市海珠区的新窖镇正式开学，共有 322 名外来民工的子弟报名入学。可是开学这天学校举行升旗仪式

的时候，创办人罗伟权和石胜会却被人带走了。

兴乐小学于 3 月 19 日被正式通知停办了。据说，其理由是环境太差，手续、设备不齐全，属于非法办学，并且主管当局也的确有文件作为凭据。

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有文件又怎么样呢？外来民工的子弟上不了学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就此作了颇为详尽的分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都具有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但是，长期沿袭下来的户籍制度使这些权利属地化了，也就是说，这些权利只在每个人的户籍所在地有效，一旦离开了户籍所在地，权利只是一纸空文。

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的社会里，权利的属地化并不影响人们平等地享受公民权利；但在社会流动的规模和频率都日益加剧的今天，权利属地化的不合理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城镇，在沿海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口已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些外来人口在新的地区工作、生活，许多人还成了家，生了儿女。但是，由于权利的属地化，他们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许多方面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权利属地化对于儿童的影响更为严重。这些孩子随父母在非户籍地出生、成长，他们对自己的户籍地没有父辈那种对家乡的眷恋之情，绝大多数成年后不可能再回去，将成为户籍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群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但是，他们得不到教育，成为社会的新文盲一族；他们没有属于孩子的世界，从幼年起就随父母浪迹社会，缺乏系统的道德伦理教化；面对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迅速增长，而自己却很少有权享用的社会，他们是在一种贫困感、被剥夺感、被歧视感中成长的，因此，心理健康、人格发展都是令人担忧的。

……以今年 3 月被关闭的广州“兴乐小学”为例，对外来人口自费办学，应在办学人资格、办学过程、办学条件、办学费用等方面有一套系统的审批、监督体系，防止以办学为名、骗取钱财为实的人钻空子。但又要看到，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毕竟是社会中低收入者，靠他们自己出钱办学，是不可能达到公立学校的办学要求的，更不可能像对“贵族学校”那样要求这类私立学校。要看到，能把这些失学儿童组织起来，学习文化和接受道德教育，即使培养水平达不到城市公立小学的要求，也比让他们失学、浪迹街头要好。其实，“兴乐小学”的办学条件大概不比这些孩子家乡的小学差……

社会各界对外来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国家教委基教司义务教育基金处的姜永久处长指出，解决外地民工子女入学，最直接的目的不在于他们将来能否考上大学，而是会识字，会读、写、算，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以便将来更好地掌握谋生的本领以及做一个好人。在办学形式上，应该灵活，不拘一格，无需非得具备什么“办学要求”。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姜处长说：“民工子女入学，可以适当缴纳点费用，使学校觉得不白办，家长也承担得起。至于校舍，可以采取办晚班、节假日班的办法，这些时间加起来，一年是 200 天。现在在校生的学时为 210 天，完全符合规定学时。”在师资方面，姜处长指出，可以利用退休教师，甚至是采取家庭办学的方法，收费灵活，还可采取计时收费的方式。

广州市政协委员屠鹤云也指出，决不能让外来人员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在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和地区，教育部门应主动研究解决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途径和办法；通过社会力量办学和私人办学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条可取的新路子。他认为：一是主办人要有一定的教育管理经验和能力；

二是有基本的教学场所；三是有基本的师资力量。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这是最根本的。

的确，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这是最根本的，不论这些孩子是哪里人，有没有城市户口。这就是“大道理”，其它的一切理由都是“小道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1996 年 5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名为《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的文件。该文件规定：“流入地人民政府要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创造条件，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可是有文件还是不够的，而且这份文件也还比较空泛，难以具体操作。况且为众多的外来民工子弟入学创造条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动真格的”，是要“花票子的”。

困难，的确很困难。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市，解决常住人口孩子的入学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近年来，小学生入学难困扰着广州不少年轻的父母。据报道，1996 年全广州新增小学毕业生 3313 人，却没有新增一所中学；由于初中新生多，全市初中每班班额将达 56 至 58 人，在东山、海珠等区，一些借读生将不得不被调拨到邻区的其他中学就读。

其实，初中学位吃紧的问题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显露，随着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和借读生的不断增加，这一问题日益突出。据预测，今后 5 年间，广州市年均初中招生数将比初中毕业生多 2000～30oo 人，其中 1998 年将净增四千六百多人，初中学位哪里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近年来，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小学毕业生都能升上初中，广州市采取了压缩普通高中招生班数、扩大初中班额等办法，结果治标不治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绍，现在全市共有 24 所中学只开设了两个普高班，以腾出位置给初中，这势必会影响今后高中的招生容量；而扩大初中班额，则使不少中学窄小的教室拥挤不堪。按国家标准，一个初中班最多容纳 50 人，而广州中学的初中班人数已大大超标。

除了近年来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快，新建学校太少外，初中学校布局不合理，一些新建小区教育设施不配套，也是造成学位紧张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新发展城区的教育设施配套问题，保证居民子女就近入学；此外，还要适当调整老城区的中学布局，缓解个别地区的入学紧张形势。

广州市近年的建设搞得热火朝天，经济实力在全国大城市中仅居上海、北京之后排位第三，可是教育呢？学位紧张怎么办？

现在的报纸上，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通车、某某大厦落成的消息常常可见，这当然令人高兴。如果哪一天，报纸经常出现新建某某学校的消息，那会更令人高兴！那是比某某大厦落成更为重要的消息。

学校、教育，是中国人通向 21 世纪的“高速公路”。

为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来人的孩子，芝麻，开门吧！

“小而全”和“子弟学校”；“子弟学校”曾经辉煌；止业的角色定位和”子弟学校”的归宿；企业办“子弟学校”难以为继；“子弟学校”的“小而散”；“名不正，言不顺”和“子弟学校”“解甲归田”；国企改革的“大文章”和“子弟学校”的“小文章”。

它们向何处去

中国的单位几乎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机构，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小社会。“小而全”的结构曾经是中国社会组织的理想模式。学校办企业和企业办学校就是如此。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就有所谓的“子弟学校”。“子弟学校”是一种附属物，它要依附于某一单位，这个单位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军事机构，也可能是文化组织，也可能是科研机构……“子弟学校”的兴衰成败和它所依附的对象关系密切，这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特殊现象。“子弟学校”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企业所办的子弟学校是全部子弟学校的主体部分，它们的贡献不容忽视。

据统计，到 1993 年止，全国共有企业办的中小学一万八千多所，教师和职工六十多万人，在校学生约六百一十万人，年教育经费（不含基建投资）四十五亿多元。这些数据表明，企业所办的中小学在中国教育事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一些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如太原、长沙、株洲、兰州、柳州、武汉、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企业办的中小学占有“半壁江山”。在铁路、煤炭、冶金、石油、石化、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基本上具有较完备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企业为教育事业投下了巨额资金。比如，重庆钢铁厂每年拿出 2000 万元用于本厂子弟学校的开支。

可是，企业办的中小学现在却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角色定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应不应该办学校？中小学校在企业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应该具有相对专一的功能。事实证明，企业作为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实体应该轻装上阵，“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模式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像一个要上战场的士兵不能身上带着锅碗瓢盆一样，这些“锅碗瓢盆”要扔在后方，士兵只有手拿刀枪才能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学校是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有着历史的原因。从“一五”期间国家建设的 156 个重点工程开始，到后来的五年计划的工程项目，乃至“三线建设”，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让职工子弟有地方上学念书，国家都在建设时安排了附属中小学校的建设。企业不仅办中小学，还办医院、商店等社会福利事业，形成了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局面。企业办子弟学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企业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必然要把包括中小学在内的非生产性事业和社会职能分离出去。这样说来，中小学在企业中没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是社会的事业，是全社会的责任，企业也有着巨大的责任。但这不等于说，企业要自己来办学校。企业对于教育的支持主要在于以税收的方式为社会（政府）办教育提供财政来源。企业不能太“婆婆妈妈”，“婆婆妈妈”的事由政府来管，企业应该去冲锋陷阵，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

其二、实际困难。企业办中小学给自身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武汉钢铁公司每年中小学经费高达 4000 万元，上缴教育费附加 2000 余万元。这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其它类型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现在，无庸讳言，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比较困难的境

地，它们亏损日益严重，已无力支持附属的中小学校。据调查，某工业城市1994 年企业亏损面达 70%，企业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的占 65%。山西某企业子弟中学，由于所属企业亏损严重，无力支持学校，学校的化学实验室连自来水管都无法更换，而厂里只能优先保证教师的工资，其他就顾不上了。在太原，据国家教委的一份材料表明，亏损企业教师人均收入大大低于地方教师，许多教师不安心在企业附属中小学工作，仅山西一纺织厂就一次有 9 名教师调走，同样情况在其他学校也多有发生。至 1994 年底，全国企业破产已达三千余家，依附于它们的子弟学校怎么办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问题不止这些。有些企业所办的子弟学校学生数量不足，造成很大的浪费。据国家经贸委在湖南株洲的调查，当地企业子弟学校每校学生不足 300 人、每班学生不足 20 人的占总数的 15%，而且多数学校师资水平不高。在陕西咸阳市，企业子弟学校一度形成“小而散”的局面，36 所企业办的学校没有平行班的达 11 所，年级不全的有 8 所，一些学校因缺少生源几乎停办；而地方学校则是超负荷运转，9 所地方学校平均班额在 70 人以上，最多的达 103 人。这样，迫使咸阳进行改革，将地方学校和企办学校的界限打破，才使企办学校得以维持和发展。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企业办子弟学校一方面是“名不正，言不顺”，即企业应该专心于生产经营、心无旁顾，把办“社会”的责任还给社会；另一方面，企业子弟学校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某些地方这些困难可能一时会有所缓解，但从全局看，这些困难则是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因而是长期性的。

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在于让企业的子弟学校“解甲归田”，回到地方。

可是，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要走完它还得费很大的气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要克服。比如说，重庆市有数十所企业办的子弟学校要由地方接收，但以重庆市的财力是难以办到的。重庆钢铁公司所在的大渡口区有 14 所企办学校要由地方接收，面对此种状况，该区教委主任说：“十多所中小学移交下来，每年耗资上千万，区财政绝对拿不出这笔钱……”的确，没有钱，神仙也没有办法。困难还不止这些。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大题目，可以写大文章，附属子弟学校的何去何从是这篇大文章中的“小文章”。大文章总体构思好了，“小文章”才好落笔。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篇“小文章”也不容忽视，它的每一笔、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对大文章有影响。可是，大文章毕竟是统帅全局的。现在，这篇大文章才刚刚开始破题，下面要怎样落笔，人们还在探索，还需要时间。

我们还必须等待，尽管事情已非常急迫！“育教无类”和私学兴盛；改革开放：民间办学热潮；办学为什么？发”教育财”吗？“民族学校”，议论纷纷；黎子流说：”民办学校的路还很长……只要继缤走下去，一定会成功”；中国需要武训；教育残疾人，让他们心灵健康；别再让孩子们”祸从天降”；深圳街头卖花童，回到校园吧！

民办学校和其它

民办学校是中国的传统。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至战国后期，私学就非常繁盛了，“中牟之民弃田圃随文学者邑之半”。在这之中，孔子是创办私学的一代宗师。他在而立之年开始私人讲学，有教无类，广招门徒，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墨子也不甘人后，“上说下教”，其创办的私学规模和影响都很大，与孔子的儒家私学并称为“显学”。其他如名家、法家、纵横家等也都聚徒讲学，学生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可以这样说，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兴盛繁荣的局面，是与民间办学分不开的。中国进入了本世纪50年代后，民间办学的传统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暴风骤雨从天而降中断了。民间办学成了一个禁区，一切都是公有的，学校也不例外。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的确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也打开了民间办学的大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已成了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政策。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到1995年底，全国已有民办幼儿园2.07万所，民办中小学3159所，民办中等专业学校672所。各类民办学校在校学生达680万人。可是，与全国68万所公办小学、8万所普通中学相比较，民办中小学还显得太少，它只占全部中小学校的 0.5%，显然微不足道。中央教科所1993年在北京的一次调查表明，90%的被调查者看到和听到了关于中国私立学校兴起的消息，72.3%的人关注私立学校，认为私立学校可以补充公立学校的不足和克服公立学校的弊病。中国的民办学校（当然也包括私立学校）还需要一个大的发展，才能满足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公众的期望。

在民办学校的开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是想发“教育财”的，他们颇具生意的眼光，颇懂生意经，开始尝试办“教育实业”，搞“教育投资”，名为“办学”，实则捞钱。于是，乱收费、高收费司空见惯，虚假广告、欺骗学生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教育目的、教学思想、教育方法等诸多方面也问题重重。

“贵族学校”一度成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活题。“贵族学校”校园漂亮迷人，用高薪请来了优秀教师，学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人校要缴纳高昂的、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仿佛是天文数字一般的学费（如广东英豪学校要32万元）……这些都引起了纷纷议论。有人慷慨激昂地对“贵族学校”口诛笔伐，从办学目的、教育方针、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并且要求立即予以关闭。这种批判和否定也的确击中了“贵族学校”的要害，令人深思。可是，难道中国的学校是多了吗？既然现实社会中有“大款”阶层存在，他们愿意出高昂的学费送子女入读这一类学校，又干别人何事呢？这种“消费”总比比富摔“人头马”要好一些吧？至于“贵族学校”的具体教学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解决吗？何况，兴办学校还可以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也有人这样为“贵族学校”辩护。当然，这后一种声音还显得软弱。

的确，在民办学校发展的过程中，还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种种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禁止民办学校发展的理由。中国的国情是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国家一下子还不太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

办教育。对于社会办学、民间办学、私人办学，唯一的政策选择是：鼓励，鼓励，再鼓励！这当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管理、规范都是必要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要管“死”，而是要管“活”。在这方面，广州市前市长黎子流的一些观点也许能给人们一些启示。据报道，1996 年 6 月 27 日，当时的广州市长黎子流对著名的民办学校英豪学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早就听说了英豪学校，在美国访问就有外国朋友夸奖英豪学校。”

谈到该校办学方向问题，黎子流说：“只要坚持培养四有新人这个方向，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借鉴别人的好东西。”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黎子流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事情不能主观武断，要看实践结果。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把学校办起来，第一没花国家一分钱，集家长的闲散资金投入教育；第二实行一种新的模式，因材施教，教育孩子勤劳、自律、自强；第三教育好了孩子，对家长对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些都是大好事，我是赞成的。民办学校的路还很长，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只要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成功的。”

与民办学校相联的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引进外资办学呢？在经济领域引进外资已是毫无疑义的了，引进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也没有问题。那么，引进外资办学呢？能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只要吸引外资不违反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什么不可以呢？

民间办学是社会对于教育的一种投入，是社会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中国需要武训，需要那种为了办学而不惜乞讨的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承担起对于教育的责任。可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比如说，对于残疾人的教育就还差得很远。中国目前有残疾人数千万之多，他们当中，文盲、半文盲有 6 成以上，上过小学的人只占总数的 1/4。在 14 岁以下的 800 万残疾儿童中，还有 200 万人至今仍未迈进过校门一步。在农村，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在四川仪陇、巴中等县，聋儿的入学率在 30%以下；在安徽六安、枞阳等地，聋儿的入学率不到 20%；在湖南岳阳，有 39%的残疾儿童没有入学。残疾儿童在生理上已经有了缺陷，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正当的教育，那么在智力上。心灵上也会有某种缺陷。这会是我们民族极大的不幸。

又比如说，现在，许多地方中小学的校舍的确有了很大改善，也建起了不少新楼房。可是，中国还是有不少的孩子在陈旧破烂的屋子里上课，他们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1997 年 4 月 9 日早上，广东省清新县回兰镇新洲小学的一间教室突然倒塌，一帮正在上课的孩子们祸从天降，全班 57 人伤 36 人，其中重伤 12 人。这间教室是建于 1970 年的砖瓦平房，主梁由于时日已久，承受不起瓦面的重量而折断。上午 9 时 30 分，学生们正在专心上课，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教室里的学生未来得及反应便被塌下来的木梁、瓦片击中。在事故现场，只见大片塌下的木梁、木片、瓦片交错压在折断成 V 型的主梁上，砸在书桌上。三分之一的书桌被压倒。教室东、北两面砖墙几乎完全向外倒下，一片狼藉。

再比如说，在深圳街头，在广州街头，那些手捧鲜花卖予路人的大多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他们从内地、从贫困山区来到这里，把如花似玉的生命耗费在吆喝卖花上，只是为了挣到那么一点点钱，而他们本该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念书。1991 年，湖南浏阳大瑶乡坳下棚村一次就有 13 户家长将上小学的子女交给不法分子带到深圳街头卖花。这些儿童最大的 11 岁，最小的仅

有 6 岁。1995 年 3 月 4 日，深圳市一次就收容浏阳卖花儿童 40 名。这些孩子白天睡在只垫一张草席的地上，十来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狭窄的屋子里，晚上出去卖花，甚至向外国人乞讨……这样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是多么令人痛心，而当社会各界为此伸出援手、献出一份爱心时，我们又感到了几分欣慰。可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许多孩子流落街头，救助他们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为了我们民族的明天，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承担起教育这份沉重的责任！

10 教育改革：路漫漫其修远

中小学教育如何走进 21 世纪

当中国从“ 文化大革命 ”的混乱中走出来时，有一件事曾经震撼了一代人的心灵：恢复高考制度。那是 1977 年的秋天，从报纸和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考试制度，而不是像前几年一样从工农兵中推荐人员上大学。这个消息使多少已经麻木乃至绝望的心又燃起了希望之光，人们奔走相告，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壮观的一次考试：570 万青年走进了考场。从此之后，每年的 7 月就成了考试月，那一次次的高考就是对于命运的严峻挑战，学生和家长们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于是，就有了“ 高考指挥棒 ”。这根棒比孙猴子的金箍棒更有法力，它神奇地指挥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学习，指挥着中国的教育，从而指挥着中国的未来。

我们认为，以恢复高考为标志的中国教育的恢复实际上只解决了要不要教育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怎样教育，而我们 20 年的实践只不过交出了一张不怎么合格的答卷。这当然有种种原因和理由可以开脱。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和振兴，我们必须改革，必须扔掉“ 高考指挥棒 ”。

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唯一的选择是改革！改革！再改革！

儒家传统：轻自然，重人伦；蔡元培：“ 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 ”；卢梭：“ 我们享有的教育来自大自然 ”；美国老师上“ 蚯蚓 ”课：学生尝了蚯蚓的味道；追寻 ”自然之声 ”的克劳德；于光远提倡童道主义。

师法自然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正儿八经的，从孔夫子开始，教育被认为是大事，但强调的重点则是对于伦理道德的学习。在孔夫子之后，特别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文化政策之后，教育主要变成了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生动活泼、独立思考被赶到一边，四书五经几乎成了读书入学习的一切内容。在儒家思想中，重人伦、轻自然，“述而不作”，这和封建专制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于是，国人受到了禁锢，天真活泼的儿童一个个都正襟危坐，变成了小老头儿，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会写几句八股文，背一些道德教条，就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当然，在中国古代的哲人中，也有推崇师法自然的教育的，比如在老庄那里就有这样的思想。魏晋时期的嵇康是反正统的一个代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到了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私塾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私塾教育让儿童正襟危坐如重囚，对卷茫然，了无生趣，怎能成学？蔡元培则明确指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在西方,遵循自然的教育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希波克拉底说“教育……就像是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进行教诲的地方好比是由空气输给植物的食粮；勤奋学习恰似田间管理；促使庄稼生长、壮大、成熟的是时间。”

卢梭是非常推崇“遵循自然”的教育的启蒙思想家，他在《爱弥儿》中说：“我们享有的教育来自大自然，来自众人，或来自万物。我们的器官和智能的内在发展是大自然的教育；我们学会利用这种发展的能力即是众人的教育；通过对周围环境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万物的教育。”

卢梭的思想和主张在西方影响很大，慢慢地变成了教育的实际做法。中国人到西方国家去，往往发现那里的孩子们常常在老师带领下在大自然中玩，这也算是教育吗？是的，这就是教育。在德国，中小学有许多课必须在户外上。在一些年级，一半以上的课程都必须在大自然中讲授。

有人曾撰文介绍美国教师上的一节“蚯蚓”课：一上课，老师说这节课的内容是“蚯蚓”，请同学们准备一张纸，上来取蚯蚓。同学们捏着纸片纷纷上讲台取蚯蚓。许多蚯蚓从纸片上滑落下来，学生们推桌子挪椅子地弯腰抓蚯蚓，整个教室顿时乱成一团，老师却视而不见。课后老师对人说，上了一节“蚯蚓”课后，假如连蚯蚓也抓不住，那么这节课还有什么意义？

同学们抓住了蚯蚓回到座位后，老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环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蚯蚓的外形等有什么特征？看谁能把它的特点最后补充完整。经过片刻的观察，学生们踊跃举手。

学生：虽然看不见蚯蚓有足，但它会爬动。

学生：不对，蚯蚓不是爬动而是蠕动。

老师：对。

学生：蚯蚓是环节动物，身上一圈一圈的。

老师：对。

学生：它身体贴着地面的部分是毛茸茸的。

老师：对，你观察得很仔细。

学生：老师，我刚才把蚯蚓放在嘴里尝了尝，有咸味。

老师：对。我很佩服你。

学生：老师，我用线把蚯蚓扎好后吞进了喉咙，过一会我把它拉出来，它还在蠕动，说明它生命力很强。

此时老师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激昂地说：“完全正确！同时我还要赞扬你在求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勇敢行为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同学，我远不如你！”

这种课的上法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国的中小学把学生的分数看得那么重，并且按成绩排名出榜公布的做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些西方人士甚至认为这是对学生的羞辱，是侵犯人权。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孩子们本质上不存在好和差的问题，只是每个学生各有兴趣和特长而已。学校和教师（当然还有为人父母的家长）的责任，就是要细心地发现和培养孩子们的潜质与特长，尊重孩子们的兴趣。而兴趣则是最好的老师。法国人让·克劳德则以他的成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例证。

让·克劳德是法国高山生物声学研究中心的主任，40 年来，他一直醉心于收集各种鸟儿和动物的叫声。他创办了希代尔出版社，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传播“自然之声”的出版社。他们在古生物学家的帮助下，制成了恐龙的喉管，从而模仿出史前沼泽地爬行恐龙的低沉吼叫。他们实地录制的鸟鸣和动物叫声达到二千多种，即世界已知动物种类的 1/5 的声音被记录下来了。

克劳德读中学时连续三年没有通过会考，他却不予理会。晚上，他埋头阅读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十卷著作；白天，他则忙着捕捉饲养小动物。一次，他认识了一位汽车厂的工人，那位工人常在早晨拎着录音机去林子里录鸟叫，这启发了克劳德，他一下子就对此入迷了。

从此以后，克劳德到过世界上许多地区，追寻鸟的鸣叫和动物的吼声，他在这之中享受了大自然的乐趣，也获得了成功。他以法国卡尔格地区白鹭、夜莺等鸟儿的叫声制作了他的第一张唱片，结果一年就销售了一万多张，得到了人们极大的喜爱。

克劳德的例子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自然是美的源泉，艺术的源泉，亦可以说是人生的源泉”。孩子们就是应该在大自然中吸收营养，得到灵感，启发创造力。在这之中，给孩子们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给他们一个可以想象的自由空间是多么的重要。玩，就是孩子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于光远先生认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对于孩子尤其是这样，童年时光有无限的乐趣。对于小孩的教育应该提倡童道主义，就是对于人生，也应大行童道主义。

可是，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沉重的书包压迫着他们，就如本书第一章和其他章节中所描写的那样。留学美国的高钢就是由于他的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去上学，却会做《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一类的大文章而对美国和中国的小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们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

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的确，我们需要认真而全面地反思中国的教育文化传统，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方针和教育实践。

马克思：”未来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王国维：“教育之宗旨何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应试教育”危害何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创造力的培养和”情商”；教育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不会洗澡的猫”与”翻江倒海的龙”。

全面发展

对于教育的深刻反思，必须从教育的目的说起。人类为什么要教育？为什么不能像动物一样自然地成长而需要教育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关系到对人的价值的根本认识。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多种学派得出了多种答案。在马克思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克服、扬弃了异化劳动片面性的自由劳动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而在建立新社会之中，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地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毛泽东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他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毛泽东之前，著名学者王国维这样阐述过教育的目的。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其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

时至今日，从理论上反对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大约已经没有了，至少在正规的出版物中是看不到了。可是，中国的教育并没有沿着全面发展的轨道前进。目前的这种教育，人们常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应试教育”。这种应试教育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升学率，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取士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认为是古代科举制在现代的复活与延续。应试教育是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它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采用封闭化、程序化（“正确答案”法）、划一化的考试手段，它强化学生的死记硬背的能力，而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有人总结出应试教育的危害至少有这样几点：

1.冲击德育，乃至能使德育消亡。它对诱发青少年一代的自私意识，造成他们的自私心态，具有社会上任何个人主义宣传都无法比拟的能量；也就是说，它在促成智育膨胀的同时，也空前有力有效地加速着人才的人格（德格）矮化。

2.伪化智育，僵化智育，使智育模式化。它从两个方面阻遏高品位人才的涌现：①不尊重真正人才的第一特征——个性化；②不尊重真正人才的又一主要特征——智能在知识面前的优越性。

3.笨化教育手段，扼杀教育的生动性。应试教育必然牵动出的教材加厚、填鸭式教学、作业量加大，粗看上去很像是提高了对教学水平的要求，其实，这种教学模式最容易掩盖也最容易助长教学手段的“笨化”。

应试教育的危害远不止这些，这种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脱离当今社会的

实际生活，扼杀创造性，加重学生负担，忽视人的个性化发展，制造或加深教育领域中的不平等（它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考试筛选学生，只注重所谓尖子学生），从而贻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中国教育的基本目的，这种教育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素质教育”。人的素质是多种多样的，智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道德素质、个性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心理素质、创造素质、技能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应当包括在人的素质之中,教育就是应该为培养这些素质服务。素质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呢？第一，素质教育必须立足于个体差异，以人的先天秉赋为基础，尽可能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第二，素质教育必须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依据，并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致力于帮助学生形成合理的素质结构；第三，由于个体的先天素质、后天环境和教育影响的不同，学生的素质结构不可能千篇一律，因而，实施因材施教和个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

在素质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创造力是人才的一个根本标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谈到自己所受的教育时说：“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到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老师要你注意的不是最高原则，而是一些新的现象，抓住这些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归纳、总结。”“我的老师泰勒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每天大约要产生 10 个新想法，但其中 9.5 个是错误的，可他面对困难，探索困难。一个人如果每天有一个正确的新想法，也就不得了了。”杨振宁的话令人深思。当今世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公司与公司、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的创造性的竞争。墨守成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应试教育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扼杀人的创造性，就如古代的科举取士，所取之士大多是只会死背四书五经、写一点程式化的八股文的书呆子。罗素对这种教育有着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思想上的大胆给人的愉悦在青年男女中远比在成年人中要普遍得多，在孩子们当中更是非常普遍了，这是异想天开的孩提时代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人到晚年，这种现象就少了，因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家为了绞杀这种思想上的大胆给人的愉悦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智力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仅仅是智力的方面，甚至主要的不是智力的方面。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成功，只有 20%取决于智商的高低，而 80%则取决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称为“情商”，即人的情绪的自控性、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挫折的承受力、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与宽容程度等等。情商高的人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生活快乐，与人相处融洽，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情商与智商不同，它不是天定的，而是由学习培育形成的。对于应试教育的一个严厉批评就是它的“重智主义”倾向，忽视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而这种教育的结果必然造成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一代人，造成“只能动口而不动手”的“君子”。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及其飞速发展会越来越证明应试教育的失败。

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讲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教育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为各种形态的生活。抛开生活这个综合体，我们让孩子们分门别类地学代数，但一无所获；学几何，也一无所获；学科学，还是一无所获；学历史，也还是一无所获；学上几门语言，又是一无所通，最后学的是乏味的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剧本，一大堆故弄玄虚的注解，以及那些须得死记硬背的情节与人物的简短分析。难道以上所列的这些学科

能因为是人们生活中所熟知的就说它们表现生活吗？对此，最好的解释是，这是神在构思创造世界的时候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目录表，他当时还不知道将目录内容怎样排列呢！”的确，教育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为了人们更加美好地生活，而不是死记硬背一些所谓的“知识”。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培养人的生活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还应当记住怀特海的另一段话：“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不重视训练有素的智力资源和全面发展的健康人性的种族注定要灭亡。”

在我们的东邻日本，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所要培养的人才是：（1）具有宽广的胸怀、健康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2）具有自由、自律、自主、自立与公共精神；（3）在国际事务中能干。

有一种说法，如果给猫洗澡，以后猫就再也不会自己洗了。中国的教育不能培养出“不会洗澡的猫”，而要培养“翻江倒海的龙”。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有这个信心：我们的下一代在太平洋的大风大浪中一定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而这有赖于教育改革。

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英格尔斯：“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哈比森：“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乐西”；教育：现代化的“基石”；现代化教育：物质条件、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教育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变化迅速的最为深刻的历史进程。和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牛拖破车的生活节奏不同，工业文明以法术般的魔力迅速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物质的外观上，而且也体现在内在的精神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现代化成了世界性的潮流。

在工业文明所启动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实现现代化也成了几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的目标。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逐步加深，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且日益受到国人的关注。

1983 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为中国教育改革所指出的方向。

对于教育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在于，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过程，不仅是物质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和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就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说的：“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英格尔斯并且认为，不能忽视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发展依赖于教育的进步。社会现代化的中心是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说深刻揭示了教育对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了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也说：“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而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显然只有依赖教育。世界银行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发展报告列举了具体的数据说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结论说：“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其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英国的《科学技术白皮书》说：“随着知识日益成为货物和服务增加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国家的财富也越来越依靠它的人民的知识和熟练的技术。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我们有压倒一切的理由要求加强每个人的科学教育，更加注意下一代合格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培养。”

用一个词来形容教育对于现代化的作用，那就是“基石”。现代化的辉煌大厦要建立在教育的稳固基石上。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有一块横匾：“每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石。可是，这块“基石”本身也应该是“现代化的”。

在“传统的”基石上不可能建造“现代的”大厦。

教育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许我们首先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的教育呢？

现代化的教育首先必须有其物质的“外观”。很难想象在一栋摇摇欲坠的楼房里会有现代化的教育。校舍、教学设备、经费投入等等都体现了现代化的程度。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可以用一系列的指标来衡量，诸如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校大学生占适龄青年的比例、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等。这些指标的数值像一把把的尺子，可以量出教育的先进程度。

教育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条件上，教育是一种制度。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远比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更为重要。如果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科举制的教育，我们能说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教育吗？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包括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学校的办学体制、运行机制等等）要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并为之服务。

教育还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教育的价值观和与之相联系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都应该是现代化的，这才称得上是现代化的教育。“满堂灌”、“唯智主义”、“考试中心主义”等等都不能进入现代化的教育殿堂。

“现代”是一个和“传统”相对应的词。现代教育是和传统教育相对应、相比较的。中国的传统教育延续几千年，基本上是封建的。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一种应试教育。它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它的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不求甚解，以训练写程序化的八股文来说，它忽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述而不作，只要求注解圣人的经典；它提倡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它轻视自然知识、轻视体育……中国的教育中也有优秀的传统，如“有教无类”，如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等。但这些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

和传统教育不同，现代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育。就如本章第二节所论述的那样，现代化的教育应当培养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教育就是生活。现代化的教育就是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愉快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我们的社会正在飞速发展，21 世纪即将来临。面对着世纪之交的时代，中国人在未来的新世纪的竞争中处于何种地位，取决于中国的教育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21 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1997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委员们为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新世纪的人才需要创造性。适应性和协同性。而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从 1901 年废八股、1904 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1905 年完全废除科举制度迄今，中国的近、现代教育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中国的教育，无论是”硬件”和“软件”，离现代化的教育目标还有一段艰巨的路程。可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不能动摇。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在全民教育水准、教育的思想观念、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终身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教育的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向现代化推进。

教育改革：脱胎换骨；日本的经验：从考试地狱中走出来；”马拉松”式的竞争：中国孩子之悲哀；“考分拜物教”；改革的必要条件：全民大讨论；高教改革：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高考改革：变“独木桥”为“多木桥”；

“ 诗外功夫 ”：社会配套改革；标本兼治，治本为主。

改革：生存还是死亡

中国的教育要现代化，唯一的选择是改革。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不仅仅讲的是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中，教育改革喊得还不那么响，还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这更加使得我们感到有一种沉重的责任，要为教育改革大声疾呼。正像社会大众所认同的在经济发展中教育要先行一样，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在中国的全面改革中，教育改革也要先行一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教育改革呢？

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是彻底的、全方位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而要脱胎换骨。具体说来，就是脱应试教育之“胎”，换素质教育之“骨”；脱传统教育之“胎”，换现代化教育之“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教育怎样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也许日本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提供某种经验。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乡间所建的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良好的教育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可是，日本的教育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学历社会”，它的青少年是从“考试地狱”中走出来的。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一次审议报告中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偏重学历的社会风气。人们为了进入一流企业、一流学校而开展了激烈的竞争。家长、教师和学生都不得不卷入这样一种只重分数、偏重智育的教育中去，忽视了对学生个性发展的指导。”1988 年的日本教育白皮书《我国的文教政策——终生学习的新发展》则说：“学历主义不仅助长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思潮，而且还阻碍了终生不间断学习的终生学习社会的到来。”在日本，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好而自杀的新闻时有所闻。

由于考试竞争激烈，日本中小学生课程负担沉重。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日本教育当局试图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而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可是，此举却遭到家长们的反对。许多家长惟恐自己的孩子少学了东西，降低了竞争能力。这样，应试教育尽管从理论上得不到人们的赞成，它的存在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为了改变“考试地狱”和“教育荒废”（教育荒废有种种表现，如逃学、欺侮弱小同学、校内暴力、教师体罚、青少年道德行为不良等等。这实际上是应试教育所导致的后果）的状况，1986 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了“纠正学历社会的弊端”的构想：其一，建立以 21 世纪为长远目标的终生教育的社会，不以“学了什么、学得怎样”看重学历的标准来评判人，而以“曾在何时、何地学习”为标准来评判人；其二，企业、国家政府机构在录用人时应注重个人各个方面的能力，纠正偏爱名牌学校的做法，公正对待正规学校毕业生以外的通过其他途径掌握了一定技术的人才，实行不同学历录用人才和评价人才的办法，实行以能力为主的晋升、调级制度，等等。1987 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又提出了“评价的多元化”构想，强调着眼于发展每个人的创造性，尊重人的个性，实行人才的门户开放政策等等。在这一年，日本开始采取了可以参加两所大学入学考试的“连续”高考方式。1989 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一所大学可以参加两次考试的“分离、分割式”高考方式。1990 年，日本实行了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均可“自由利用”的新的统考制，即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并举办考试，而各大学则可根据这一考试结

果外加调查书、学习能力测验、面试、小论文和实验技能检查等多种方式选录新生。这样“考试地狱”的状况就有所改变了。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日本有同有异。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在就业的竞争中，学历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因而人们就拼命追求学历，追求上大学。几乎所有的孩子，从他们一出生，望子成龙的父母为其所设计的未来中，上大学是其中必须的一项。而现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分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饭碗”的代名词。于是；孩子们一上小学就投入到了这个“马拉松”式的竞争之中：从小学到参加高考，每一步都是紧要的，都放松不得，稍有松懈，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就会从升学的竞技场上被“红牌”罚下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常常用这样的句子来形容中国的教育，这种形容是非常准确和形象的。可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沉重和残酷。那些幼小的、年轻的生命在考试的角斗场上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压力，他们没有了欢笑，没有了玩耍，没有了睡眠，没有了春天，没有了童年，生命的全部意义似乎都是考试和分数。这是中国孩子之悲哀，也是中国成人之悲哀！

考试、分数，是人制造出来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决不是人生命的目的。金钱也是一样，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进行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可是人们却拼命追求、聚敛金钱，为金钱而奋斗而拼搏而不顾一切，马克思把对金钱的这种疯狂追求和顶礼膜拜叫做金钱的‘异化’或称之为‘金钱拜物教’。中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产生了“分数崇拜”或“考分拜物教”。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于考分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对于金钱的追求。在古代社会中，《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在科举取士时期读书人的悲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考试中展现其人生价值的。他们向往的是从书中得来的“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这种非常强烈的功利追求形成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今日变本加厉地压迫着中国的孩子们。孩子们为了未来的出人头地而放弃、丧失了自己现在的生活。

人大都有功利的一面。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应试教育的考分即使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除了“选拔”的作用外，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用处。学生们背诵出来的“条条”一进入社会生活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学生被社会评价为“高分低能”。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教育与生活相背离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搏斗场，可是在这里人们并不是比考分，而是人的素质的全面较量，是胆识、意志力和创造性的较量，是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较量。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最根本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科学的本质要求在于创造。应试教育说到底最大的弊病在于扼杀了人的创造力，从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从制度、思想、方法等等方面来一场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变革。在此，我们不揣冒味，提出如下设想：

1.进行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全民讨论。这样的讨论不是“空对空”，而是“卖打实”的。正如没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难以想象尔后的改革开放一样，关于教育的大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教育改革的思想准备。一旦人们认识清楚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认识清楚了应试教育的危害，认识清楚了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和意义，那么要不

要改革和怎样改革就顺理成章了。“知难行易”，我国古代哲人的这一格言也许并没有过时。全民讨论，就是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支持教育改革，为教育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2.以高教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认为，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人们希望上大学，这种愿望是合理的，要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这一美好愿望。有人会说：中国的高等学校就是那么多，短期内也无力多建，招生数量有限，怎么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呢？我们认为，出路在于改革。中国的高校效率太低。许多教师实际上是“闲人”或“半闲人”，他们一年半载上不了几节课。这不是很大的浪费吗？的确是这样，许多国外的教授到中国来都为中国高校教师的轻松而感到惊讶。从师资力量来说，成倍地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某些大学师资力量不足，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到其他大学聘请兼职的教师呢？鲁迅不就在大学里兼过职吗？那么还有哪些问题呢？当然很多，比如经费啦、学生宿舍不足啦等等。经费的问题，当然有赖于政府加大投入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援，但实行真正的收费上学制度势在必行。上大学收费天经地义，而且收费不能是象征性的，必须按“成本”核算。这样，一方面会促使一部分人自动放弃高考尽早“分流”，另外又可以解决高校的经费不足问题。学生宿舍不够怎么办？学生一定要住在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里面吗？不一定吧。君不见，美国的许多大学生就是在校外祖房住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这样呢？中国的高校再也不能走“小而全”办社会的老路了。绝对一点说，高校对于大学生的吃穿住行可以统统不管，至多在能力允许的范围里管一管，高校只管大学生的学习，吃穿住行的事应该由围墙外的社会去管。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吃穿住行的事自会有人来管的,会有人来开快餐店 ;会有人来建学生公寓……不该管的、管不好的事学校管它干什么呢？

扩大了招生规模，降低了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应试教育就不会那么威风、厉害了。

中国的大学还需要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关键在于怎样办大学？按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子，大学永远办不好。按改革的精神办大学，大学会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3.改革高考制度。“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次高考定终身”，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独木桥”当然容纳不了“千军万马”，为什么不能变“独木桥”为“双木桥”、“三木桥”和“多木桥”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高考不一定要全国性的统考，完全可以由高等学校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只要读过一些名人传记的人就会知道，在二三十年代，不少人参加过多所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现在的高考制度实在不合理，它不允许人的失败，不给学生选择的机会。如果考试是多次的、五花八门的，那么应试教育就会无立足之地，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去作针对性的、千篇一律的准备，没有办法去猜题“应试”。与此相联系的是，应当建立终身学习的制度。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可以坐进大学的教室去学习，去拿文凭。终身可以学习，就不一定只在高中毕业时硬往大学里挤。

4.社会的配套改革。教育的改革不只是教育自身的事，“诗外功夫”也许更为重要。比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非常重要，就学校的效率来说，不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就没有办法提高效率；而不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还有很多的配套工程，比如设立教育银

行为教育事业筹资融资，给经济能力不足的学生提供贷学金以保证教育的公正；设立新的税种保证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严格立法执法以法治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学校内部的民主，让教师和学生管理好学校……

在这里，我们没有具体地、“操作性”地直接提出对于应试教育进行改革的方案，比如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制”，重新考虑课程的设置和编排，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变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技术性”的改变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关键在于“制度性”的变革。“制度”治本，“技术”治标。中国的教育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

我们已经或者正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彻底转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市场的竞争最终将会淘汰一切不合时宜的事物。说到底，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会摧毁传统的应试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壤。但这不等于说教育改革可以坐享其成。

不！绝对不是这样！市场经济的发展猛烈冲击着教育，教育改革不能滞后，而要超前，要先行一步；即使它现在落后了，也要迎头赶上。

为了 21 世纪，为了中国人的崛起，为了孩子们的现在和明天，为了千秋万代的事业，中国的教育向现代化迈进吧！

后　　记

一个冬日的下午，坐在一间屋子里，几位 77 级的同学在相聚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孩子身上。已为人父母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别人的孩子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如牛负重有着切肤之痛，他们生命的沉重也令我们沉重异常。他们已经没有了欢笑、玩乐、空闲乃至睡眠。他们的物质丰裕是童年处于普遍贫困时代的我们所没法比的，可他们精神的重压又是童年只知道摸鱼捉虾的我们所难以想象的。为这些孩子们写一本书，吼叫几声，让世人关注当今中小学教育的种种问题，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由来。

的确，我们毫不隐讳：对于当今的教育，我们是持批评态度的，因而下笔之处偏激、偏颇乃至偏见肯定不少；但是，我们不需要也不想作不偏不倚的持中之论。我们要直抒胸臆，要面对现实，不虚伪，不粉饰。我们要呐喊，要为孩子们大声呐喊！要为 21 世纪的到来大声呐喊！哪怕这喊声不那么中听。

本书由张效雄、刘林平策划。作为策划人，张效雄除了对选题和有关事宜做了一定的工作外，还对写作提纲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并提供了部分写作资料。

刘林平作为本书的主编拟订了写作提纲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本书写作的分工情况如下：

刘林平：序言，第三、七、八、九、十章；张荣国：第一、二章；方向东：第四、五、六章。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述一、雍建雄、聂朝霞的支持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雪晴、文丰、宗善：《菏泽：清查冒牌大中专学生》，《中国青年报》1996 年 1 月 24 日。

王少华：《关于初中生学习习惯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1996 年第 4 期。

杨东平：《高考“女状元”现象之我见》，《南方周末》1996 年 9 月 27 日第 3 版。

秋狄、萧遥：《“议价生”面面观》，《中国教育报》1993 年 1 月 7 日。

郑理、乔玲：《来自京城中小学“择校生”高收费的调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3 页。

杨帆：《学校也能出“大款”》，《南方周末》1996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

杨东平：《去年的教育经费》，《南方周末》1996 年 11 月 22 日第 3 版。

何东昌：《遵循什么原则解决教育经费短缺》，《中国教育报》1996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曲冠杰：《农村教育集资亟须整顿》，《光明日报》1996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毕晓凤：《课室挤满：80 人》，《羊城晚报》1997 年 4 月 11 日第 8 版。

田勇、宗时杰：《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们的下一代——当前少儿图书市场一瞥》，《中国教育报》1996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

伍燕凌：《谁来教育这些孩子——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透视（上）》，《经济日报》1996 年 5 月 8 日。蔡禾：《外来人口的权利》，《南方周末》1996 年 9 月 20 日第 1 版。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殷云、曾华国：《英豪：红旗飘飘的民办学校》，《光明日报》1997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当前中学女教师比重过大不利于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教育文摘周报》1995 年 10 月 18 日第 2 版。

鄢烈山：《师范能“俏”起来吗》，《南方周末》1996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孙大卫：《负担过重，年龄老化，医疗费少——部分城市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不佳》，《光明日报》1988 年 7 月 20 日。章夫：《早逝的“蒲公英”》，《教师报》（西安版）1993 年 1 月 10 日。

金志明：《90%满意率说明什么》，《中国教育报》1996 年 12 月 14 日。

冯国蓉：《上课讲废话胶布贴嘴巴》，《华商时报》1996 年 4 月 1 日。

陆振德：《课堂岂能成刑堂》，《中国教育报》1996 年 11 月 8 日。

刘玉：《马桂贤体罚学生被开除》，《中国教育报》1997 年 1 月 29 日。

赵学礼、木羽：《学校当家人宜精不宜多》，《光明日报》1996 年 2 月 8 日。

《外流，为什么有的教师想方设法另择高枝》，《光明日报》1988 年 8 月 17 日。

胡瑞文等：《关于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问题》，《上海高教研究》1989 年增刊第 24 页。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初中教师供求预测课题组：《我国 2000 年初中教师供求预测》，《教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丰子恺：《“美的教育”译者附言》，《教育杂志》第 23 卷第 2 号（1937 年 2 月）。
甘远志：《“贪玩”的于光远》，《南方周末》1997 年 3 月 7 日第 5 版。
高钢：《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读者》1996 年第 6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9 页。
毛志成：《素质教育如何启动？——中国教育沉思录之三》，《中国教育报》1997 年 3 月 21 日第 3 版。
周志超：《素质教育的基本原则》，《光明日报》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6 版。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4～255 页。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 页。
转引自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80 页。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一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18 页。